

火的考验：



美国南北战争 及重建南部

上册

[美] 詹姆斯·M. 麦克弗森 著

商务印书馆

K712.43
2

856R1

火的考验

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

上册

(美) 詹姆斯·M. 麦克弗森 著

陈文娟 卢艳丽 郑扩梅 译

陆国沛 刘衷易

白自然 校



200224006

商务印书馆

1993年·北京

James M. Mc Pherson

ORDEAL BY FIRE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根据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 1982 年版本翻译

DP97/28

HUǒ DE KǎOYÀN

火的考验

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

上册

〔美〕詹姆斯·M. 麦克弗森 著

陈文婧 卢艳丽 郑扩梅

译

陆国沛 刘衷易

白自然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69-3/K·168

1993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56 1/32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7千

印数 0—1 200 册

印张 12

定价：8.40元

出版说明

南北战争,也称美国内战(1861—1865),是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这是美国北方资产阶级雇佣劳工制和南方种植园主奴隶制矛盾所引起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争。战争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北方资产阶级雇佣劳工制战胜了落后的、反动的奴隶制,便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马克思指出:“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资本论》第一卷“序言”)。

南北战争及战后南部的重建问题一直是美国历史学家关注的研究课题。一百年来,美国研究南北战争和已出版的有关图书数量相当多,但是把南北战争及南部的重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却不多见。有鉴于此,本书作者参考了数百种有关著作,结合自己二十多年教学、研究和写作经验撰写此书,既反映了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提出了作者本人的新见解,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史学著作。

本书作者詹姆斯·M. 麦克弗森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自1962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南北战争及美国种族关系史的专家。除本书外,作者还写过下列著作:《为平等而斗争:内战及重新统一时期的奴隶制废除论者与黑人》(1964)、《黑人的内战》(1965)、《向自由进军:内战中的黑人》(1968)、《废除奴隶制的遗产:重新统一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1975)等。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是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的

历史观点和我们的唯物史观并不一致，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和辨别。

中译本由陈文娟、卢艳丽、郑扩梅、陆国沛和刘衷易翻译，白自然校。原书中的图表，因故没有采用，谨此说明。

目 录

前言.....	1
序.....	6

第一编 战争前夕

第一章 美国的现代化, 1800年—1860年.....	11
第二章 内战前的南部.....	33
第三章 关于奴隶制的论战.....	50
第四章 兼并得克萨斯, 美墨战争和1850年的妥协.....	69
第五章 入侵者、逃亡者和本土主义者.....	95
第六章 堪萨斯与共和党的兴起	117
第七章 危机的深化, 1857年—1859年	133
第八章 危机年; 1859年—1860年.....	155
第九章 脱离联邦与即将来临的战争	172

第二编 内战

第十章 同室操戈: 上南部.....	201
第十一章 战争动员	220
第十二章 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	240
第十三章 内战外犯	272
第十四章 北部瞩望之春	289
第十五章 杰克逊和李的回击	304

第十六章 蓄奴制与内战：北部的政策，1861年—1862年	
.....	329
第十七章 第一个转折点：安蒂特姆与解放奴隶354
附注378

前 言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776年—1783年的独立战争创建了合众国，而1861年—1865年的南北战争则从毁灭中维护了合众国的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国家性质。内战解决了美国的两个基本问题：要么是一个中央政府拥有最高权力的统一的国家，要么是一个由各独立州组成的松散的邦联；或者，要么是这个标榜“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国家，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继续存在下去。1789年的宪法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直到1861年，这些问题还未解决，但不管怎样，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内战创建了当代美国的国家体制，它是以62万士兵的牺牲为代价的——这个数字几乎与美国在其它历次战争中死亡的总人数相等。这场战争也是西方世界在1815年至1914年期间规模最大、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战争。它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动用了参战双方的全部物力财力，并彻底摧毁了战败者一方的资源。内战的主要争端是主权和自由，双方寸步不让。和平谈判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战争以一方无条件投降而告终，也只能这样告终。这场战争不仅摧毁了蓄奴制度和南部邦联，而且摧毁了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内战的全部投入和整个结局、重大事件中高度戏剧性场面及其英雄和反派人物，以及胜利者的欢乐和失败者的悲剧，始终使学者和大众对占据美国历史舞台中心的南北战争发生兴趣。描述这一战争的图书比写美国历史上任何其它事件的图书都多。已出版

的南北战争军团历史(regimental histories)就有近800部,相形之下,写独立战争的书则只有几部。着迷于南北战争研究的人数也大大超过对美国任何其它战争感兴趣的人数。每年都要有数百万人前往参观南北战争的战场和枪炮武器陈列。讨论南北战争的圆桌会议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近期。有关蓄奴制、黑奴解放和内战对南部黑人及白人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是美国历史学界最活跃、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

目前尚无一本综合探讨美国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书,本书的意图就是要满足这一需要。书中对重大事件力求做到既叙述其经过,又说明其意义。本书收录了历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阐述了作者个人的见解。作者对这段历史具有20年的教学、研究和写作经历。

书的头3章描写了19世纪上半叶导致南北地区对抗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第一编的其余6章追溯了1844年—1861年间最终导致南北分裂和爆发战争的政治历程。第二编记叙了严峻的、激动人心的4年战争岁月。这一编涉及到了战争的各个方面:军事领导人、战略、技术、战役和战斗;联邦和南部邦联的政治领导人及其活动;双方的外交政策;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动员;后方的生活;黑奴的解放和解放了的奴隶在战争中的作用等。第三编描写战后国家重新统一问题和被解放的奴隶在从旧南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南部所享有的权利。最后一章一反传统写法,没将重建时期终止于1877年;本章表明,引起内战的争议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当时南部各州正式剥夺了黑人公民的选举权,却并未遭到北方或全国政府的有力反对。尔后,也只是在这之后,困扰美国政界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争端才宣告结束。

内战爆发时摄影术已开始出现。一张张珍贵的湿板照片生动

地记载了当时的悲痛、苦难、忍耐、坚毅、屈从、死亡、献身和胜利的欢乐。这些图片胜过千言万语。本书收录了71幅照片，与有关事件或人物的说明文字排印在同一页或附近的书页上。许多照片都附有说明背景及其意义的短文。另外，本书还包含了为数不多的图表以及大量的地图，作为文字说明和分析的补充。多数地图是说明南北战争中最重要战役和战斗的精确的军事形势图。^①而图表则显示出各种统计数据，一目了然，浅显易懂。

本书中有许多名词或概念，可能使读者感到陌生，因此，在正文或同一页的脚注里都作了解释。对于另一些可能陌生的名词术语，尤其是军事术语，可查书后的术语注释。按顺序编码的尾注为文中引语和某些统计资料提供了出处。读者不要把这些有选择的注释看作是写作本书的全部资料来源。读者如要了解后者，可查阅文献目录。文献目录以短文形式出现，分门别类地列举了从有关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大批文献中精选出来的最重要的图书、文章和原始资料印刷品。

一本书的质量完全是靠作者本人；但是，如果没有许多人和许多单位的帮助，要写出类似本书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在过去几年里，学生、同事和讲座的听众们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我对这一时期的认识和理解。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和亨利·E. 亨廷顿图书馆的藏书及其工作人员对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我尤其感激马丁·里奇、已故雷·比林顿、詹姆斯·索普、弗吉尼亚·伦纳和埃爾·杰克逊，他们使我在亨廷顿图书馆进行研究和写作的那一年（1977—1978）里过得愉快，并有所收获。我还必须感谢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它们为我提供了在亨廷顿图书馆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资金及假期。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下列图书馆

① 原书的照片和地图，由于技术原因，中译本没有采用。——编者

和档案馆,感谢它们允许我使用他们收藏的照片,并感谢它们的工作人员帮助我搜寻这些照片:国会图书馆、美军军事历史研究所、芝加哥历史学会、罗切斯特医学中心大学的爱德华·G. 迈因纳图书馆以及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瓦伦丁博物院的库克美术馆。

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在我成书的不同阶段曾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如果我采纳了他们提出的所有修改建议,这本书肯定比现在更好;由于我采纳了其中的许多建议,这本书还是比不作这些修改好得多。因此,我十分感谢下列同事和朋友细心阅读本书手稿和提出坦率的建议:斯蒂芬·安布罗斯、威廉·库珀、理查德·柯伦特、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迈克尔·霍尔特、艾丽斯·勒斯特蒂格、佩顿·麦克拉里、埃里克·麦基特里克和埃默里·托马斯。

我还要感谢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的编辑部成员,尤其是戴维·福尔默,是他首先建议我写作此书并且自始至终真诚地支持我;还有詹姆斯·夸尔瓦塞,他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关心和热情,并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即使是最爱挑剔的作者都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也感谢伊夫林·卡特拉克,她复印编辑手稿的技术是如此地娴熟;感谢“J.与R.技术服务部”的约翰·科迪斯,他有高超的画图技术;感谢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的德拉·曼柯蒙,照管了出版工作中的许多琐碎工作;感谢路易斯·马苏尔,他认真细致地校对了书中的引语和参考资料;另外还要感谢我妻子帕特里夏·麦克弗森,她在帮助我完成阅读校样这一繁琐工作中表现出耐心并花费了时间。写作本书的过程也是我增长知识的过程,以上提到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丰富了我的知识。

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乔治·蒂克纳曾于1869年写道,南北战争“为本世纪留下了一道鸿沟,把战前和战后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一切分开。我似乎觉得自己不再生活在我诞生的那个国家了。”4年之后,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瓦纳合写了一部题为

《镀金时代》的小说,为这个时代命了名。他们在小说里写道:内战和重建南部计划“连根拔除了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古老制度,改变了全体人民的政治和半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方式,它们对整个国家性质的影响的深刻程度,恐怕要花二至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充分估计出来。”本书是按过了三代多人之后的眼光来写的,它将试图说明这些革命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

詹姆斯·M. 麦克弗森

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

1981年8月

序

南北冲突的背景

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的发展速度是近代史上无双的。这个发展包括三个方面：领土、人口和经济。1803年，美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领土扩大了一倍。在获得了佛罗里达（1810年和1819年）、得克萨斯（1845年）、俄勒冈（1846年）以及墨西哥割让的土地（1848年和1854年）之后，领土又扩大了几乎一倍。与翻了四番的领土相比，人口的增加速度就更快了：1803年是600万，到1853年就变成了2600万。经济发展得更快：在这50年里，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七番。在这三个领域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其中一个领域里的发展比得上美国。这三方面的同时发展使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瞩目的国家。

不过，这个发展是以牺牲北方某些民族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白人野蛮地、非法地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屠杀美洲土著，并把他们驱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去。美国人奢望得到土地，挑起了与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的武装冲突，用暴力和战争夺取他们的领土。奴隶种植的烟草和棉花成了美国发展经济的部分基础。在标榜“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蓄奴制国家。

高速发展造成了社会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导致一次次的危机，从而威胁着共和国的生存。这种紧张局势从一开始就主要与奴隶制有关。自由州和蓄奴州在地理上把这个国家分割开了，这

就决定了危机将以地方性冲突的形式爆发。每一方都形成了自己的体制和价值观，这种体制和价值观是以其各自的劳动制度为基础的。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意识，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体制是正确的，同时谴责对方的体制。

这两派在同一面旗帜下共处了四分之三世纪，这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向心力强于地方主义的离心力，他们都没有忘记为建国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但是，早在1787年，在制宪代表会议上就曾因为奴隶制的冲突而几乎使这个尚未完全立足的联邦分裂。最后，北部各州为了预防南部抵制宪法的威胁，才不得不接受了维护蓄奴制的三项妥协条款：在众议院和选举团按人口分配的代表制中，每个奴隶按五分之三个人计算（宪法第二部分的第一条）；20年内联邦法律不得通过禁止奴隶输入的法令（第九部分第一条）；逃亡到自由州的奴隶应归还原主（第二部分第九条）。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南部想用增加蓄奴州的数目来抵销自由州快速的人口增长速度，于是产生了强大的领土扩张欲望。购买路易斯安那、吞并得克萨斯和征服原属墨西哥领土的西南部土地，都是在南部人任总统和南部控制国会多数的时候完成的。这些做法遭到了北部的有力反对。在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建州时，居住在这里的南部移民曾不顾“西北法令”禁止在这一地区推行蓄奴制的规定，企图使蓄奴制合法化，但没有成功。

北方的奴隶制反对者对南部的这种图谋进行了反击。1819年，北方国会议员反对在购得的路易斯安那的部分土地上拟议建立的密苏里州里实行蓄奴制。结果，两派发生冲突，造成激烈争吵，并使人担心分裂。1820年，国会采用一个妥协方案，解决了这个难题，即承认密苏里为蓄奴州，但在北纬36°30′以北的那部分路易斯安那土地上禁止蓄奴。

“密苏里妥协案”使这块领地上的蓄奴制问题平息了一代人之

久,到墨西哥战争之后,又再次激化。1850年之前,国会每允许一个自由州加入联邦,也允许一个蓄奴州同时加入,以此保持南部在参议院的均势(及至1848年,联邦的蓄奴州和自由州各15个),尽管南部人口增长率低,使它在众议院和选举团已成为少数。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按地理范围选拔的,由于蓄奴州所占领土大,南部法官就占多数,再加上民主党受南部控制,它运用的政治权力就超过了它的人口比例了。从1789年至1861年,有三分之二的总统、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临时主席,以及国会的许多主要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南方人。

但是,南部控制全国政治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到1860年,自由州的人口已达到1900万,而蓄奴州则只有1200万,其中400万是奴隶。在1860年的总统选举中,北方反蓄奴派的胜利就成为不祥之兆。大多数蓄奴州为避免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乃脱离联邦,挑起内战。

第一编

战争前夕

第一章 美国的现代化，

1800年—1860年

经济领域的变化

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年人可以明显地看到在他的一生中经济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工业革命，并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1800年，当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已经使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国的时候，美国仍然是个农业社会，其为数甚少的工业产品都是在家庭和小工场里用手工制造的，或者是从英国进口的。住在有2500人以上的城镇的居民数只占人口总数的6%，而且这个百分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城市之间的商业运输大多数靠帆船。罗马帝国时代以来，陆上交通没有得到改善；其实，罗马帝国的公路可能还要比美国好些。美国除了个别公路外，绝大多数是雨天几乎无法通行的土路。内河运输主要靠顺流而下的平底船，这些船一旦到达目的地，便被拆开当柴卖掉。农业技术自首批殖民者到来之后就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化。一个农业工人的产值不比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高，有些地方甚至还低些。离居民中心或通航河流数英里以外的农场，基本上都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为目的，因为缺乏适当的运输工具，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

1812年(美英)战争之后，这一切开始变化。在这之前，美国各殖民地和州的经济曾有过经济学家们所称的“粗略”增长：即使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人口增长率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1815年以后，

经济有了“集约性”的增长，即财富和产品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也就是说，人均产值有了增长。我们没有精确的数据反映1840年以前美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但1840年以后（也很可能自1815年之后），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为1.5%——每45年足可翻一番。

19世纪前半叶的经济，既有数量上的变化，也有质量上的变化。在经济结构和技术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想象，经济可以出现密集性增长。以农业经济为例，如果有了更肥沃的土地，或者更有效地利用了传统的耕作方法，人均产值也可能提高。在1800年至1860年，南部各州的经济发展就是这样。但在这一时期，北部的经济则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所以，下面有关经济发展的分析，主要适用于北部。*

交通运输的变化

最先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质量变化在交通运输方面出现。1800年至1830年是早期美国史上的收费公路时代。建筑队新建或改建了数千英里的全天候铺石公路（用岩石或碎石铺设路面的公路），其中绝大多数在北部各州。收费公路时代与运河时代相交迭。运河时代以伊利运河取得惊人成就而开始。这条运河由奥尔巴尼至布法罗，于1825年竣工。到1850年，美国已有3700英里的运河，其

* 本书地理名词解释如下：“南部”指各蓄奴州，“北部”指各自由州，但在南北战争期间，由于四个“边界州”，即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未脱离联邦，所以也包括在北部。这四个“边界州”，再加上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有时也称之为“上南部”，其它蓄奴州称为“下南部”或“植棉南部”。“区域”或“区域性的”，根据上下文内容，指的是蓄奴州或自由州，以及两者的比较或关系。“地区”指的是每个“区域”内部几个州组成的较小的集团。“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有时统称为“东北部”。“老西北部”或1846年获得俄勒冈领土之后的“中西部”，都是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和俄亥俄河以北的各个州。“东南部”指阿巴拉契亚山以东的各蓄奴州。“老西南部”将指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蓄奴州，不要把它和“新西南部”，即1848年从墨西哥割取的领土混淆。

中大部分也在北部。运河时代又和铁路时代相衔接。修筑铁路的热潮始于1830年由巴尔的摩向西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之后，到1850年代，这一热潮达到了高峰。在1840年，美国就有3328英里的铁路了，比最早拥有铁路的英国还长。到1860年，美国的铁路长度已接近31000英里，相当于世界其它各国铁路的总和。

这几十年也是内河汽船的伟大年代。第一条汽船是罗伯特·富尔顿于1807年发明的，成功地应用于哈得孙河的航运。1812年战争之后，这一形式的运输业发展迅速，并且成为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主要交通工具。在1815年，用于内河航运的只有十多条船，而到1860年，就有约3000条船了。1840年代，为适应汽船的航运需要，运河加深和加宽。这种明轮轮船也用于五大湖。海洋运输的汽船在内战之前也出现了，但总的来说美国的近海商业运输仍主要靠帆船。

运河、铁路和五大湖航运业的发展引起了各地区间关系的变化。1840年以前，地区间的贸易是顺着南—北方向进行的。大西洋沿岸的航运和俄亥俄—密西西比河的航运网决定了地区间贸易的格局。但主要的运河和铁路大多是东—西向的，它们把东北部和老西北部联系在一起。到1840年代，五大湖—伊利运河一带的运输量已超过了密西西比河的运输量；到1850年代，东—西方向水域和铁路的运输量已是南—北河运量的两倍多。贸易格局的这一变化加强了自由州之间的区域性联系。这一变化对在1861年南部退出联邦的危机中加强自由州团结和共同对付南部起了作用。

19世纪的美国人把他们的交通设施称为“内部改良”；现代经济学家则把它们称为“社会间接资本”。这是一种基本投资形式，由于建筑期长，不能很快收到效益。实际上，投资者最终获得的直接利润少，甚至没有，但由于改善了交通状况，整个社会受益大。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或无力承办这类建设项目，所以大部分的运河是

各州政府开凿的，新英格兰以外的公路大多数是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修建的。用私人资本修筑的收费公路由于无利可图，最后大部分由各州政府接管。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还疏浚港湾和河道，建筑河堤并用其它办法来改善和维护内河航运。尽管大部分铁路是用私人资本建筑的，但许多市和州的政府及联邦政府都用贷款、授予土地和提供发行证券保证等方式给予重要支持。

不管我们把这些投资称为内部改良，还是社会间接资本，其结果是经济的集约性发展提供了基础。这些设施减少了运输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并使区域间市场经济的出现成为可能。在1817年，把货物从辛辛那提航运到纽约要花50多天的时间，到1852年只需6天。在同一区间，乘客的旅程时间从三个星期减至两天。现在，西部农民已有可能把农产品运到购买力强的东部销售了。在1818年和1858年期间，1桶(31.5加仑)西部产的猪肉的批发价在辛辛那提和纽约的差价已从9.53美元降到1.18美元。在同一期间，这两地的西部产的面粉差价也从每桶2.48美元降至0.28美元。许多货物的价格下降使美国的批发价指数在这40年里下降了40%，生活费指数下降了约15%。

粮食生产的增长

由于出现全国性的市场，交通运输的改善促使农场主和制造商生产走向专业化和批量化(即高产量低单位成本)。在南北战争爆发前40年里，粮食总产量翻了四番，其中出售的商品粮(即非自给粮)所占的比率提高了近一倍。尽管1820年—1860年期间农业劳动力由占全劳力的76%降至57%，农民仍能养活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在这40年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农村人口快三倍。1820年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数的7%，到1860年就增加到20%。这是美国历史上城市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

粮食产量的增加与这一时期许多农业技术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在1800年前的数百年里,农具没有多大改进。某历史学家曾写道:“(美国)殖民者在粮食种植、收割和脱粒技术方面比《圣经》时代好不了多少。”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人们发明了多种畜力牵引的农具和机器。用另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农业技术革命化了。”¹

最早的发明是1810年代的铁铸犁板和1830年代的钢制犁。1820年代初还有人发明了几种播种机、耙犁和中耕机。这些发明使一个农民的耕种面积扩大了,这实际上使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收割问题更趋严重了。农民的种植能力超过了收割和脱粒能力。所以,1830年代弗吉尼亚的塞勒斯·麦考密克和缅因的奥贝德·赫西发明的马拉收割机是19世纪最重大的发明之一。使用这种工具,两个男人加一匹马的日收割量与使用配禾架大镰刀的8个男人或用小镰刀的12个男人的收割量相等。但是,如果脱粒能力不能同时得到相应提高的话,那么生产力在这一点上的飞跃也没有多大意义。好在1834年缅因的约翰和希兰·皮茨成功地发明了马拉的脱粒机和扬谷机。到1850年代,北部各州的农民已经克服了他们的传统的保守观念,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由中西部工厂批量生产的新式机器。这种用机器和马代替人力劳动的变化使美国的农业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开始过渡到今天的资本密集型。

美国的工业生产法

制造业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以自给和供本地市场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于1815年达到了高峰,然后就让位给了以供应地区间的和全国性的市场为目的的作坊和工厂。像英国一样,美国工业革命的先锋也是纺织业。181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引进动力织机之后,工厂生产法(即具有不同技能的挣工资的雇工在同

一个大建筑物里使用动力机器,共同生产某种产品)开始在纺织业中实行。从1817年到1837年,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品年产量从400万码增加到了3.08亿码。

1830年之后,随着发明家和企业家发明了新式机器和使用了新的生产组织方法,工厂生产法逐渐扩展到了其它工业行业。当然,在上述许多领域里,英国是开创者。其它西欧国家在基础科学和早期的工业技术方面也都比美国先进。但是美国的工商业者和技术人员很像今天的日本人,善于消化外国的技术为自己所用,通过一系列改革使技术加以改进。这样,尽管纺织机械的基本技术是英国人发明的,但1820年代和1830年代的革新工作大多是美国人作的。1840年代马萨诸塞州的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可算是美国对服装业的最重要的贡献。

美国的机械比欧洲的同样机械更能适应变化。美国人造的纺织机既廉价又轻便,而且常是木制品。这使英国的工程师们大为吃惊,因为他们造的机器都是金属的,可使用数十年。但是美国这种貌似荒唐的做法还真是顶事。工艺技术发展得如此迅速,过了几年,美国的机器破旧了,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更换更先进的机器;而英国的机器因为更坚实、更贵,就不那么容易废弃了。“任何新技术都很快被引进来,”一位于1829年访问美国的外国人这样写道。“这里毫不墨守成规,美国人一听到‘新发明’这个词,便立即竖起了耳朵。”²

及至1840年代,美国已部分扭转了早期以来欧洲向美国输出工艺技术的趋势。英国的企业家们发现,他们能够从大西洋彼岸新崛起的对手那里学到许多东西。用机器批量生产通用零部件的做法要算是美国佬对工业革命的最重要贡献。英国人把它称为“美国式生产法”。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创见,19世纪初首先施用于武器生产。过去,一支步枪的每个零件都是技术工匠特制的,所

以每支步枪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作，其零件与别的同类步枪的零件不尽相同。这样，步枪(或别的产品)的生产过程很慢，需要许多技术工人。产品的价格昂贵，而且其零件一旦损坏，必须由技术工人配制新部件，花费甚大。但是，如果零件都是用机器大批生产出来的，同类步枪的零件就可通用了。这样，生产成本和替换零部件的费用就降低了。最初，由于机器工具粗糙，生产出来的零部件不能完全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机器工具工艺的改进，美国式的批量生产法得到了推广，并用来生产数十种产品，其中包括钟、表、钉、螺钉、螺母、螺栓、锁、家具、犁、靴和鞋，甚至还可以生产大型产品如蒸汽机、火车头和麦考密克收割机的零部件。

美国的这些机器制品成了1851年伦敦水晶宫国际展览会的奇迹。美国的武器生产法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们从美国请来了工程师和机械师，帮助他们改建恩菲尔德兵工厂，生产军用来福枪。(十年后这个兵工厂为美国南北战争的参战双方生产了数以千计的来福枪)。1850年代英国也派一些工业团体前往美国参观工厂，并于1854年邀请发明六响左轮手枪的康涅狄格州人塞缪尔·科尔特到英国议会说明情况。科尔特在他的解说词里用一句话总结了美国工业生产法：“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机器制造。”⁸这一信念使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前期成了机床工艺的世界领袖。美国人在发明现代机床的先驱六角车床和铣床方面，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现代化的社会因素

美国的工业很像其农业，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力密集型。这有四个基本原因：缺乏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劳力；自然资源丰富；群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高；对于革新持开放态度，热心于发明创造和实验。

由于美国人口密度低，有边疆廉价土地可以开发和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力总是供不应求，结果美国的工资水平高于欧洲。劳动力的短缺和昂贵促进了工艺技术的改革，以使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美国与欧洲相比，如果说它的劳动力既缺少又昂贵，但其主要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和森林，则正好相反。水利是新英格兰纺织厂的动力；木柴是汽船、火车头和一些工厂的蒸汽机的燃料。美国的森林也为机械、船只、铁路枕木和汽车及其它许多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建筑材料。而欧洲森林资源贫乏，木材的价值高昂得多。就像土地廉价而形成的雄厚资本刺激资本密集型农业那样，丰富的原材料和动力刺激了资本密集型工业。

教育和价值观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把奴隶人口计算在内，美国在1850年的识字人数比率（89%）和在校学生比率，除瑞典和丹麦外，是世界上最高的。在各自由州，每个州的比率都高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新英格兰地区又独占鳌头。外国观察家指出，教育在培养美国工人“适应能力强的多面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854年，一个访问了美国的英国工业团体报道说：“由于受到了比欧洲的绅士阶层高得多的教育，美国的青年工人能迅速学会工艺技术，并且决不满足于只掌握其行业的部分业务，力求精通其全部。”“在他们的面前，有许多因为解决了经济和机械的问题而获得利益并得到提拔的聪明人作为榜样……在那里，至少在新英格兰各州，凡是具备正常能力的青年工人，没有一个不想创造发明某种技术或改进生产方法的。”⁴美国的许多新工艺就是工人自己发明的，例如缝纫机就是波士顿的机械工伊莱亚斯·豪发明的。

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墨守妨碍变革的传统和陈规旧习。革命的传统和共和主义思想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新型的、与众不

同的人。他们有意识地使自己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们重视变革而轻视传统,他们公开宣称自己信仰“进步”、“发展”和“改革”;他们表现了“一往无前的精神”,相信“九霄云外才有止境”。1840年代的美国民族主义者曾欢呼:“我们是代表未来的人民。”“习惯势力已失去了势头,时间和变革才是赛场上的冠军。”⁵这种乐观主义和乐于实验是美国人革新才能的基础。

许多美国人把机械化看作是促进道德和实现民主平等的手段。一位笃信宗教的人说,铁路的出现是上帝为了“加快人类活动,将能量和活力输送到以前荒僻的地区,增设城镇和村落,并使教堂和学校星罗棋布”。1851年,一位作家在《科学的美国人》一书肯定地说:“每一种新的和有使用价值的机器,不管是新发明的还是改良的,将给所有的阶级,不管其穷富,都普遍带来实惠。”辉格党的政治领袖威廉·西沃德相信,“平民政府将沿着蒸汽机和电报机发展的脚印前进。”一位早期经济学家声称,因技术的进步而导致的产品产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标志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互平等的趋势。”⁶

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正经历着今天的社会学家们所称的“现代化”过程:对社会间接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经济变为全国性的一体化市场经济;进行技术革新和使劳动密集型生产变为资本密集型生产,从而提高人均产值;工业部门以比其它经济部门都快的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有可能供养更多的城市人口,从而加速了城市化;教育、文化和大众广播通讯的发展;重变革、轻传统的价值观的确立;历来适应农村村落情况并以世袭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亲族关系体制发生了演变,成为流动的、整体化的、不讲私情的、由才能决定社会地位的多元化社会。在19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间,美国(不包括南部)在上述大多数方面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现代化的思想意识

美国现代化的根源是与新教伦理道德相联系的价值观。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就注意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韦伯感到奇怪，为什么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信仰新教的，特别是信仰加尔文教？他从加尔文教的教义里得到了解释：教旨认为上帝是有选择地拯救灵魂的；相信世间的成功是上帝恩宠的标志；相信上帝的“感召”的人们在感召下从事各种职业，不管其职业高尚或卑贱，在上帝的面前都一律平等，因而勤奋工作是一种神圣的职责；反对浪费，认为财富应该用来为上帝争光，上帝将通过其仆人施恩于人类，人类不应该挥金如土，骄奢淫逸。把这些信念综合起来就形成了韦伯所称的“现世的禁欲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刻苦工作、勤俭节约、自尊自重、忠实可靠、自我约束、自力更生和为实现长远的目标而不惜放弃眼前的利益。这一价值观最适宜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在更为世俗化的时代里，这种价值观已变成了职业道德。但在19世纪，它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由于英国和美国的清教教会（包括17和18世纪的清教支派公谊会和唯一神教会）大力提倡这种价值观念，所以有时它也被称为清教道德观。在清教的教义、训条和教规里包含了《圣经》上的语录和格言，强调工作是上帝的光荣，懒惰是恶魔的工具。例如：“克尽职守乃是上帝的召唤”（《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不劳作者亦不得食”（《帖撒罗尼迦

* 韦伯的观点尽管颇有说服力，但未被普遍接受。批评者认为经济的发展不能完全归因于宗教，并指出，有些非新教社会，如日本，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和经历了现代化过程。

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不义之财会减少,劳动所得之财会增多”(*箴言》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勤劳者将为人上人；懒惰者将为人下人”(*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魔鬼专找懒汉去为非作歹”(艾萨克·瓦茨)。

这些格言也被收进了教科书和大量发行的“成功之道”一类的书籍。后一类书的宗旨是宣传只要刻苦工作,做出成绩,自我节制和勤俭节约,就能取得成功。其中很多作者是教士,他们对读者的教诲可以用新英格兰的一位教长的话来表达：“宗教教导你,勤奋是你对上帝应尽的神圣义务。上帝的要求是：‘事职须孜孜不倦!’”美国的教科书,尤其是广为采用的诺亚·韦伯斯特编写的“缀字课本”和长老会教士威廉·霍尔姆斯·麦古弗编写的“读本”,都反复讲述同样的训条：“保持勤奋将使你达到任何目标。”⁷

清教的工作道德观念一般在新英格兰人中间最为强烈,在公理会教友、唯一神教徒、长老会教徒和公谊会教徒中间则尤其强烈。所以新英格兰成为美国现代化中的先锋地区,并且在企业家和发明家中具有加尔文教背景的新英格兰人所占比率超乎异常,并不是偶然的。⁸

表 1.1 十九世纪美国企业总经理与发明家的出身背景

地 区	于1825年前后出生的企业总经理		1790年—1860年创造了重大的技术革新的人的出生及(或)居住地点	1825年美国人口的分布
	本 人 出生地 (数目: 247)	父 亲 出生地 (数目: 175)		
新英格兰	51%	65%	42%	16%
北部其它地区	34	22	51	38
南部	3	2	7	46
国外或未知地点	12	11		

表 1.2 十九世纪企业总经理的宗教信仰

教 派	企业总经理 (数目: 144)	约占1840年前后 美国总人口数比率
公理会	22%	5%
长老会	14	10
唯一神教会	10	1
公谊会	8	1
圣公会	25	2
其它新教派别	21	51

其它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上述二表中的数据。分析按1860年统计数字为基础的财产占有情况表明，不管新英格兰出生的人居住在哪里，他们都要比来自美国其他地方的人更富有。对于19世纪杰出企业家和百万富翁的调查说明，其中新英格兰人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新英格兰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的两倍。有关科学家的两份调查资料说明，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人所占的百分比是该地区人口与全国总人口百分比的两倍半。⁹ 1847年，一位访问了美国的阿根廷人报道说，新英格兰人“将其精神的、智慧和手艺的才能携带到了合众国的各个地方，这些才能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活动的作坊。……美国初期的大企业、铁路、银行及大公司都是他们创办和发展起来的。”¹⁰

现代化与改革

北部新教的现代化精神还引起了南北战争前一些重要改革运动，如节酒、兴办教育和反奴隶制运动*等。这些运动来源于19世纪头30年新教复兴运动延续下来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许多福

* 反奴隶制运动将在第三章叙述。

音派新教徒，尤其是有北部背景的教徒，在传教团热情的鼓舞下，决心不仅要改造有罪之人，还要使社会纯洁，清除酗酒、卖淫、愚昧，特别是蓄奴制度。福音派教徒希望首先通过人的改造来改造社会，也就是向人们灌输新教的道德观念——即勤奋、虔敬、自觉、节俭和通过自我约束达到自我进步。

节制饮酒运动

节制饮酒运动体现了上述改革主张的全部内容。19世纪初，美国人的烈性酒饮用量大得惊人：相当于现今人均用量的三倍。任何社交场面，若无狂饮，则不足以尽兴。酒很便宜，而且多数地方不征税。它还是人们吸入热量的重要来源之一。许多人每天喝一及耳(四盎司)威士忌或朗姆酒；约翰·亚当斯在早餐前必定要喝一品脱烈性(含20%酒精)苹果酒。到美国访问的欧洲人对美国人“每隔半小时至数小时便喝些酒的习惯”都表示惊讶。¹¹

节酒运动就是针对这种酗酒现象而兴起的。它开始时是一种地方性的宗教和道德改良行动，到1830年代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声讨运动。在其鼎盛时期，即1836年，美国节酒协会(一种地方和地区间的联合会)号称有150万会员。但不久之后，该协会就在节酒或禁酒的问题上分裂了。最初，节酒运动是主张节制饮酒，但到了1830年代，其激进派极力主张禁止一切含酒精的饮料。由于要求参加该组织的人完全戒酒，到1840年，其成员大为减少。

直到此时，节酒运动仍属于中产阶级新教教徒的运动，它试图通过说教，将其自制与自我约束的价值观灌输给整个社会。在这一点上，节酒运动有利于现代化进程。在工业化社会形成之前，劳动制度是按计件而不是按计时决定的。例如某些工匠在集中精力干完一件工作后就停工数日——很可能是将其时间和钱化在饮酒上。这种不规则的劳动制度不适用于有规律的工厂节奏，因为机

器作业要求工人守时、可靠和自制。劳动制度逐渐由计时代替了计件。钟表的大量生产推动了这一转变，而且钟表本身就是美国式生产方法的一项成就。英国和美国的节酒运动都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这决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许多雇主为了培养工人的纪律性和坚定性，都支持节酒运动，有的还明令禁止其雇工在工作时或下班后饮酒。

许多工人，尤其是爱尔兰和德意志的移民工人曾反对和抵制节酒运动。但到1840年，一些有经验的新教工作者曾向他们灌输节酒观念，并且建立了“华盛顿节酒协会”。*到1847年，其成员已发展到60万之众，他们都自豪地宣称自己克服了酗酒。节酒运动在1840年因用强迫命令代替劝说而衰落了，此时“华盛顿节酒协会”又使它恢复了活力。1846年，缅因州第一个通过了禁售烈性酒的立法，此后十年有15个州通过同样的立法。

但是这一法令并没有能认真执行，许多州的法院最终把它撤销或加以控制。节酒运动取得的辉煌成绩，都是道德启发和自觉戒酒的结果。从1830年到1850年，人均酒精消耗量下降了四倍。而在同一时期，咖啡和茶叶的人均消费量则增加了近一倍。这些思想变化是同人们的劳动道德观，如自制、遵守时间和忠实可靠相联系的，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教育改革

南北战争前的另一个重大改革是公共教育事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手段，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投资会暂时把青年人从劳力中抽出来，但从长远来看，则

* 该组织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支持共和体制的主张。

提高了他们的适应能力、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1853年,某企业家写道:“聪明的劳动者为其所在企业创造的资本比无知识的劳动者要多得多。”¹²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英国工业家认为美国工人的适应能力和美国工业技术的高效率是由于美国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像现代化的其它方面一样,教育的发展也与新教教义有很大关系。清教徒十分注重提高阅读《圣经》和理解教义的能力,这使新英格兰社会成为17世纪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18世纪,信仰长老教会的苏格兰和路德教派的瑞典的教育也赶上了新英格兰,同样是因宗教在起作用。在19世纪的美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归功于新教各派。新教的影响甚至浸透到公立学校里。

早在1830年,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已至少在其四分之三的人口中间建了公立学校制度。在别的地区,尽管地方免费学校、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学校培训班和家庭教师等结合为一体,能够为大多数白人提供教育,但基本上没有新英格兰和纽约两地的那种公立学校制度。即使在这两地,这种制度也是不正规的,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师资培养场所,教学水准各不相同,学生不分年级,并且很少有人在上完小学后继续升学。

19世纪30年代初,在新英格兰的一些进步人士、特别是霍勒斯·曼的推动下,教育改革运动扩展到了北部的许多地方。作为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的秘书,曼领导推动制度不健全的公立学校制定规章制度和教师专业化的运动,并将这一改革信息传播到了别的州。他于1839年建立了第一所培训教员“师范”学校。在此后20年里,北方另外几个州也都建立了这类学校。马萨诸塞州还带头进行了下列改革:使各年级的课程标准化;1852年通过了第一个义务教育法,并将公共教育扩展到中学。到1860年,大多数北部的州建立了至少是8年一贯制的公立学校体系,在5至16岁的儿

童中,约有四分之三在校上学。1850年代,南部某些州尽管也进行了某些教育改革,但在内战之前,那里仍无有效的公立学校体系。

1857年,马萨诸塞州主管学校的负责人曾写道: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通过每天灌输伦理道德和宗教信条”,“培养组织纪律、遵守时间、坚忍不拔和刻苦勤奋的习惯”。由此可见,当时的教育尽管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许多教育改革者已开始用更为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学校的作用。尤其是霍勒斯·曼,他已经用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待学校,认为学校是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的动力。1848年他写道:“教育是使国家资源发展或扩大的伟大动力,它比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提到的任何一种生产因素都更强大,是一个国家的总财富中最有效益的资本。”学校教育还给予贫民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价值观和技能,从而也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教育“更能使穷人消除对富人的仇恨,并能使他们摆脱贫困”。¹³这一说法可能过于乐观,但确实反映了美国大多数人把教育看成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

当然,学校不是进行教育的唯一场所。除了家庭和教会外,还有许多传播信息和思想的渠道。在公共场所进行演讲就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改革者们发现,演说是传播其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马萨诸塞州的教育家乔赛亚·霍尔布鲁克于1826年创建了美国科学和艺术学会,这是第一所成人教育机构。它组织演讲者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和村庄就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题目进行宣讲。

使19世纪时任何别的通讯工具都相形见绌的是报刊。美国的报刊普及率是世界之最。1830年以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报刊发行量猛增。1835年第一部蒸汽印刷机问世,它使一架印刷机的印刷速度从每小时印200份猛增到5500份,再加上造纸机和切纸机的发明,报纸的价格下降,其结果是发行量大增。在1820年代,一份报纸的售价是5—6美分,十几年后花一美分就能买到数份纽约报

纸。由于铁路的发展,城市里的日报能够为农村出版星期周刊。到1860年,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的星期周刊发行量已增加到20万份。1844年以后,电报机的大量生产,实现了远距离的快速通讯,并在1848年成立了美联社。1825年至1840年,报刊发行量翻了一番,到1860年又翻了一番,总发行量达到33万份。发行量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到1860年,美国的报纸数量是英国的两倍——也几乎是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紧张关系

美国社会的各民族集团并非完全一致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和接受现代化的价值观。反对最强烈的是在南部地区(见第二章)。在北部,主要有下列两个集团反对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和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在现代化中形成的霸权。天主教徒,尤其是其中的爱尔兰人;美国中西部的南方人,其中多数是来自蓄奴州的移民后裔。

天主教与新教的价值观

19世纪,住在爱尔兰本土和美国的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其文化价值观在许多方面是与现代化对立的。贫困和受压迫的经历使他们产生了深沉的近似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思想。既然别人占有了全部财富和权力,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和期待未来的做法也就毫无意义了。许多爱尔兰人都不相信改革即“进步”能改善个人或社会境况。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助长了这种保守思想。1859年有个信仰天主教的知名人士写道:“现在过于强调所谓社会进步或文明进步的重要性了。对于那些信奉上帝和来世的人来说,这两者都没有多大价值。”教会反对以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思想为温床而蓬勃发

展的改革潮流。天主教的领导人说,这些改革运动“是完全违反过去的原则和信条的,也是违反当今的伦理、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常规的”。“激进的新教主义精神”已经“污染了我们整个社会,并使一大部分公民变成了疯子。”1856年纽约天主教报纸说,在这种狂热思想的蛊惑下,“数年来这个国家正在朝着导致革命的方向滑下去”。¹⁴1846年至1878年的教皇庇护九世为教会反对现代化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定了调子。他在他的《谬误之种种》一文里说:“以为罗马教皇能够并且应当附和及赞同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想法是错误的。”

这些伦理的和宗教的价值观使保守的、反变革的天主教居民和具有现代化和改革思想的新英格兰新教居民之间产生了隔阂。阶级的差异又加深了这种隔阂:本地出生的新教居民位居中、上层阶级,而爱尔兰的天主教居民则处于下层阶级。双方都以猜疑的眼光看待对方;而这种猜疑在1840年代大批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涌进美国之后更为加剧。新英格兰人的某些改革如提倡节酒和公共教育的运动,曾试图将中产阶级的新教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强加给天主教居民,但是,尽管本地或英国移居来的新教居民节制饮酒。而爱尔兰和德意志移民仍酗酒严重。移民儿童的入学率在1850年只占当地居民儿童的三分之一。信仰天主教的父母们对于在公立学校里读《圣经》(钦定本)和背诵新教祷词的做法十分不满,从而在1840年代开始建立天主教教区学校的运动。

中西部:“灰胡桃居民”与新英格兰居民的对立

中西部南方的“灰胡桃居民”组成了另一个反对现代化的特殊文化群体。美国向西移民的路线大致与纬度线并行,所以中西部南方的居民大多来自上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北方的大多来自新英格兰和上纽约州(这里的居民也来自新英格兰)。这两股移民

在中西部中部的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会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油与水的关系。“灰胡桃居民”(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穿的家织布是用胡桃或核桃汁染色的)大多是来自南部的卫斯理会教徒和浸礼会教徒。他们在这里发展了以种植玉米、养猪和酿制威士忌酒为主的农业经济。这里的交通网与向南流的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支流相联接,所以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是倾向于南部的。

在中西部的北半部定居的新英格兰人来得晚些,他们发展的是一种商农结合的多种经营经济。这里的经济发展得较快,到内战爆发前的20年间,北半部比南半部更为繁华。它的贸易是沿着新开凿的运河和新建的铁路网发展的,于是它就和工业化的东北地区联系在一起了。在中西部各州,新英格兰人控制了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如银行、铁路、商业、工业等等。他们也开展了节酒、反奴隶制等改革运动等。及至1850年,新英格兰人居住区的几乎每项现代化指标,包括人均财产、经济增长率、学校和文化程度、铁路和商业、城市化速度、技术革新及对于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支持等,都高于灰胡桃居民区。灰胡桃居民对于他们心目中的新英格兰人的经济霸权和“清教”文化的扩张十分反感。他们顽固地敌视银行、公司、节酒运动和黑人,所以在这些州里,政界在银行法、公司章程、节酒法规、反对蓄奴的宣传和反对黑人的措施等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

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

到1830年代,美国的两党制作为美国政治的永恒特色已经确立。19世纪上半叶有关现代化进程的各种争议,促使两个政党及其各自的选民确立了思想立场。民主派人士继承了杰斐逊的主

张,即扩大州权、限制中央集权、继续传统的经济程式及主张宗教多元化。辉格党人士继承的是联邦主义,主张民族主义、中央集权、经济革新和在现有各新教派别的旗帜下统一文化思想。北部的天主教徒和灰胡桃居民坚决支持民主党,新英格兰和英国出生的新教徒则组成了辉格党的强大的选民队伍。在天主教或灰胡桃居民稀少的地区也出现了不同的但又类似的格局。在某些州,如亚拉巴马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则不同,辉格党在城区和与交通线及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富裕的农业地区占有绝对优势。新罕布什尔州的商人、技术工人和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大种植园主多数倾向于辉格党;而与市场经济联系不多的贫瘠地区的农民则倾向于民主党。其它各州也存在着类似的格局,尽管常有些显著的例外。

如果从这一格局就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辉格党是主张现代化的党,而民主党是主张继承传统的党,那么,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辉格党希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支持内部改良运动并给银行发特许证,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民主党,特别是在1840年以后,反对银行、公司等有利经济发展的机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政府用立法手段确立这些机构的经济特权,平等权利可能受到威胁。支持节酒运动、公立学校、黑人权利和监狱改革的大多是辉格党人;反对者大多是民主党人。辉格党人大多具有促使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企业家伦理观,而民主党人大多则保持了杰斐逊在农业方面的对立传统,至少在这方面是忧心忡忡的。多数辉格党人对未来充满信心,而多数民主党人则害怕未来。用历史学家马文·迈耶斯的话来说:“辉格党明确地道出了美国人的希望”,而民主党“则表达了他们无休止的忧虑和怨恨”。¹⁵ 表 1.3 列举了1832年至1849年期间 7 个州(新罕布什尔、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弗吉尼亚、亚拉巴马和密苏里)的议会议案表决情况,有助于说明两党的分歧。¹⁶

表 1.3 1832年—1849年 7 个州议会议案表决情况

赞 成 的 议 案	辉格党	民主党
银行 (92项)	83%	31%
商业公司 (49项)	77	39
内部改良 (49项)	63	45
非赢利志愿协会公司 (10项)	71	37
社会改革 (节酒、监狱改革、收容所改革 和取消死刑) (22项)	66	41
公立学校 (15项)	68	47
反对蓄奴制、亲黑人措施 (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俄亥俄) (19项)	82	10
总计 (非重要的平均数) (256项)	74%	38%

在美国政坛上，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二银行重发特许证问题和19世纪40年代美墨战争问题，使辉格党和民主党发生最激烈的冲突。辉格党支持银行并反对美墨战争，但在这两项争执中都失败了。美墨战争还激化了两党间的另一个分歧。两党都支持美国向外扩张。但辉格党主张通过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从“时间”上进行扩张；而民主党则主张夺取领土，进行“空间”扩张，并在夺取的领土上像各州那样，建立传统体制。民主党人主张把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居住地赶走；辉格党人主张维护内战前印第安人仅剩的少许自卫权利，尽管这些权利是微不足道的。“进步”对于辉格党来说，意味着内部发展；对于民主党来说则意味着外部扩张。在一本题为《我为什么加入辉格党》的小册子里，霍勒斯·格里利解释说：“无止境地扩张领土与内部改革是矛盾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全力并吞他人土地的同时又能使自身进行改革。”¹⁷

民主党主张的是杰斐逊的农业思想、小的联邦政府权力、分权各州和领土扩张。这种主张最符合南部的利益，最有利于蓄奴制度。美国这种奴隶制的有体财产被称为“特殊制度”，这毫不因为它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像个畸形怪物。两党关于银行、关税、内部改良及其他问题的争执，最后都逐渐成为在奴隶制问题上发生更大冲突的背景。

第二章 内战前的南部

南部的经济

在前面谈的有关美国现代化的一般情况中，南部在许多方面是个突出的例外。农村和农业在各蓄奴州仍占压倒优势。那里的经济也得到增长，但是还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商业和工业部门。1860年，南部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这和1800年一样。对于占南部劳力一半的奴隶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根本不可能提高。与教育蓬勃发展和接近普遍认识文字的北部相比，南部促进教育的努力微乎其微，而且文盲接近占人口的半数。在各自由州蓬勃发展的群众性协会、改革运动和自我改进协会等大多未触及南部。各蓄奴州重视传统与稳定，而轻视变革和进步。

北部和南部的某些比较

表 2.1 至 2.5 列举了北部和南部之间某些重要统计数字差异。表中所指的“蓄奴州”包括 1861 年仍留在联邦里的四个边界州。如果只指最终脱离了联邦的那十一个州，那么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

其它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些表反映的情况。马萨诸塞州的工业品产量在 1860 年就超过了未来邦联各州的总产量；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产量则分别是未来邦联各州总产量的两倍。生产原棉的南部各州只占全国棉纺能力的 6%。1860 年，纽约州的银行资本几乎是全部 15 个蓄奴州的总数；而马萨诸塞州的银行资本则

为南部棉花种植州的总数。南部白人的人均报刊发行量不及北部全部人口的一半。南部白人人口占全国白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在1790年—1860年期间，南部人的重要发明只占全国的7%。轧棉机的应用使南部经济发生了变革，但其发明者则是于1792年到乔治亚做家庭教师的马萨诸塞州人伊莱·惠特尼。内战前南部的大部分大学校长、教授、研究院的负责人、家庭教师和报刊编辑都是从北方来的。

表 2.1 城镇(人口在 2500 以上者)居民比率

	自由州	蓄奴州
1820	10%	5%
1840	14	6
1860	26	10

表 2.2 农业劳力比率

	自由州	蓄奴州
1800	68%	82%
1860	40%	84%

表 2.3 1860年农田和农具的价值

	每英亩农田价值	每英亩农机农具价值	工人人均农机农具价值
自由州	\$ 25.67	\$ 0.89	\$ 52
蓄奴州	\$ 10.40	\$ 0.42	\$ 30

表 2.4 工业投资

	自由州		蓄奴州	
	占全美总数	人均数	占全美总数	人均数
1840	80%	\$ 21.92	20%	\$ 7.25
1860	84	\$ 43.73	16	\$ 13.25

表 2.5 1860 年文化程度和受教育人数

	识字人数比率			自由人口 中 5—19 岁的在校 生	平均开学 天数/年
	占总人口数	占自由州人口	占奴隶人口		
自由州	94%	94%	—	72%	135天
蓄奴州	58	83	10% (估计数)	35	80

南部的“殖民地”经济

自从1610年代弗吉尼亚开始试种烟叶以后，为世界市场种植原料作物就一直支配着南部的经济生活。在1776年以前，从南部各殖民地运往英国的出口量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出口烟叶；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出口稻米和靛蓝原料。在独立战争以后，靛蓝作物基本上停产了，烟叶产量也下降了不少。但是，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商业性种植短纤维棉成为可能*，而英国和新英格兰棉纺工业的兴起，则对棉花有了新的、巨大的需求。在1800年—1860年期间，南部庄园和农场的棉花产量每十年翻一番。1815年—1860年，棉花的出口量占美国出口总量的一半多。为奴隶制和南部辩护的人颇有根据地争辩说，统治美国经济的是棉花大王。

南部作物在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大部分资金和管理人员来自南部以外的地区，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代理人”或称为“代理商

* 1793年以前南部很少种“短纤维棉”，因为这种棉纤维短，与棉籽的粘合力强，用手工剥除棉籽费工，使得这种种植不能营利。轧棉机是一种很简单的装置，用一个带刺的圆筒在一个格栅上旋转，分离棉籽和纤维。长纤维棉质地好（也贵些），棉籽、棉绒容易分离，所以在1793年前就进行了商业性种植，但它的种植区只限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沿海地区和海岛上。在惠特尼发明轧棉机（1793年）后，南部广大地区都可种植短纤维棉了。

人”。这种代理业务始于殖民地时代，那时伦敦的烟叶公司派代理人到弗吉尼亚采购和运输烟草。这些代理人以未来的收成为担保，向种植园主提供信贷并作为种植园的采购员，到伦敦或其他地方去购买消费品。到了19世纪，这种做法自然而然地就转变为棉花销售，只是代理商越来越多的是北方人，而不是英国人。多数（现在估计约有三分之二）代理商尽管住在南部，但实际上是新英格兰人或英国人。

当种植园的棉花运到孟菲斯、新奥尔良、莫比尔、查尔斯顿、里士满或几个别的城市以后，就由代理商掌管了。代理商提供货栈，承担运输并推销给买主。他还为种植园主安排保险、信贷和物资供应。他从每一项服务中收取一笔手续费。各种手续费（如果种植园主还债的话，还包括利息在内，正像很多种植园主做的那样）加起来，相当于全部作物收入的20%。这种代理业务意味着南部财富的外流；在内战爆发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估计外流的数目每年在一亿至一亿五千万美元之间。

所以，种植业尽管赚钱，但大部分销售利润（暂不算加工为成品后的利润）流入外人手里。南部作为原材料的出口地和工业品的进口地，它与北部和英国实际上保持着一种类似殖民地的经济关系。1847年，莫比尔的一个居民抱怨说：“我们的商业除一小部分外都掌握在北方人的手里。我们的银行股份，八分之七为北方人所有。……我们的批发业和零售业，及一切值得一提的买卖都掌握在新英格兰人手里。……在财政上，我们所受的奴役比我们的黑人更甚。”¹ 1851年，亚拉巴马州的一家报纸说，“目前，北方靠着南方已发财致富了。”

“我们从北方购买全部的奢侈品和必需品。……北方佬辱骂和谴责奴隶制和奴隶主，而我们的奴隶却穿北方生产的衣服，戴北方的帽子，穿北方的鞋，用北方的锄头、犁和其他工

具。……奴隶主穿北方的衣服,用北方的马鞍,夸耀北方的四轮马车,读北方的书。……他的产品是用北方的船运至市场的;他的棉花是用北方的轧棉机脱籽的;他的甘蔗是用北方的机器榨糖和加工的;他的河流上行驶着北方的汽船。……他的儿子在北方的大学求学,他的女儿在北方的美容所接受精心美容;他的医生是北方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学校里聘请北方教员;他用北方的发明装备自己。”²

1852年,想改变这一状况的南方人恢复了“南部商业大会”(它创办于1837年)。这个组织在1850年代后期每年都召开一次年会。其目的是想用南部的钱修建铁路、开辟汽船航线、修筑港口、设立银行、兴建工厂和其它企业,以便使其经济独立于北部。这一运动的领导人还规劝南部同胞购买南部产品、抵制北方的教科书和教员,只资助南方的作家并只去南部的胜地度假等。南卡罗来纳的威廉·格雷格极力主张建立南部自己的棉纺工业,并于1840年代带头在格拉尼特维尔建了一个纺织厂,作为榜样。南方的激进派人士埃德蒙·拉芬只穿南方生产的服装。弗吉尼亚的参议员詹姆斯·梅森自豪地穿着家庭织的布做的衣服出席参议院会议。

但是这一切都不奏效。南部商业大会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这个大会逐渐成为主张脱离联邦的分裂主义者的讲坛。表 2.4 的数据表明,在1840年—1860年间,南部的人均工业投资翻了一番,但这个数字仍低于北方,而且在全国工业生产能力中,南部所占的比率实际上还下降了。新奥尔良的詹姆斯·德鲍是商业杂志《德鲍评论》的出版商,也是南部经济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发现,新奥尔良缺少印刷设备,他的《评论》不得不送到纽约去印刷。在他的广告收入中,四分之三来自北方的企业。该杂志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部工业潜力的评论集,在北方的销售量竟是南方的六倍。甚至参议员威廉·格雷格也不得不为他的格拉尼市

纺织厂雇一名北方人当厂长，雇一名新英格兰人作监工。

奴隶既是资本又是劳力，这是南部经济的一个重要事态，可以用来说明它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在一个典型的种植园里，在奴隶方面投资超过了在土地和农具方面投资的总和。奴隶制农业是不可能走北部农业的道路并发展成为更加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恰恰相反，因为资本的增加在这里意味着劳力的增加。种植园主不是投资购买机器，而是购买更多的奴隶。正像现代的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出售棉花是为了购买奴隶，即生产更多的棉花去购买更多的奴隶，这个‘无休止的循环’就是一个典型的棉花种植园主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和方向。”³

从1793年轧棉机问世到内战爆发前夕，南部的农业技术很少变化。从表2.3上可以看到，由于资本被劳力所吸收，南部的土地和机械的单位产值还不及北部的一半。在1800年—1860年间，南部农业的人均产量确实增加了（可能与北部的速率相当），但增加的原因主要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种植园劳力安排的改善，以及像所地附图表明的那样，种植园边界向西面处女地推进的结果。

所以，南部经济是“增长”了，但不是“发展”了。从表2.2可以看到，1860年南部农业劳力所占的比例与1800年基本一致。南部没有实质性地发展城市的中产阶级和技术工人队伍，没有能形成可提供多种产品和多种服务的多样化经济。由于南部把奴隶、其他种类的人员和不动产都算作财产，1860年南部白人的 人均财产（\$3978）几乎是北部人均财产（\$2040）的两倍。南部自由民占全国自由民的30%，而在全国最富的人中间，南部占了60%。另一方面，南部人均收入估计只有103美元，与北部的141美元相比，低了27%。⁴

有些经济历史学家认为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但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棉花和甘蔗种植园主（烟草、稻米和大麻种植园的利润可

能低些)有利。他们的平均投资收益与北部工业企业家相当,而高于北部的农场主。上南部的许多奴隶主也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向西南部的兴旺的棉花种植园提供了他们多余的奴隶。但对奴隶来说就无利可图了。有两位经济史学家曾估计过,棉花种植园里奴隶的收入以食物、衣物和住房计算只占种植园生产总收入的22%。在奴隶解放以后,种植园的劳务支出与总收入的比例就上升到了56%。⁵对于南部的小农场主来说也无利可图。他们被大种植园主从最肥沃的土地上挤走了,也很难从价格不断上涨的奴隶市场上买得起奴隶。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奴隶制经济,那就是看一看这种制度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南部的发展。许多当代的学者对此问题是持否定意见的。南部生活的观察者们,包括到南部访问的法国人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埃利奥斯·凯恩斯和到南部旅行的新英格兰人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都认为奴隶制造成了南部经济的落后。1831年,托克维尔乘汽船顺俄亥俄河下行,他的左侧是肯塔基,右侧是俄亥俄州,蓄奴社会与自由社会的鲜明对照引起了他的沉思。他写道:

“河的左岸人烟稀少,时而看见一队奴隶在半荒芜的田野里懒洋洋地走着。……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正在沉睡。但是右岸,从远方传来嘈杂的哼哼者,你可以知道人们正在忙于劳作;田地里长着茁壮的庄稼,……舒适的迹象显而易见。人们看起来是富裕的、满足的。他们在劳动。”

1850年代,奥姆斯特德在南部作过三次广泛的旅行,每次都写了书。他对南部的看法也像托克维尔一样尖刻。他说,蓄奴州缺乏“自由劳力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具有众多的不同工种的技术劳力、本地的多种作物市场、密集的居住区和大量的小资产者的存在。”他还说,如果一个人在离开20年后再回到北部,他会惊奇地

发现：

“‘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房屋、教堂、校舍、工厂、铁路、公路、运河和桥梁更好了；人们穿得更漂亮了；文化修养提高了。但是，如果一个旅行者过了20年又重新回到密西西比，他看到的棉花利润所积累的财富是什么呢？种植园主指给他看的不是房屋、图书馆、教堂、校舍、工厂、铁路或任何类似之物，而是他的黑奴——没有任何别的。”⁶

南部不能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独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建立多种经济，即过于依赖一种作物——棉花。1850年代因棉花需求量增加了，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国民经济从1837年—1843年的危机中逐渐恢复后，棉花价格从1844年的最低点每磅五美分逐渐上升到1850年代的十美分。种植园主于是不择手段地利用每一寸土地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几乎年年创新纪录。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奴隶价格的上涨。1850年代，奴隶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因此占用了南部绝大部分现有资金。一位主张在南部兴办纺织工厂的佐治亚人沮丧地反问道：“为什么我们要把棉花运到遥远的北方去加工，尔后以如此高价反销到我们这里来呢？这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余钱都用来购买奴隶了。”⁷ 尽管盛产棉花的南部在1850年代空前繁荣起来，但其经济更加局限于单一作物的农业了。

南部经济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南部的社会价值观。

南部的价值观与经济变革

在南部，要求发展工业的呼声常被那些指责企业家伦理观为新英格兰人庸俗的实利主义的声音所淹没。南部人喜欢自我标榜的形象是乡村绅士派，其举止风度是忠厚谦和、热情好客、悠闲自得、善骑猎、对妇女有骑士风度、对同等人尊重、对下等人仁慈。在他们的眼里，新英格兰人则是一批见钱眼开的店小二：精明但无尊

严，勤奋但缺少悠闲阶级的风采。一个密西西比人说：“北方人爱赚钱，南方人爱花钱。”作家乔治·卡里·埃格尔斯顿在回忆他于内战后从印第安纳州到弗吉尼亚州去接管庄园遗产时说：“我辞别了发展迅猛的、世界性的和万花筒似的西部，前往生活闲逸、环境恬静的弗吉尼亚，那里没有压力感或紧迫感，没有对未来的忧虑，明天要干的事跟今天完全一样。”⁸

1850年代的许多南部头面人物都同意托马斯·杰斐逊对农民的赞扬，说他们是“真实、纯真美德的特殊宝库”；还同意他关于反对城市工业家阶级的警句，说他们是国家政体上的脓疮。亚拉巴马的一位政治家在内战前夕声称：“我们没有城市，我们不需要城市。……我们不要工业，我们不期望贸易，不期望有机械的或制造业的阶级。只要我们有稻米、甘蔗、烟草和棉花，我们就有钱买到我们所要的一切。”1857年，弗吉尼亚州长亨利·怀斯盛赞奴隶主阶级的绅士风度，说他们“身居僻乡不失文明；生活欢愉不忘仁慈；在社交中举止稳健、优雅，……有闲暇的时间去提高自己在道德、行为、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修养。”南卡罗来纳的某种植园主十分反对北方所使用的商业、工业、内部改良、城市和改革运动等专门名词术语的进步概念。他警告说，这些“吱吱喳喳、吵吵闹闹的进步分子”的目标如要在南部实现，“只有靠消灭掉整个庄园主阶级”。⁹这种思想的盛行无疑成了南部经济变革的障碍。

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

奴隶制构成南部独特的社会体制的基础。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南部经济的基本制度是种植园农业，不是奴隶制本身，可是这两种说法并没有多大区别。奴隶制与种植园自17世纪起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在1850年代，从事采矿、交通、建筑、伐木和

制造业的奴隶只占奴隶总数的10%；家奴和从事其它非农业劳动的奴隶占15%，其余占75%左右的绝大多数奴隶是从事农业劳动的：55%种植棉花、几乎全部水稻、甘蔗和大麻及一大部分粮食作物都是由奴隶劳力生产的。

拥有奴隶的南部白人家庭只有三分之一，但由于奴隶昂贵，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对比之下，1950年只有2%的美国家庭拥有与一个世纪前一个奴隶价值相当的公司股票。1850年代，近一半奴隶主只有5个以下的奴隶；但是占总数12%、拥有20个或更多奴隶（这个数目通常区别种植园或农场的标准）的奴隶主占有了一半以上的奴隶。

统治民族的民主

蓄奴制对于非蓄奴白人有何利害关系呢？对于这部分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无文化知识并沾点种植园经济的边勉强度日的“穷苦白人”。与此相反，一些南部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种植粮食并为市场种植少量烟草、棉花或养猪的“朴实平民”是自豪、聪明、欣欣向荣和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农村中产阶级。许多现代学者，包括北部和南部的，则把他们看作是反对蓄奴制度的潜在力量，因为种植园制度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感到蓄奴制把一切劳动都降格为奴役劳动了。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为避免偏见，实事求是，必须把农村中三种不同的非奴隶主白人区分开来。一组是“山区”居民，即居住在阿巴拉契亚高地、马里兰西部和肯塔基东部至阿拉巴马北部的峡谷、密苏里南部和阿肯色北部的奥萨克高原的居民。这些地区的奴隶人数很少，其居民大多数是种植粮食和饲养家畜的小农场主。在政治上，山区居民常常在议员名额分配、州

政府对内部改良的资助、土地税及奴隶等问题上与山下和低地居民持对立态度。他们是种植园经济的反对派，其态度与南部反蓄奴制第五纵队最为接近。在内战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忠于联邦政府的。

第二部分人生活在“松林区”或“杂草地”，那里是沙地或沼泽地，位于北卡罗来纳东部、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南部、密西西比东部和其它许多峡谷地带。这些人最合乎“穷苦白人”的传统形象。他们只种几英亩玉米地或在林区放养几匹骨瘦如柴的牲口。尽管他们有时也向南部较富裕的地区出售少许生猪，总的来说，他们像那些山区人一样，极少参与商品作物经济活动。

但第三部分非奴隶主白人，人数最多，在这种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居住在山下或不那么肥沃的沿海低洼地带。他们每年收获一两包棉花，或一大桶烟草，也种些粮食作物。他们在个人利益上和情绪上与种植园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为种植园轧棉花，也有可能向附近的种植园出售自产的猪肉。他们中许多人对奴隶主的地位垂涎三尺，而且也确有某些能干的或幸运的人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南部还存在着传统的亲连亲的关系，一个非奴隶主白人很有可能是位于同一条公路沿线的某个庄园主的堂表兄弟或外甥、侄子。大种植园主还按照习俗，每年举办一、两次野餐会招待穷苦的邻里——尤其是他正在竞选议员的时候。

在奴隶主与非奴隶主白人之间，除了存在着他们潜在的阶级矛盾缓和的亲戚关系和共同的利益外，还存在着一种最重要的纽带，即种族联盟。南部的白人尽管并不都拥有奴隶，但却都拥有白的肤色。蓄奴制不仅是一种劳动剥削的手段，而且它还是种族统治的一种手段。不管有多少非奴隶主白人多么讨厌蓄奴制度，但没有什么人认为尚有其他手段可以维护白人的优越地位。阿拉巴马的一个农民对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说，他相信蓄奴制

是错的，但是他也不相信解放奴隶是对的。他说：“假定他们自由了，你会发现他们自认为跟我们一样优秀了。……一个黑人以为跟白人一样优秀了，你怎么想？一个黑人登门向你的千金求婚，你怎么想？”另一个穿着邋遢的农民对奥姆斯特德说，他希望“这里根本不存在黑人。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孽障。……但是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赞同解放奴隶。让他们自由并呆在这儿，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要被他们偷去了，那样谁都没法在这里住下去了。”¹⁰

奥姆斯特德敏锐地指出：“自孩提时起，在白人大众的社会环境中就只有一样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有价值一些，那就是黑奴比他们要低贱。”作为南部亲蓄奴制的主要政治发言人、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C. 卡尔霍恩也意识到这一点。1848年卡尔霍恩说：“对于我们来说，社会的两大对立阵营不是富人和穷人，而是白人和黑人；所有的白人，包括贫穷的和富有的，都属于上层阶级，受到尊敬，享受平等……从而享有贫困或灾难都剥夺不走的地位和荣誉。”¹¹

社会学家皮埃尔·L. 范登伯格把这种为蓄奴辩解的理论和白人的优越感称为“统治民族的民主”，即属于统治民族居支配地位的种族的人都优越于不属于这个民族的人。¹² 统治民族的概念在南部和北部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阿拉巴马州的南部权利的卫士威廉·L. 扬西说：“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是在两种思想基础上建立这个政府的：第一，白人都是公民，是居支配地位的种族，白人与白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第二，黑人是低贱的种族。”按照这个说法，《独立宣言》里所说的平等是所有“白人”的平等。《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个奴隶主。以安德鲁·杰克逊的名字命名的“杰克逊民主主义”的核心是平等，但杰克逊总统也是一个奴隶主。杰克逊的民主党人是白人优越论的积极维护者。他们的统治民族的概念帮

助他们把北部的爱尔兰人、灰胡桃人和非技术工人吸引到民主党一边来,因为该党宣称,不管他们多么潦倒,他们仍然比黑人优越。像南部的非奴隶主白人那样,他们也害怕解放黑奴,因为黑奴解放了,他们的白色皮肤就无意义了。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怀斯说:“粉碎蓄奴制,而且将以蓄奴制的拳头粉碎人人平等的原则。”¹³这就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奇谈怪论:对许多白人来说,蓄奴制成了自由与平等的基石。

奴隶的处境

对于奴隶来说,不存在这种奇谈怪论:奴隶制就是奴隶制,自由则是其对立面。奴隶契约赋予奴隶主对奴隶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可以买卖;可以不经法庭随意处罚;可以拆散奴隶家庭;可以奸污女奴;甚至可以杀死奴隶而不必害怕承担法律责任。奴隶作为一种形式的财产,在法律上不享有人权。他们在法律上不许结婚,不许占有财产,在多数蓄奴州里也不许学文化。主人可以允许他们建立家庭,挣点钱,或者(少有情况)用钱赎买自由,但是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前,他们的钱、配偶和孩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强行夺走。有几个州虽然允许奴隶赎买自由,但获得自由后必须离开该州。1860年在各蓄奴州共有25万自由黑人,其中只有3.5万人生活在下南部的八个产棉州,而且受到各种令人愤慨的限制,因而许多人的生活比奴隶好不了多少。

在实践中,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常因自身的经济利益或有时的温情主义而有所约束。主人和监工不可能光靠鞭子维持其统治。由于奴隶的死亡、残废、受虐待或逃跑,即使能生产一点棉花,也是很少的。就像雇主和被雇者之间的关系那样,这里也需要劝说、诱导、奖励和让步。绅士派的种植园主所遵循的“高尚行为”准则也要求他们对下等人施以仁慈。奴隶和主人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信

仰的是同一个基督教的上帝。在奴隶和主人之间除了敌对和仇视外，信任和情感瓜葛也是可能存在的。

总之，奴隶制既是一种法律的和经济的制度，也是一种人际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其非人道的倾向，并为奴隶提供了创造其各种文化机构的活动自由。这些文化机构会支撑他们在倍受奴役的环境下能够一代代生存下来。在黑人居住区里出现了一些自然形成的领袖，他们往往成为黑人教会“无形机构”的雄辩的传教士。黑人教徒们不顾禁令，避开白人，单独集会做礼拜（有些是秘密进行的）。奴隶们创作的《黑人圣歌》是内战前美国最早的和最感人的音乐，它既反映了黑人无可奈何地忍受痛苦的状况，也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南北战争后这种音乐演变成成为伤感民歌，最后又发展成为爵士音乐。奴隶制很难使家庭生活稳定，但多数奴隶还是设法建立了牢固的亲戚关系和家庭关系。所以尽管奴隶制起了压制黑人的作用，但积极的黑人文化所表现出的反抗力，提供了奴隶在苦难面前争取生存的见证。

与西半球的其他许多地方相比，美国的奴隶主对奴隶的肉体摧残不那么严重。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或巴西的咖啡种植园里，绝大多数的奴隶生活条件实在恶劣，过着牛马似的生活，寿命很短。在那里因气候和疾病而死亡的奴隶人数要比北美多；为奴隶提供的食物、衣物、医药和日用品更少。在热带甘蔗园里，对劳动节奏的要求要比北面种植棉花或烟叶更残忍。

当奴隶制在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盛行时，非洲的奴隶贸易仍在自由进行。但美国则相反，它的奴隶制达到顶峰只是在1808年禁止贩运非洲奴隶以后。这与奴隶所受到的待遇有重要关系。在拉丁美洲，许多种植园主认为，与其为奴隶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组织家庭和通过自然繁殖维持其人数，不如把他们奴役致死，然后从非洲进口新奴隶来得合算。在美国，奴隶的进口来源被卡死

了，种植园主就只能依靠自然繁殖来维持和增加其奴隶“资本”。所以，改善奴隶的健康状况和鼓励生育是符合奴隶主利益的。一名解放了的奴隶说，他的主人“像照料你饲养的一匹马似的，按时让我们吃饱、吃好。”另一个解放奴回忆说：“路易斯安那州有个种植园主喜欢在来人面前夸耀健壮的奴隶儿童，说‘这一个值一千元’，‘那一个真是个庞然大物’。你看，这完全跟养匹小骡子一样。”¹⁴

1840年以后，美国的奴隶人口每十年平均增长27%，跟白人的自然增长率几乎相等。这样的增长率在奴隶制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西半球的其他地区，自然繁殖连奴隶的原来人数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增加了。例如，在巴巴多斯，1712年—1762年期间，奴隶人口每十年自然减少43%。在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的黑人人数是从非洲进口黑奴人数的十倍，而在西印度群岛，则只有进口黑奴人数的二分之一。奴隶贩子一共从非洲运了一千万人到大西洋彼岸，其中只有6%的非洲人运到了美国；而在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的黑人人数是西半球黑人总数的30%强。

这些简单的人口统计数字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含意。比如，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律是允许奴隶结婚的，还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护，但在美国，奴隶的婚姻是没有法律基础的。可是，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依靠进口奴隶来维持奴隶的需求量，而从非洲进口的奴隶中，男性人数几乎是女性的两倍。因此，许多男性奴隶根本没有结婚和组织家庭的可能。相反，1820年后美国的男、女奴隶数目基本相等，多数奴隶都得以组织家庭。这是北美奴隶自然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美国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次数少于加勒比地区或拉丁美洲国家：有家庭义务的男人比没有家庭义务的人较难参加起义。

然而,美国的奴隶家庭是脆弱的,因为它缺乏法律保护,美国奴隶制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奴隶家庭的破裂。即使奴隶主本人不愿拆散其奴隶的家庭,将他们出售,也不能阻止他人在他去世后为抵偿他的债务而这样做。许多研究美国奴隶制的学术报告都证实,被奴隶主拆散(通常是卖掉一人或将两人分别卖给不同主人)的婚姻占奴隶婚姻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¹⁵至于被卖掉的子女或被拆散的兄弟姐妹,就不知其数了。

蓄奴制与劳动道德观

在现代社会里,人的地位与出身有关,也与个人的成就有关。但奴隶的地位是完全由出身决定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奴隶来说,提高地位的范围是极小的:如从田野作业提拔为司机或室内奴隶。即使那些花钱赎回了自由的奴隶,其地位的变动也受到种族主义和各种限制自由黑人的法律约束。

蓄奴制也破坏了南部白人的劳动道德观。由于体力劳动都与奴隶相联系,劳动就成为低贱的,而不是光荣的事了。弗吉尼亚的政治家乔治·梅森承认,“蓄奴制对发展工艺和制造业不利。穷人轻视奴隶从事的工作。”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业家威廉·格雷格抱怨说,他的州“缺乏勤劳人民应该具备的一切特征。”¹⁶由于就业机会少和对白人的劳动缺乏尊重,到美国来的移民中只有八分之一在南部定居。从蓄奴州移居自由州的白人是自由州移往蓄奴州的两倍。

奥姆斯特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南部白人和黑人的劳动态度。他在作品里描写了南部草率的耕作、坎坷不平的道路、破烂不堪的公共设施、火车和汽船晚点或无故取消班次,以及整个得过且过的气氛。奥姆斯特德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奴隶劳动的低效率。强制性的劳动是不情愿的劳动。奥姆斯特德写道,奴隶们“看来是在做着劳动的动作,实际上不使一点劲”。他认为北

部一个自由工人的效率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两倍。他解释说，大多数奴隶缺乏努力劳动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以增加产量。他们缺乏现代化劳动所必须的时间观念。一个南部白人说：“他们的时间对于他们自己毫无价值。”奥姆斯特德认为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黑人用消极怠工的方式抵制这种强制性劳动。这从黑人的传说和种植园主的档案记录里可以找到印证。例如，他们假装生病、在监工不注意时停止工作、假装听错了命令、破坏工具、虐待耕畜、逃进森林或沼泽地等。奴隶制也是南部农业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南部的锄头十分笨重，据说是因为北方农场通常使用的那种轻便锄头会被奴隶弄坏。北方的农场主开始使用马牵引犁和中耕机之后很久，奴隶们还在继续使用锄头翻地和耕耘。南部农业所用的犁，都是老式的骡拉铁锹似的浅耕犁，而不是19世纪30年代北方普遍使用的马拉模板式深耕犁。南部普遍以骡为耕畜，因为骡虽不如马那样健壮有力，但不需精心饲养，经得起奴隶们的折磨。在1860年，各蓄奴州饲养的骡占全国总数的90%，而马只有40%。^{*}

最使蓄奴制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是禁止奴隶学文化。奴隶中至少有90%是文盲。奴隶们虽然创造了丰富的口头文学，但由于不识字，就使他们无法在现代化社会里交流知识、思想和文化。文化程度低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最大的差异，也是南、北之间最大的区别（见表2.5）。废奴主义者认为，这也是南部“落后”和蓄奴制极不道德的主要原因之一。

* 经济史学专家罗伯特·福吉尔和斯坦利·恩格尔曼不同意“奴隶制效率低”的理论。他们认为，由于管理认真、奴隶积极性高，以及大型种植园经济具有优越性，南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比北部的高。没有什么历史学家同意这种说法的。参阅福吉尔和恩格尔曼所著的《处在十字路口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经济》一书，及批评此书观点的另外两本书：保尔·戴维的《蓄奴制的帐单》和赫伯特·古特曼的《蓄奴制与数字游戏》。

第三章 关于奴隶制的论战

反奴隶制运动

在18世纪以前，没有什么白人曾对奴役黑人是否合乎道德提过疑问。在人类文明史上，奴隶制在世界各地都是最古老的劳动形式。处于近代文明前期的哲学和宗教都为奴隶制辩护，认为它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多种附属形式之一。但到了18世纪后半叶，流行于英裔美国人和法国人的四种思潮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反奴隶制运动兴起的思想基础。

第一股潮流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后兴起的激进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其中的教友派。传统的基督教教义认为，奴隶制是上帝的意志，是宗教等级的一个必要的部分。宗教改革运动发出爆炸性的力量，对现状提出了各种挑战。在英国和美国，教友会是最成功的教派之一。到1760年，他们就开始清除自己队伍里的蓄奴现象。1775年，他们在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反奴隶制组织：“宾夕法尼亚废奴促进会”。与此同时，18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美国新教史上有几个重要的复兴运动，这是第一个复兴运动。）产生了福音派思想，即相信信仰是可以改变的，灵魂是可以拯救的。接着，这个思想使许多公理会和卫理公会的教徒也像教友派教徒那样改变了传统的观点，不再把受奴役视为罪有应得，而认为奴役他人是一种罪孽。

第二股思潮是“启蒙运动”，它进一步从理性上驳斥奴役的理论根据，对奴隶制在为最大多数人创造最大利益的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提出疑问。第三股思潮是自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自由经济

学反对封建主义和国家重商主义对自由企业和自由劳力的控制。亚当·斯密写的《原富》(又译《国富论》——译注)(1776)一书是阐述这一理论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在这部书里,斯密写道:“表面上看来,奴隶劳力只须养活他们就是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最昂贵的劳动。一个不可能获得财产的人没有别的利益,唯有尽量多吃,尽可能少干活。”¹

第四股反奴隶制潮流是1775年以后使大西洋两岸动荡了半个多世纪的一系列大革命运动。在这期间,美国马里兰以北新建的各联邦州、在法属西印度群岛*和摆脱西班牙而取得独立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都废除了奴隶制。1808年,英国和美国也开始禁止其公民从事国际性的奴隶买卖。以后,英国又利用外交手段及其海军力量不断强迫更多的附属国实施这一禁令。1833年,英国在其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1848年,法国和丹麦也在第二次欧洲革命浪潮里效法英国。

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成就。将近两百万奴隶因此获得了自由。奴隶买卖虽然还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也总算受到限制。可是,美国南部、巴西和古巴的蓄奴制度不仅没有废除,而且还因为1800年后这些地方的棉花、咖啡和甘蔗生产的发展而更加强了。其结果是,1850年西半球的奴隶人口比半个世纪前还多。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参与了把奴隶贩卖给巴西和古巴相当兴旺的黑市贸易。有些奴隶贩子在1808年以后还继续非法地把非洲人贩运到美国来。**

废奴运动与殖民地开拓

在独立战争时期取得不少成就之后,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就失去了一些势头。南部的杰斐逊主义者作为种植园主,从蓄奴

* 1803年拿破仑在法国恢复了奴隶制。

** 每年约有不到一千的非洲人被贩运到美国。

制中捞到了好处，因而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就烟消云散了。白人还担心，黑人是下等民族，“野蛮成性”，让许多黑人“解放出来”将构成对社会的威胁。正如托马斯·杰斐逊在1820年所说的，南部已经“揪住狼的耳朵了”，不能松手让它跑。²

解决这个难题有一个颇得人心的做法，就是以“殖民地开拓”的方法逐步解放奴隶，也就是让获得自由的黑人回到非洲老家去定居。1816年，一些美国名人，如亨利·克莱和布什罗德·华盛顿（乔治·华盛顿的侄子）组织了一个“美国殖民协会”，设法在西非弄到了一块土地，建立了利比里亚国家，把它作为美国自由黑人的天堂，并由该协会资助，把他们运送到那里，帮助他们定居。开始时美国殖民协会抱着很大希望，到末了并没有解决奴隶和种族问题。虽然利比里亚在1847年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了，但殖民协会及其在各州的附属机构到1860年才勉强送去了不到一万名黑人，而这不过是当时美国黑人自然增长数的0.3%。

美国殖民协会主要遭到三方面力量的反对：下南部的蓄奴制拥护者，他们反对妨碍实施蓄奴制的任何工作，尽管那是非常温和的工作；大多数自由黑人，尤其是北部的黑人，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不是非洲人；1830年以后的废奴主义者，他们谴责殖民协会是种族主义者，因为它主张用把黑人赶出美国的办法来解决种族矛盾。

激进的废奴主义

1830年以后兴起了一股激进的废奴主义思潮，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所谓的“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运动。在北方，领导该运动的是加尔文教修正派，他们强调人人都可随意选择自己救世的道路；上帝的恩泽并不是赐给预先选定的人，任何改邪归正、弃恶扬善、信仰上帝并按其意志行事的人都可得到恩泽。这是一种积极的信

念。它促成了一系列压“邪”扶正的改良运动,如反对异教,维护安息日制度,反对娼妓、酗酒和奴役他人的行为。这运动继承了清教的“一人之责集体承担,一人之罪集体受惩”的教义。根据这一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还有一个美国人受奴役,全体美国人都应对此承担罪责。

查尔斯·格兰德逊·芬尼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最杰出的福音派传教士。他的追随者有善于雄辩的演说家西奥多·韦尔德和富商兄弟阿瑟和刘易斯·塔潘。再加上威廉·加里森,他们都成为1833年成立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在此后数年里,该组织及其在一些州和地方上的分会迅速发展,到1838年,各地已有1350个分会和25万会员。这些分会出版小册子和报纸,组织演讲会并征集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抵制奴隶制。

这一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1830年代的废奴主义者与其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前辈不同。他们反对把黑人殖民到非洲去的做法,认为这是奴隶制拥护者的伎俩,是为加强这一制度而给它涂脂抹粉。他们反对同蓄奴制妥协,认为罪恶必须铲除,不能妥协。1831年1月1日,加里森在他的著名的《解放者》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废奴主义的战斗宣言:

“我将像真理一样无情,像正义一样严正。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愿温和地去思考、去谈论或去写点什么了。不,决不!你可以让一个家中失火的人温柔地呼救;让丈夫温文尔雅地从强奸者手中抢回他的妻子;让母亲不慌不忙地救出她掉进火海的婴儿。但是,不能让我温文尔雅地对待眼前的这一斗争。我是认真的,我不含糊,我不悔改,我决不后退一步。我的话是一定有人听的。”

19世纪30年代的废奴主义者有两个主要的奋斗目标:让美国人民,包括南部人和奴隶主们认识到蓄奴制是罪恶的;为自由黑人

争取平等权利。这些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办法都是根据“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运动（或称为“复兴运动”）拟定的。宗教改革者们自己“皈依”废奴主义信仰，就希望改革信仰。他们认为，只要美国人都认识到蓄奴制和种族歧视是对上帝和人类的犯罪行为，就会停止犯罪，克服种族主义思想，废除奴隶制，并让所有的自由民享受平等的权利。

但是他们的希望成了泡影。南部根本不理睬他们。南部的一些州和市还出价悬赏买加里森和该运动其他领导人的脑袋。一些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南部去的废奴主义勇士们不是遭到暴徒的袭击，就是被驱逐出境或被关进监狱。有些暴徒还冲进南部的邮电局，抢走或烧毁废奴主义者的宣传品。杰克逊总统支持这种行动，并命令邮政局长禁止邮递这类印刷品，理由是它们有可能煽起奴隶暴动。只有为数很少的南部白人成为废奴主义者，如肯塔基的詹姆斯·伯尼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两姐妹安格里娜和萨拉·格里姆克，他们不得不移居北部宣布自己的信仰。

就是在北部，接受奴隶彻底解放并使他们享受平等权利的废奴主义者也不是很多。受这些目标威胁的经济利益和种族利益太多了。在1830年代，北方暴徒袭击了废奴主义演说家、毁坏了废奴主义宣传品并焚烧了废奴主义者的财产。有些暴徒还袭击自由黑人。暴徒大多是下层白人，他们害怕南方的奴隶解放后会涌到北部来与他们争夺就业机会，分享社会平等权利。但也有一些暴徒是“有钱有势的绅士”，他们大多是与南部有关系的商人、律师以及保守分子。这些保守分子认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危及了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废奴主义政治

一些废奴主义者在规劝人民接受废奴主义失败之后，开始从

事政治活动。1839年他们成立了“自由党”，并提名詹姆斯·伯尼为该党1840年的总统候选人。但伯尼只得了7000张选票，只占选票总数的千分之三。

“自由党”的建立是引起反奴隶制运动分裂的原因之一。以加里森为首的一派反对参加政治斗争，认为这意味着丧失原则。他们反对按美国宪法选举总统，认为宪法是一个亲奴隶制的文件。他们有些人甚至号召各自由州脱离这个维护奴隶制(或“拐骗人口制”)的联邦。他们对一些大的教会组织拒绝接受激进的废奴主义主张十分不满，攻击这些组织是“贼窟”。这使福音派废奴主义者感到气愤。加里森主义者还主张男女平等，这又冒犯了男性废奴主义者，因为后者只支持给男性黑人以平等权利，但拒绝接受男女平等。妇女人权运动使妇女抛弃了废奴主义组织。当她们撰写和演讲关于种族不平等的罪恶时，有些妇女还开始谈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1848年，一些妇女废奴主义者在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女权大会。在8年前，反奴隶制协会的一些成员，如芬尼和塔潘兄弟等，因加里森派成功地使一名妇女当选为协会的执委而退出了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支持者，并于1840年代另行组建了一些反奴隶制协会。

1840年以后反奴隶制力量虽然分裂了，但仍很活跃，并且起着重要作用。它确实扩大了影响，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反奴隶制的政治家比废奴主义者能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但也正如加里森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运动范围的扩大淡化了该运动原有的宗教和人道主义色彩。虽然废奴主义的政界人士及其温和的同事们仍把废除奴隶制和实现民族平等看作是最终的奋斗目标，但他们集中力量防止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展，而不干预现有蓄奴州的内部事务。这是一种反对奴隶制的立场，而不是废除奴隶制的主张。这种立场被写进了自由土壤党的

1848年的政治纲领，也被势力更强的共和党写进了它的1854年的竞选纲领。自由土壤党的多数成员，与多数废奴主义者相比，更关心的是白人的权利，而不是黑人的权利。1856年，《纽约论坛报》著文说：“在共和党里有废奴主义者，也有愿意并确实在为黑人服务的人，但还有更多人，他们主要是为自由的白人劳力争取新的领地，而很少或根本不关心自由黑人和奴隶黑人的权益。”³

反奴隶制运动与现代化

废奴主义和反奴隶制力量都起源于新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人聚居的北部地区。该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如芬尼、韦尔德、塔潘兄弟、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利普斯等，都是马萨诸塞州或康涅狄格州人。在1840年代担任“自由党”领袖并于1848年协助将“自由党”扩大为自由土壤党的俄亥俄州人萨尔蒙·蔡斯，是在新罕布什尔出生和长大的。在567名废奴主义领导人中，63%出生于新英格兰地区，而当时该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1%。对上纽约州和俄亥俄州一些废奴主义力量较强的县份进行调查，也发现反奴隶制组织与新英格兰人居住区和福音派复兴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⁴

无论在英国还在美国，企业家与废奴主义运动领导人的社会背景都很相似。教友会教徒在这两组人中间都很突出，尤其是在英国。参加英国教友会的一些家族，如达比家族、劳埃德家族、巴克利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组成了英国工业革命先锋，并在18世纪为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提供了许多领导人。同样，教友会教徒在18世纪的美国商业界也很突出，并且在早期的反奴隶制组织里占压倒多数。1830年以后，美国的废奴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新英格兰地区的福音派新教徒和唯一神教派的手里，而正是在这时，

这一地区和这一些人形成了美国经济中最现代化派别。表3.1说明了19世纪中叶美国废奴主义和工业领导人之间社会背景的相似之处。⁵ 在一份有关废奴主义领导人(总数为622人)的职业调查报告中,从事工商业的人所占的比例(21%)仅次于神职人员的比例(34%)。

表 3.1 废奴主义领导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背景

	废奴主义领导人	人口比率*	企业家	人口比率*
新英格兰出生的	63%	3 : 1	51%	3 : 1
公理会教徒	34	7 : 1	22	5 : 1
唯一神教徒	13	13 : 1	10	10 : 1
教友会教徒	20	20 : 1	8	8 : 1
	67%	10 : 1	40%	6 : 1

自由劳力观念

废奴主义者与企业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思想就是自由劳动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新教主张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比奴隶制的外部制约能培养出更多的有效的劳动者。以增加工资和提高社会地位作为刺激的积极办法和没有工资和提升机会的消极刺激办法都比鞭打产生的动力更大。某废奴主义者说:“鞭子只能依靠刺激人的皮肉,不能触及他的产生行为动力所在的部位。”反奴隶制的辉格党的一位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写道:“奴役一

* 这个比例指的是具有上述背景的废奴主义领袖和企业家所占的比例与具有这些背景的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间的关系。即在上述废奴主义领袖的平均出生年份(1805年),生活在新英格兰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1%,而在全部废奴主义领袖中,出生于新英格兰的是21%的三倍。在企业家的平均出生率(1825年),新英格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8%。教徒的比例是1840年代的。被调查的人数分别是:

废奴主义者出生地:总数为567

废奴主义者的宗教关系:总数为504

企业家出生地:总数为247

企业家宗教关系:总数为144

个人就等于抹煞了他的抱负，他的进取心和他的能力。在人性的构成中，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是使人努力工作的原动力。”⁶

提高社会地位的理想是自由劳力观念的核心。《纽约时报》在一篇歌颂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的文章中说：“自由劳动制度可以使今天的穷人成为明天的小地主和商人。”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已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律师，他说：“我毫不羞愧地承认，25年前我是一个雇工，铺铁轨或在平板船上干粗活。”但是“自由社会”使穷人“有机会改善他的处境；他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劳动条件并非一成不变的”。林肯还写道，“人人机会均等”的原则就是“为每一个人扫清道路，给每一个人以希望，最后使每一个人都能兴办企业和工业的原则”。⁷

用林肯的话来说，奴隶“终生禁锢在受奴役的地位”，自由劳动理论把南部描绘成人民大众贫穷落后和劳动只为少数特权者积累财富的地方。虽然南部人也可以列举出许多白人由穷变富的例子，但自由土壤党人坚信“奴隶制使一切都枯萎、凋谢，……是自由劳动的穷苦白人的祸害。……它使劳动成为一种耻辱的东西，从而使白人感到沮丧，遭受贫穷，并且越来越穷，社会地位越来越低”。1848年纽约一位国会议员说，哪里有奴隶制，“哪里实质上就没有中产阶级。要么是大富翁，要么是穷得使人绝望，这就是固定的社会格局”。⁸

简言之，奴隶制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后来成为自由党和共和党领袖的威廉·西沃德在1835年访问了弗吉尼亚之后写道：“贫瘠的土地、古老而破旧的城镇、坎坷失修的道路，……没有工业、不见进步……，这一切就是奴隶制带来的后果。”他还说，这个制度耗尽了“智力、精力和能力”，所以“这与国家的安全、福利和伟大所要求的一切条件是不相称的”。⁹就像欧洲资本主义必须摆脱陈腐的封建主义的束缚那样，生机勃勃的美国资本主义

已经不能继续与陈腐的奴隶制度共存下去了。

北善南恶的观点当然会被某些人歪曲。但到1845年以后，由于奴隶制在新获得的领土上扩展势力，冲突越来越尖锐化，因而接受这一观点的北部人也越来越多。反奴隶制阵营里的人把这一冲突看作是关系到美国前途的斗争。自由土壤党的一家报纸说，“我们反对蓄奴制的扩张，因为它削弱了人民的生产力，阻碍人民集结在一起聚居，阻碍了一切公共教育系统的建立。〔只要奴隶制在那些新领土上实行〕，各州的自由劳动就不可能进行。……如果各州的自由劳动得以实现，南部的奴隶劳动就无立足之地；而且在几年后，这些领土上就会涌现出积极而活跃的人民。”¹⁰

拥护奴隶制力量的反击

从必然的罪恶到积极的善举

反奴隶制运动大大触犯了南部的感情。作为革命传统的继承人，南部领导人起初也承认奴隶制不符合1776年人们为之奋斗的自由理想。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多数南部人把蓄奴制解释为“必然的罪恶”。既然是罪恶，就应该随着时间和进步的发展而逐渐消亡，但因为它是必然的罪恶，就不可能迅速废除，否则将导致南部的混乱。将解放的奴隶向非洲移民的做法旨在用循序渐进的改良办法达到最终消灭这一罪恶的目的，所以在南部受到人们的青睐。

到19世纪30年代，有两种情况的发展使这种“必然罪恶”的观点破产：一、棉花王国的出现，使奴隶制在南部经济中成为空前必需的事物。二、废奴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南部处于守势，激起南部从理论上进行全面反击，说蓄奴制根本不是“必然罪恶”，而实际上是“积极的善举”。他们提出以下的论点，说明历史上的伟大社会，诸

如古埃及、《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希腊、罗马帝国、查理曼时代的法国、大宪章时代的英国，都是以奴隶制或农奴制为社会基础的。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 R. M. T. 亨特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像样的文明制度不是以国内的奴隶制为基础的。”¹¹ 甚至《圣经》也是赞成奴隶制的：使徒保罗就曾规劝奴隶服从主人，并劝告一名逃亡奴隶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1850年，南部一个教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可谓这类小册子的典型，其标题就概括了“积极的善举”理论的内容：《南部对北部的责难和挑衅的答辩：蓄奴制是上帝为最完善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的一种制度，是共和国政府永存的唯一保证》。

“积极的善举”论鼓吹者自信其理论至少在南部赢了一招。1838年，约翰·卡尔霍恩说：“过去许多南部人认为奴隶制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罪恶的，现在这种糊涂的谬论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认识了奴隶制的真实面貌，它是世界上自由制度的最安全、最稳固的基础。”20年后，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在谈到那些抱有糊涂思想的南部人时说：

[他们]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虚弱的、可耻的、罪恶的……，于是恐惧而战栗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厄运。但是，一些勇敢的人接受了挑战，迫使南部重新检讨这个问题。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因为蓄奴制度而感到内疚的南部人了。¹²

为达到这个目的，南部抵制外部的批评，并压制内部的不同意见。南部建立起思想壁垒：用强制性的手段保持团结，以对付外部的攻击和内部奴隶暴动的威胁。在1831年纳特·特纳奴隶暴动*后，南部各州以维护秩序为名，对白人和黑人都加强了控制。几乎

* 纳特·特纳(Nat Turner; 1800—1831)，黑奴，在宗教思想的鼓舞下，于1831年8月在弗吉尼亚率黑奴举行暴动，杀死了至少55名白人，引起南部各地发生一系列恐怖报复行动。

每一个南部州都通过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如路易斯安那州规定，对发表“助长有色人种的不满情绪或煽动奴隶不服从主人”言论的人，要判处21年至终生苦役的刑罚。有些州授权治安法官或别的官员没收持反对意见者的邮件。一些居民区成立了“警戒委员会”或“公安委员会”，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搜寻和侦查图谋在居民区散发煽动性小册子、传单或其他任何印刷品的人，以及为煽动暴动而用不正当手段去影响奴隶的人”。一切陌生人，尤其新英格兰人是怀疑和监视的对象。“警戒委员会”还检查旅店客人或搜查旅行者的行李。许多外地人成为暴徒行凶的受害者，他们被涂上煤焦油，再插上羽毛，有些人还被拷打致死。¹³

蓄奴制的代言人对于南部保守的社会秩序十分得意。他们不仅抵制废奴主义，而且抵制影响着北部社会的各种“主义”，如女权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先验论、千禧年主义*等等。南卡罗来纳州的某人声称，蓄奴州是“抵制异端分子掀起的各种社会风浪和政治风浪的防护堤”。南北战争前，美国各地有一百多个乌托邦社区，其中只有两个座落在南部。女权运动在波托马克河以南的地区毫无进展，而在那里，白人妇女依然安稳地坐在超然于男人的政治世界和政治事务的受人尊敬的宝座上。南部的一个编辑大惊小怪地指责被“主义”弄得神魂颠倒的马萨诸塞州人竟然“蜂拥着去听一个把丈夫丢在家里看孩子的、穿着布鲁姆女服的不男不女的人演讲”。这样的事在蓄奴社会是绝对不会有，在那里，“奴隶是最低层阶级，是社会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坚固的基石，整个社会建于稳定的基础之上，是不会受任何蛊惑而动摇的。”¹⁴

1855年，里士满某报著文说，南部应抵制异端邪说，防止北部

* 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从基督教神学观点出发的一种历史哲学，源自《新约·启示录》，第20章；宣扬基督教殉教者复活，与基督共同掌权1000年，在此期间，人类所期望的和平与公正将要通过上帝权柄实现。——编者

书刊流入。应设法让年轻人留在南部,不让他们到北部去上大学,因为那里的“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报纸和演讲场所,而每个演讲者和编辑都不受健康舆论的约束,公开辩论为人们所信奉的宗教信条”,在那里,天真无邪的青年有可能受到“异端邪说的毒害,这些异端邪说反对一切存在的制度,无视一切有关宗教、法律、道德、财产和政府的公认准则”。所以,年轻人应在南部接受教育,因为这里的“教育具有道德观和宗教的虔诚性,是稳健的,他们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都不会读到与正统基督教、纯真道德、财产权和婚姻的神圣性相违背的一句话”。¹⁵

关于雇佣奴隶制的理论

拥护奴隶制的代言人在与外部的批评者唇枪舌剑中很快懂得,反击是最好的自卫方式。1856年,新奥尔良的一家报纸写道:“事实证明,北部各州的自由社会是失败的,它已经内部腐烂了。”南部人写了许多小册子,说明在南部种植园里工作的黑奴比工厂里的“雇佣奴隶”的生活水平高。南方奴隶从不失业或降低工资;他们享受免费治疗,老有所养,而不会被人抛弃、忍饥挨饿或靠救济活命。他们还申辩说,在南部不存在“乞讨、赤贫和衣衫破烂的现象”,而在北部,这些现象在每一个城市都可见到。1855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威廉·格雷森发表了一首长诗,题为《雇工与奴隶》,鲜明地表达了“雇佣奴隶制”的主题:

雇 工

自由徒有其名——奴隶苦役永无尽期……

肮脏的茅舍——穷人的窝棚,

或在恶臭的地窖,席地仰卧。

衣衫褴褛,霉臭的杂草当床,

街沟里捞点屠宰下水聊充饥肠度日……

这些惨境；如此贫穷，如此关怀，
为奴隶争取的自由创造的就是这幸福……。

奴 隶

他们有主人的谆谆教导和关怀，
有吃有穿，受到无数年月的护养。
昔日人数寥寥，如今已有百万，
白人的一切有用技艺，已为他们所有，
勤俭、温良，精于林业，善于园田，
扶犁弄斧，样样皆能……。
不愁贫困，无须行乞，
从来没有雇工的苦痛，
也不必像他们那样绝望挣扎，
念及妻子儿女，奴隶感到宽慰；
也许一旦死亡来临，尚有哀思忧伤：
让妻子儿女蒙受炎凉世间的仁厚。¹⁶

一些人针对哈里特·斯托所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写了许多小说，如《罗宾叔叔在弗吉尼亚的小屋和汤姆在波士顿无家可归》，其题目就体现了上述理论。又如，反自由社会和拥护奴隶制的极端分子乔治·菲茨休写的《吃人者！即无主之奴隶》这一题目也是如此。到1852年，以“雇佣奴隶制”为主题的书籍已如此之多，以致拥护奴隶制的人可以这样写道：“南部奴隶在精神、物质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条件都优于世界任何地方和任何环境下的劳动阶级，这一点已无须再次证明了。”¹⁷

骑 士 形 象

许多种植园主把自己设想为贵族阶级。詹姆斯·哈蒙德声称：

“奴隶制度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贵族阶级，一个有才华、有道德、慷慨无私和勇敢的贵族阶级。”¹⁸ 奴隶主家庭出身的人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接受发号施令的训练。他们按骑士的准则来要求自己，如举止高雅、彬彬有礼、尊重妇女、慷慨解囊等。司各脱的小说在南部所以特别受欢迎，其原因之一就是种植园主们把自己看成是《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里的骑士或《威弗利》系列小说里的苏格兰贵族。1850年代，南部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一些南部人把自己称为“南方人”，这个名词就取自司各脱的小说。南部的上层人士还喜欢玩马术比赛，比赛时年轻人把自己打扮成马尔文骑士和老多米尼翁（弗吉尼亚州名）骑士等，在大庭广众之下竞相向美貌少女献殷勤。

从这种自我标榜的形象又产生了这样的论调，即南部种植园主是17世纪英国骑士阶级的后代，而新英格兰人则是英国圆颅党^①即清教徒的后代。根据这一说法，英国骑士又是11世纪征服英格兰的诺曼底骑士的后代，而清教徒则是被征服的撒克逊人的后代。肯塔基州某编辑在一篇颇有代表性的评论里说：“南部的诺曼底骑士们对于撒克逊后裔新英格兰人的庸俗与放肆忍无可忍。”1860年，《南部文学通讯》发表了一篇题为《北部人与南部人的种族差别》的文章，文中所述的“差别”，就是骑士和清教徒、诺曼底人和撒克逊人。该文声称：

在南部殖民地定居的是属于王室的血缘和家族的人……被称为骑士，……是征服者威廉大帝的诺曼底贵族的嫡系后代，以尚武和无所畏惧见诸历史，以豪侠、勇武、诚实、文雅和智慧闻名于世。……南部人就是这一种族的继承人。¹⁹

^① 圆颅党(Roundhead)，1642年—1652年英国内战时反对贵族的清教徒议会党人，因他们剪短头发，与查理一世宫廷中流行的长头发不同，故云。——译者

引文提到的“尚武和无所畏惧”，与其说是有关骑士和诺曼底人的传说，不如说是南部真实生活的写照。当代的观察家，包括北部的、南部的和外国的，都公认南部人比北部人更熟悉武器，并且普遍有使用武器的嗜好。在梅森—迪克森分界线*以南地区的凶杀案发生率大大高于该线以北的地区。自从艾伦·伯尔1804年在决斗中杀死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北部就很少发生决斗事件，但在南部，决斗现象一直延续到南北战争爆发。

决斗的存在与南部贵族的荣誉标准和依靠个人行动而不是依靠法律去报仇雪耻的做法有关。南部许多杰出的政治家都与人决斗过。安德鲁·杰克逊曾打死过他的对手；南卡罗来纳州某州长就曾以决斗过14次而闻名，并且每次都打伤了对方。1830年以后，南、北关系渐趋紧张，南部的一些议员还向其北部对手提出决斗挑战。后者一般都予以拒绝（虽然1838年曾有一名缅因州议员被肯塔基州的代表打死），这又似乎加强了南部人说的新英格兰人是懦夫的观点。

南部的战斗精神也比北部强。在美墨战争中，南部志愿兵多于北部，其主要将领都是南部人。在1841年—1861年间，美军首席上将都是南部人。在1850年代，三名准将中的两名和所有地方师师长（除一名以外）都是南部人。1849年—1860年间，四名国防部长是南部人。在西点军校学生和正规军军官中，南部人所占比例为30%，而大于全国白人所占的比例。到1861年，西点军校的校友情谊显得十分重要：在1828年和1829年的西点军校生中，有11名成了南部邦联的最高将领或领导人，其中包括罗伯特·李、艾·西德尼·约翰逊、约瑟夫·约翰逊和杰斐逊·戴维斯等。

比就读西点军校的南部人之多更能说明问题的可能是南部的

* 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面的南北分界线。——译者

军事学校的数量。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塔德尔军校是最著名的。到19世纪50年代,南部几乎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军校。186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部军校的数目是北部的五倍(但北部的大学和职业学校则是南部的两倍)。这一点在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中显得很重要。

南部和北部都有很多志愿兵连队,其中有些是社会组织,不过军事训练充其量是一般化的,但也有许多是严肃地恪尽职守的真正武装部队。尽管证据还不够充分,但按人口比例,南部的武装部队数目肯定比北部多,尤其是在1850年代。*当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只有四千名左右达到军训年龄的男性白人时,该市已至少有22个志愿兵连队。1859年,萨凡纳市的一名律师这样撰文描述他的炮兵连开往纳什维尔市和返回的情形:

在梅肯,我们受到新成立的炮兵连的欢迎,并有梅肯志愿兵、弗洛伊德步兵和比布县骑兵的护送。……在由梅肯去亚特兰大的路上,遇到了盖特市的警卫队代表。……在路经马丽埃塔时,当地军校学生放了一枚六磅重的小炮以示致敬……。〔在纳什维尔〕我们受到德意志步枪队、谢尔比警卫队和军校学生的迎接……。〔在返回萨凡纳时〕警卫队、警士、奥格尔索普的轻步兵和爱尔兰贾斯泊绿衣队都列队欢送我们。²⁰

南部武装戒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控制奴隶。在南部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三、五成群的白人在一名头头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夜间巡逻,搜捕无通行证的奴隶和驱散奴隶的秘密聚会。一个巡逻兵每两周值勤一次,所以每条巡逻线上总有50多个白人巡逻兵。

* 马库斯·坎利夫在他著的《士兵与平民:1775年—1865年美国的尚武精神》(波士顿,1968年出版)一书里说,当时南、北的尚武风气一样盛行,北部的志愿兵连队可能比南部还多。但作者所举的例子却只能证明相反的情况。坎利夫还忘了应按人口比例来解释他的证据,也就是说,南部白人数不到北部的一半,他们在西点军校的学生和志愿兵连队的实际数字可能比北部少,但按人口比例却大得多了。

巡逻兵中也有非奴隶主，这也是奴隶主与非奴隶主之间的另一条纽带，使他们与蓄奴制联系起来。

美国尽管很少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但南部的人对此总是担心的。美国只有几次这样的起义，如1831年纳特·特纳起义和1800年在里士满附近由加布里埃尔·普罗泽和丹马克·维齐领导的第一次流产的阴谋暴乱，第二次是1822年在查尔斯顿。这些起义足以引起白人的恐惧。武装的志愿兵连队的作用之一就是“镇压突发的起义”。前面提到的萨凡纳某律师在1856年写道：“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参加这样的武装连队。这种起警察作用的连队，就其性质而言，是十分必要的。”²¹

奴隶制与美国政治

从1844年到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蓄奴制度。1844年前，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也曾多次通过别的问题爆发出来，使南、北双方发生冲突。例如，1819年至1820年的有关密苏里州的争执就是这样。1832年，一些州拒绝执行国会的决议，表面看来这是在争论关税问题，实质上还是蓄奴制问题在作祟。主张抵制国会决议的南卡罗来纳州人认为，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如关税问题所显示的——蓄奴制就会受到威胁。拒绝执行国会决议是维护各州自主权的最极端的做法。这是一种地方分权制宪政理论，其主要目的是保护蓄奴制度和抑制中央政府可能对它进行的干涉。

民主党是蓄奴制的主要政治堡垒，南部组成了奉行杰克逊主义的民主党联盟力量的主体。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获得了蓄奴州的71%的选票，而在自由州他只获得了50%的选票。他的五分之四的选票来自南部。四年后杰克逊在南部蓄奴州获得了70%的选票，在北部有51%。杰克逊主义者对南部的支持给予酬报。杰

杰克逊指定了四名最高法院法官,其中三名是南部人。总统马丁·范布伦是杰克逊亲自选中的接班人,他在最高法院又安排了两名南部法官,却没有增加北部人。杰克逊否决了重新颁发美国第二银行特许执照和拨款修筑公路的提案,这无疑使主张地方分权的南部人感到高兴。杰克逊政府支持南部邮局禁止邮递反奴隶制宣传品的态度也受到南部的欢迎。在1836年至1844年间,国会通过了“限制言论自由法”,其目的就是抵制反奴隶制的请愿书。支持这一立法的国会议员大多是民主党人。

范布伦以“假面具”(指支持南部的北部人)而闻名,但南部仍不信任这位纽约人。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范布伦在1836年的大选中当选了总统,新成立的辉格党(其主要领导人是肯塔基的亨利·克雷)在南部还获得了微弱多数票。在此后的15年里,民主党和辉格党在南部和北部都保持着均势。两党领导人都故意把有关蓄奴制的分歧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但这种做法只是在几年内有效。后来,兼并得克萨斯领土和美墨战争的爆发随即把蓄奴制的扩张问题推到了全国政治的前沿。这使两党在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分界线上分道扬镳了。

第四章 兼并得克萨斯,美墨战争 和1850年的妥协

兼并得克萨斯

1820年代,墨西哥刚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获得独立。美国人在墨西哥政府的同意下,开始向得克萨斯地区移民。但是到1830年,墨西哥政府开始对语言和文化都与自己不同的移民涌入感到不安,对他们政治上是否忠于自己和是否遵守墨西哥政府禁止蓄奴的规定持怀疑态度。美国移民数量的日益增多,也造成了争夺土地和政治权利的矛盾。1836年得克萨斯居民与墨西哥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到达了破裂的边缘。得克萨斯居民终于宣布独立,并在遭到阿拉莫守卫战士的屠杀后,于1836年4月21日在圣·贾辛托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还俘虏了墨西哥领导人安托尼奥·洛佩齐·德桑塔·安纳。为获得自由,安纳签署了同意得克萨斯独立的条约。该条约遭到墨西哥国会的谴责,但得克萨斯人仍兴高采烈地建立了“孤星共和国”,并请求加入美国。

并入美国的请求在华盛顿遭到阻挠。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指责南部民主党人策动得克萨斯的居民举行暴动并申请并入美国是为了扩张蓄奴制的势力范围。北部的一些民主党人也反对合并。安德鲁·杰克逊和马丁·范布伦总统为避免发生美墨战争和维护民主党的团结也不愿亲近得克萨斯。大失所望的得克萨斯人只好自强自立。美国政界有关得克萨斯的争论这才平息下来。

但这种平静是暂时的。1841年,辉格党的首任总统威廉·亨利·

哈里逊上任一个月就患肺炎去世了,约翰·泰勒入主白宫。泰勒是弗吉尼亚州的辉格党人,一贯反对辉格党支持提高关税、重新颁发银行特许证和联邦政府拨款修筑公路和水道的法案。他上任后很快就和辉格党国会议员们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分裂,于是,不久就成了一名无党派的总统。他转而寻求民主党的支持。他提了一些南部人充当他的内阁成员(包括他的弗吉尼亚老乡、国务卿艾贝尔·厄普舒尔),并开始考虑他在1844年大选中如何取胜的问题。他决定要解决得克萨斯的合并问题,因为“这是唯一能赢得南部人对一名南部候选人的足够支持的议题”。¹

厄普舒尔于是就着手与得克萨斯秘密谈判合并条约。与此同时,亲政府的报纸煞有介事地渲染英国在得克萨斯所谓阴谋。事实是,英国曾与得克萨斯谈判相互承认和通商条约。英国的废奴主义者曾表示,希望他们的国家在得克萨斯的影响有助于那里的奴隶解放。南部人把这夸大其词地说成是英国与北部废奴主义者合谋,要在西半球建立自由卫星国,以阻止美国的扩张和把它作为攻击美国蓄奴制的桥头堡。

这是一种很好的宣传。仇英心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仍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南部人担心,如果蓄奴制只局限在目前的范围内,就有可能被窒息而亡;如果不增加蓄奴州的数目,南部就必将在联邦政府里成为孤弱的少数。国务卿厄普舒尔在给南部派的强硬分子约翰·C.卡尔霍恩的信里写道:南部人“必须要求吸收得克萨斯……这对于他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南部的)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团结一致,因为这是一个南部问题,不是辉格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²

1844年2月,厄普舒尔在一次事故中丧命,他的接班人正是卡尔霍恩,正好由他完成了合并条约的谈判,并于4月将此条约提交参议院。卡尔霍恩还同时公开通知英国公使,说蓄奴制关系到美

国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合并对于阻止废奴主义者颠覆蓄奴制度的阴谋是必要的。³ 这种公开支持蓄奴制的做法惹怒了北部的参议员。南部的辉格党议员也不愿支持变节的泰勒，不愿因批准合并条约而冒与墨西哥打仗的危险。他们联合北部辉格党议员及北部的一些民主党议员一起，于6月阻止参议院批准合并条约。但在这之前，得克萨斯问题就早已成为总统竞选的主要问题了。

两名主要的竞选对手——亨利·克莱和马丁·范布伦都在得克萨斯问题上栽了跟头。他们俩于4月27日同时发表反对合并的公开信。克莱的立场与辉格党(包括南部的在内)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四天后他被该党一致推选为总统候选人。但是范布伦的公开信在南部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不安，从而促使卡尔霍恩派民主党人加快了击败这位纽约候选人的行动。这一行动取得了成功，因为民主党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得到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支持。他们利用这一条使范布伦在八次投票中都遭到了失败，尽管在第一轮选举中他曾获得过简单多数票的支持。在第九轮中选举中疲惫的民主党人终于推出了一匹黑马：坚决主张兼并得克萨斯的田纳西州人詹姆斯·K·波尔克。卡尔霍恩的一名支持者喜形于色地宣称：“我们胜利了。波尔克比任何一个被提名的公职人员都更接近我们。他是个大奴隶主，是彻底主张合并得克萨斯并支持地方分权的。”⁴

泰勒想当第三党派候选人的希望因波尔克的胜利而成了泡影，于是他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在总统竞选的紧锣密鼓声中，“得克萨斯热”席卷了整个南部。一个弗吉尼亚人写道：“看来人们在得克萨斯问题上的确激动了，除了立即合并，没有办法使他们得到满足。”克莱担心失去处于合并压力下的南部辉格党人的支持，于7月发表了两封公开信，说如果合并意味着和墨西哥打仗，他仍然是反对合并的，但是“如果能不失面子，不导致战争，并得到联邦共和

国的一致赞同,我是乐意看到合并的。”⁵ 他的信又激怒了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其中有些人决定改投自由党的候选人詹姆斯·G.伯尼的票了。克莱在得克萨斯问题上采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既没有能在南部挽回多少支持票,又失去了纽约地区的一些关键选票。波尔克就因为在纽约地区比克莱多得了5000张选票而当选了总统。

波尔克在除了两个州以外的所有未来的联邦州中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自由党在北部的选票与1840年相比,增加了9倍。虽然自由党总票数不到北部全部选票的3%,但1844年的大选像一把锋利的劈刀,把美国的两个政治党派分割成了大体上按南、北地区划分的党派。

领土扩张天命论和美墨战争

波尔克只是以微弱多数(49.6%对克莱的48.1%选票)获胜的,但主张合并的人仍把这一结果看成是选民给予总统的授权。1844年12月,泰勒为了使得克萨斯的合并成为自己执政期间最大的成就,他绕过了批准条约需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的规定,把合并问题作为联合决议提交给了国会,因为这只需要两院的简单多数就能通过。尽管人们怀疑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宪法,但参、众两院还是在1845年3月泰勒卸任前夕通过了这个联合决议。起初有几个北部民主党议员越轨投了反对票,但最终还是服从了该党的统一步调,投了赞成票。1845年底,得克萨斯终于并入美国,成为其一个州。

北部民主党人支持合并得克萨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希望在兼并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一块面积与得克萨斯相似的土地也能得到南部支持。1844年,民主党在其竞选政纲里向全党保证,它不仅

要得到得克萨斯,也一定要得到“整个俄勒冈领土”。这块土地从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北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当时俄国的阿拉斯加的南部边界。美国和英国都想占领它。1818年以后,两国达成了共同占有的协议。但到了1840年代,美国移民大量涌进哥伦比亚河和威拉米特河流域肥沃的地带。他们也像得克萨斯的移民那样希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波尔克总统于1845年宣布终止美英共同占有的协议,宣称北纬 $54^{\circ}40'$ 以南的土地都归美国所有。好吹牛皮的民主党演说家们公然宣扬美国占领整个美洲大陆的“领土扩张天命论”。在他们的鼓动下,民主党提出了“要么 $54^{\circ}40'$,要么就打!”的口号。北部民主党人认为可以用俄勒冈来测试南部民主党人是否像支持蓄奴制领土扩张那样也支持自由领土扩张的论调。作为田纳西人,波尔克未能通过这个考验。他甘冒与墨西哥打仗的危险以获得西南部地区,却不情愿冒与英国打仗的危险来占领俄勒冈的全部土地。不过在美墨战争爆发前,他的这一态度尚不明朗。

波尔克一上台,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就恶化了。美墨两国存在着三大矛盾。首先是美国兼并得克萨斯。这一问题也许可以谈判解决,因为得克萨斯毕竟已独立10年了,而且墨西哥并不真正希望重新收回它。第二是得克萨斯的边界问题。当得克萨斯尚是墨的一个省的时候,其南部边界在努埃西斯河。但在波尔克政府的支持下,得克萨斯声称其南部边界应该是里奥格兰德河,这样得克萨斯的范围就几乎扩大了三倍。第三是人烟稀少的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地区的前途问题。波尔克已决心不择手段地把它们弄到手。

1845年,波尔克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他一方面派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斯利德尔作为“全权公使”前往墨西哥城,提出要用不超过3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的土地,同时还要求墨西哥答应以里奥格兰德河作为美墨边界,以偿还

它对美国公民所负的所谓债务，另一方面。波尔克命令扎卡里·泰勒将军率领的美国军队进驻努埃西斯河以南的争议地区，同时派一支分遣舰队到墨西哥沿海去巡逻。他指使驻加利福尼亚蒙特雷的美国领事煽动当地居民的亲美情绪，因为那里有数百名美国移民。美国政府还秘密命令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美墨战争爆发时立即夺取加利福尼亚沿岸各港口。

墨西哥政府拒绝接待斯利德尔公使。此后不久，墨西哥城发生政变，反美的军事政府上了台。该军政府发誓要收复被“外国佬”“盗走的得克萨斯省”（西班牙和美国的肮脏交易）。波尔克以牙还牙，于1846年1月命令泰勒的部队开赴里奥格兰德河，并命令美国船只封锁里奥格兰德河道。墨西哥则派军队驻扎在里奥格兰德河南岸，与泰勒对峙。波尔克希望发生一次事件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而他急不可待，甚至在未发生事件的情况下，准备在5月9日向国会发表战争咨文，这时消息传来，得知在4月24日在里奥格兰德河北岸的一场冲突中有几名美国士兵被墨西哥人杀死。5月11日波尔克发表了战争咨文。在演说中他装腔作势地说，“虽然我们力求避免战争”，但战争“还是因为墨西哥的挑衅而爆发了。它侵占了我们的国土，使美国人在美国的土地上流了血。”⁶

墨西哥对这块争议地区的要求起码跟美国同样强烈，所以可以说这场战争是美国发动的，因为它让墨西哥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流血，这是废奴主义者、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以及甚至许多南部辉格党人的意见。俄亥俄州的一个辉格党参议员发表了曾轰动一时的讲话。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墨西哥人，我会对你说：‘难道你们没有埋葬自己同胞的空地吗？如果你们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我们就用沾上血的手来迎接你们，这里好客的坟墓并不嫌弃你们’。”废奴主义者的宣传使更多的人相信，得克萨斯问题和美墨战争是罪恶的“蓄奴制政权阴谋”为扩张蓄奴制领土所采取的步骤。在新英格兰

地区流传着一首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写的反战的方言诗，他假借一个新英格兰的农人霍齐亚·比格洛的口说：

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垂涎欲滴，
为的是建立新的蓄奴州，
这样就可以凌辱你、奚落你，
还要罪恶地掠夺你。

马萨诸塞州议会同意洛厄尔的观点：1847年它通过决议，说发动这场“违宪战争”“有三个目的：扩大蓄奴制、加强蓄奴制的力量、争取控制自由州”。⁷

对“整个俄勒冈”的要求成为首批战争灾难之一。波尔克不愿同时两面作战，于是便从“北纬54°40′”的要求退却，准备以北纬49°为基础与英国进行妥协谈判。有12名北部民主党议员背叛民主党而对妥协条约投了反对票。由于辉格党无视“扩张领土天命论”，并且希望与英国维持和平，一致赞成该条约，这才使它得以通过。辛酸的北部民主党人抱怨南部民主党人背信弃义，说“得克萨斯问题和俄勒冈问题是在同一情况下产生、在同一个摇篮里成长发育的”，但利用了北部的选票兼并了得克萨斯以后，“得克萨斯的奇怪的朋友们却变了脸，尽一切可能去扼杀俄勒冈”。⁸ 尽管如此，多数的北部民主党人还是继续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

尽管辉格党不喜欢这场“波尔克先生的战争”，但是该党议员愿冒政治自杀的危险去投反对票者寥寥无几，因为多数地方是支持战争的。联邦主义党因反对1812年的战争而遭灭顶之灾的教训，许多辉格党人记忆犹新。辉格党里只有14名众议员和2名参议员投票反对宣战。在军队和军备拨款问题上，多数辉格党议员也是投赞成票的。但在预审该法案和国会表决与战争有关的辅助性法案的过程里，出现了一个明确反战的派别，它包括了几乎全部北部辉格党议员、几个南部辉格党议员，另有一些北部的民主党议

员。这种反战情绪部分是由于1846年大选时国会里增加了38名辉格党议员,其中多数来自东北各州。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军队在墨西哥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果的话,反战派是有可能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联合力量的。但是由扎卡里·泰勒和温菲尔德·斯科特领导的、由正规军和志愿兵组成的混合部队尽管在数量上不及墨西哥的军队,却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胜利,到1847年9月,攻陷了墨西哥城。美国另有一支小部队攻占了新墨西哥地区的圣菲市,然后向加利福尼亚进军,并帮助美国的太平洋分遣舰队和由美国移民组成的志愿兵打垮了当地墨西哥军队的抵抗。

美军在墨西哥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有一支技术精良的炮兵部队,其陆军进军神速而墨西哥部队则士气低落,而且美军自斯科特和泰勒将军一直到尉级军官中有素质优良的指挥官。在优秀的下级军官中,有些人在15年后的另一次更为残酷的冲突中成了领导人,如罗伯特·E.李、尤利塞斯·S.格兰特、托马斯·J.杰克逊、艾尔伯特·S.约翰逊、约瑟夫·E.约翰逊、乔治·B.麦克莱伦、皮埃尔·G.T.博雷加德、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布拉克斯顿·布雷格、约瑟夫·霍克、乔治·戈尔顿·米德、乔治·H.托马斯及杰斐逊·戴维斯。

美军的胜利使扩张主义者的胃口更大了,对于里奥格兰德河以南的大片墨西哥土地也开始垂涎三尺。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波尔克在1847年10月下令召回看来急于想和墨西哥人妥协的和平谈判使者尼古拉斯·特里斯特。特里斯特拒不应召,与墨西哥达成了“瓜达鲁普·希达尔戈条约”,并于1848年2月把它送往华盛顿。根据这个条约,墨西哥放弃对里奥格兰德河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并同意以1500万美元和墨西哥欠美国人的所谓债务作为交换条件,把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割让给美国。(这一块土地包括今天的加

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的全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的大部及俄克拉河马、科罗拉多和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3月10日，参议院投票表决该条约时，7名不希望占领墨西哥领土的辉格党议员和7名想要更多的领土的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但其余的票数仍足以使该条约获得批准。

在3年的时间里，美国共获得了1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其中近一半位于老密苏里妥协线北纬36°30'以南。这主要是两位南部人总统和南部的将领(斯科特是弗吉尼亚人；泰勒是路易斯安那人)努力赢得的，他们的志愿兵有三分之二人数是来自蓄奴州的。由此，人们可以设想，在北部议员提出要在美墨战争中夺取的土地上排斥奴隶制时，南部人会怎样地震惊和愤慨。

威尔莫特附件

离美墨战争结束尚不到3个月，一个初出茅庐的宾夕法尼亚民主党议员戴维·威尔莫特于1846年8月8日就一项拨款法案提出了修正条款，其内容是：“作为割取墨西哥共和国领土的一项明确的和基本的条件……在该领土的任何部分永远禁止实行蓄奴制或强制性的劳役。”⁹ 这一补充条款包含的这个原则，后来被称为“威尔莫特附件”，并成为此后15年里南北冲突引人注目的因素。

威尔莫特代表的是一批极为愤懑的北部民主党议员。其牢骚跟某些经济立法有关。波尔克政府上台时曾起誓要为辉格党争取联邦政府的资助以发展经济的计划铲除最后障碍。大多数北部民主党议员都赞同这一点，但有两件事情使重要的议员集团之间产生了分歧：一是1846年的“沃克关税法”。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议员对关税问题是十分敏感的，他们认为许多商品的关税下降的幅度超过了政府曾对他们作出的承诺。二是波尔克否决了得到中西部

民主党议员支持的关于改善河道和港湾设施的提案。中西部这些议员还对政府在俄勒冈问题上与英国妥协感到愤慨。其他不满情绪与政治有关。1844年范布伦未得到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其支持者至今仍耿耿于怀；波尔克拒绝任命范布伦的人进其内阁，并使纽约的巨富们倒向范布伦的宗派对手，更使他们的愤懑火上加油。

北部民主党人的一切怨恨之根源在于日益不满南部民主党人对党的控制。在1844年阻挠提名范布伦的是南部民主党人；炮制“沃克关税法”和支持波尔克否决改善河道和港湾设施提案的也是他们；坚持割取整个得克萨斯领土却把半个俄勒冈拱手让给他人的总统也是一个南部人。这个总统还挑起了被北部人视为蓄意扩张蓄奴制势力的罪恶的侵略战争。北部的民主党人害怕自己会因支持这场亲蓄奴制的战争而失去选票。纽约的一个民主党领导人说：“为南部利益而使自己蒙受损失的北部民主党人已经够多啦，我不希望看到更多了。”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人吉迪恩·韦尔斯于1846年7月写道：“南部从来没有为安抚北部作出任何让步，而我们却为满足南部作了很多很多。”“我们必须让北部的人民感到满意，……我们决不能把扩张蓄奴制变成这场战争的成果。”¹⁰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一位辉格党人写道，南部“早已践踏北部的权利和正当要求。他们对北部政治家作威作福，如今更是变本加厉。我认为现在正是北部应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¹¹

北部辉格党的全体议员和北部民主党议员除4名外全都投票赞同威尔莫特附件，但南部民主党全体议员和南部辉格党议员除两名外都投了反对票。众议院通过了该附件，但却未能在这一届参议院会议上进行表决。1847年2月，在下一届会议上，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了威尔莫特附件；但在参议院，因为有5个北部民主党

参议员加入了南部的行列(不包含反蓄奴制附件)。后来,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28名民主党众议员也改变了支持修正条款的立场,使得这个不附附件的拨款案就获得了足够的赞同票。

政党因地区利益分裂

尽管南部在否决威尔莫特附件问题上获胜了,但政治体系经历了一次预兆不祥的破坏,原先政党的分野是在国会表决时显示出来的,现在一变而为完全按地区利益划分了。这对于两个政党和合众国本身来说都是个不祥的兆头。在威尔莫特附件之前,政治体系还能容忍地区之间的分歧,这是因为蓄奴制是个州的制度,不在国会权限之内。但是,由于决定新领土的体制是国会的职权,所以蓄奴制问题就突破了党派界限,成为地区冲突主题了。

北部各州议会除了一个州外,都通过了威尔莫特附件。南部各州议会作出反应,保证“不惜代价坚决抵制到底”。赞成威尔莫特附件的一派就南部最珍惜的价值观——荣誉向南部提出了挑战。阻止奴隶主往新领土上转移财产的一个办法就是往他们脸上抹黑。那是一种诋毁手段,“降低他们的身份,……要对南方佬说,走开!你们是下等人,因为道德败坏而不得进入我们这里。”一些南部人说,南部不能容忍这种“污蔑”,“宁死也不能接受这种污辱。”¹²

南部人最害怕的是被自由领土包围,害怕自由领土像一条大蟒蛇一样慢慢地将蓄奴制度缠死。一些反蓄奴制的人也明确地道出了这个意图。俄亥俄州的一个辉格党人警告说:“如果你们要打这场血腥征服战争是为吞并领土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这块领土上建立一批自由州,包围你们,然后将到处点燃自由之火,烧毁你们的奴隶锁链,解放你们的人民。”这些话使南部更加恐慌。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H. 哈蒙德告诫说,威尔莫特附件如果被通过了,密西西比河西岸将出现10个自由州。“北部一旦获得了这股新

势力就会对我们进行欺压,宣布解放奴隶或干别的类似的事,把我们贬为海地人那种处境,……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就是故意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子孙——扔进火海。”¹³南部的议员们也纷纷扬言,如果通过威尔莫特附件,合众国必将解体。

关于南部立场的正式条文照例由约翰·C.卡尔霍恩提交给国会。他的呈文则照例咬文嚼字地搬弄宪法权利作为自己的依据。1847年2月19日,他向参议院提交了一系列的提案,说新领土是一些州的“共同的财富”,国会作为各州的“联合机构”,无权剥夺任何州的公民把其财产转移到新领土上去的权利,因此在所有领土上蓄奴制度都是合法的。在解释其提案时,卡尔霍恩说,如果蓄奴制“被完全排斥在新领土之外”,蓄奴州和自由州各15个的均势就遭到破坏,蓄奴州就只能“听凭非蓄奴州的摆布了。”当天卡尔霍恩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如果这个阴谋得逞,我们就成了少数,……那时我只能对合众国说:可悲!可悲!那时你会看到,我将挑起南、北纠纷。如果我们退缩了,我们就会完蛋了;但如果我们坚定不移,我们就能胜利:迫使北部接受我们的要求,否则我们宣布独立。”¹⁴

在威尔莫特和卡尔霍恩这两个极端相反的立场之间,还存在着一系列似乎可以调和的意见。有一种折衷方案得到波尔克及其内阁,以及辉格党和民主党双方温和派的支持,它主张将北纬36°30'的密苏里妥协线延伸到太平洋海岸线。这样,在俄勒冈领土(即现今的俄勒冈、华盛顿和爱达荷三个州)再加上组成了现今的犹他州、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的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北半部的土地上禁止建立蓄奴制;在组成了今天的俄克拉何马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南半部的领土上,不限制蓄奴制。这个方案对部分反蓄奴制的北部人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认为西南部

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将使蓄奴制难以在那里扎根。但是多数反蓄奴制的人不仅关心这些领土的命运，也关心将来美国可能获得的其他领土的前途问题，所以，坚决支持威尔莫特附件或卡尔霍恩提案的双方强硬派都拒绝接受任何折衷方案。

在36°30'线的方案失败以后，又出现了被称为“人民主权”的折衷方案。最早拥护这一方案的是密执安州人刘易斯·卡斯，他是184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波尔克决定不连任总统)。他在1847年底提出了“新领土的事务让新领土的人民自己去解决”的主张。这个主张符合民主和自治的原则，并具有政治上模棱两可的性质。卡斯没有明确指出人民应在哪一个阶级对蓄奴制作出取舍。是不是哪个地方的立法机构都可以随意禁止蓄奴制呢？北方的民主党人理解为“人民主权”就说明可以这样做。卡斯的方案是不是意味着新领土的人民只有在申请州地位的时候才能决定蓄奴制的取舍呢？南部的民主党人就是这样来理解人民主权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州议会才能有权制定反蓄奴制的立法。按照这一理解，蓄奴制就可以在经济上适宜的地方先取得合法的立足之地，然后一个或几个新建的州就可以带着蓄奴制加入合众国了。南部和北部的民主党人都知道存在着对人民主权方案的不同理解，但都接受了这个人民主权方案，并且心照不宣地同意保留这个模棱两可的含意，以便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维护民主党的团结。

1848年大选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未能防止因蓄奴制扩张问题而使党分裂。这个问题首先由于纽约州派了两个观点对立的代表因而给大会造成了困难。一个是坚决支持威尔莫特附件的范布伦派(当时在政界被称为“烧谷仓派”)；另一个是想博得南部欢心的“保守

派”。*“烧谷仓派”拒绝两个代表团同时出席大会的折衷建议,踢开大会,以分裂的极少数票提名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南部和西部的部分民主党代表提名卡斯,但他在蓄奴制问题的暧昧态度难以获得卡尔霍恩派的支持。亚拉巴马州的威廉·洛登·扬西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重申了卡尔霍恩关于在新领土上蓄奴制地位的观点。当他的提案以1:6的少数遭到否决时,扬西退出会场。虽然跟随他的只有一名代表,但这个象征性的事迹已预兆了困难的前景。

辉格党为了尽量减少因地区分歧给该党带来的损失,决定不制定任何政纲,并提名一个非政治家去竞选总统。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是辉格党的两位年高德劭的领袖,但辉格党置他们于不顾,却提出了从未投过票,并且直到1848年大选时都还没有肯定自己是不是一名辉格党人的战争英雄扎卡里·泰勒来当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本是反对美墨战争的党派,现在却推举这一战争的将领来当总统候选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当时美国政界是多么千奇百怪。

泰勒是个大奴隶主,大多数北部的辉格党人并没有因此反对他,但也有少数反奴隶制的强硬派人士不肯支持他。泰勒的提名使马萨诸塞州辉格党人中的“良心派”和“棉花派”之间长期存在的慢条斯理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良心派”的成员都是深受反奴隶制运动影响的少壮派。他们对马萨诸塞州的辉格党受纺织业主的控制很不满意,这些纺织业主在经济上依赖南部棉花。“棉花派”辉格党人尽管曾反对并吞得克萨斯并支持威尔莫特附件,但在1848

* “烧谷仓派”是纽约州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不满南部人控制党内事务和纽约州民主党的赞助机构的控制。传说某荷兰人为消灭老鼠把谷仓烧了,“烧谷仓派”据说就是想以退出民主党(从而使之瘫痪)的办法来惩罚对立派。“保守派”据说是只关心选票而不顾原则的人。

年,他们想跟南部辉格党人寻求和解。针对这一点,以查尔斯·弗朗西思·亚当斯和查尔斯·萨姆纳为首的“良心派”指责提名泰勒是“鞭子老爷”和“织布机老爷”之间的罪恶联盟的产物。他们退出了辉格党,并准备参加一个第三党联盟。

成立这样一个联盟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1848年7月,查尔斯·萨姆纳在他给俄亥俄州的萨蒙·P.蔡斯的信中写道:“看来全国终于觉醒。自由精神像早年独立战争时期那样,遍布了整个马萨诸塞州。”¹⁵蔡斯在自由党里领导了一个小组,专门与退出各主要党派的反蓄奴主义者联络。自由党在1844年后也曾发生过分裂:一小部分人认为,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有权废除各州的蓄奴制度。由于采取这种极端立场的人很少,这些自由党里的纯真主义者发现,自己是反奴隶制运动被孤立的一翼,这跟谴责宪法为亲奴隶制文件的加里森主义者是该运动被孤立的另一翼完全一样。1847年底,自由党的主流派支持蔡斯的主张,提名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约翰·P.黑尔为总统候选人。黑尔在政纲中要求联邦政府根据宪法,在有权禁止蓄奴制的地方,如新领土、华盛顿特区和所有联邦机构,禁止蓄奴制。这个政纲为具有类似想法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联合铺平了道路。

黑尔愿意让贤,给一个能够获得更广泛支持的候选人,特别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纽约州里,已经被“烧谷仓”派提名的马丁·范布伦就是这样的人选。这年夏天,在自由党人、“良心派”辉格党人和“烧谷仓派”民主党人之间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谈判,终于为8月份在布法罗召开“自由土壤党”大会打下了基础。争论的焦点是范布伦。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和废奴主义者很难接受这位同情蓄奴制的北方民主党人,但是为了获得“烧谷仓派”对强硬的反奴隶制政纲的支持,自由党人和“良心派”辉格党人只好容忍了范布伦。他们还设法让查尔斯·弗朗西思·亚当斯当了竞选伙伴。在“自由土壤、

自由言论、自由劳力和自由公民”的口号下，“自由土壤党”诞生了。

“自由土壤党”的诞生打乱了辉格党和民主党不谈蓄奴制问题的竞选战略。在北方，这两大党都不得已采取反奴隶制的立场：民主党人坚定认为，人民主权将使新领土成为自由土地；而辉格党人则声称他们支持威尔莫特附件。但在南方，这两党就摆出另一副面孔：民主党人吹嘘自己在领土扩张中的功劳，以表白自己是关心南部利益的；而辉格党人则强调，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主泰勒要比中西部的蔡斯更能维护南部的权利。里士满一家报纸声称：“与各种折衷方案相比，我们宁愿要拥有甘蔗种植园、棉花种植园和400名黑奴的‘老扎克’*。”¹⁶

显然这一口号赢得了选票。与1844年相比，辉格党在南部的选票增加了百分之十，而民主党则减少了百分之四。在15个蓄奴州里，泰勒在8个州获胜；在15个自由州里，也有7个州支持他，其中包括起关键作用的纽约州。于是他在选举团里赢得了多数。范布伦没有能在任何一州获胜，只得了北部人民的选票的14%。他作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对选举结果无足轻重，但他却在纽约州从卡斯那里争得了民主党的很多票数，足以使该州落入辉格党手中，而在俄亥俄州则吸引了辉格党的许多票数，使该州落入民主党之手，抵消了在纽约州的影响。

1850年的妥协

在1849年3月4日泰勒就职前，分裂主义的余烬又在即将结束的国会会议上重新燃烧。由北方控制的众议院重新肯定了威尔莫特附件，通过了一项谴责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进行奴隶买卖的

* 老扎克即扎卡里·泰勒。——译者

决议。并且准备通过一项废除蓄奴制本身的提案。作为报复,南部议员小组让卡尔霍恩起草一份陈述南部对此愤懑的发言稿。卡尔霍恩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起草了一份讲话稿,他希望讲话稿将成为一个捍卫南部权利的新政党的纲领。但是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南部民主党人在讲话稿上签了字,而南部辉格党人则根本不愿沾边。辉格党人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后,正期待着入主白宫的泰勒将再次使他们交上好运。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就表达了这个观点:我们“在泰勒将军麾下感觉无后顾之忧”。¹⁷

但泰勒一上台就使他的南部盟友大吃一惊。他认为自己是国家的,而不是南部的总统。纽约的反奴隶制的参议员威廉·H.西沃德成了他的主要顾问之一。总统必须对新领土上的蓄奴制问题立即作出决定。1848年在萨特矿发现黄金后,大批移民像潮水般涌向加利福尼亚,这就有必要在这一地区设立治理机构。泰勒的解决办法是立即接受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州,以防止领土问题日趋恶化。这遭到南部的极力反对,因为在墨西哥法律规定下,这些地区不存在蓄奴现象,这样,这些地方就将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对于许多南部人来说,泰勒的政策就是改头换面的威尔莫特附件。

总统派密使到旧金山和圣菲,鼓动当地人起草州宪法并申请加入联邦。加利福尼亚人无须他人督促。他们于1849年秋召开了大会,写了一部禁止蓄奴制的州宪法。加利福尼亚的人口已超过了当时的两个已建州(特拉华和佛罗里达)的人口,所以就申请获得州的地位。但是,人口稀少的新墨西哥要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复杂多了。一方面,它与得克萨斯(今新墨西哥州的东半部被认为是得克萨斯的)边界争端几乎要导致一场热战;另一方面,在大盐湖附近的摩门教居民区新近为拟议建立的新州德塞里特州通过了一部宪法。德塞里特虽然没有蓄奴现象,但存在着一夫多妻制,对于

许多国会议员来说，这也是同样难以接受的。所以在这里成立州的问题只能等到上述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考虑。

加利福尼亚问题成了南部权力和力量的试金石。它若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就将成为一个致命的先例。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巴恩韦尔·雷特说，蓄奴制度能否在西南部兴旺起来，“权利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在将来割取的领土上能否有蓄奴制。拒绝承认〔南部的权利〕只能导致力量的较量。”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强调：“原则不仅是岗哨，而且是制宪自由的堡垒。如果在原则上让了步，或被强力夺走了，那么城堡很快就会被攻陷。”南卡罗来纳州的哈蒙德说：“我们的安全全靠力量均衡。”¹⁸

加利福尼亚内部的对立派给卡尔霍恩的南部权利运动增加了新的生命力。1849年秋，在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对立派要求第二年6月在纳什维尔召开大会。南部的激进分子（不久后他们便称为“食火者”）开始公开地谈论要脱离联邦。他们希望能利用纳什维尔大会来推动这件事。南部反泰勒的力量削弱了那里的辉格党势力。在1849年几个州的选举中，辉格党的票数大减。辉格党人出于自卫，就和民主党人争着表白自己是多么地忠于南部权利。脱离联邦的言论已成为街谈巷议。卡尔霍恩说，南部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比过去我看到的更坚决、更大胆。许多人承认自己是分裂主义者，更多的人声称，只有分裂，别无他途”。詹姆斯·哈蒙德对卡尔霍恩说，如果北部不让南部在参议院里保持永久的平等，“我们就将他们踢出国会山，并放一把火烧掉国会”。¹⁹ 不仅有文斗，还有武斗。如在国会开会时曾多次发生拳打脚踢。1850年4月17日，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亨利·S·富特就曾在参议院对其同事拔出左轮手枪。

1850年，共和国面临着一场基本秩序的危机。占据这个伟大戏剧舞台中心的是全国3位即将结束历史舞台生涯的重要政治家：

参议员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和约翰·C. 卡尔霍恩。他们3位都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出生并且从政半个世纪的人。他们都曾谋求美国的最高职位,但都未能实现其夙愿。他们在1850年的大辩论里的主要作用,是将领导权传给年轻一代。卡尔霍恩在大辩论期间去世。两年后,克莱和韦伯斯特也相继去世。4位年轻的参议员——斯蒂芬·A. 道格拉斯、威廉·H. 西沃德、杰斐逊·戴维斯和萨尔蒙·P. 蔡斯,成了大辩论的主角。在以后的10年里,他们成了4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

在1820年和1833年,亨利·克莱曾为了避免分裂而提出了妥协方案,因此,赢得了“大调解家”的名声。1850年他再次出面进行调停。1850年1月29日,克莱向参议院提交了8项提案。在前6项中每两项为一组,分别向北部和南部作出些让步:加利福尼亚将以自由州的资格加入联邦,但在从墨西哥并吞的其余领土上则对“蓄奴制不加限制或不提任何条件”,得克萨斯的边界争端的解决应有利于新墨西哥,但联邦政府应承担得克萨斯的公共债务,作为对它的赔偿;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要取消,但当地的蓄奴制应保证不受联邦政府干预。这6项提案对北部的让步可能大于对南部的让步,因为整个加利福尼亚都将成为非蓄奴区;新墨西哥也有可能是自由领土;得克萨斯领土的削减将缩小蓄奴制的范围,从而使南部想把得克萨斯分为两个或更多的蓄奴州的期望就遭到了挫折。但是允许华盛顿特区保留蓄奴制是南部的收获,而否定威尔莫特附件则是反奴隶制者的失败。最后两项提案是对南部的让步。其中一项声称国会无权干涉州与州之间的奴隶买卖;另一项要求联邦政府通过更强硬的法律,帮助奴隶主追回逃亡到北部的奴隶。

克莱慷慨激昂地为他的提案发表了辩论词,接着便出现参议院历史上几篇有名的讲话。3月4日,病魔缠身、不久就去世的卡尔霍恩披着法兰绒衣,坐在一旁,由弗吉尼亚的一个参议员代他大

声宣读讲话稿。他反对妥协，警告说合众国已危在旦夕，南、北冲突已使国家机构分裂或遭到削弱，例如，卫理公会和浸礼会分成了北方派和南方派；一些民间协会已经在蓄奴制问题上分裂了，政治党派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他说，每一起分裂事件都是由北部主动挑起的，要维护合众国，就必须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使南部恢复它“在南、北均势遭到破坏之前所具有的保护自己的力量。”卡尔霍恩也许在考虑他的“共存多数”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应有分别代表南部和北部的两名总统，都对全国性的立法拥有否决权。²⁰

三天后，丹尼尔·韦伯斯特作了事后被许多人称为“3月7日讲话”的发言。他说：“我今天不是作为马萨诸塞州人，也不是作为北部人，而是作为一名美国人在此讲话。……我今天要为维护合众国的存在而讲话。‘为此，请听我的讲话吧’。”尽管韦伯斯特是由反奴隶制的选民们选举出来的，并且曾支持过威尔莫特附件，但他现在却呼吁妥协了。他说，造物主将会把蓄奴制从并吞的墨西哥领土上排除出去；何必采用立法手段来伤害南部的面子呢？“我并非竭力重申自然法则或上帝的意志”。²¹但是自由土壤党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他们决不相信上帝会在新墨西哥禁止蓄奴制度，并且认为韦伯斯特提议通过追回逃亡奴隶的法律是罪上加罪。韦伯斯特的讲话虽然得到了北部和南部保守派的称赞，却遭到了反奴隶制者的臭骂。约翰·格林列夫·惠蒂尔写的一首诗《伊卡博德》真切地反映这些人的愤慨：

何等堕落！糊涂至极！
昔日光辉已黯然失色！
虽有一头华发，
荣誉一去不再来！

一切都已消逝，

眼睛依旧，灵魂却不存在：

背弃信仰、鲜廉寡耻，

斯人已矣！

西沃德在3月11日所作的“法外法”讲话更符合废奴主义者的胃口。他说：“在道德、社会和政治事业的稳步运转下，……奴隶解放是必然的。这个进程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则要看它是得到推进还是受到阻碍。……一切巩固或扩张奴隶制的做法都倾向于触发暴力；而一切限制其发展、削弱其力量的措施都有助于奴隶制的和平消亡。”所以克莱的妥协方案是“极端错误并且十分罪恶的。”不仅宪法证明在新领土上禁止蓄奴制是正确的，“而且还有超越美国宪法的崇高法律”，即上帝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在上帝面前人人是自由平等的。南部说西沃德的讲话是“荒谬邪恶的”，克莱指责这种法外法的论调是“荒唐的、不负责任的、令人作呕的”。²²

在进行了一阵子的唇枪舌剑之后，参议院于4月成立了一个“13人委员会”，由克莱任主席，任务是把他的提案修改成法律条文。到这时，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主要由中西部的民主党人和上南部的辉格党人组成的支持妥协方案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只占参、众两院全部议员的四分之一，因为北部的辉格党议员（也包括某些南部的民主党议员）反对妥协方案中亲蓄奴制的内容，而南部民主党议员和下南部辉格党议员则反对其中的反奴隶制的内容。克莱同意将妥协方案的各个部分作为整体向上提交，希望对立的双方都能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而赞同整个提案。但是事与愿违，对立的双方都为了不让对方获得其所要的东西而拒绝接受提案。克莱在5月份提交了“混合提案”^{*}；但是，在进行了近3

*、混合提案承认加利福尼亚享有州地位；视新墨西哥和犹他为准州，不提及蓄奴制问题；调整得克萨斯边界，使之有利于新墨西哥；给得克萨斯1000万美元赔偿费，用于偿付公共债务。关于逃亡奴隶的法律和在华盛顿特区废除奴隶买卖的提案分别提呈国会。

个月的错综复杂的角逐之后，参议院于7月31日将该混合提案否决了。在这期间，政党的和地区间的联合体像万花筒似地组合后又解体。在这之后，疲惫不堪、悲观失望的克莱离开了鼎沸的华盛顿，到纽波特去享受清爽的海风了。

伊利诺伊州的斯蒂芬·A·道格拉斯代替克莱成了亲妥协力量的领导人。作为民主党的实用主义者和老谋深算的国会议员，他根本就不相信能通过一个包罗万象的提案。他后来曾说，他对于在新领土上是否禁止蓄奴制并不关心。但他相信能使不同的集团都赞同妥协中的各个部分。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他在国会其他议员的帮助下，就是按此既定方针做的。

这年夏季发生的两件事帮了道格拉斯的忙。6月召开的纳什维尔大会未能如南部激进分子原先希望的那样煽风点火。只要在国会的面前还放着妥协方案，多数南部人都不愿立即采取极端行动。来自南部九个州的代表通过了一些有节制的决议，并决定闭会后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月之后泰勒总统因肠胃炎突然去世。泰勒始终坚持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州加入联邦的计划，而不给南部以任何补偿，来自纽约的新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赞同妥协。菲尔莫尔对几个辉格党议员施加影响，让他们在表决他们不喜欢的妥协议案时弃权，从而减少了反对票数。

在1850年的8月中旬至9月中旬，国会通过了五个独立的提案：承认加利福尼亚的州地位；调整得克萨斯的边界；将新墨西哥和犹他作为准州，并规定在它们成为正式州时，“按加入联邦时该州的宪法规定——不管是否禁止蓄奴制——吸收进联邦”；颁布严厉的逃亡奴隶法令及在华盛顿特区禁止奴隶买卖。

这些就是1850年的“妥协”。但是，如果妥协意味着“敌对各方之间由于每一方都赞同另一方的某些条件而达成的协议”的话，这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妥协。任何一方的多数反对派决不赞同另一

方想要的条款；相反，多数北部议员对他们认为亲奴隶制的措施投了反对票，而多数南部议员对他们认为反奴隶制的措施也投了反对票。这些议案获得通过只是因为主张妥协的北部民主党议员和上南部辉格党议员相互支持的结果。有关犹他、新墨西哥和逃亡奴隶提案是因为许多北部议员弃权而获得通过的。因为这个原因及此后10年的事态发展，历史学家戴维·波特把它称为“1850年停战协议”，这看来更为贴切。²³

不管怎么说，1850年妥协中的某些部分的后果是始料不及的。加利福尼亚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的，但其选民送往华盛顿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却大多是亲奴隶制的。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加利福尼亚即使是一个蓄奴州的话，也不大可能给予南部更多的支持和宽慰。另一方面，关于新墨西哥和犹他两地区的有关条款，对于南部来说只是一个虚假的胜利。犹他尽管在1850年通过了一项奴隶法规，直到1860年，那里也只有29名奴隶。南部人把一部分奴隶带进了新墨西哥，并迫使当地于1859年通过了奴隶法，但1860年的人口统计未在那里发现任何奴隶。在华盛顿特区禁止奴隶买卖的决议使外地的奴隶不得运进特区出卖或转让，但特区内的奴隶买卖并没有能制止。关于逃亡奴的法律，在1850年的妥协谈判中是争论得最少的一个提案，它结果成了最爆炸性的事件。

1850年的妥协方案尽管含糊而且又有嘲讽味，但它毕竟避免了（至少推迟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多数美国人，甚至那些不喜欢妥协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菲尔莫尔总统宣称，这个妥协是南、北矛盾的“最终的和不可逆转的解决办法”；两个政党和两个地区里的温和派都接受了他的这个提议。在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上，南部比北部更真心诚意。大多数南部人，尤其是辉格党人，把妥协看作是南部的胜利。北卡罗来纳的一个辉格党人写道：“我们南部人的奴隶财产又获得了新生，蓄奴制比过去25年更牢靠了。”²⁴

这种情绪遏制了南部激进分子的分裂主义运动。在下南部的4个州(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里,辉格党人和民主党里的温和派组成了联邦主义者联盟,挫败了右翼民主党人企图控制当地州政府和召开脱离联邦的大会的努力。1850年12月,佐治亚的联邦主义者通过了一些决议,为南部在下一个10年制定了标准政纲。这是一个暂行的联邦主义的政纲。虽然佐治亚“不完全”赞同妥协方案,但是它将“把它当作调整地区间矛盾的永久性的协议来遵守”,但是,如果国会或北部采取什么行动的话,佐治亚必将奋起反抗,即使发展到脱离联邦也在所不惜。这些行动包括在华盛顿特区禁止蓄奴制、撤销或不实施逃亡奴隶法令、在犹他或新墨西哥准州禁止蓄奴、拒绝某蓄奴制新州加入联邦或抑制州际奴隶买卖。而这一些正是“自由土壤党”和越来越多的北部辉格党人所主张的政策,所以反奴隶制的人把佐治亚政纲看作是一种政治恫吓。

作为温和派和联邦主义者的南部辉格党人原以为南部接受1850年的妥协将使他们获益,结果大部分好处都被民主党人获得了。的确,到1852年,辉格党在南部已处于困境,原因有下列三个方面:(1)对已故总统泰勒“背叛”南部仍记忆犹新;(2)事实证明民主党人在维护南部权利方面比辉格党人更强硬,所以北部稍有侵犯南部利益的动静,辉格党的支持者必将倒向民主党;(3)北部反对逃亡奴隶法令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抵制了该法令的实施并加强了北部辉格党中反奴隶制派的势力。最近有几个反奴隶制的激进分子被选进了国会,如新罕布什尔州的约翰·P. 黑尔、俄亥俄州的萨蒙·蔡斯和本杰明·韦德、纽约州的西沃德和马萨诸塞州的萨姆纳被选进了参议院;宾夕法尼亚州的撒迪厄斯·斯蒂芬和印第安纳州的乔治·W. 朱利安被选进了众议院。他们在国会与一位多年来一直对“奴隶制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老议员联合,即俄亥

俄州的乔舒亚·吉丁斯。这些人几乎都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生的，或者其父母是新英格兰人。他们大多数都是辉格党人，所以南部的辉格党人也因为党内有这些新英格兰的“狂热者”而受到牵连。

1852年的大选

1848年，民主党内的宗派主义“烧谷仓派”给该党造成的损失比真正的反奴隶主义者所能造成的损失更大。到1851年，多数“烧谷仓派”都已驯服地回到了民主党内，抛弃了他们的威尔莫特附件原则。1852年，民主党提名新罕布什尔州的富兰克林·皮尔斯竞选总统，竞选政纲是强调地方州的权利，谴责废奴主义和重申1850年的妥协内容。皮尔斯尽管是个新英格兰人的后裔，却是一贯支持蓄奴制的。民主党再度成为一个团结的、全国性的政党。

北部的辉格党仍分为两派：主张妥协的菲尔莫尔派和反奴隶制的西沃德派。南部的辉格党人决定，如果后者在党内占了上风，他们就退党。辉格党在1852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表明，南、北的紧张关系和内部的观点矛盾已使该党陷于瘫痪。北部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坚持提名征服墨西哥的南部将领温菲尔德·斯科特；南部辉格党人则支持纽约的菲尔莫尔。大会勉强通过了一个“默许”1850年妥协方案的政纲。但是支持斯科特的代表中有一半投票反对这个政纲，另一半中的许多人支持这个政纲，仅仅是把它作为让保守派支持斯科特的一种默许的交换条件。大会进行了52轮选举，仍不能在这两名候选人中作出抉择。在支持斯科特的选票中，96%来自自由州；支持菲尔莫尔的选票中，85%来自蓄奴州。韦伯斯特的几名代表控制着这个均势。在第53轮选举中，斯科特总算从菲尔莫尔那里拉来了一些支持票，从而获得提名；但在南部的全部选票中，他仅得到了十分之一。

自由土壤党提名约翰·P·黑尔为总统候选人，并通过了一个旗帜鲜明的政纲，谴责1850年的妥协，要求撤销逃亡奴法令，反对吸收任何新的蓄奴州进入联邦，并谴责蓄奴制是“对上帝的亵渎，是对人类的犯罪。……基督教的教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都坚决要求废除奴隶制。”²⁵

南部的辉格党人知道，在他们的北部同胞中有不少人怀有同样的想法。他们预感到，斯科特会像过去的泰勒那样落进西沃德的圈套。一些有名望的南部辉格党人认为，南部“决不能支持一名以废奴主义影响强加于党的候选人，从而鼓励反奴隶制的情绪和挑衅行为”。于是他们退出辉格党，加入了民主党。²⁶在6个下南部州里，斯科特只得到了当地民众选票的35%，而1848年泰勒还在那里获得了50%的选票。斯科特在15个蓄奴州里只赢得两个州；另外还赢得两个自由州。由于“烧谷仓派”重返民主党，大大增加了皮尔斯的选票，而“自由土壤党”的选票就相应减少，只占北部总票数的6%。

在南部，正如前辉格党领袖亚历山大·斯蒂芬所说的那样，“辉格党已名存实亡了”。到1853年，民主党已控制了未来南部邦联的每一个州。在这些州的65名国会议员中，辉格党只占14名。辉格党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北部党，而北部的党员又四分五裂。全国性的两党体制已濒临消亡。

第五章 入侵者、逃亡者和 本土主义者

命定扩张论和1850年代的蓄奴制

据称,在准州蓄奴制问题上的冲突是一起就“身处逆境、可以想像的黑人”进行的争吵。许多同代人都赞成丹尼尔·韦伯斯特的观点:造物主必将从墨西哥的割让的领土中取缔蓄奴制。1848年,肯塔基州人约翰·J. 克里坦登写道,“不管承认与否,把蓄奴制带到新墨西哥或加利福尼亚的权利并非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当这种权利似乎被承认时却没有一个明智的人把他的奴隶带到那里去”。¹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内战实际上是由双方用“恶毒的偏见”而分裂国家的那些狂热分子引起的。

但它决不是说造物主会在西南部之外的地区保持蓄奴制。事实上,假设现有农艺水平及棉花、烟草的种植在19世纪50年代已推广到西部地区,那么,这未必意味着在新领土上不能实行蓄奴制。奴隶的使用在南部和拉丁美洲的矿业及其他一些工业中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在国会发表反对《1850年妥协方案》演讲时,坚持认为蓄奴制能够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兴旺起来。《南方季刊》认为,“加利福尼亚是一个天然的蓄奴州”,如果政府不干涉,“成千上万名年轻、聪明、积极的人就会到那个地区,每人至少会拥有一至五个奴隶”。在法律禁止蓄奴制之前,已有几百名奴隶在加利福尼亚矿山劳动。1850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州法院决定允许部分奴隶主暂时在此居住的情况下,仍然作为奴

隶在那里做工。《查尔斯顿信使报》宣称：新墨西哥矿物资源提示人们，“在这一地区，财产受保护的权利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蓄奴制在世界上没有比采矿业更适用，更有利可图了”。²

然而，问题的症结不是在于已经取得的这些地区，而是在于那些将来可能取得的领土。1850年，一位65岁的美国人，已经亲眼目睹了其国家的版图在他成年后的生活中增长了四倍。他没有理由希望这一进程会停止下来。总统皮尔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决心进一步扩张。鉴于与北方毗邻的土地已经被一股强大的势力（英国）控制，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要向南方扩张。因此，反对蓄奴制的国会议员们不仅担心现有地区的蓄奴制，而且更担心在未来的领土上也会实行蓄奴制。

他们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赞成蓄奴制的扩张主义者已将其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古巴、中美洲和墨西哥。杰斐逊·戴维斯竭力主张获得古巴及墨西哥另一部分领土，“以增加蓄奴选民区的数量”。他的同僚、密西西比州的参议院的艾伯特·加勒廷·布朗宣称：“我想得到古巴。……我想得到塔毛利帕斯、波托西和墨西哥的其他一两个州……和在中美洲的一个立足点。……是的，为了奴隶制的扩展，我们需要这些地方。”许多南方的喉舌也起而响应：“在我看来，获得古巴对南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命运是同古巴联系在一起的。……南方的安全只能依靠其特殊制度的扩展”；“征服古巴并使之并入南方是几乎所有的南方人共同的夙愿”。南方的主要月刊《德鲍斯评论》几乎每期都反复强调南方地区扩大的必要性：“我们要完成一种天命，这就是征服整个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的命定扩张论。”³

完成这一天命是一个被称为“金圈骑士团”的幽灵似的古怪组织的目标。该组织是弗吉尼亚人乔治·比克利于1854年在路易斯维尔创立的，是一有着复杂的宗教仪式和等级标记的兄弟会组织。

骑士团提出一项计划，要建立一个蓄奴州“金圈”，它起自南部，经过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和西印度群岛而扩展成这样一个大的弧形。比克利说，这将为联邦增加25个新的蓄奴州。如果国会拒绝承认，南方就退出联邦，而成立一个新的庞大的奴隶制帝国的中心，这里将生产世界上大部分的棉花、烟草、糖和咖啡。尽管比克利有点招摇撞骗，他的组织也没起多大作用，但骑士团却设法挑起了论战。内战期间，比克利曾试图在北方组织反战团体。

墨西哥战争后，美国扩张的实际努力主要集中在古巴。1848年，波尔克政府向西班牙提出以一亿美元买下古巴。当西班牙政府气愤地拒绝后，南方人试图采取其他手段。他们指望挑唆那些持不同政见而希望美国吞并的古巴甘蔗种植园主举行一场得克萨斯式的革命。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支持纳西索·洛佩斯，一个在1848年一次夭折的暴动后逃离古巴的古巴籍委内瑞拉冒险家。洛佩斯征募美国志愿人员去入侵古巴。这是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进行的第一次海盗式*远征。

洛佩斯远征队的船只在启航前就被持有反感的泰勒政府命令的海军扣留了。大胆的洛佩斯于1850年重新组织了一支由几百人组成的队伍并溜出了新奥尔良。他攻陷了卡德纳斯城并火烧了政府大楼。但是由于古巴人没能举行起义，而且西班牙进行反攻，这些海盗们不得不匆匆逃至基韦斯特。美国政府对那些违反中立法的主要人物提出了公诉，但新奥尔良陪审团未能证明他们有罪。相反，洛佩斯在这儿却成了英雄。许多有名的南方人帮助他招兵筹款以进行第三次冒险。1851年8月，洛佩斯带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再次入侵古巴，但又一次遭到失败。洛佩斯的大部分人马被截

* 海盗式 (filibustering) 一词出自西班牙语 *filibustero*，意指海盗似的冒险家或海盗。

获而遭到杀戮，50多人被俘并被当做海盗处死，其中包括洛佩斯本人和美国司法部长的侄子——肯塔基州年轻的威廉·克里坦登。这使冒险家们一时大为扫兴。

但这并没使美国人减弱吞并古巴的努力。皮尔斯政府把获得古巴做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总统任命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埃尔·索尔为驻西班牙公使。在到达马德里几个月之内，索尔因攻击君主制而触怒了西班牙人，并在一次决斗中打伤了法国大使，同时他还试图借口一艘美国商船在哈瓦那港发生的事件向西班牙政府提出最后通牒。1854年春，国务卿威廉·马西指示索尔向西班牙出价一亿三千万美元购买古巴，如果不成功，便“为下一个目标而努力——使古巴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当西班牙政府拒绝出卖后，索尔便开始暗中联络一些革命组织，以策划推翻政府。与此同时，马西指示索尔与美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公使——约翰·梅森和詹姆斯·布坎南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会晤，就获得古巴岛的问题交换意见。三位公使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由索尔起草经布坎南修改后的一份不寻常的备忘录，宣称“对北美共和国(美国)来讲，古巴与现有各州同样必要”。如果西班牙拒绝出卖，而美国政府又认为古巴对其安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根据各项人为和神授的法律，我们将证明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该岛是正当的”。⁴

《奥斯坦德宣言》在报界披露后，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骚动。反蓄奴组织谴责它是个“强盗宣言”，“是攫取、掠夺和谋杀，并靠糟塌某些地方和奴役奴隶去发财”。⁵ 众院索取外交函件并公之于众。已经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上陷入政治困境的皮尔斯政府召回索尔，放弃了古巴计划。*

1854年有一个较大的冒险计划与官方购买古巴的尝试部分巧

* 官方对获得古巴的努力并未结束。布坎南于1856年当选总统后到1860年任期内试图购买古巴。民主党的政纲也保证该党在这方面要更加努力。

合。这次冒险的领导人是密西西比州前州长约翰·A. 奎特曼。奎特曼在纽约古巴流亡者的支持下，筹划资金、招募远征志愿人员，准备入侵古巴。在南部，许多知名人士援助这项事业。通过与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的私交，奎特曼认为他已得到了政府对其冒险计划的默许。1854年5月1日，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约翰·斯利德尔甚至建议暂停《中立法》。但奎特曼并未趁热打铁。1854年秋，《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和《奥斯坦德宣言》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促使皮尔斯宣布他将坚持中立法。最终，奎特曼放弃了1855年4月的入侵。

这些失败把扩张主义者的目光引向了墨西哥和中美洲。1853年，驻墨西哥公使詹姆斯·加兹登试图向墨西哥购买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表面上的目的是购置土地修建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但北方参议员有很充分的理由怀疑，这是又一次蓄意获取潜在的蓄奴领土。墨西哥拒绝出卖那么多土地而把数量减少到5.4万平方英里。北方议员在1854年表决通过“加兹登购地案”之前又把它减少了9000平方英里，结果就获得了今天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南部的土地。

19世纪50年代，美国冒险主义者大多从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对墨西哥发动了数十次武装侵犯。有几次侵犯以单纯掠夺为目的；而其它则是墨西哥战争遗留下来的零星的局部边境冲突，这些冲突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但也有几次是由创建一条贯穿墨西哥北部的“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蓄奴州链条”的欲望引起的。⁶这些侵犯没有一次成功，有时甚至给入侵者造成惨重的损失——尤其是1857年的克雷布远征队。亨利·克雷布，一个田纳西出生的加利福尼亚州人，率领一支由90人组成的队伍侵入墨西哥的索诺拉州，结果被包围，而且在向墨西哥当局投降后全部被无情地处死。

克雷布少年时代的朋友威廉·沃克后来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但在此之前，他一直被称为“掌握命运的灰眼睛人”，是最主要的冒险家。不甘寂寞的威廉·沃克是田纳西州人，后移居加利福尼亚。1853年，他招募无业游民，准备侵犯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在最初的几次得手之后，他们被迫退回境内，在旧金山因违背中立法受到审判。存心袒护沃克的陪审团，进行了八分钟的商议，便宣布他无罪。两年后，沃克又寻求更大的冒险。他率领一小股武装部队侵入了尼加拉瓜；联合当地反叛力量推翻了尼加拉瓜政府，并于1856年6月自立为总统。沃克宣称他的征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复兴”中美洲共和国联盟所迈的第一步。沃克在南部的许多主要支持者也把这看作是在中美洲重新推行奴隶制和创建一些新的蓄奴州的第一步。

但中美洲各共和国表示反对。为了赶走沃克，它们组成联盟来进攻尼加拉瓜。1856年9月，沃克颁布法令，要在尼加拉瓜重新实行蓄奴制，以此来争取南部的进一步支持并征招更多的志愿人员，去对付他所面临的威胁。这在南部引起了热烈的响应，有些人应征，但对拯救沃克政权已为时过晚。1857年5月，美国海军的一艘军舰救出了从战败和霍乱流行中幸存下来的冒险家。

沃克返回后在南方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南方为他第二次入侵尼加拉瓜提供了人员和给养，但海军插手阻止了他的这次行动。国会中的南方议员谴责海军扣留沃克。袒护沃克的新奥尔良陪审团以10票对2票裁定沃克虽违犯中立法但无罪。沃克在南方进行了一次凯旋式旅行，并写了一部关于他的冒险经历的书。在书中，他强烈要求南方支持他再次出征。他写道：“如果南部希望把它的制度推行到热带美洲，它必须在限制它行动的条约制定之前就采取行动，南方青年内心响应这一光荣的号召。……推行奴隶制的最好区域是在热带美洲。”⁷ 他得到了足够的赞助以发动一场新的

海盜式远征。但这次他运气不佳，被洪都拉斯国民警卫队缴了械。1860年9月12日，沃克非凡的生涯在洪都拉斯行刑队手中结束了。

南方人对获得新的蓄奴领土的行動的支持，使“1850年妥协方案”之后的脆弱的地区性休战受到损害；而北部人对“逃亡奴隶法”作出的反应也起着同样作用。

逃亡奴隶法

逃亡奴隶问题可追溯到宪法的条款内容。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一个州里从事家仆或田间劳役”而逃往他州的人，“在享有这种家仆或田间劳役的一方提出要求时，应予遣返之”。用通俗的话说，它的意思是：逃到自由州的奴隶仍将是奴隶并要被送回原地去继续受奴役。1793年，国会制定了“逃亡奴隶法”，规定奴隶主可以跨州追捕奴隶，并在州或联邦法院确定其所有权之前就把逃奴带回去。此法案曾一度起到很大作用。但随着1830年代战斗的废奴运动的兴起，逃亡奴隶问题引起了一场严重的争论。

对北方人而言，逃亡的奴隶把蓄奴制从抽象变为有血有肉的现实。反对蓄奴主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奴隶勇敢逃亡，机智躲过侦探，沿着北极星所指方向奔向自由的故事。废奴主义者发现，逃亡奴隶是最生动的反奴隶制的演说家。逃奴的自传文学（有些是别人代写的）已成为非常有影响的反奴隶制的文学作品。一个被称为“地下铁道”的组织，向逃亡者提供路途中的援助，这就为反蓄奴制的新英格兰人提供了做一些实际的反蓄奴制工作的机会。尽管“地下铁道”实际上并非像传闻的那样广泛，但那些夸大其词的谣传仍激起了南方人的愤怒，从而加剧了南、北方的紧张关系。逃到北方的奴隶人数虽然仅仅是奴隶总数中的极小部分（约千分

之几),但他们所显示的重要意义已超出了他们的数字比率。

在南方人看来,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些北方州制定的“人身自由法”。这些法规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绑架和转卖自由黑人使之沦为奴隶。一些州的人身自由法还禁止州政府官员参与追捕逃奴,并确保逃奴拥有人身保护令和陪审团审讯的权利。

这些法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州案”(1842年)作出裁决前是合法的。在此案中,一个马里兰州的奴隶主因用暴力将其逃跑的奴隶绑架回马里兰,而被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宣判犯有绑架罪。对此,联邦最高法院作了相反判决,不仅推翻原判,而且宣告宾夕法尼亚州反绑架的法令是违宪的。不过,最高法院同时也指出,执行宪法有关逃奴追缉条款完全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因此,宾夕法尼亚州禁止其州政府官员执行1793年的联邦法规是正确的。这项复杂的判决在1840年代又重新掀起了一次制定人身自由法的高潮,当时七个州禁止他们的官员参与追缉逃亡奴隶的行动或禁止使用州和地方的监狱去监禁那些就遣返有待作出判决的逃奴。这些州的法规激起南方人要求制定新的联邦法,以强制执行逃亡奴隶法的条款。

1850年的“逃亡奴隶法”正符合南方人的这种要求,它事实上是由国会制定的最强硬的国家法律之一。该法包括下列条款:(1)设置联邦专员负责发放允许逮捕和领回逃奴的证明;(2)追索奴隶者的一纸宣誓书即可被认作所有权的证据,而逃亡奴隶却被剥夺为他或她自己辩护的权利;(3)专员每次如果做出有利于追索者的裁决,可获得十美元的报酬,但如果他释放一个逃奴就只能得到五美元;(4)专员有权要求任何公民作为武装人员去协助执法,拒绝执法者或妨碍执法者将受到严厉的罚款或坐牢。国会中的北方议员要求组织审理逃亡奴隶问题的陪审团的努力失败了。

此法规是“1850年妥协方案”最重要的产物。南部人坚持认为,

它的实施是南北统一绝对必要的条件。反奴隶制的北方人则谴责这项法规。用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的话说,它是“一项龌龊的法律”,没有人能去执行,“除非他失去了自尊”。该法规的拥护者声称,还应再写明如果专员送回一个逃奴,那么他拿到双倍的酬金也是合理的,而反对者认为这些酬金是无耻的贿赂。正如一位自由土壤党人所指出的,该法不啻指定一个奴隶的价值是一千美元,而一个新英格兰人的灵魂却仅值五美元。许多北方人公开认为禁止由陪审团审理逃亡奴隶问题乃是否定了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最糟糕的是条款授予联邦专员握有指派任何公民充当逃奴追捕者的权力。许多新英格兰人扬言誓不服从。国会议员乔舒亚·吉丁斯预言:甚至军队也不会执行这种法规,可以“让总统……使我们自由的土地浸透鲜血;但他永远不能使我们服从那项法规”,⁸

更使新英格兰人愤怒的是,在该法规实施的第一年中,积极捕获逃亡奴隶的事件急剧增加。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以专门捕捉逃奴为业的一种人。显然,南方奴隶主的某些代理人还不如那些绑架者,那些持有伪宣誓书的绑架者看准赚大钱的时机已到,就捕捉自由黑人卖往南方。1851年2月,印第安纳州麦迪逊市的一个自由黑人,在他妻子和儿女的面前被人绑架,并被送还给一个奴隶主。这个奴隶主声称这黑人就是他19年前逃跑的奴隶。在纽约,卫理公会一位勤勉的黑人教徒被捕捉逃奴的人抓住,在他的妻子儿女还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就被迅速而神秘地带到了巴尔的摩市。一个在波基普西居住多年的黑人裁缝被绑架送往南卡罗来纳。在那里他的售价是1750美元。一位说自己一直住在费城的黑人妇女被一个马里兰人认领,那马里兰人坚决认为她是他22年前逃走的奴隶,并强烈要求取得她的6个出生在费城的子女的所有权。在此案中,专员否决了认领者的要求。在纽约卫理公会教徒和波基普西裁缝的案件中,当地黑人和白人筹款赎回了他们

的自由。但是，谁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用以赎回1850年—1851年从北方被捉回重新沦为奴隶的另外81名黑人——他们都是有案可查的，且不说那些没有记录的未知数目中的绝大部分。

10年中最悲惨的逃亡奴隶案件是玛格丽特·加纳案。该案的结局是不幸的。1856年1月，玛格丽特·加纳带着她的4个孩子与其他3名逃亡奴隶一起横渡俄亥俄河到辛辛那提。奴隶主跟踪他们，并买到了追捕证明。当这些逃奴即将被联邦法院的武装追捕队抓住的时候，玛格丽特·加纳试图杀死她的孩子们，以免他们重新沦为奴隶。她设法割断了女儿的喉咙，但当她又以同样手段去杀她的儿子们的时候被阻止了。俄亥俄法院以谋杀罪拘禁了她。但联邦专员解除了州法院对她的拘禁，并命令把她及其孩子们送回在肯塔基州的主人那里。这位奴隶主则立即把他们卖到了俄亥俄河的下流。她最小的儿子在轮船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而加纳和她幸免于难的两个孩子则最终被送到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上拍卖。

“逃亡奴隶法”是对北方黑人社会的沉重打击。许多“自由”黑人实际上都是逃跑奴隶，即使不是，他们也无法针对南方法院提供的宣誓书为自己申辩。成千上万的北方黑人逃到了加拿大。这项法律在北方给黑人的民族主义增添了新的生命力，因为它似乎提供了新的证明，就是黑人在美国永远也无法得到安全。于是，在19世纪50年代，黑人纷纷向海地、中美洲、非洲迁徙，形成一股势头。

但是，逃离美国并非对“逃亡奴隶法”的唯一反应。黑人和白人在一些北方城市组织了治安维持会，以隐藏和保护逃奴免遭追捕，如果他们被逮捕便在法律上给他们以援助。这些组织聚集了各种持反奴隶制观点的人，就连一些从未表露过类似思想的人也加入组织。治安维持会竭力主张非暴力行动。但他们很多人从未在暴力面前后退一步。黑人领袖、原逃亡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

拉斯说：要使“逃亡奴隶法”变成一张废纸的最好办法就是“干掉一打或更多的绑架者”。⁹

10年中，治安维持会参与了一些著名的逃奴营救活动。1850年10月，波士顿治安维持会在前来认领逃奴的佐治亚监狱看守的鼻子底下，抢救出两位著名的逃亡奴隶——威廉·克拉夫特和埃伦·克拉夫特。4个月后，黑人侍者弗雷德·威尔金斯在波士顿被当作逃奴逮捕。他的朋友都把他叫做“沙德腊”。当他被拘留在联邦法院时，一群黑人破门而入，目瞪口呆的代理执行官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威尔金斯已被劫走。1851年4月，政府设法挫败了另一起在波士顿营救逃奴托马斯·西姆斯的企图。它用300名士兵对西姆斯严加看守，并在凌晨4点钟把他押上了一艘开往南方的货船。1851年9月，在宾夕法尼亚的克里斯蒂安娜，一群教友会黑人与一个带着一些助手前来追捕两名逃奴的马里兰州奴隶主交起火来。结果，在这次枪战中，三名黑人和这个奴隶主被打死，奴隶主的儿子受了重伤。10月，一伙黑人及白人废奴主义者闯入锡拉丘兹警察局，成功地劫走了在押的逃奴杰里·麦克亨利，并渡过安大略湖把他送往加拿大。

制定“1850年妥协方案”的米勒德·菲尔莫尔政府决心惩办违反“逃亡奴隶法”的人，对几十个同沙德腊、克里斯蒂安娜和麦克亨利营救事件有牵连的人起诉，但除一人在杰里·麦克亨利案件中被判有罪外，所有被告均因陪审团内部意见不一而被宣告无罪或释放。正如南方陪审团不再审判违反中立法的人一样，北方陪审团也不再审判“逃亡奴隶法”的违犯者。

也许是因为大多数逃奴已经隐藏起来或逃往加拿大，1851年以后被逮捕、送还以及被营救的逃奴数字减少了。1852年，逃奴问题引起的骚动逐渐平息下来。北部和南部的温和主义者对“逃亡奴隶法”在内的“1850年妥协方案”表示支持，似乎才使局势得到了

稳定。

但是,在表面的平静下,北方的不满仍似火山在隆隆作响。哈里特·比彻·斯托令人震惊而又脍炙人口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影响日增,并大大加深了北方人对在自己土地上追捕逃亡奴隶的反感和内疚。对现代读者来说,尽管这部书的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都是虚构的,而且文字多少有些伤感,但《汤姆叔叔的小屋》始终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畅销书。斯托夫人出于对“逃亡奴隶法”的义愤创作了这部小说。此书故事从1851年春季起在一家反奴运动的报纸上连载了近一年;1852年春成书出版,数月之内便成为一部空前的畅销书。它在北部感人泪下,而在南部却遭到愤怒的反驳。十年后,当斯托夫人受到亚伯拉罕·林肯接见时,据传总统曾说:“原来你就是促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1854年春的两起事件重新激起了北部对“逃亡奴隶法”的违抗。第一起事件是“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废止了“密苏里妥协案”关于禁止在北纬36°30'以北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土地上实行蓄奴制的规定。《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引起了那些曾经竭力主张遵守“逃亡奴隶法”的温和主义者的愤慨。他们感到,既然一个关键的妥协条款已被南部否决,那末也就不再有遵守其它条款的义务了。这一年发生的另一起引起震动的事件就是安东尼·伯恩斯事件。

伯恩斯事件和艾布尔曼诉布思案

安东尼·伯恩斯原为弗吉尼亚州奴隶,逃到波士顿后在一家服装店工作。5月24日,他突然被逮捕。消息很快传开。治安维持会组织群众性集会,前来参加抗议的反蓄奴主义者从邻近地区涌入波士顿。黑人和白人反蓄奴主义者对联邦法院进行了一次未

能很好配合的袭击,打死了一名看管伯恩斯的看守,但没能把他营救出来。皮尔斯政府决心要以此事件证明“逃亡奴隶法”即使在波士顿也适用,它连续三次拒绝该市领导人以奴隶市场价格赎回伯恩斯的自由的请求,反而派遣联邦部队把伯恩斯押往港口。那里停着一艘将送他回弗吉尼亚的船。好几万愤怒的新英格兰人目睹了这一切。美国革命的策源地也响起了宣告自由死亡的丧钟!

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大是惊人的。一位曾劝告人们服从逃奴法的保守的波士顿律师写道,“当一切结束之后,我独自留在办公室,双手捂住脸哭泣,无法做任何事情。”另一位保守律师爱德华·埃弗雷特评论说:“在以前的30年中这里从未发生像这3个星期之内所发生的这种变化。”辉格党棉花派的前领袖阿莫斯·A. 劳伦斯说:“一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躺下睡觉,仍旧是保守的、辉格党妥协派联盟,一觉醒来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狂热的废奴主义者”。¹⁰

安东尼·伯恩斯(他的自由最终被波士顿治安维持会设法赎出了)是从波士顿或者新英格兰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送还的最后剩下的逃奴。伯恩斯事件促使北方的九个州制定了新的人身自由法。这些法令包括一项或几项如下条款:委派州律师为逃奴辩护;州政府负担全部诉讼费用;拒绝提供任何公共设施为羁押逃奴使用;新的严厉的反绑架规定;控告逃奴须经州法院的陪审团裁决。规定这些条款的目的是阻挠那些追捕逃奴的人,使他们的追捕计划需付出昂贵的代价,既浪费时间又冒风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些法令在这方面是有效的,因为从那些已经颁布新的人身自由法的州遣返回来的逃奴人数,自1854年以后已经减少。*

一些州的人身自由法实质上使联邦法失去了效力。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艾布尔曼诉布思案”(1859)带

* 在1850年代,这些州在制定新人身自由法之前有62个逃奴被原主索回,而在那之后只有27个。

来的问题。此案是由威斯康星州的废奴主义者谢尔曼·布思引起的。他因在1854年领导过一次袭击使一个被监禁的逃奴获得自由而被联邦法院判罪并关押。威斯康星州法院判定“逃亡奴隶法”违宪，宣布释放布思。联邦代理人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贾斯蒂斯·罗杰·塔尼为“逃亡奴隶法”的大部分条款辩护，并宣称任何州对实施“逃亡奴隶法”的干涉行为都是违宪的。布思重新入狱。这样，受到南部支持的联邦法的最高权威受到维护，而得到北部支持的州的自主权遭到扼杀。的确，这对于南部信奉州主权的传统来说，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自由土壤党与自由黑人

尽管人身自由法似乎已经表明北方在种族问题上持自由化态度，但这样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在北方一些地区，确实存在着对立的态度。在一些北方州通过人身自由法的同时，另一些北方州则通过了新的“黑人法”，将一些卑劣的约束条例强加于自由黑人。大部分保护逃奴的法规出自上北部地区（新英格兰、纽约州北部地区、密歇根、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而下北部的一些州和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新西部州则保留或通过了黑人法。

1851年，印第安纳州立法会议正式通过了一项禁止黑人迁入州境的法律条款。这是对该州的法规的补充条款，该州原来的法规规定不准居住在那里的黑人享有选举权，不准参加陪审团或在警卫队服役，不准在法庭上做不利于白人的证词，不准与白人通婚或与白人同校。衣阿华州和伊利诺伊州也都有类似的法规，并分别在1851年和1853年通过了禁止黑人移居州内的条款。这些条款反映了这些州的大多数白人的种族歧视情绪。这些排斥黑人的法律也是向南部表示的和解性保证，表示逃奴在这些州并不受欢迎。

俄勒冈的州地位在1859年得到联邦承认的时候，黑人迁入的可能性也很小，该州亦正式制定了一整套的黑人法，其中包括禁止黑人移居的条款。加利福尼亚虽然早在10年前就已被禁止制定拒绝接纳黑人的法规，否则将影响它成为联邦的一个独立州。但是，这个金山州也采用了盛行于下北部其他地区的一切歧视性的法规。即使是在堪萨斯，一个自由土壤党的大本营，也曾于1850年代末投票赞同排斥黑人的法律条款，尽管这些条款在1861年堪萨斯成立州以前已经被废止。显然，大多数西部移民不希望有黑人生活在他们中间——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黑人。

这种排斥黑人的行动甚至还影响了一部分自由土壤运动。戴维·威尔莫特坚称，他的限制性条款并不是因任何“对奴隶制问题神经质的敏感，也不是对奴隶病态的同情而产生的。……黑色人种已经在美洲大陆占有了足够的土地。”威尔莫特完全愿意称他的决议案为“白人的条款”。¹¹

这种观点大体上与民主党或自由土壤党的赞助者“烧谷仓派”的思想是一致的。自由党人和辉格党良心派则表现了更宽容的态度。在自由党1844年的党纲中曾包括确认平等权利和争取在北方各州消除种族歧视等政策要点。在马萨诸塞州，黑人可以享受几乎全部的公民权利及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党人的一个联盟，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和辉格党良心派曾努力扫除法律上最后的歧视残余。1843年，他们设法删除了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的法规，但要求取消黑人在警卫队服役的禁令未能成功。1855年，他们终于赢得了关于禁止学校种族隔离法案的通过。1846年，在纽约州，民主党人——其中包括许多两年后对自由土壤党投赞成票的民主党烧谷仓派党员，挫败了自由党和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为废除黑人选民必须具有250美元财产资格的条款所作的尝试。自由土壤党在俄亥俄州取得了很大成功，而1849年以前该州的黑人法在北方各州中是对黑

人限制最多的。1848年的选举使自由土壤党在俄亥俄州取得了政治力量的均势。他们利用这种均势同民主党做交易。民主党勉强投票选举萨蒙·P·蔡斯为参议员，并废除了关于禁止黑人迁入州内、禁止在法庭做不利白人的证词以及禁止在公立学校读书等法规。这些让步换取了自由土壤党的选票，从而使民主党人得以控制议会。

内战前，只有新英格兰各州（除康涅狄格州外）允许黑人同白人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利。在1850年代期间，自由土壤党和共和党试图使北方其他一些州通过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法规，但遭到失败。民主党把他们的对手称作“黑鬼党”或“混合党”，以此来赢得很多政治资本。种族主义在北方很多地区普遍盛行，任何政党主张完全的种族平等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自由土壤党1848年和1852年党纲均未包括早期自由党纲领中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1850年代自由土壤党和共和党发动的关于州黑人选举权的运动有时看来是三心二意的。

除了政治上的策略问题外，自由土壤党的许多成员所怀有的偏见与旧观念，也阻止它提倡种族平等。这些人痛恨奴隶制度，同情逃亡奴隶，但同时主张让黑人移居国外，以保证美国继续是一个白种人的国家。自由土壤党——以及后来的共和党——对于种族平等问题的矛盾心理，正是一些废奴主义者同他们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例如，富有的纽约废奴主义者格里特·史密斯及其少数追随者在1850年代就一直积极支持一个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小派别——激进废奴主义党。

本土主义和“一无所知党”的出现

在19世纪50年代中有那么几年，白人种族集团间的冲突作为

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可以比得上南北之间的冲突。它的直接原因是1845年后外来移民数量的惊人增长。在1820年代，移民的数字平均每年不多于13000人。在1830年代，这个平均数增加了四倍。但这个数字与1840年代后期相比仍然大为逊色。在欧洲，由于土地缺乏和劳动力过剩，加上爱尔兰马铃薯虫害和1848年革命，数百万人移居国外。高工资、廉价土地和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吸引了他们绝大多数来到美国。在1846年—1855年的10年中，超过300万移民进入美国——相当于1845年美国人口总数的15%。国外出生的人口的这种增长比率，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10年相比，都是最大的。由于87%的移民定居在自由州，所以他们也主要是对北方产生影响。到1855年，在一些北方城市，国外出生人口已接近或超过了这些城市总人口的半数。

与国外出生人口的数量增加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人口成分的变化。1840年以前，移民中四分之三是新教徒，多数来自不列颠诸岛。他们之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是无技术的劳工或仆人，其余都是农民、技术工人、白领阶层或专业人员。然而，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移民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爱尔兰，其余多数来自讲德语的国家。此外，在这个大的移民浪潮中，无技术的劳动者的比例是早期移民的两倍。最早来东北部大城市居住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成为最贫穷最集中最引人瞩目的移民。

反移民观点或称“本土主义”表现出并非反对一般的外来移民，而是主要反对罗马天主教徒。的确，一些狂热的本土主义者原本就是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信徒和威尔士或英格兰卫理公会信徒，他们从故乡带来了反对天主教徒的情绪。无论在不列颠还是在美国，反天主教意识都是根深蒂固的。“血腥的玛丽”*、“盖伊·

* 英国女王玛丽一世(1516—1558)的别名。她以血腥迫害新教徒而出名。——译者

福克斯日”*、“光荣革命”**及其他类似纪念活动，已成为信仰新教的英裔美国人的部分精神负担。不列颠天主教徒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即使在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通过后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剥夺。在美国，“第二次伟大觉醒”的新教福音主义激起了高涨的反天主教情绪。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的酗酒习俗，他们支持民主党和反对黑人平等权利的倾向，以及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统治公立学校的反对进一步加深了福音派新教徒的偏见。

甚至在1845年移民猛增之前，种族集团成员和宗教的紧张关系有时也造成暴力行为：183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顿，一伙新教徒破坏了一座女修道院；1844年，费城新教徒（包括苏格兰—爱尔兰人）同天主教徒发生冲突，激战中有5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两座天主教堂以及30幢其他建筑被破坏。大批移民的涌入更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1854年选举日，巴尔的摩的新教徒同天主教民主党人冲突，8人死亡，50人受伤；同年，在圣路易斯的一场选举骚乱中有10人被打死；1855年，在路易斯维尔的一场当地人同爱尔兰移民的争斗中，20人死于非命。

选举日的骚乱是本土主义进入政治领域的后果之一。1843年和1844年，所谓“美国人”的政党参加了纽约和费城的地方竞选。在1840年代，又有一些富于本土主义色彩的秘密兄弟会式的组织相继成立。其中之一就是1849年在纽约成立的“美国星条旗团”。当

• 11月5日，阴谋爆炸英格兰议会的纪念日。1605年，英格兰天主教徒在议会地下室安装炸药，企图在议会开会时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及其主要大臣。但事泄，为首者盖伊·福克斯被处死。——译者

• • 1688年英格兰议会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政变，是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的尾声。1685年国王詹姆斯二世即位，企图借助法国恢复天主教和封建专制统治，与议会冲突。1688年议会迎身为詹姆斯二世之婿、法国死敌和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出兵讨伐国王。次年奥伦治亲王及其妻玛丽被宣布为英格兰国王和女王，即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译者

问及这个团的情况时，该组织的成员都回答说：“我一无所知。”到1854年，“一无所知党”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组织，其成员估计达100万之多。他们的宗旨是限制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的政治权利。有些州甚至在移民还未入国籍之前就允许他们参加选举；而在另一些州，加入国籍要等待短暂的5年时间，这就是说，1840年代后期涌入的外来移民，到1850年代初期才能登记在选民册上。本土主义者愤怒地指责说，某些城市的民主党机关利用尚未获得美国国籍的外国人充选民之数是不合法的——这种指责完全属实。1850年—1855年在波士顿的选民中，国外出生者的数字增加了200%，而国内出生者仅增加了14%。有鉴于此，“一无所知党”就以美国政党的名义组织起来，公开投入政治斗争。他们主张把加入美国籍的预备期从5年延长至14年或者21年；只允许持有国籍的人参加选举；对本土出生公民加强管理。

禁酒与教育问题很容易同本土主义联系在一起。缅因州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大量制造和出售酒精饮料，从而导致了一场关于“缅因法”的争论，而结果在1850年代其他一些州也制定了类似法令。许多爱尔兰和德国裔美国人认为这是对他们习俗自由的侵犯。与此同时，一些州的天主教领导人强迫公立学校停止使用钦定版《圣经》，并要求保障教会学校的经费，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罗马天主教会干涉美国学校的担忧。一位本土主义者谴责道，这“专横的信仰”是企图“以主教的法帽代替我们的自由之帽，把天主教的权杖同星条旗混成一体”。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与美国的共和精神大相径庭”，“真正的美国人”在大选中要求“保证共和政府的三项根本原则——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圣经》、自由的学校。”¹²

1854年，“一无所知党”在一些州和地方选举中利用了本土主义的骚动。保守党领袖们感到震惊，他们形容说，这简直是一股“飓风”，一场“龙卷风”，“一阵政治精神病的狂乱”。一位困惑的宾夕法

尼亚州民主党人声称：“似乎所有的人都被这里的本土主义搞得精神错乱了。”在纽约，一位绝望的辉格党领导人承认，“新的问题已经破坏了如党的纪律之类的一切事情，许多忠诚的老辉格党员都昏昏然迷失了方向”。¹³ 在马萨诸塞州，一无所知党的飓风扫清了旧党派，赢得了63%的选票，包揽了全部国会议员、州官员及除二人外的全部州议会席位。这个新党在宾夕法尼亚获得的选票高于40%，而在纽约是25%。下一年它控制了3个以上的新英格兰州，接着它又在大西洋沿海中部各州取得了胜利，然后便转向南方地区，赢得了马里兰州、肯塔基州和得克萨斯州，并在其他一些南方州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对手。

在南部及一些边远州，“一无所知党”吸收了寻求新的政治归宿的前辉格党人。在东北部，他们从两个主要政党中争取选票，但对辉格党的冲击比对民主党更甚。一些本土出生的民主党人由于对本党不断增长的移民倾向表示不满而退党，而一向吸引新教徒中大多数中产阶级和有技能的工人阶层的辉格党，其成员则对本土主义者的呼吁极为敏感。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南北冲突中已被削弱的辉格党，又在1854年—1855年期间本土主义者的反目下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

本土主义者和自由土壤党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本土主义和反奴隶制运动都产生自同样的福音派新教背景。资本主义的劳动自由思想认为，天主教和奴隶制都是专制、落后和阻碍社会发展的象征。“天主教报刊赞成使用奴隶劳动”，一家自由土壤党的报纸写道，“这两股邪恶势力有着天然的姻亲关系”。在马萨诸塞州召开的一次“一无所知党”大会指出：“罗马天主教教义和奴隶制”都“建立和维持在无知与专横的基础上，……那儿对不接受奴隶制的罗马天主教不存在真正的敌意。”¹⁴ 1854年有许多自由土壤党人投票选举“一无所知党”候选人。在一些州，在“堪萨斯—

内布拉斯加法案”问题中出现的“反内布拉斯加法”派也同本土主义者的组织结成了联盟。在1854年的选举中依靠反蓄奴制的票数当选的多数国会议员还得到了本土主义者不同程度的支持，反过来他们也支持本土主义者。

另一方面，多数废奴主义者、自由土壤党领袖和反蓄奴制的辉格党人都斥责本土主义是一种偏执的观念，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限制奴隶制这个主要目标转移开的东西。一位共和党人说：“不论是教皇或者外国人都不能够统治这个国家或者危害它的自由，但养育和贩卖奴隶的人能够做到这些。”自由土壤党的《民族时代》报（曾首次连载《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报纸）的一位编辑写道：“一无所知党”是一个“可憎的组织，……同蓄奴制一样是与平等权利原则不相容的，……你不再有权剥夺来这个国家落脚的兄弟的公民权，更不用说有权去剥夺你的有色人种邻居的公民权了”。¹⁵ 在纽约，威廉·H. 西沃德坚持反对本土主义达10年或更久时间。亚伯拉罕·林肯，一位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但不久就加入共和党，从伊利诺伊大草原发出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言论。他说，“我不是‘一无所知党’。”

任何一个憎恶对黑人进行压迫的人怎么可能赞成降低白种人的地位呢？在我看来，我们的退化速度相当快。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一开始就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现在我们实际上把它读作“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如果“一无所知党”上台，它将读作“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果真如此，我宁愿移居到某个真正热爱自由的国度，譬如俄罗斯，在不掺杂伪善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以改善。¹⁶

由于下章所述的原因，1856年“一无所知党”在北部的政治势力陷于崩溃。同年，在美国人党成为南部的一个主要政党，并且是走投无路的辉格党人的暂时落脚之地。但到后来，“一无所

知党”的异常情况把东北部正常的政治格局搞得面目全非。这使辉格党遭受了一次突然而沉重的打击。然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促进基本的政治改组方面终于显示出比本土主义更重要，因为它促使一个反蓄奴制政党的诞生。这个党很快就成为北部的一支政治支配力量。

第六章 堪萨斯与共和党的兴起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1854年1月4日，准州委员会主席斯蒂芬·A. 道格拉斯参议员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在密苏里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建立内布拉斯加准州。这引发了一场新的、重大的在准州蓄奴制问题上的论战。

内布拉斯加法案可追溯到10年以前。渴望土地的拓荒者曾坚持主张建立准州组织，以废除印第安人对那里的土地所有权而为自己开垦肥沃的良田。关于援助修建从中西部到加利福尼亚的铁路的权益问题，也同样吵吵闹闹，要求建立一个准州，以便于勘查和取得铁路所有权。1853年2月，众议院通过了成立该准州的法案。但由于内布拉斯加准州位于北纬 $36^{\circ}30'$ 以北，而“密苏里妥协案”禁止在那里蓄奴，所以参议院的南方议员否决了这项法案。密苏里人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圣路易斯新闻》评论道：“如果内布拉斯加成为一个自由准州，那么密苏里将三面被自由准州包围，那里经常有人力和工具帮助我们的奴隶逃跑……。如果说这批财富在密苏里不无价值的话，那么这批财富是不安全的。”密苏里州奴隶主的一次会议决定：“如果这个准州对拓荒者开放的话，我们互相誓约，不管献出多少鲜血和财产，也要将密苏里的制度建立于准州土地上。”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戴维·艾奇逊赌咒，他将亲眼目睹内布拉斯加在成为自由准州之前就“沉入地狱”。¹

艾奇逊有权有势，他的威胁举足轻重。作为参议院的临时

议长，在副总统已于1853年逝世的情况下，他的地位仅次于总统。艾奇逊与另外三位有权势的南部参议员，来到华盛顿的 F 大街的一所房子里。这三位参议员是弗吉尼亚的詹姆斯·M. 梅森和罗伯特·M. T. 亨特、南卡罗来纳的安德鲁·P. 巴特勒——他们分别是外交、财政、司法委员会的主席。这个“F 大街聚餐会”——这是他们自称的——对撤销“密苏里妥协案”作为成立内布拉斯加准州的先决条件一事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斯蒂芬·道格拉斯最初曾试图回避他们所施加的压力。同代人和历史学家们对道格拉斯的动机有过种种猜测：赞成扩展奴隶制，或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渴望在 1856 年的大选中获得南部的支持，使他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望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线时能把东面的终点建到他自己的伊利诺伊州。无论上述这些因素有多大，道格拉斯的主要动机还是源自“领土扩张命定论”的信念。他同意成立内布拉斯加准州，目的正是促进美国向西部地区扩张。为了防止再一次延误，他希望回避令人烦恼的蓄奴制问题。他的 1854 年内布拉斯加法案最初条文，只是 1850 年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法案的翻版。道格拉斯草案曾明确说明，当内布拉斯加被承认为一个准州时，“是否蓄奴将取决于宪法规定”。但是，这不能使南方人满意，这是因为它在作为准州期间禁止蓄奴，所以“密苏里妥协案”将保证它是个自由州。因此，道格拉斯企图使用其他策略。他发现由于“誊写中的笔误”，草案中遗漏了一项重要条款，于是就给予补充：“关于准州和即将成立的新州是否准许蓄奴的问题，将由当地居民选举代表磋商表决决定。”这种人民自主权正是 1848 年以来道格拉斯一直在努力争取的。尽管它已经暗含对“密苏里妥协案”的否定，但还不能满足南方议员们的胃口。

在这一点上，一位来自肯塔基的辉格党参议员，渴望恢复辉格党维护南方权利的形象，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明确废除“密苏里妥

协案”关于北纬36°30'以北禁止蓄奴的规定。道格拉斯最初不赞成这项修正案，他懂得它将引起北方的义愤。但是当同肯塔基的参议员会晤之后，据传说，道格拉斯停止了抵制并说：“是的，先生，你是对的。我将把它写入我的法案，尽管我知道它会引来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混乱。”²

道格拉斯和一个南部参议员的代表团劝说虽不太赞同但意志薄弱的皮尔斯总统支持这一修正案，从而使它成为民主党给予赞助的法案，以促使难以驾驭的北部民主党人采取一致立场。当1月23日道格拉斯提出他的修正案时，它又包含了一个新增补的部分：将准州分为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部分，堪萨斯指密苏里州以西地区，内布拉斯加则在堪萨斯以北。观察家指出，这是把堪萨斯划为蓄奴区，而把内布拉斯加划为自由区。关于这些准州的居民何时能够在蓄奴制上作出决定的问题——北部民主党人认为在准州第一次议会开会时，南部民主党人则坚持在批准成立州时——故意悬而不决，以维持南北民主党人对这一法案不太可靠的支持。

道格拉斯的法案的确引起了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混乱。第一个霹雳是发表在1月24日的《国民时代》的《独立民主党人的呼吁书》。^{*}该文是由萨蒙·P·蔡斯和乔舒亚·吉丁斯执笔，而由国会中的主要自由土壤党议员们署名发表的。呼吁书指责“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是“对一个神圣誓言（指“密苏里妥协案”）的十足的践踏”，是对“一种宝贵权利的可耻背叛；是一个险恶的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个阴谋旨在把来自东半球的移民乃至我们本国的自由劳动者从一片辽阔的空地上赶走，而把这片沃土变成由奴隶主和奴隶居住的专制主义的凄惨地区”。³这些成为自由土壤党在国会

* “民主党”一词大约是弄错了，因为几乎所有的签名者都是辉格党人。

激烈的论战中的主要课题。随之而来的是，成百上千个抗议集会在整个北方召开。

道格拉斯以自己出众的才能和手腕使参议院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他坚持说，“1850年妥协案”已经提出了在北纬 $36^{\circ}30'$ 地区采用的人民自主权的问题，这已经意味着对“密苏里妥协案”的否定。尽管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争辩——1850年的法案只规定要在从墨西哥兼并的地区实行人民自主权，而不涉及路易斯安那购地，更没人相信它会影响“密苏里妥协案”——但是，它却变成南方和民主党人的正式论点。道格拉斯同时又像他在1850年一样坚持说：造物主将阻止奴隶制在新的准州内立足。这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现今堪萨斯州东部的三分之一具有同密苏里州境内的密苏里河流域一样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那里的大多数奴隶都是用于种植大麻和烟草，而这些作物在堪萨斯也同样生长。

在参议院的论战中，要算北卡罗来纳的乔治·巴杰尔和俄亥俄的本杰明·韦德间的辩论是最精彩了。巴杰尔说：“如果一位南部议员希望把孩童时代养育他，并被称作‘妈妈’的老黑奴带到新准州，以改善他们一家的命运，上帝呀，人们有什么理由要阻止他呢？”韦德说：“对参议员带着他的老妈妈迁居堪萨斯我们没有异议，我们仅仅坚持他不能在那里把她卖掉。”⁴

3月3日，参议院在道格拉斯的敦促下以37票对14票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其中北方民主党参议员的投票情况是14票对5票。由于北方民主党众议员将不得不于11月面对选民，所以众议院中的斗争表现得更加严峻而持久。在众议院辩论某个问题时，有些众议员已经剑拔弩张，险些要发生流血事件。5月22日，众议院终于以113票对100票通过了这个法案。北方民主党的情况是44票对44票。这是该党分裂的显著标志。就两院表决的总票数看，南方人提供了61%的赞成票，北方人提供了91%的反对

票。北方一家报纸辛辣地评论道：南方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次“奴隶制和贵族政治对自由和共和主义的胜利”。⁵

但是，它也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胜利，正如霍勒斯·格里利后来指出的，法案在两个月之内所造就的废奴主义者比威廉·劳埃德和温德尔·菲利普斯在20年中所造就的还要多。

共和党的兴起

1854年春、夏两季，整个北方到处都在举行反对“内布拉斯加暴行”的愤怒的集会，到处都在组织新的政治联盟。一些州是自由土壤党人带头，另一些州则是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率先。反内布拉斯加的西北部民主党人和东北部的本土主义者在组建这些新联盟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新组织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反内布拉斯加”、“联合”、“人民”、“独立”等。但最能被接受的名字是“共和党”，因为它把1854年的这场斗争与1776年国家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第一次斗争联系起来。后来，许多城市都声称“共和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它那里召开的，但这一荣誉似应归于威斯康星州的里彭。1854年2月28日，一批反对内布拉斯加法的人在里彭的公理会教堂开会，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该组织将命名为共和党。5月9日，约30名反对蓄奴制的国会议员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建议反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政治联盟采纳这个名称。7月6日，在密歇根州的一次大会上议会正式选择“共和党”作为该州的政党的名称。

其它一些州的政治组织也于1854年采用了这一名称。然而，某些州的辉格党领袖仍不愿放弃他们旧时的忠诚，还指望他们的党能继续成为北方政治革命的工具。在纽约，威廉·西沃德领导其党徒仍以辉格党的名义从事1854年的竞选活动。在伊利诺伊，亚

伯拉罕·林肯也同辉格党人站在一起。但是，辉格党在争取反内布拉斯加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有两个不利因素：有些州保守的辉格党棉花派拒绝同退党的民主党人和自由土壤党人结盟；另一些州，那些后起的团体拒绝采纳辉格党的名称。尽管原先的辉格党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党的主体，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将丧失辉格党的党籍。到1855年底，辉格党已经悄然解体。

无论用什么名称，反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党派在1854年的政治改组中得到了报偿。竞选中的失败是民主党的一场灾难。多达四分之一的北方民主党选民背弃了他们的党。令人震惊的是，自由州民主党的91名代表有66人在国会的选举中失败。在44位曾投票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代表中，只有7人继续当选。1852年，民主党控制着除两个以外的所有的北方州；而在1854年，除两个以外，他们失去了所有北方州。结果，党几乎成了一个南方党。在下届国会中，南方民主党人在数量上以2比1的优势超过了北方民主党。除在内战和重建这些非常时期外，北方民主党人直到1930年也未能重新在国会获得与其南方的同党相等的席位。

新兴的共和党是民主党灾难的主要受益者。但这一点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出来的。并不是所有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人都立即加入了共和党。在一些州，“一无所知党”比共和党赢得了更多的选票。但在1855年—1856年期间，共和党在策略上挫败了“一无所知党”，夺取了它的大多数反奴隶制追随者，从而获得巨大成功。1854年，尤其是在马萨诸塞州，一些曾经支持“一无所知党”的反蓄奴主义者转向了共和党，他们力图接管“一无所知”运动，并把它改造成一个新的反奴隶制的政党。1855年6月召开的“美国入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给他们向这一目标跨出第一步提供了机会。在这次大会通过了一项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决议之后，来自12个自由州的代表退席。1856年2月发生了又一个意外

事件,在另一次“美国入党”代表大会上,否决了一项要求废除“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提案。

在1855至1856年的冬季,在众议院议长的人选问题上展开的持久斗争中,共和党在牺牲“一无所知党”的情况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1854年当选的100名左右反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国会议员中,现在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参加了共和党,尽管他们有些人在竞选中曾得到过“一无所知党”的支持。共和党议员团决定推举马萨诸塞州的纳撒尼尔·P.班克斯为议长候选人。班克斯曾经是“一无所知党”的党员,现在已是共和党人。因为,在共和党与民主党均未在众议院占有多数的情况下,“一无所知党”掌握着力量平衡,并可防止任何一党取得多数。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选举在拖延。最后,众议院不得不改变规定,而允许以未超过半数的最多票数选出议长。班克斯在第133次的选举中赢得了103票。其中约30票来自北方“一无所知党”人,这些人从此宣称自己是共和党人。当1856年6月北方“美国入党”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C.弗里蒙特时,这种结合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对北方“美国入党”人来说,蓄奴制已表明它比向外移民更是一种应坚决否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共和党吸引了大多数北方本土主义者入党。

在此过程中,共和党的理论也继承了本土主义文化上的某些糟粕。共和党人使党变成了一个改良主义的、反奴隶制的、新教的政党,也使党变成了一个富有生机和革新精神的资本主义政党,其现代思想体系吸引着本土出生的上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人。值得注意的是,1856年总统选举时的各党派实力分布图上的共和党地区,恰恰与新英格兰殖民地区、反奴隶制和要求禁酒地区、公立学校及无文盲地区、反对实行黑人法并赞同黑人居民拥有选举权的地区(但黑人居民很少)相叠合。尽管共和党官方蔑视本土主义,许多党员却继承了敌视天主教和奴隶制的观点,认为它们是镇压

性和愚昧落后的综合表现。

南方人和天主教徒又恢复了敌对情绪。他们用“黑人共和党”、“杨基佬”、“清教徒党”等谑称概括了同共和党联系在一起的一大批消极的特征：废奴主义和种族平等、财迷和刻薄行为、虚伪、偏执和一种令人作呕的干涉他人道德行为及所有权的欲念。中西部南方的灰胡桃居民也持反共和党的态度。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之后，居住在上北部地区的民主党人大多脱离了他们的党，并最终成为共和党人，但灰胡桃居民仍然忠于民主党，并同天主教徒和南方人一起继续成为该党的支柱。

流血的堪萨斯

共和党继承了自由土壤党的威尔莫特附件的原则，把它作为他们的主要宗旨：不允许各准州存在蓄奴制，不允许再增加蓄奴州。当反奴隶制势力在国会为争取堪萨斯成为自由州的斗争失败后，他们矢志要把斗争转移到该准州内部去进行。参议员西沃德对他的南部同事说：“由于无法回避你们的挑战，为了自由，我接受了。我们将为堪萨斯未开发的土地而斗争，上帝会使人多势众、办事公正的一方取得胜利。”而在另一方，密苏里州参议员艾奇逊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很大的赌博。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将把奴隶制扩大到太平洋；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将失去密苏里、阿肯色、得克萨斯以及所有的准州。因此，我们必须大胆地去进行这场赌博。”⁶

他确实大胆地进行了这场赌博。尽管自由土壤党首先创立，并于1854年夏成立了“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团”，为堪萨斯移民提供资助，但第一批移居到那里的却是艾奇逊的拥护者。早期的堪萨斯移民大多来自密苏里州，不少人带着奴隶。自由土壤党移民多数来自中西部各州。由新英格兰移居堪萨斯的人很少，但关于

“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团”的宣传舆论，致使蓄奴派把这看作是新英格兰人废除西部蓄奴制的一个阴谋。随后，在自由土壤党和蓄奴派移民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都属于典型的边疆居民集团的冲突：有关争夺土地、城镇地址和水源的冲突，以及新居民点中由于各种制度和立法不健全而难以避免的暴力行为等。但由于堪萨斯是全国蓄奴制问题斗争的焦点，所有的冲突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划分成两派。

1854年秋，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安德鲁·里德到达堪萨斯，担任准州州长的职务。他的第一项工作是监督选举国会的准州代表。蓄奴派决心使人民自主权的这一初次尝试符合他们利益。在选举日，有1700名武装的密苏里人越过州界，来参加堪萨斯选举。这些被反奴隶制报纸所称的“边界暴徒”，以压倒多数的选票选出一位派往华盛顿的蓄奴派代表。

1855年3月选举准州议会时，边界暴徒又故技重演。这次，有四五千人涌过了边界。艾奇逊由参议院返回家乡领导了这次入侵。他告诉追随者说：“有1100人从普拉特县赶来参加选举。如果还不够，我们可以再送来5000人——足以杀死准州内每一个该死的废奴主义者。”⁷ 尽管到这时来自自由州的真正移民已占多数，但选举中蓄奴派投了5247票，而自由土壤党只有791票。后来，国会的调查结果表明，蓄奴派有4968票是骗来的。但受到密苏里人恐吓的里德州长拒绝组织新的选举。尽管强烈要求主持公道，但皮尔斯总统无动于衷。南部报刊为之欢呼。亚拉巴马州一家报纸宣称：“密苏里人豪爽地保卫了我们的权利。”⁸ 议会（或按照废奴派称呼：“伪议会”）通过了一项严厉的蓄奴法。该法限定官方只任用公开的蓄奴派。任何对堪萨斯及蓄奴制的合法性表示怀疑的人都将监禁，任何人为奴隶反抗进行辩护或为逃奴提供帮助都将被判死刑。

愤怒的自由州移民开始组织自卫。他们把劳伦斯城变成反奴隶制的坚强堡垒并用“比彻的圣经”（废奴派教士亨利·沃德·比彻曾说：“在堪萨斯，勇猛的射击比圣经的说教更实惠。”）武装起来。他们成立了一个自由州党，并为制宪会议的召开进行了一次合法选举。这次制宪会议（遭到蓄奴派选民的联合抵制）在托皮卡召开，起草了一份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他们在1855年和1856年交接的那个冬季成立了自己的州议会。为了表明他们并非像蓄奴派报纸所说的“废奴主义的狂人”，自由州移民的州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奴隶或自由黑人迁人的法令。*

堪萨斯于是出现了两个准州政府——一个是合法的，但却是以欺骗手段建立的；另一个是不合法的，但却代表着大多数移民。在华盛顿，总统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承认前者，而主要由共和党组成的众议院赞成后者。当里德州长宣布自己支持自由州移民时，皮尔斯任用了一个顽固的蓄奴派——威尔逊·香农取代了里德。共和党从北方移民对边界暴徒的愤怒中得到不少好处，这些暴徒的海盗式行为，曾由废奴派报纸大肆渲染。

与此同时，堪萨斯的一些零星的暴力行为也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1855年11月，双方在瓦卡鲁萨河沿岸纠集了几百名武装人员。密苏里人原打算进攻劳伦斯城，但在关键时刻被香农州长劝阻了。在这次“瓦卡鲁萨河战斗”中只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冲突。随之而来的严寒冬季使人们不得不在室内呆了几个月。但随着春天的来到，暴力又重新爆发了。5月21日，蓄奴派的700名武装人员开进了劳伦斯城，捣毁了两家报纸编辑部，将报纸投入河中，焚毁了旅馆和自由州“州长”官邸，并抢劫商店。

* 在托皮卡宪法上签字的共37位代表，其中13人出生在南方，21人原属民主党。这些人是坚持排斥黑人法的主要力量。在对该法表决时，新英格兰人投票反对，但被中西部人以多数压倒。

这个事件的消息甚至还未传到东部地区，华盛顿方面的争吵和斗殴已经使南、北部的关系紧张起来。5月19—20日，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堪萨斯犯下的罪行》的激烈的长篇演说。他用华丽的语言和挑衅的口吻赞扬北部的高尚品德，用性行为的隐喻痛斥南部在“强奸”堪萨斯。演讲中他还辱骂性地再三提及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两天后，巴特勒的堂兄、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在参议院休会后闯入参议院大厅，走到萨姆纳的桌前，用手杖敲打他的头部。萨姆纳双腿被桌子绊住无法自卫。他试图站起来，最后猛地把桌子从地上抓起，蹒跚着向前走了几步，终于瘫倒；可是，狂暴的布鲁克斯仍然继续打他，直到被闻讯赶来的其他议员推走。在这次殴打和伤害下，萨姆纳三年没有重返参议院。但1857年马萨诸塞州议会仍选他为参议员，并在参议院为他保留了一个空座位，作为一位奴隶制“暴行”受害者虽无声但富有意义的象征。

布鲁克斯的行为引起了北部的愤怒。“流血的萨姆纳”同“流血的堪萨斯”成为共和党强有力的团结口号。南方温和主义者对布鲁克斯杖打萨姆纳痛恨不已，但他们只是少数。布鲁克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写道：“每个南方人都兴高采烈，连手杖的残段都被请求当作神圣的纪念品。”⁹《里士满辉格党》报表达了许多南方报纸的看法，该报认为：“这是个漂亮而有效的鞭笞。……我们感到唯一遗憾的是布鲁克斯先生没有用马鞭或皮鞭代替手杖，作为对其诽谤的回答。”由于南方议员一致投票反对，众议院未能以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对布鲁克斯的谴责。尽管布鲁克斯辞去议员职务，而他在他的地区以全部选票重新当选，从而又得意洋洋地返回了华盛顿。布鲁克斯在南卡罗来纳逗留期间，哥伦比亚市市长赠给他一根崭新的镶有金把的山核桃木高级手杖。同时，他也收到了来自南方各地的手杖，其中查尔斯顿市赠的手杖上刻着题字：

“再揍他。”还有一位选民送的手杖则题词：“用击倒结束争论”。¹⁰

因此，南部人应对堪萨斯对抗中的大部分暴行负责。但堪萨斯的一位相信以眼还眼的人却是例外。约翰·布朗的外貌和举止颇像一位《圣经·旧约》中的先知。这位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废奴主义者，当他对商业和农场的经营几乎全部失败之后，带着几个儿子漂泊到了西部并于1855年在堪萨斯定居。他组织了一支自由州移民的武装队伍，并参加了“瓦卡鲁萨河战斗”。1856年5月，这支队伍在赶去保卫劳伦斯的途中传来了该城已被洗劫的消息。布朗听说后“暴怒”不已。现在是“以牙还牙”的时候了，他说，“让坚持奴隶制的人们胆战心惊。”第二天，当他们又获悉萨姆纳参议员被打的消息时，有人亲眼看到布朗“狂怒不已——发疯了”。“这也许是引发事件的最后的决定性的刺激”。¹¹ 布朗于是率领一小伙人——他的4个儿子和另外两个人，沿着波塔瓦托米河连夜进行袭击。布朗等从一个船舱里抓到5名蓄奴派移民，并残酷地用大刀砍下他们的脑袋来处死他们。

这场屠杀在堪萨斯引起了一连串游击战。尽管东部的废奴主义者受到很大震动，但他们却否认——或不相信——这次屠杀的真实性，可是多数堪萨斯人知道是谁干的。^{*}在此后的4个月中，在堪萨斯双方打了就跑的袭击日趋激烈，并被国内报刊夸大成一场全面的战争。有些报刊干脆给来自堪萨斯的新闻加上固定的标题——“内战的进展”。约翰·布朗参加了这些小规模的战斗，他的一个儿子也在战斗中死于非命。1856年期间大约有200人在堪萨斯的战斗中死亡。9月，皮尔斯总统任命约翰·吉尔里代替无能的香农做州长。约翰·吉尔里是一位性情粗暴但为人正直的宾夕法尼亚人，曾在墨西哥战争中作为一名指挥官赢得了荣誉，并且担

* 到这年年底才暴露布朗应对此事负责。

任了旧金山市的第一任市长。1856年秋，吉尔里州长利用联邦军的巧妙部署又结合劝说，拦截并驱散了战斗的双方，给堪萨斯带来了一个不稳定的平静。在这时，成为最大问题的堪萨斯——准州内的蓄奴制——成了总统选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

1856年大选

在美国历史上，共和党是第一个完全地方性的主要政党。尽管来自上南部四个州的少数代表出席了全国代表大会，但共和党仍无望在蓄奴州获得一个县的支持。共和党政纲声称，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堪萨斯，谴责民主党吞并古巴的企图，并确认国会有权“在各准州内禁止野蛮时期的孪生遗物——多妻制和奴隶制”。这份纲领有五分之四的篇幅涉及蓄奴制问题，同时也主张政府资助铺设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和改善河流、港口——这些议案曾遭国会南方议员的阻拦或皮尔斯总统的拒绝。

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是约翰·C·弗里蒙特。他的父亲是天主教徒，而且他曾与一位天主教教士联姻，所以共和党不能指望所有本土主义者的支持。但对他的提名却有可能吸引原民主党人。公认的共和党领导人西沃德和蔡斯都是激进分子，他们的丑名会伤害胆小的投票者的感情。年富力强的弗里蒙特同他们相比，虽然政治经验少一些，但却以他对西部的探险和在加利福尼亚举行反抗墨西哥统治的“熊旗暴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更受欢迎。*

* 在1846年美墨战争时，弗里蒙特作为一支地形测绘队队长恰好在加利福尼亚绘制地图。他支持当地萨克拉门托瓦利的一批美国移民，占领了墨西哥索诺马司令的指挥部。他们升起了一面绘有一只灰色的熊面向红星的旗帜，宣布“熊旗共和国”独立。三个星期后，美国军队进入加利福尼亚，兴高彩烈的移民们降下了他们的熊旗而代之以星条旗。

民主党也考虑到“当选的可能性”，提名詹姆斯·布坎南为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皮尔斯和党的卓越领袖道格拉斯曾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中陷得太深了；而布坎南运气很好，他在过去的三年中不在国内，一直作为公使住在英国。在民主党大会16次陷入僵局的投票之后，道格拉斯退出并转而支持布坎南。民主党的纲领重申了杰斐逊和杰克逊关于州权的政策纲要，反对政府在经济或社会的改革中扮演任何角色。它也重申了“逃亡奴隶法”，谴责共和党人是假冒的废奴主义者，并主张在准州内实行人民主权。

此外还有美国入党提名的米勒德·菲尔莫尔，他也受到辉格党残余分子的支持。这些辉格党残余分子徒劳地希望垂死的辉格党能东山再起。1856年的竞选事实上是在两个选区进行：布坎南同菲尔莫尔在南部，布坎南同弗里蒙特在北部。虽然菲尔莫尔的竞选活动在上南部和前辉格党的大本营下南部进展顺利，但也仅仅在马里兰州获得了胜利。弗里蒙特赢得了上北部地区——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以及全部新英格兰和纽约（在占多数的北方州面前纽约市的份量就显得很凄惨了）。在新英格兰人聚居的俄亥俄州和衣阿华州大多数选票也投给了共和党。但在下北部地区——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州，斗争就激烈了。谁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再加上其他任何一个州，他就能当选。所以双方都把他们的精力全部集中于这些州。

在共和党方面，竞选运动激起了美国政治上空前未有的热情。一位共和党记者写道：“目前正在发展的这一进程是美国政治上的一次革命。”年轻的共和党人组织了一个“广泛觉醒俱乐部”，并举行了火炬游行。他们高呼的口号是“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弗里蒙特”。共和党人的言论把这次大选当作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进步与反动之间的斗争。布法罗召开的一次共和党会议宣

称：“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以一个人民的政府代替寡头的政府；这个政府在世界面前维护人权而不是蓄奴主的特权；这场斗争不应该看作是南北方派别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阶级——奴隶主——反对各阶层劳动人民的战争。”¹²

南方的言论似乎恰恰证实了共和党的论点。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报纸宣称：“北方自由社会最大的弊病是肩负着一个劳工和技工奴隶阶层的包袱，不适于自制。”弗吉尼亚州的一位编辑解释道：“我们已经讨厌在任何事物前面冠以自由一词，从自由黑人开始一直充斥整个篇目——自由农场、自由工人、自由社会、自由意志、自由思想、自由儿童和自由学校——这一切同该死的主义同出一辙。”¹³

民主党人在上北部地区利用了两个重大问题——种族歧视和害怕分裂。一家民主党报纸解释道：“在这个国家提高非洲种族的地位，使之在政治和经济条件方面与白种人完全平等，这就是那个支持弗里蒙特的政党的目标。”这次选举将看出北方人民是喜欢“黑鬼……（以及）一种虚伪、卑鄙、可怜而空洞的慈善呢，或是喜欢他们自己的种族、肤色、合众国以及对它的一切无数的祈祷”。由于性情急躁的南部人、甚至一些温和派都威胁说，如果弗里蒙特当选就将脱离联邦，使人们对合众国的前途忧心忡忡，因此布坎南从中获取不少好处。共和党人在缅因州9月的选举中获得65%的选票而获胜后，弗吉尼亚州州长亨利·A. 怀斯下令让他的国民警卫队处于警戒状态并写道：“如果弗里蒙特当选，这里将会发生一场革命。”¹⁴类似的声明促使许多有着辉格党背景的北方保守派重新集合于布坎南的名下，作为避免灾难的唯一选择。堪萨斯10月份的安定否定了共和党最有力的论据，因而也帮助了民主党。

布坎南获得了关键的下北部地区4个州的选票（加上加利福尼亚州）从而当选。他在公民投票中赢得了全国45%的选票——

在自由州是41%，在蓄奴州是56%。菲尔莫尔赢得了南部44%的选票，但在北方仅获得13%的选票——然而这足以在下北部地区击败弗里蒙特。布坎南在15个蓄奴州中赢得了14个州的赞成票，但在16个自由州中仅获得了5个州的赞成票。他是1828年以来第一位没有在南北两地区同时赢得多数票的总统。他的当选是南方的胜利，但也如同他们早期的那些胜利——得克萨斯的吞并、墨西哥战争、“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等——最终反而促进了北部的反蓄奴制运动。这种相反的进程在布坎南就职两天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而进一步发展了。这件事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判决。

第七章 危机的深化，

1857年—1859年

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判决

人们制定“1850年妥协案”原是希望能够在准州内平息关于蓄奴制的争吵。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人们也曾抱有同样的愿望。但两个法案都未能解决准州议会在该准州获得州地位之前能否禁止蓄奴制的问题。这两个法案不但不能平息争吵，反而激起了北方人的愤怒。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判决又重蹈覆辙。联邦最高法院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各准州蓄奴制的合法地位，相反却使地方主义余烬复燃。

这个案件是经过了一段很长很复杂的历程之后才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德雷德·斯科特是密苏里州奴隶，他的主人是一名军医。19世纪30年代，他曾被主人随军带往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准州。1846年他的主人死后，斯科特根据“密苏里妥协案”关于曾在一个自由州或准州居住的奴隶即成为自由人的规定，向其主人继承者要求自由。在密苏里州巡回法庭，他最初败诉后来又获得了胜诉，不料州最高法院于1852年推翻了巡回法庭的审判，并否决了他的自由权。同时，他的主人移居纽约。斯科特于是又到联邦巡回法庭上诉，因为宪法规定一个州的公民可以向联邦法院诉讼另一个州的公民。1854年当联邦法庭宣布维持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原判时，斯科特要求自由的努力再次失败。于是，斯科特的律师把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次上诉在1856年春引起了争论，并且在

1856年—1857年间争论一直没有中止。

到这时,这一案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斯科特的自由问题。* 法院面临三个严峻问题:(1)在自由州或准州的长时间居住是否已使斯科特获得自由?(2)作为一个奴隶或黑人,斯科特是否有权以公民身份向联邦法院上诉?(3)“密苏里妥协案”关于在斯科特曾居住过的威斯康星州禁止蓄奴制的规定是否符合宪法?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争议最小的。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根据以前的判例,裁定斯科特在自由州只是一名“旅居者”,因而仍然是奴隶。对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联邦最高法院能够以简单的维持联邦巡回法庭的原判而加以回避。实际上1857年2月14日,大多数法官都决定这样做,而且塞缪尔·纳尔逊法官开始写判决书。

但是,几天后法院又重新研究并决定发布一个包括该案各个方面的全面裁定。是什么原因要改变这个意向呢?其明确答案被秘密的法庭诉讼程序掩盖了。但有些事情是清楚的。11年来——从威尔莫特附件以来——准州地区蓄奴制的合法地位一直是国内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瓦解了一个政党,同时又使另一个政党诞生,并围绕着在获得州地位之前准州居民是否可以排除蓄奴制问题而给第三个政党——民主党——带来了分裂的危险。多年来人们一直盼望在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1850年的“新墨西哥和犹他州法案”和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都要求这个问题要由最高法院来裁决。但是这些准州没有发生此类案件,现在从新购地路易斯安那的另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案件。

1856年与1857年交接的那个冬季,华盛顿盛传,最高法院要抓住这个时机解决准州是否根除蓄奴制问题。南方人渴望全面解决,因为相信法庭会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裁决。他们的自信是有充分理

* 斯科特最终总是会获得自由的。在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否定的裁决三个月后,他的主人解放了他。斯科特于一年后逝世。

由的。五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罗杰·塔尼，都是南方民主党人。四位来自北方的法官中也有两个民主党人，其中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格里尔还是一个与南方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蓄奴派。要求以“法官的政治家风度”去解决令人烦恼的准州问题，这种要求太强了。在来自佐治亚州的法官詹姆斯·M. 韦恩的建议下，法院同意由塔尼起草一项代表多数法官意见的裁决书，否认黑人具有公民身份，并宣布“密苏里妥协案”关于北部准州禁止蓄奴的规定是违反宪法的。

五位南方法官希望能够获得至少是一个自由州的同僚的支持，以避免裁决书成为一个地方性的文件。来自田纳西州的法官约翰·卡特伦敦促即将上任的总统布坎南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官格里尔施加压力，让他赞成其多数同僚的意见。布坎南乐于接受这种敦促，因为他赞同蓄奴派的主张，而且他的当选主要归功于南方选民。布坎南也希望准州问题能从法律上获得解决，以防止他的政府像其前任那样被这一问题搞垮。总统对格里尔施加了影响，使他决定同南方法官们一致行动。在获悉即将宣布的裁决后，布坎南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诡譎地提及这一案件：“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裁决，我都将同所有善良的公民一样愉快地服从。”¹

两天以后，在3月6日，法院开庭。每位法官都写了意见，分歧很大，以致使人很难准确地知道法院究竟该怎样裁决。除了各方意见中可以达到大体一致的共同点之外，塔尼均采纳6比3的多数意见。结果他做出了如下的裁决：一，德雷德·斯科特仍然是奴隶。二，奴隶和黑人不是美国公民，* 因为宪法曾规定，黑人“一个世纪以来始终被认定是下等阶层，……既是如此下等，所以他们不具有一个白人所享有的必须受到尊重的那种权利”。² 塔尼根据

* 一致同意的三条意见仅仅阐明奴隶不是公民，并未提及自由黑人作为奴隶的后裔，是否也不能享有公民的权利。

这种逻辑推断，这些下等人及其后裔在 1857 年都不是美国公民，因此斯科特到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这件事本身就首先应该被否决。三，斯科特在伊利诺伊州的居住并不能使他获得自由，因为按照州与州间互相尊重对方法律的礼节，密苏里州的法律是有效的。四，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居住也不能使他获得自由，因为国会无权排除准州的蓄奴制，“密苏里妥协案”的排斥蓄奴制的条款是违宪的。

塔尼和意见一致的法官们关于准州的裁决基于这样一些原则：卡尔霍恩认为，准州是国家的共同财产，不是国会创造的；奴隶财产与其他任何财产具有同样地位和准州蓄奴主的奴隶不准被剥夺，就像不能剥夺农夫的马一样等两项原则（因此，无论是准州议会还是国会对蓄奴制的废止权力都被塔尼否定了）；第五次修正案的正式法律程序条款禁止联邦政府在没有正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当然，废奴主义者强调第五次修正案中的“自由”这个词，把它作为联邦政府有权废除蓄奴制的根据。但塔尼认为，财产取代了自由，这甚至也压倒了宪法第四条第三款给予国会“处理和制定关于准州的一切必要的法规和规章的权力”；共和党人认为，这项条款使国会有权禁止蓄奴制，但对多数法官来说，事情并非这样。

塔尼的裁决在梅森—狄克森分界线*以南引起了广泛的赞扬。《奥古斯塔（佐治亚州）护宪者》为此欢呼说：“南方关于南方蓄奴制问题的意见……现在已成为国家的最高法律。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南方意见就是反对宪法，也就是反对政府。”许多北方民主党人也跟着表示兴高采烈。宾夕法尼亚州一家民主党报纸把这个裁决书称做“是‘黑人共和主义’的悼词。它……使他们党所创立的

* 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州的界线，后来成为区分美国南北方的标志。

全部理论都被碾得粉碎。”³

但这一裁决并非人人同意，它的明显的党派偏见并不使共和党人对它尊重。来自纽约州的法官纳尔逊表示了个人的意见，他仅仅肯定了巡回法庭的判决，但拒绝对其他问题发表评论。来自俄亥俄州的法官约翰·麦克莱恩(前辉格党人后加入共和党)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法官本杰明·柯蒂斯(他一贯自称是辉格党人)提出异议。他们拥护“密苏里妥协案”，肯定黑人应享有公民权，并声称斯科特应得到自由。柯蒂斯的观点是对塔尼各主要论点的有力驳斥。他指出早在1787年某些州的黑人就已经成为合法的公民，根据宪法第四条第二款(“每个州的公民都将有资格获得某些州的公民所享受的优待和豁免的权利”)，他们应享有美国公民的各种权利。柯蒂斯批驳了塔尼在国会对准州权力方面的诡辩，并声称废除奴隶制既不是对财产的剥夺，也不是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否认。

多数现代学者认为，柯蒂斯的不同见解要比以塔尼为首的多数人的意见能成为更完美的法典。关于对此案最新和最详细的研究证实，塔尼是一个捍卫南部权利的“狂热的党派分子”，一个“极端的地方主义者”，他厌恶北方，蔑视共和党。他对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是企图摧毁共和党的基本原则。这种裁决是“纯粹的党派偏见，是用法律语言进行的精神论战，它不像地区间的和解方案，而更像一个最后通牒”。⁴

这种现代评论几乎是重复了共和党当时对裁决的观点。“一个邪恶、欺诈的裁决”，“一种残暴的主张”，“故意的颠倒”，“一种经过整理加工的虚伪陈述和肤浅的诡辩”，“共和国司法史上最大罪恶”，这就是共和党人对那次裁决的一些评语。废奴主义者尤其反对不利于黑人公民权的判决。而共和党人则大力争取撤消国会对准州蓄奴制问题的权力，共和党人也惊讶地指出了这个裁决在法

律上对自由州本身的影响。如果德雷德·斯科特在伊利诺伊准州的两年“旅居”不能使他获得自由，那么怎样才能阻止奴隶主携带他们的奴隶进入自由州居住两年或更长的时间？如果奴隶与其它财产没有任何区别，那么一个州怎样才能有权通过立法手段反对这种财产的所有权？亚伯拉罕·林肯警告道，塔尼的法院或许很快就将宣布一项裁决书，“宣告美国宪法不允许一个州在其境内废除奴隶制”。⁵

反对蓄奴制的人们坚信，对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不是正当的法律解决。《纽约独立报》宣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对一个种族的精神谋杀，不能服从。”《芝加哥论坛报》强调指出，没有一个“自由人会遵守或听从这样一种给人民及其自由带来灾难后果的裁决”。⁶但这种论调使共和党人不安地靠近加里森废奴主义者的文明违抗理论。民主党人不失时机地在这一点上攻击共和党。他们指出，法院的裁决就是国家法律，违抗法律就是对宪法的背叛。为反击这一谴责，共和党人抓住柯蒂斯法官的论点：塔尼关于准州奴隶制问题的裁决只是法官的附带意见——即对决议的评论，对案子没有直接影响，也不具有约束力。《纽约论坛报》指出，鉴于塔尼宣布斯科特不是公民，他的诉讼——因此也是准州蓄奴制问题——也就不宜在法院立案，任何涉及该案的意见都仅仅是法官的附带意见，“只有道义上的影响”，“就如同在华盛顿任何一家酒吧中很多聚会的人所作的评论一样”。⁷

这个法官的附带意见在政治上给了共和党人一个天赐良机。它使他们能够不背上不守法的黑锅而拒绝承认最高法院的裁决。*

* 法官的附带意见即使在法学界也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但当代历史学家和法官们都认为，塔尼的裁决并非仅仅是法官的附带意见，其政治的才智和法律上的正当性均应予以承认。除州议会对奴隶制问题的权力外，全部裁决都属于该案的法律问题，因而对法院来讲也是适当的。

缅因州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关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不具备道德和法律上的约束力”。其他一些州的议会也随之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共和党利用北方人对这次裁决的敌意，决心“重建”最高法院，并做出新的判决。《芝加哥论坛报》声称：“补救的办法在于……投票箱，应当使共和党人出任下届总统，1860年将标志着像1776年那样的时代。”⁸

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使它的炮制者大失所望。它没有解决蓄奴制问题。它未能消除地区间的怨恨，反而使之更强烈了。它未能削弱共和党；相反，由于人们相信共和党对企图在全国范围推行奴隶制图谋的指控，共和党却因此而得到加强。由于裁决自身得不到实施，它也未能在各准州确立蓄奴制的权利。因此，南部人开始呼吁制定联邦奴隶法以保护准州的蓄奴制。最后，裁决没有解决民主党内关于人民主权何时得以实行的分歧。塔尼判定准州议会作为国会的工具，并不比国会本身拥有更多排斥蓄奴制的权利，这就与斯蒂芬·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观念发生了冲突。道格拉斯力求使人民主权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协调一致是针对重新挑起堪萨斯问题的势态的。而堪萨斯问题已迫使他采取了反布坎南政府及该党南部派系的立场。

莱康普顿宪法

正当最高法院考虑德雷德·斯科特的命运时，堪萨斯事态正逐渐出现新危机。尽管吉尔里州长已经使准州安定下来，但争夺权力的斗争仍在继续。蓄奴派在人口上明显地处于劣势。每位观察者都承认，自由州人在定居者中已经占到二比一的多数，而且每年春季的移民都远远超过预计人数。由蓄奴派控制的准州议会出于绝望，不顾一切地于1857年2月召开会议，大胆制定州宪法，并申

请州的地位，而不交选民表决。议会通过法案决定将制宪会议候选代表名单的准备工作及选票的计算事宜全部交由蓄奴派官员掌握。吉尔里州长否决了该法案，但议会却不顾其否决强行通过了它。因工作繁重和生命受到恐赫而弄得精疲力竭的吉尔里于3月4日提出辞职。他曾经历了墨西哥战争和旧金山淘金热的考验，但堪萨斯问题使他太勉为其难了。

布坎南总统任命了一位坚强的小人物、密西西比人罗伯特·J. 沃克接替吉尔里。尽管沃克决心秉公办事，但堪萨斯的棘手的政治问题很快也把他搞得狼狈不堪。准州官员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将多数会议代表席位给予赞成蓄奴的县。自由州移民联合抵制6月的选举，指责其全部程序是一场骗局。这使蓄奴派得以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控制大会。然而，沃克仍坚持他们所制定的任何法律都必须交由选民表决。为此他遭到了他以前的南部朋友的谴责和威胁。在这个问题上，布坎南政府起初支持沃克，但1857年秋天发生的事件使布坎南屈从于控制其政府的南部人。

9月，在莱康普顿召开的堪萨斯制宪会议起草了一个旨在使堪萨斯成为蓄奴州的宪法。但与此同时，为准州议会而进行的新的选举将在10月举行。由于有自由州移民参加，沃克相信这将是一次公平的选举。投票结果首先显示出蓄奴派的候选人赢得了小胜。但舞弊行为很快就败露了。在一个仅有30名合法选民的地区，选票登记名单上就出现了1601个由辛辛那提市的人名地址录上抄来的姓名。沃克撤销了2800张伪选票，结果使自由土壤党在下届准州议会中占到了稳固的多数。

尽管南部人都因“调查选举结果”而辱骂沃克，但他们的指责不啻是承认在公平选举中自由土壤党占有多数——这一多数将使莱康普顿宪法在公民表决中被否决。鉴于不经公民表决，国会几乎就必然拒绝授予州的地位，莱康普顿大会的领袖们想出了一个巧

妙的办法以保全宪法并且进行公民表决。他们制定了一个新的条款，它将保护在准州内生活的每位奴隶主占有200名奴隶(及其后裔)的权利,但禁止将来再向堪萨斯输入奴隶。选民投票承认宪法时可以在这个条款(“废奴”宪法)或原订条款(“蓄奴”宪法)之间进行选择,按照原订条款,将来仍然可以带进奴隶。这是公民表决中仅有的两种选择。

共和党人谴责“莱康普顿骗局”是对人民主权的践踏。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和许多北部民主党人也提出同样的责难。他们所以认为它是骗局,其理由是:一,即使除了有关蓄奴制的条款外还包含一些有争议的条款,但它使投票人没有机会直接拒绝宪法;二,“废奴”宪法是一个花招,因为它保护准州现存的蓄奴制,不顾输入奴隶的禁令,为将来私运其他奴隶敞开了大门。

堪萨斯自由土壤党认为,制宪会议及其起草的宪法二者都是非法的,因而拒绝参加12月21日的公民表决。结果,“蓄奴宪法”以6226票(其中2720票后来被宣布为伪票)对569票轻易地获得通过。同时,自由土壤党的新的准州议会宣布将于1858年1月4日举行第二次公民表决,届时投票人可以直接否定或接受宪法。蓄奴州移民抵制了这次投票,结果有138票赞成“蓄奴”宪法,24票赞成“废奴”宪法,10226票反对整个宪法。

在1857年—1858年,莱康普顿宪法成了国会的一个中心问题。道格拉斯宣称要就此问题对政府发动一场政治战,并在参议院领导反对依据莱康普顿宪法授予堪萨斯州地位的斗争。1858年2月,30名南、北部众议员就莱康普顿宪法问题的通宵辩论中大打出手。北部各州议会都谴责那部宪法,而南部一些州议会则以脱离联邦相威胁,除非国会同意根据那个“正式通过”的文件授予堪萨斯以州的地位。一个南卡罗来纳人叫嚣说:“与其堪萨斯不能以莱康普顿宪法获得州地位,不如让[联邦]在血与火中毁灭。”⁹布

坎南在这些恫吓及其南部顾问们的威吓下，否认自己曾赞成对整个宪法进行公民表决。现在他宣称12月21日的投票是合法的，而事实上更能反映堪萨斯意愿的1月4日投票却不合法。总统就莱康普顿宪法问题呈交国会的咨文中宣称，堪萨斯“此时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一样是一个蓄奴州”。

布坎南把莱康普顿问题看作是对党忠诚的一次考验。在他40年的政治生涯中，包括在众议院、参议院的供职，在俄国和大不列颠做公使，以及担任国务卿，67岁的未婚总统已逐渐热爱民主党而胜过世间的一切，认为忠诚党的政策是最高美德。布坎南决定利用政府的全部赞助力量和权力，使那些动摇的民主党参议员和代表们站到莱康普顿一边。尽管道格拉斯强烈反对，参议院还是通过了莱康普顿宪法。参议院中强大的南方势力和一些倾向蓄奴派的北方民主党议员，促使参议院于3月23日通过关于堪萨斯的州地位法案。但在众议院情况就不同了。北部代表们面临着1858年的竞选，因而几乎有一半北部民主党人都与共和党人一同反对莱康普顿宪法，并在4月1日的最后表决中否决它。

这个事件的后果在堪萨斯使人们大为沮丧。政府为挽回面子，建议向选民提交一个莱康普顿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授予堪萨斯部分联邦土地。然而，堪萨斯人把这种授予视同“行贿”，仍在1858年8月2日的投票中以6比1之差拒绝了该宪法。当堪萨斯在1861年最后获得州地位时，它已成为联邦中共和党人最多的一个州。

对民主党来说，莱康普顿的结局是令人痛苦的。道格拉斯已与来自本党的总统分道扬镳，并且已脱离了他的⁵¹大多数南部支持者。在他们看来，他现在还不如一个“黑人共和党”。这就注定了18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分裂，在那次会议上，道格拉斯理所当然地被大多数北部代表推举为总统候选人。

莱康普顿斗争也暴露了人民主权在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中所反映的缺陷。尽管1858年以后，奴隶制在堪萨斯仍然具有合法地位，但实际上它已不再存在，因为自由土壤党的压倒优势已在那里创造了一种使它无法生存的环境。早在1857年6月，道格拉斯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次演讲中，曾试图将人民主权与德雷德·斯科特的裁判主张协调起来。当时他说，尽管奴隶主在准州拥有奴隶的产权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但如果没有地方立法和适当的治安条例去支持、保护和承认，它就只能是一种空有的、毫无价值的权利”，而这些规定和立法“必须完全靠准州人民的意志和愿望”。¹⁰这个起码的道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论；但在莱康普顿之争的结局中，它却成了问题，使南部人对道格拉斯进行攻击。人民主权被上下两块磨石夹在中间，上块磨石是共和党要求国会废除准州蓄奴制，而下块磨石是南部人要求制定联邦蓄奴法以保障蓄奴制。

林肯一道格拉斯的辩论

1858年6月16日，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大会提名亚伯拉罕·林肯为联邦参议院议员竞选人。这种行动是前所未有的，参议员素来由各州议会选举产生，从未有过在州议会选举之前由某政党提名的事例。但1858年不寻常的形势要求不寻常的行动。道格拉斯与布坎南政府的决裂促使一些东部共和党人建议，作为扩大反蓄奴制阵营的第一步，支持他连选连任参议员。但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没有一个赞成的。他们曾经不畏艰难地同道格拉斯进行斗争。他们认定他并非潜在的共和党人。支持他将是党的自我毁灭。他们对林肯的提名明确表明了共和党人的主张。这使得参议员的职位问题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选举中的唯一问题。由于道格

拉斯不得不起而捍卫自己的政治生涯，因此一条长长的阴影投向了1860年。这也促成了美国历史上一场最著名的辩论。

林肯的受命演说为其竞选活动定下了基调。这次演说名垂青史，被称为“家不和”演讲。他的目标是使道格拉斯与共和党人之间拉开尽可能大的距离。道格拉斯虽然曾反对莱康普顿宪法，但他这样做仅仅是由于堪萨斯人在宪法问题上被拒绝进行公平投票表决。道格拉斯曾反复强调，他并不关心蓄奴制是被投票赞成还是被投票否决。林肯指出，“不关心”政策，对共和党人来说，是应受到谴责的，共和党人认为蓄奴制是社会道德和政治的败坏。共和国的创始者们始终坚持这样的立场。他们曾在西北准州以及新购地路易斯安那北部消除蓄奴制，并希望它最终能在任何地方都被废止。而道格拉斯在1854年却促使“密苏里妥协案”失效，在1857年又拥护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林肯援引《圣经》说：“‘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它要么是完全这一种，要么是完全那一种。”在民主党领导下，它可能变成完全蓄奴制的。但共和党人——国家创建人的真正继承人——则决心“阻止它进一步扩大，并使公众相信它最终要被消灭时而予以取缔”。¹¹

道格拉斯对于把他同狂热的蓄奴派联系在一起的挑战，不能置之不理。他在竞选演说中怒斥林肯颠倒黑白。林肯予以回击。几周内，两位竞选者相互追逐，在全州各地进行了一场长期的辩论。他们仅仅每隔数日就利用同样的讲台发表演说。最后，道格拉斯接受林肯的挑战，同意进行七次面对面的辩论。这些辩论在美国历史上被广泛传说。成千上万的农民风雨无阻地涌入设在七个不同城镇的露天会场去聆听三个小时的辩论演说。竞选达到了极其引人注目的戏剧性效果。这是大卫对歌利亚——此时这位大卫身高6.4英尺，差不多比歌利亚高出了一英尺。

道格拉斯试图把林肯划为废奴主义者，以使他处于被动。道格拉斯说，国家可能幸存于半奴隶半自由。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它不能无限期地这样做下去。人民主权给予准州居民机会去决定要不要保持蓄奴制。道格拉斯说，如果让他们公平选择的话，所有现存的准州都一定会废除奴隶制。这将满足多数北部人的愿望，而不冒黑人共和党用其“最后消灭”的废奴主义论调造成分裂的风险。

道格拉斯说，此外共和党还要求给予黑人以平等。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话题，尤其是在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巴特纳特县。“我不相信上帝一直打算让黑鬼与白人平等，”当他的支持者们高喊赞成时，道格拉斯大声说，“他们属于下等种族，必须永远处于下等地位。”美国是一个白人的国家，“由白人创建，永远为白人和他们的后代造福，我不赞成分散白人享有的公民权”。“难道你希望勾销我们州的宪法中排斥奴隶与自由黑鬼的条款吗？”道格拉斯反问，他的支持者们则高喊：“不，不。”

难道你们愿意把这个美丽的州变为自由黑鬼的聚居地（“不，不！”）以便在密苏里废除蓄奴制，就能把10万解放的奴隶送到伊利诺伊来，成为公民和选民，同你们诸位享有同样权利吗？（“不，绝不！”）如果你们希望黑鬼获得公民权，如果你们赞成他们进入这个州并同白人一起居住，如果你们愿意给予他们同你们一样的平等的选举权的话……那么你们就支持林肯先生和黑人共和党吧，他们赞成给黑鬼公民权。¹²

这种战术使林肯处于守势。他在南部和中部各县发表的演说中驳斥了道格拉斯的指责。他说，种族差别的存在，将“永远阻止[他们]以平等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生活在一起”。林肯向他的听众保证说：“我现在不，以前也从不赞成以任何方式造成白人和黑人两个种族间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掌声）——我现在不，以前也从不

赞成产生黑人选民或陪审员，准予他们担任公职，或与白人通婚。”¹³ 他不同意废除“逃亡奴隶法”，禁止州际奴隶买卖，违背当地奴隶主的愿望而解放华盛顿特区的奴隶——就像道格拉斯所指责的那样。

林肯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比多数上北部共和党人更保守的态度。但是他几乎不能采用其他的方式来演讲，他希望在伊利诺伊州获胜，而这是自由州中种族意识最强的一个州。他在以往的辩论中是很雄辩的。“让我们摒弃一切关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这个种族或……那个种族低贱之类的诡辩，而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直至我们重新站起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无论在智力方面黑人和白人有无高低之差，林肯说，“在人人自食其力的生活权利方面，他与我平等，与道格拉斯法官平等，与每一位活着的人平等（掌声）。”然而共和党并不打算干涉一些州现存的蓄奴制度，仅试图阻止它的扩张。与民主党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这个政府是为保障自由而建立，况且奴隶制度对黑人、对白人、对土地和对国家都是十足的罪恶”。问题的关键在于奴役是否道德。如果它正确，它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如果它错误，那么无论是限制它还是最后根除它都是可行的。“这是正确和错误两个原则之间在全世界的永恒的斗争”。道格拉斯“看不到蓄奴制度会灭亡”。而在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将尽可能使公众相信它最终要被消灭，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而被取缔”。¹⁴

这些辩论虽然表明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对蓄奴制态度的严重分歧，但也反映了共和党内对种族平等问题的矛盾心理，以及林肯关于现存奴隶制的“最终解放”与无限期维持的说法的内在矛盾。道格拉斯指出，共和党不可能两路得逞而勉勉强强达到自己的目标。但在1858年，对共和党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缓和反蓄奴与维护联邦的对立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关系了。

总之，在伊利诺伊州的选举中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拥护道格拉斯的议员候选人在该州南半部地区赢得大多数选票。而林肯的支持者在北部也获得了同样的胜利。共和党候选人总票数为125000票；道格拉斯的民主党为121000票，少数反对道格拉斯的有5000票。但道格拉斯获得了很大一部分县的选票，维护了民主党在州议会投票总数中的多数地位，从而得以提名他为联邦议员候选人。然而在其他自由州民主党遭受了挫折，他们的53位北部国会议员减少到31名。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州都获得了多数票，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些州保持这种多数，他们就将赢得1860年的总统竞选。

大决战的前兆，1858年—1859年

南北分裂的开端

历史学家们曾认为，林肯在弗里波特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以巧妙的提问断送了对方面当选总统的机会。林肯问道，准州人民在获得州地位之前是否能合法地排斥奴隶制？换句话说，人民主权能够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协调一致吗？如果道格拉斯作否定的答复，那么他将得罪许多北部民主党选民，并有可能在参议院正在进行的辩论中失败。如果他作肯定的答复，他将得罪南部并失去他的党在1860年对他的总统提名。

这个理论上的麻烦已经使道格拉斯因反对莱康普顿宪法而得罪了南部，而且他也曾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第一次是1857年6月在他表示赞成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演讲中。在弗里波特他再次做了肯定的回答：尽管奴隶制在准州是有合法权利的，但准州人民可以用拒绝通过对它实施保护的治安条例之类的办法来排斥蓄奴制。林肯已料到道格拉斯会作出这样的回答，而且他对待这个

问题并不像在后来的回忆中显得那么重要——其实，这一问题是要证明道格拉斯就是蓄奴派，而不是让道格拉斯得罪南部，但结果多少与林肯的目的相反。

南部许多报纸谴责道格拉斯的“弗里波特理论”，其实他们已经在莱康普顿问题上诅咒他几乎整整一年了。“弗里波特理论”最终成了一场正在日益尖锐的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使民主党于1860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派。争论涉及保护准州蓄奴制的联邦奴隶法问题。南部人主张，倘若准州议会拒绝制定保护奴隶制的治安条例，那么必须由国会来制定它。1859年2月，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艾伯特·G. 布朗在参议院宣称，如果不制定联邦奴隶法，他将敦促他的州脱离联邦。这就引发了一场充满仇恨的南北两派争论，布朗的同事杰斐逊·戴维斯等人与道格拉斯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

布坎南政府再次试图吞并古巴，从而也加剧了南北间的紧张关系。总统的意图是双重的。他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吞并古巴是其对外政策的中心。同时，希望通过古巴问题治愈民主党南北分裂的创伤。多数北部民主党人相信领土扩张命定说。无论他们对堪萨斯奴隶制持什么态度，大多数人欢迎古巴成为蓄奴州。这个问题可以促使北部民主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重新团结。道格拉斯赞成如此吞并之。美国驻马德里公使愚蠢地企图收买西班牙各派力量以争取他们支持拍卖古巴。在华盛顿，南部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支付3000万美元购买古巴的议案。共和党人谴责对古巴的出价是扩张蓄奴制的无耻阴谋。他们以拖延办法阻止拨款，直至1859年3月4日该届国会任期届满。

同时，南部参议员否决一项准许每个移民获得160英亩宅地的议案。该议案已于1859年2月在众议院得到几乎全部共和党人和三分之二的北部民主党人支持被通过。但南部人反对，认为这

是使新英格兰农民大量移居西部的诡计。明尼苏达和俄勒冈刚刚被联邦正式接受为州，堪萨斯不久也将成为一个正式的自由州，南部人敏锐地感到在国会和选举团中，北部人正在增长为多数。于是，南部参议员及其少数北部同伴在1858年—1859年这一短暂的会期中阻止了宅地法。北部支持的宅地法和南部支持的古巴议案，都因对方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为南北两地区在1860年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关于奴隶买卖的论战

重新开展非洲奴隶买卖的活动，在引起南北分裂日益增多的问题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问题。这种买卖活动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到1859年已发展到引人注目的规模。多数南方人反对恢复这种买卖。但很多重要人物却赞同废除1807年禁止输入奴隶法案。杰斐逊·戴维斯指责该法案违宪，是对南部的侮辱。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要求恢复奴隶买卖。三分之二的南部国会议员投票反对国会关于谴责煽动重新开展奴隶买卖的决议。1859年，南部商务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赞同废除反输入法。南部一家主要商业期刊的编辑 J. B. D. 德鲍担任了“非洲劳力供应协会”主席，该协会成立于1859年，专门从事抵制反输入法的活动。

这场运动的起因有三条。第一是19世纪50年代迅速上涨的奴隶价格。在1849年—1859年间，一个壮年男性农奴的平均价格从1000美元涨到了1700美元。这不仅使富裕的种植园主大量耗费金钱，也使普通农民漫天要价而不能成交。在非奴隶占有者对种植制度的忠诚日益使人关注的时候，通过进口来扩大奴隶数量以降低奴隶价格的想法也是颇有吸引力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写道：“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尽可能增加奴隶人数，这样就可以确保全体居民

自身利益的动力，以争取他们的支持。”¹⁵

其次是心理因素。许多南部人认为，非洲奴隶买卖是不道德的。蓄奴派极端分子担心，这种情绪可能只是达到这种想法的第一步，那就是确信国内奴隶买卖乃至奴隶制本身都是错误的。威廉·L·扬西问道：“如果在弗吉尼亚购买奴隶并把他们带到新奥尔良是正当的，为什么从非洲把他们买来再带到那里就不正当呢？”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编辑坦率地告诉他的读者：“如果你们承认蓄奴制，就必须赞成奴隶买卖，因为它们是一码事。那些不赞成我们的人，必定是反对我们的。那些否定蓄奴制和奴隶买卖的人就是南部的敌人。”¹⁶

第三，恢复奴隶买卖的活动成为南部民族主义的武器。某位脾气暴躁的人说，南部应该以“主动的进攻”取代其一贯的防御立场。煽动奴隶买卖是最好的手段，因为它能造成对“北方人的怨恨和对他们的观点的蔑视”。两位著名的脾气暴躁的奴隶贸易鼓吹者——弗吉尼亚州的扬西和埃德蒙·拉芬，在1858年创建了“南方人联合会”，以“激发南部人的热情，指导南部人的思想……在适当的时刻，我们将采取有组织的一致行动，使亚拉巴马州爆发一场革命”。¹⁷

尽管它激发了南部人的热情，但恢复非洲奴隶买卖运动并未取得具体成果。1858年，路易斯安那州众议院批准输入非洲“学徒”（为奴隶制起的合法化名词），但州参议院未通过。其他州立法机关均未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但19世纪50年代后期，向美国非法贩运奴隶的现象已经增多了。最臭名昭著的是纵帆船“漫游”号事件。这艘纵帆船的船主查尔斯·A·L·拉马尔是一个著名的南部家族后裔。1858年，“漫游”号从非洲运载600名奴隶，避开英国人的巡逻队，终于使300名幸存的非洲人在佐治亚州登陆。联邦官员扣留了船员。尽管铁证如

山，萨凡纳陪审团还是宣布他们无罪。拉马尔甚至被允许从官方的拍卖中以4000美元赎回他的船！大约与此同时，查尔斯顿陪审团也宣判了另一起违法贸易船的船员无罪。这些行为激起了北部人的义愤；反过来，这种义愤又被指责为新英格兰人的虚伪。密西西比州一家报纸责问：“难道一个新英格兰人在北部违犯逃亡奴隶法与一个南部人在南部违犯反奴隶买卖法有什么区别吗？”¹⁸

无论有什么区别，关于买卖奴隶的争论看来印证了威廉·H. 西沃德的论断。西沃德在1858年一次演说中曾描述说，在奴隶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不可约束的冲突”。1857年，几星期内先后出版的两部书——乔治·菲茨休的《食人生番》或称《没有主人的奴隶》和欣顿·罗恩·赫尔珀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使这一冲突进一步深化。

南北争辩

菲茨休是弗吉尼亚州海湾地区的一位绅士，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自由社会的破产”的文章。1854年，他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题名《南部社会学》。随后他又于1857年出版了《食人生番》。菲茨休说，资本主义是一场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是社会同类相残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奴隶制是一种保障雇主在工人中拥有世袭利益的古老制度。“当一个人遭到贫困、灾祸、衰老、病弱的袭击时，奴隶制对他来讲是多么可贵啊。”北部的全部问题出在他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虚伪学说。菲茨休断言：“人并非生来就有资格享受平等权利。这种说法太近乎真理了。认为一些人生下来就驮着马鞍子，另一些人生来就骑在他们的背上，用鞭子踢赶他们；而这种骑马法对双方都是好事，……奴隶制对于劳动者来讲，无论白人或者黑人，都是一种自然而又正常的现象。……我们奴隶主断言，你

们必须依赖家庭奴隶制，它是一种最古老、最优越、最普遍的社会主义形式”。¹⁹

其他蓄奴派分子也附和菲茨休的论点。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乔治·麦克达菲声称，“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有资格享受自由或有享受自由的能力。”佐治亚州一家报纸惊呼：“自由社会！这个名字令人作呕。那只不过是油污的机修工、污秽的操作工、吝啬的农夫和神经错乱的理论家拼凑起来的混合体，……还不如南部绅士的一群奴隶所组成的社会。”²⁰几年后，一些在谢尔曼将军麾下服役的“吝啬的农夫”和“油污的机修工”在行军经过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将会想起这番话。

1857年经济危机对南部影响较小，这使南部人得以炫耀其体制的优越性。当萧条时期大批北部商业破产、银行倒闭、工厂停工的时候，棉花价格却保持稳定，棉花产量创造了新纪录。这导致参议员詹姆斯·哈蒙德1858年4月在参议院发表他关于“棉花大王”的著名演说。南部人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已确定无疑”。哈蒙德告诉北方，大恐慌期间只有不断出口棉花，才能“从毁灭中拯救你们”。这是奴隶制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就这些问题，哈蒙德进一步说道：

“你们的整个雇工阶层，正如你们所称的体力劳动者和“操作工”阶层，实质上就是奴隶。……在整个社会体制中，必须有一个阶级担负奴仆的职能，从事生活中单调乏味的工作，……这个阶级构成社会的底层。……南方是幸运的，它找到了一个适用于那种目的的种族。……我们为此而使用他们，称他们为奴隶。……但你们使用的却是白人。”²¹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像这样的演讲给共和党人制造了政治资本。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出身低下：纳撒尼尔·班克斯最初是一家纺织厂的筒子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威尔逊的父亲是个

体力劳动者，威尔逊本人也曾是一名制鞋工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霍勒斯·格里利二人的父亲都是靠种地勉强维持生计的小农；亚伯拉罕·林肯的双亲都是未受过教育的拓荒者。这些人都是自由社会中地位升迁的活生生的例子。如果南部人认为是这样的人构成了社会底层，那只能进一步证实共和党人对南部的看法。^{*} 林肯同道格拉斯辩论时，听众中的共和党人就举着写有这样口号的旗帜：“吝啬的农夫、社会底层、油污的机修工，赞成亚伯拉罕·林肯”。

欣顿·罗恩·赫尔珀与乔治·菲茨休截然相反。赫尔珀生长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一个小农地区。他在1857年出版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一书论述奴隶制对南部经济的影响。赫尔珀援引1850年精选的统计资料，描述了当北部大踏步向前迈进时南部在落后中的萧条景象。他的论述将普遍有文化并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北部工人、农民与贫困无知的南部穷白人做了对比。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奴隶制乃是南部一切耻辱、贫穷、无知、暴虐和愚昧的根源。”奴隶制独占了最好的土地，把所有劳动都贬为奴役劳动。使学校拒绝接受工人，使所有人都陷入贫困而只是“鞭子老爷”例外。这些“鞭子老爷”“不仅是黑人的绝对主人，也是所有非奴隶主白人的绝对主人。非奴隶主白人的自由仅徒有其名，他们被人故意地、残忍地弄得长期处于极度无知和卑微的地位”。²² 赫尔珀虽然要求废除蓄奴制，但并未对奴隶寄予同情。他主张用船把他们送回非洲去。他的书是为非奴隶主白人而写的。他激励他们起来建立州共和党组织，并用自己的选举权推翻种植园主的统治，解放南部。

然而，非奴隶主很少读到他的书。没有一个南部出版商愿意出

^{*}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著名的南部领导人也是早期从微贱中奋斗过来的——包括参议员哈蒙德。

版《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赫尔珀只好移居北部并在纽约出版了它。1857年夏季这本书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共和党人的关注。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破例为它发表了整整8栏的评论。共和党领袖们筹款印刷并发行了这部书的节选本作为运动文件。这激怒了南部人，尤其是共和党人在节选本中增加的醒目标题：“革命——可能的话，和平进行；必要的话，采用暴力”。²³ 奴隶主们谴责《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是“纵火犯、造反者、国家和平与安宁的敌人”。²⁴ 一些州宣布发行或收藏这本书为犯罪。

赫尔珀的这部书导致国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僵局。在1859年12月的众院里，共和党人占有优势但未达到多数。他们提名俄亥俄州的约翰·谢尔曼为议长。谢尔曼在奴隶制问题上虽然是个温和派，但仍与其他67名共和党国会议员一起对赫尔珀的书表示了支持（他并未读过这本书）。谢尔曼要赢得议长职位，还需要一些边境州的美国入党议员的支持。一位密苏里州代表提出了一项议案，认为凡是支持《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的人不“适于任众院议长职位”，从而阻止了边境州的人投票选举谢尔曼。众院多次投票都未能选出议长。争执延续了8个星期，南北双方议员火气越来越大，相互辱骂，甚至携带武器来参加会议。一位观察家报道说：“唯一不带一支左轮手枪和匕首的人就是那些带着两把左轮枪的人。”²⁵ 众院议员席上爆发枪战看来已有现实可能性。直到谢尔曼退出并有足够的边境州美国入党议员同共和党人一起投票赞成新泽西州的中立派威廉·彭宁顿做议长时，僵局才在第44次投票中打破。

约翰·布朗对哈珀斯渡口的袭击事件加剧了华盛顿的紧张势态。这一事件发生在国会开会之前不到两个月。这一暴力事件使10多年来不断加剧的南北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它在1860年总统选举前一年还促动了一系列不祥的政治事件。

第八章 危机年：1859年—1860年

约翰·布朗与哈珀斯渡口事件

自1856年在堪萨斯作为游击队首领取得功绩后，约翰·布朗就一直在研究制订一个在南部打击蓄奴制的令人敬畏的计划。布朗是个相信上帝的惩罚和公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他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不流血就不能免除罪孽。”他确信，奴隶制的罪孽必须用血来偿还。怀着真诚的宗教狂热，他坚信自己是执行上帝这一任务的工具。他计划率领一支突击队进入弗吉尼亚的山区，在那里把低地种植园的奴隶吸引到他的旗帜下。他将武装他们，并建立一个临时的自由人共和国，扼守要隘，抵御反攻，然后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向南推进，号召奴隶起义，直至可恶的奴役体制彻底崩溃。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但布朗竭力说服一些废奴派领袖，让他们相信计划是可行的。1856年—1859年期间，他穿梭于堪萨斯、东北部地区，以及加拿大的逃奴聚居区，征募志愿兵，筹集资金，并为计划中的黑人共和国起草宪法。格里特·史密斯、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西奥多·帕克和其他三位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建立了一个“秘密六人小组”，帮助布朗在新英格兰筹款。这些钱名义上用于堪萨斯，实际上是用来购买武器和给养，以帮助布朗进击南方。

支持布朗的废奴主义者确信道义上、政治上反奴隶制的行动已经失败。随着“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布坎南当选

总统和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奴隶制已经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暴力的反击是对那些胜利的唯一回答。“秘密六人小组”虽然不清楚布朗进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了解并赞成他的总的意图。他们把布朗看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19世纪克伦威尔铁骑军*，……继承了因克伦威尔的逝世而一度中止的英格兰清教事业——社会新生事业”。

布朗计划夺取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渡口的联邦军火库，用从那里夺取的武器武装他期待加入其行列的几千名奴隶。1859年夏季，他在哈珀斯渡口对岸的马里兰州境租借了一个农场，并开始在那里集结他的由17名白人和5名新加入的黑人组成的袭击部队。布朗曾试图说服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加入他的队伍。布朗对道格拉斯说：“为了特殊的意图，我需要你，当我进攻时，成群的蜜蜂将飞离蜂巢，我想请你帮忙把它们收入蜂箱。”但道格拉斯拒绝参加，并试图劝阻布朗的鲁莽计划。他认识到，入侵弗吉尼亚并以24人的“部队”进攻联邦军火库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愚蠢行为。¹

哈珀斯渡口位于波托马克河和谢南多厄河汇合处，高山环抱，是一个军事陷阱。布朗的作战计划令人难以置信地不成熟。他未能将他的意图告诉这个地区任何一个有关的奴隶。他忽视了对哈珀斯渡口周围做地形侦查，以确定撤退路线。他没有准备给养，也没有建立一条防线，以抵御必然招致的反攻。当他在1859年10月16日夜带领18人攻占军火库时，他们甚至没带干粮。

当这个小分队夺取了毫无防备的军火库、兵工厂以及来福枪

*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领导人，英格兰将军和政治家，1653年起建立独裁统治并自立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护国主。他曾于1642年返回家乡创建一支训练有素的“铁骑军”，全部将士均由清教徒组成。在随即爆发的两次内战中，他率领“铁骑军”及后来的新模范军战胜了王党军队，并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恩格斯说他“兼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于一身”。——译者

厂，达到了初步的目标后，布朗似乎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他坐等奴隶们前来增援，但参加进来的黑人只是一小群惊慌失措的奴隶。他们是被布朗派出的巡逻队招集来的，另外还有白人人质。

这时，事件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10月17日，当地居民和附近军队被动员起来。他们占领了波托马克河与谢南多厄河上的桥梁，切断了布朗的退路，把袭击者赶出了军火库、兵工厂和来福枪厂。三个当地人(其中有一个是自由黑人)和几个布朗的人，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激战中死去或受重伤；七名袭击者逃跑(其中两人后来被抓获)；其余人被迫退到坚固的消防站。布朗和4名受伤的袭击者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抵抗。10月17—18日夜间，一支由罗伯特·E. 李上校和J. E. B. 斯图尔特海军上尉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包围了消防站。第二天清晨，布朗拒绝投降。海军陆战队采取强攻，以死一人的代价攻克了消防站。他们至少杀死了两名袭击者，打伤了布朗。

布朗解放奴隶的战争前后历时36小时即告结束。17人被打死，其中有10名袭击者。布朗及其他6名被俘的同伙最后被处绞刑。没有一个奴隶自愿参加这次暴动。布朗留在马里兰农舍里的一个手提箱装满了他同“秘密六人小组”以及其他北部同情者的通信。当这些信件被查获并公之于世后，“秘密六人小组”(除希金森仍挑衅地坚持其立场外)全都躲藏起来或逃到了加拿大。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曾到国会听证会做证人，但无一人被起诉犯有同谋罪。

从某种意义上讲，袭击哈珀斯渡口是一次不幸的悲剧性的失败。但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如果布朗的目的是鼓动一次暴力反抗以解放奴隶，也许他会取得出乎料想的成功。有迹象表明布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希望他的牺牲将使他在许多北部人的眼

中由一个狂人变成圣人，而在南部却激起了恐惧和暴怒，从而加速最后决战的到来。当弗吉尼亚州法院迅速地以谋杀、叛逆、暴动罪对他进行审判期间，布朗拒绝了一切暴力营救计划或以神经病为借口的办法，去逃脱刽子手的绞索。他对亲友们说：“对我来讲，受绞刑比其他任何事都更有意义。”²

在11月2日被判决到12月2日被绞决期间，布朗的言行赢得了无数北部人的敬佩。他以尊严的态度面对死亡。对于他，可以确切地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像他的结束那样更与他相称。他在法庭关于对自己的判决的演说结束语直接成为一篇杰作：

正如我所想像的，这个法庭也承认上帝的法律是有效的。我知道我所读的这本书是《圣经》，至少是《新约》。它教导我，如果我希望别人为我干任何事情，我也应该这样回报他们；它还进一步教导我，要记住那些被奴役的人们，对他们负有义务。我努力遵循这些训示。我说，我还太年轻，而不理解上帝是一个偏心眼的人。我相信，为了上帝的那些被藐视的人的利益，就如我坦白承认的那样，我干了我已经干的事，是正义的事，并非错误的事。现在，为使审判尽快结束，如果认为必要，我将付出我的生命，让我的鲜血，我的孩子们的鲜血和这个蓄奴制国家千百万被邪恶、凶残和不正义的法规剥夺了权利的人的鲜血流到一起，我说，就这么办吧。

12月2日，布朗镇定地走向绞刑架。他交给监狱看守一张字条：“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鲜血才能洗净这个罪恶国土的罪恶。”³

布朗在判决后的行为提高了他的声望，成了北部废奴主义者眼中的圣徒。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说，布朗将“绞刑架看作十字架一样光荣”。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把布朗的绞刑日视为“一次新革命——其重要性毫不亚于以往的革命——的纪念日”。

一些著名共和党人虽争相与布朗划清界线，但他们有些人也承认其理想是高尚的，只是手段不好。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一颗正在升起的明星约翰·安德鲁说，约翰·布朗的行为可能是鲁莽的，但是，“约翰·布朗本人是正确的”。温和派报纸《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宣称，再没有什么事件“能够比这个绞刑更引起人们在道义上对蓄奴制的敌视。这并不是因为布朗的行动得到普遍赞成，因为这些行动并不可取。而是因为他的精神和品质被承认是伟大而高尚的”。在布朗被绞死的那天，北部许多城市教堂都敲响了钟声，并鸣放礼炮。在许多祈祷会上人们都做出了要纪念这个日子的决定。这种哀悼的浪潮是罕见的，它表明反奴隶制的决心已经深深地渗透北部人的思想意识。⁴

北部人对布朗的这种同情在整个南部引起的震动，比袭击事件本身更加强烈。无论北部共和党人对布朗的行为怎样表示不赞成，无论北部保守派和民主党人怎样集会谴责布朗和所有同情他的人，南部人只看到对布朗牺牲时表现的悲痛。他们认为，布朗就是废奴主义者，废奴主义就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就是整个北部人。南部许多地区感到了恐慌。奴隶巡逻兵加强了他们的警戒。志愿民团擦净了武器，严阵以待。

布朗袭击事件发生后，分裂情绪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咄咄逼人的《查尔斯顿信使报》欢呼：“妥协的日子已经过去。”哈珀斯渡口事件甚至使“最执拗的联邦主义者确信，南部在联邦中是没有和平的”。一位前辉格党人也悲哀地附和说，这一事件“对于南部各州的老练而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来说，简直就像是进行了一场思想、感情和愿望上的彻底的革命”。⁵

北方民主党人试图利用这次袭击事件，用斯蒂芬·道格拉斯的话说，他们把这一事件看作是“共和党的学说和主义的自然的、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由于威廉·H. 西沃德是共和党提

名的总统候选人的主要竞争者，所以民主党集中火力对付他。他们指责他关于“血腥和残酷”的不可遏制的冲突的演讲，是对布朗的血腥和残酷行动的鼓励。民主党成功地使共和党陷于被动。马萨诸塞州州长亨利·威尔逊承认说：“布朗事件把我们由一个灿烂辉煌的境地抛向被动挨打的境地。……如果我们在明年的大选中败北，那全要归咎于愚蠢的不实际的布朗运动。”⁶

民主党查尔斯顿大会

但一些政治事件很快使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在北部陷于被动。南部民主党人决定把起草联邦奴隶法条款写入民主党纲领，从而否定道格拉斯的“弗里波特理论”并拒绝推举他为总统候选人。1860年1月，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在威廉·朗兹·扬西的敦促下指示其代表，假如奴隶法条款被否决，就退出全国代表大会。12年前，当同样的条款被否决时，仅仅有一位代表跟随扬西退出全国代表大会。但是这一次扬西可以指望有更多的伙伴。

4月23日，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召开时，道格拉斯似乎仍控制着多数代表，但却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二。1836年以来，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在查尔斯顿，群情激昂。北部代表在这充满敌意的土地上感到完全是外人。当政策委员会向大会提交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提案时，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起来。扬西大步走上讲台为奴隶法条款演讲时，南部党员高声欢呼。扬西说：南部必须保护它的财产，“我们的立场是要求你们让步。北部的先生们，我们南部人侵犯过你们的权利吗？……我们的制度处在危险中；我们的和平将被破坏；我们的财产将被毁灭；我们的名誉受到威胁”。道格拉斯派代表主张重申1856年关于人民主权的条款，并增补一项条款，说明

将遵守最高法院对准州议会在蓄奴制问题上的权力作出的裁决。^{*}除此之外，北部代表别无出路。奴隶法条款将给他们脸上抹黑。南部人要求他们承认扩大蓄奴制是有益的。一位俄亥俄州代表激动地辩解道：“南部的先生们，你们误解了我们，误解了我们！我们是不会那么做的！”⁷

争论几天后，对纲领进行最后表决，人民主权条款以165票对138票取得优势（自由州，154票对30票；蓄奴州，11票对108票）。共有南方8个州的49名代表按照预先的安排，跟随扬西退出了大会。他们到另一个大厅开会，通过了南部权利纲领，并观望着主要会场将采取的步骤。即使在这些南部的代表退席后，道格拉斯仍未能在剩余代表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更不用说获得大会主席所要求的总数的三分之二了。经过57轮的投票后，疲倦的代表们决定休会，待6个星期后再于巴尔的摩复会。

民主党的领袖们希望大会的拖延能使情绪冷静下来，并为通过条款进行明智协商。但喜气洋洋的南部人固执己见，拒绝和解。他们有些人认为，脱离民主党就是脱离联邦的第一步。在南部人退出大会的当天夜里，激动的人群聚集在查尔斯顿法院前聆听扬西的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结束演讲时大声说：“或许现在，历史学家的笔正在写着一次新的革命的历史。”庞大的人群“为独立的南部共和国三次欢呼”。⁸

正当沮丧的北部民主党人从查尔斯顿返回的时候，从前傲慢的辉格党的残余于5月9日在巴尔的摩召开大会，组成了“立宪联邦党”。它事实上是1856年美国入党抛弃了本土主义后的复活。立宪联邦党人的实力集中在上南部地区。该党采取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纲领，表示支持“国家宪法，各州联盟，法律实施。”它提名田纳西

^{*} 由于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中，关于准州议会对蓄奴制的权力问题没有被提交法院裁决，所以塔尼就此问题的声明始终只是一个附带意见。

州的约翰·贝尔为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埃弗雷特为副总统候选人。这些人没有机会获胜，他们顶多通过掌握足够的选票在国会的选举中阻止共和党的胜利。

共和党提名林肯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满怀信心地于5月16日在芝加哥召开。一切都决定于他们的候选人。共和党确信，不论他们提名谁做候选人，都将获得至少五六个北部州，但得不到任何南部州的支持。要取得多数选票，他们还必须赢得宾夕法尼亚再加上伊利诺伊或印第安纳州的支持——这三个州在1856年大选时全都倾向民主党。这样便排除了萨蒙·P·蔡斯。这三个州认为他太激进了。来自密苏里的爱德华·贝茨希望似乎大一些。他是个圆滑的前辉格党人。骑士风度的霍勒斯·格里利支持他仅仅是由于他能获得下北部地区的选票。但是，爱德华·贝茨曾在1856年支持过美国入党，这将妨碍他得到德裔美国人的票数。贝茨对自由土壤党的冷漠态度也背离了党的反蓄奴制的思想原则。宾夕法尼亚的西蒙·卡梅伦有把握得到他本州的支持，但仅此而已。其诚实多少有些令人怀疑，卡梅伦曾经是民主党人，后又是辉格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

最重要的候选人是受到上北部大多数代表支持的西沃德。但他有两个不利条件。首先是他长期的政治生涯。他作为州长和参议员，树敌很多，其中就有在他自己的纽约辖区内与他作对的格里利。其次，西沃德曾反对“1850年妥协案”，他当时的“高等法律”演说以及1858年关于“不可约束的冲突”的演说，都使他以激进派而闻名。来自下北部的共和党领袖们担心西沃德不能赢得他们那些州的支持。

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强了亚伯拉罕·林肯作为候选人的地位。林肯最初只获得伊利诺伊州代表的支持。但他的竞选主持人巧妙地又为他拉到了一些地区的选票；特别重要的是，在第二轮投票中还获得了一些主要州的选票。林肯具有各种赢得信任的条件。他在以前辉格党人为多数的共和党中是个前辉格党人。他谴责蓄奴制是道德败坏，但不同意采用过激的行动来反对它。他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曾在与道格拉斯的竞选中获得了很高声望，但他没有长期从政，所以没有树敌过多。他反对本土主义，但不像西沃德那样明显地使自己脱离本土主义选民。他出身卑微，他的“诚实的亚伯”和劈木人的形象，都是他的政治资本。

与1856年相比，1860年的共和党竞选纲领显得不那么激进。1860年修改了关于多妻制和奴隶制是“野蛮时期的孪生遗物”的提法；谴责布朗的袭击是“最大的罪恶”；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缓和关于在各准州排斥蓄奴制问题的语调，并肯定“各州有权制定和管理自己的内部体制”。为改变党的本土主义形象，竞选纲领反对“在国籍法方面做任何修改”，因为那将“剥夺或损害”移民的权利。1860年纲领比以往的纲领更加关注地区集团的经济利益：它包括一项宾夕法尼亚保护性关税的条款；为吸引中西部选民，它主张制定宅地法；它还要求为河流和港口拨款，并要求政府资助建造横跨大陆的铁路。这个纲领兼容了辉格党和自由土壤党的主张，温和但坚定地表达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思想。正如它自诩的那样，它是美国历史上最简明和具体的纲领——一个大幅度吸引北部选票的最成功的纲领。

候选人与纲领要相得益彰。5月17—18日夜，来自北部地区的代表们通宵达旦地紧急磋商，试图一致推出一位足以阻止西沃德的候选人。林肯的那些竞选主持人不知疲倦地到处活动，说只有他们的候选人才能赢得整个北部。他们向印第安纳州的凯莱布·

史密斯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蒙·卡梅伦许下了内阁职位。林肯曾指示其竞选代理人“不要做任何将使我受到约束的承诺”，但其主要代理人则讲，“林肯不在这里，不知道我们同谁会晤。所以，我们就继续干下去，就好像我们未曾听到他的指示，而他则不得不认可”。⁹

在第一轮投票中，林肯获得102票，西沃德获得173.5票（须达233票才能被提名）。西沃德获上北部132票，而林肯只有19票。在从新泽西到衣阿华那关键的六个州，林肯获得62张选票，而西沃德只有3.5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宾夕法尼亚和新英格兰一些州的代表转向了林肯，使他获得了181票，与西沃德的184票半对峙。在第三轮投票中，更多的选票转向了林肯。他共获231.5票，仅差1.5票就可得到提名。俄亥俄州代表突然起来宣布，他们的4票改投给林肯，于是整个大厅陷入了戏剧般的沉寂。芝加哥宠儿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全州沉浸在喜庆的欢乐中。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是缅因州国会议员，前民主党人汉尼巴尔·哈姆林。

民主党一分为二

查尔斯顿大会失败后，民主党两翼都在为6月18日巴尔的摩的新大会做准备。多数脱党分子希望参加大会，并联合北部执政的民主党人再次击败道格拉斯。但道格拉斯派民主党人在一些南部州组织了自己的代表团。大会就重新接纳南部脱党分子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大会接纳了一部分，但拒绝大多数对抗已选定道格拉斯派候选人的州的代表，从而导致南部人第二次退出大会。这次退出的共有110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离开大会去召开了自已的“南部权利”大会。脱党分子依据蓄奴法纲领提名肯塔基州的约翰·C. 布雷肯里奇（布坎南的副总

统)为总统候选人,而忠于北部的那派仍提名道格拉斯。全国上下都迅速地为四个党竞选做好了准备,每个党都意识到这次竞选是它们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

竞选运动

斗争很快变成了不同地区的两党竞选:在北部是林肯对道格拉斯,在南部是布雷肯里奇对贝尔(立宪联邦党候选人)。共和党人连一票也不指望从南方10个州获得;而道格拉斯也同样没有希望从那10个州得到支持。北部大多数老辉格党和美国人党的选民都转向了共和党。布雷肯里奇只有代表布坎南政府时才得到北部民主党主要成员的支持,而作为南部权利派就别再指望获得北部选票。很明显,击败林肯的唯一办法就是三个反对党的联合,这样他们就可能赢得整个南部,以及三、四个重要的北部州。

但这一联合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民主党令人痛心的分裂几乎是难以得到谅解或被忘却。一大批狂暴分子分明是在努力破坏党的统一,以保证选出一位“黑人共和党总统”,于是乃激发南方的分裂情绪。即使在那些抱怨分裂的南部民主党人中间,鸿沟也太深而无法逾越。南部达成的唯一联合是得克萨斯州的贝尔一道格拉斯派,他们共获得24%的选票去反对布雷肯里奇。一些政党领袖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纽约、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和新泽西州拼凑起了选票联盟。但这已无济于事,因为林肯已经在前三个州赢得了多数去抵抗反对派的联合,并在新泽西得到了半数以上的选票。

看来林肯将获得几乎全部的自由州的选票,这使保守派产生一种沮丧的和宿命论的情绪。与此同时,一种群众性的歇斯底里风浪,就像1789年夏季在法国农村发生的那种“大恐慌”,席卷了整

个南部。约翰·布朗的阴魂已经笼罩着南部人的思想。共和党总统一旦当选，就会使南方人担心北部废奴主义者将派出几十名约翰·布朗。每一个陌生人都成了废奴主义者的代理人；每一位带有神秘面孔的黑人都成了潜在的纳特·特纳。南方报纸报道说，成百个纵火、投毒、谋杀事件都被认为是奴隶们干的。一些犯有暴动嫌疑的黑人和白人被私刑处死；很多人遭受鞭挞，或浑身涂满柏油，再沾上羽毛。成百名北部白人被勒令离开，违者处死。那年夏季南部发生的严重干旱加重了这种歇斯底里气氛。

支持贝尔或道格拉斯的南方报纸认为，布雷肯里奇的宣传工具是存心制造暴动恐慌，来为他们的候选人争取选票。一家报纸说，那些恐慌故事“据查，才发现都是编造出来的，而且它们全部都是夸大其词的”。¹⁰ 现代历史学家们同意这种判断。但无论是真是假，这些故事造成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气氛，使南部的革命迫在眉睫。1860年，下南部地区几乎每一位发言人都不止一次地警告说，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他们就将脱离联邦。就连贝尔和道格拉斯的宣传工具也发出类似的警告。佐治亚州立宪联邦党领袖本杰明·H. 希尔说：“这个政府不能与黑人共和党并存共处。”亚特兰大一份道格拉斯派报纸宣称：“不管后果如何，即使波托马克河水被鲜血染成红色，即使宾夕法尼亚的街道铺满10英寻*厚的碎尸，……南方也决不会接受让亚伯拉罕·林肯就任总统这样的屈辱和难堪。”¹¹

共和党人并不认真对待这些警告。他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些警告是为了吓唬北部选民不投共和党的票。南部人早在1850年就曾以分裂相威胁，后来在1856年总统竞选中，在1859年对众议院议长席位的争夺中，以及在其它一些场合都曾提出这种威胁。一位共

* 英寻：测量深度的长度单位，合6英尺，或1.829米。——译者

和党人、芝加哥市市长断言：这些最新警告仍然属于“那套恐吓、裹挟北部屈服于南部的主张和暴政的老把戏”。¹² 德裔美国人领袖卡尔·舒尔茨回忆说，当初彭宁顿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时，南部议员们都跑了出去，但他们喝了杯酒，又返回来；等林肯当选以后，他们将喝两杯酒，然后依旧返回来。

林肯也不相信“会发生任何瓦解联邦的尝试”。竞选期间，他注意按照惯例保持总统候选人的缄默不语。当选举日临近时，他拒绝了保守派朋友们要他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以使南部平静下来的请求。“我的话怎样才能使恐慌平静呢？”林肯问道，“是打算不要政府干预各州内的奴隶或蓄奴制吗？这一点我早已反复讲过，再要重复就会成为笑柄，就显得怯懦，胆小……[并且是]鼓励鲁莽的坏人相信他们是在和一个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打交道。”¹³

当然，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南部关于脱离联邦的威胁并不是讹诈。然而，除了否定他们曾坚持的一切主张外，看不出共和党人在大选前还能为此做些什么。亚特兰大一家支持道格拉斯的报纸宣称，“我们认为，任何人……凡不敢宣布他……相信奴役非洲人的蓄奴制为社会、道德和政治的幸事者都是南部制度的敌人。”¹⁴ 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无论怎样试图表示和解，都无法使南部人听信，除非他们表示笃信蓄奴制。

南部认为关键问题是共和党对蓄奴制的威胁，而北部民主党为迎合时尚则把种族主义作为旗帜。民主党的漫画和横幅标语宣扬“黑人共和党”的胜利将使北部变成一所“黑鬼平等”的疯人院，种族混合，全是令人作呕的模样。漫画表现一些黑人正在吻一些白人妇女，而林肯和霍勒斯·格里利却亲切地看着这一切。这种宣传在纽约州尤其盛行，那儿的共和党议会正在组织对一项宪法修正案的投票，该修正案旨在取消对黑人选民的250美元财产限制的歧视性条款。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容易受到攻击，共和党发言

人和报纸大多对此修正案采取回避或冷淡态度。林肯在纽约州获得了54%的选票，而该修正案却只得到37%的赞成票。尽管纽约州北部反奴隶制各县一致拥护这项修正案，但全州共和党人只有三分之二投了赞成票。

共和党人在上北部地区把精力集中于蓄奴制问题，而在下北部则强调经济问题；中西部地区的宅地条款，宾夕法尼亚的关税条款，以及有关这些地区的河道、港口和横跨大陆铁路等条款，这些地区将因这些措施而受益。林肯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举行的一次共和党集会，在27条横幅标语中只有两条涉及蓄奴制问题。宾夕法尼亚一位民主党人抱怨说：“共和党人，在他们的讲演中，关于黑鬼问题什么都没有说，全都转向了关税问题。”¹⁵事实上，民主党人已经轻易地把这些问题交给了共和党人。在1859年—1860年国会期间，民主党人曾投票否决横跨大陆铁路法案、河道与港口法案，以及提高1857年低关税标准法案。布坎南总统否决了宅地法。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向北部选民明确地表明，南部及其“不反对蓄奴制的北部走狗”正在阻挠那些对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的措施。

1860年共和党人同废奴主义者的关系是复杂的。许多废奴主义者指责共和党是——用加里森的话说——“一个随波逐流、左右逢迎的怯懦的党”，因为它更致力于限制而不是消灭奴隶制。共和党的自我表现说明，它是一个真正的“白种人的党”，因为他们试图把准州留给白人自由劳工，这也使废奴主义者恼火。林肯的声明也是这样说的，它反对干涉各州奴隶制，反对消灭州际奴隶贸易，反对废除逃亡奴隶法。在多数地区，共和党人不敢接近废奴主义者，因为同这些“狂热分子”的联合将失去选民。

但在上北部一些地区，尤其是新英格兰，共和党同废奴主义者的关系是密切的。共和党马萨诸塞州长竞选人约翰·安德鲁和密

歇根州长竞选人奥斯汀·布莱尔都是十足的废奴主义者。许多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佛蒙特州的全体共和党人事实上也都是废奴主义者。一些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也都为林肯竞选。大多数加里森分子私下里都认为，尽管共和党有缺点，但“林肯的当选将标志着朝正确方向的发展”。“激进废奴党”，即原自由党的一小部分残余，于1860年召开会议，并提名赫里特·史密斯为总统候选人。但这个“第五党”的提名，几乎也就等于是做个姿态，史密斯所获选票是微不足道的。政治废奴主义者大都参加了共和党，他们构成了共和党的一个激进的基层组织，使这个党在上北部地区增添了革新的战斗的调子。¹⁶

竞选运动在北部也同南部一样充满激情。南部恐惧盛行，而共和党人却在北部唤起人们的热忱。横幅标语、游行、群众集会和歌曲使这次竞选运动比1840年竞选时的小木屋和烈性苹果酒更富有特色。“把木料截成横木的候选人”林肯是自由劳动者的象征，具有非凡的魅力。在“共和党广泛觉醒”横幅下的庞大游行队伍，高唱政治歌曲，手持火炬，跨越围栏的横木。（一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扛起旧式步枪，并高唱《约翰·布朗的尸体》歌曲行进在队列中）。

道格拉斯一反惯例，亲自到全国各地从事竞选活动。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赢得胜利的希望很小。但他认真对待南部脱离联邦的威胁并努力勇敢地面对它们。他在演讲中意味深长地呼吁全体美国人民应该团结在联邦周围。道格拉斯不顾疾病和劳累，坚持着艰难的步伐。就许多方面讲，这是他最出色的时候——尽管爱动脑子的观察家们指出，现在全国刮起的旋风正是6年前道格拉斯本人在堪萨斯惹起的。

道格拉斯在衣阿华从事竞选活动时获悉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等州10月份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道格拉

斯说：“林肯先生是下届总统，我们必须争取拯救联邦，我得到南部去。”他冒着很大的人身危险到下南部地区从事竞选活动，每一次停留都谴责分裂。选举日那天，他在莫比尔。看到亚拉巴马州人对林肯的胜利的反应后，他返回旅馆，他的秘书说：“从未见过他如此绝望。”¹⁷

结 果

从民主党的角度看，结果的确令人失望。林肯赢得了除新泽西外全部自由州的选举人票（在新泽西，他获4票，道格拉斯获3票），和北部54%的普选票，在北部各州，（除加利福尼亚、俄勒冈、新泽西三州外）获得了超过其联合对手的绝对多数。这样，即使他的对手全都联合起来，他在全国也能得到多数选举人票，正如下表所示。林肯没有获得蓄奴州的选举人票，也几乎没有获得边境各州除一些县镇以外的普选票。道格拉斯在北部位居第二，但他仅仅赢得了密苏里州以及新泽西的那三张选举人票。贝尔获得弗吉尼亚、肯塔基和他的故土田纳西州的选举人票。南方其余各州的选举人票则归于布雷肯里奇。

1860年竞选获票统计

	自由州 (18)		蓄奴州 (15)		总 计	
	普 选 票	选举人票	普 选 票	选举人票	普 选 票	选举人票
林 肯	1 838 347	180	25 388	0	1 864 735	180
富 森	580 426	—	15 420	—	595 846	—
道 格 拉 斯	815 857	3	163 568	9	979 425	12
布雷肯里奇	99 381	0	570 091	72	669 472	72
贝 尔	76 973	0	499 441	39	576 414	39
(反林肯)总计	1 572 637	3	1 248 520	120	2 821 157	123

在上北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北部、密歇根、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州北部，加上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衣阿华等州的新英格兰人各县，林肯获得了多于60%的选票。在其余的自由州地区他只赢得了50%的选票。因此，是北部坚决反对蓄奴制的势力赢得了这次大选，并在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中占有支配地位。这一事实并非没有被南部人察觉。

直到1856年还没有一个大党鲜明地表示反对蓄奴制。仅仅4年之后，北方州就选出了一位主张最终废除这一制度的总统。新奥尔良一家报纸认为，这是“极大的凶兆。除各种问题和疑问之外，它表明绝大多数北部人以单纯南北地区性的仇恨看待我们南部。”《里士满观察家》直率地说：“关于北部保守主义无效地要求详细检查选票的空谈现在也许被驳回。一个以憎恨奴役非洲人的蓄奴制为唯一思想感情基础的党，现在已是统治力量……不落入联邦这个陷阱，就能够改变[这些]或削弱它的力量。”¹⁸

反蓄奴制的人们对林肯当选的反应，似乎证实了南部人的恐惧。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尖锐地批评共和党的缺点。但在选举后第二天，菲利普斯在波士顿对庆祝的人群说：“有史以来，由奴隶选择美国总统还是第一次（欢呼声）。我们已经采取断然行动了。”道格拉斯说，蓄奴制势力统治国家的日子不长了，“林肯的当选挫伤了他们的威信，打破了他们的统治。这表明了这样的可能性，就是选出的总统即使不是废奴主义者，至少也是有反蓄奴制名声的人”。作为总统的孙子和儿子，自由土壤党和曼彻斯特共和党的创始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宣称，随着林肯的当选，“一场伟大的革命确实发生了……这个国家已永远抛弃了奴隶主的统治”。¹⁹

作为对北部这场革命的回答，南部发动了脱离联邦的反革命。

第九章 脱离联邦与即将 来临的战争

下南部诸州脱离联邦

当电波传出林肯当选的消息后，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就召开了会议，宣布退出联邦。在以后的6周内，其余6个下南部州的议会也召开了会议。经过短暂而紧张的选举，选民们选出了他们的代表。每个州议会脱离联邦的法令都以悬殊的（大都以压倒的多数）票数获得通过。^{*} 到1861年2月9日为止，亦即林肯当选后三个月，这些脱离联邦的各州代表们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部美利坚诸州联盟临时宪法，并选举了杰斐逊·戴维斯为临时总统。顺便作个对比，第二次大陆会议用了14个月的时间才通过了“独立宣言”，而从1786年召集第一次会议到起草合众国宪法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法国国民议会开了两年会才颁布了1791年的新宪法。

尽管脱离联邦运动在下南部地区进展得异常迅速，但团结的

^{*} 各州脱离联邦法令通过的日期与表决结果：南卡罗来纳州：12月20日，169：0；密西西比州：1月9日，85：15；佛罗里达州：1月10日，62：7；亚拉巴马州：1月11日，61：39；佐治亚州：1月19日，208：89；路易斯安那州：1月26日，113：17；得克萨斯州：2月1日，166：8。

这7次会议表决的平均比例数为：赞成脱离联邦的占83%，反对脱离联邦的占17%。在其中5个州的会议上曾预先就是否延缓单独退出联邦，以待整个南部统一行动的提案进行了表决，结果都被否决了，但差数不大，赞成延缓的平均比例数为40%，反对的为60%。这就从某种形式上表明了这7个州的大多数代表是赞成脱离联邦的。

表面现象却掩盖了内部的分歧。到1860年12月为止，就已出现了三种基本观点：头一种也是最激进的一种观点是“立即脱离联邦”。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每个州单独就可脱离联邦，不必等待整个南部采取集体行动。这些立即脱离主义者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那些拥有奴隶最多的县，这些县在1860年时支持布雷肯里奇。但是，许多不占有奴隶的民主党人和占有奴隶的辉格党人由于预见到共和党对白人特权和奴隶制的威胁，也被卷进了立即脱离派阵营。第二种观点主张“合作”，它的支持者们主张，要等到整个南部对林肯当选作出有系统的集体回答后再行动。这些合作论者主要得到拥有较少奴隶的山区县和支持贝尔或道格拉斯当选总统的地区的支持。第三种观点是彻底反对脱离联邦，这些“无条件联邦主义者”大多数居住在边境州，只有极少数来自下南部地区。

除了脱离主义观点占主导地位的南卡罗来纳，合作论者投票人数占下南部投票人总数的40%。这使许多北部人过高地估计了南部联邦主义的力量。他们没有认识到合作论和联邦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合作论者又分成三个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派别，他们分别称为“合作论脱离主义者”，“最后通牒主义者”和“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所有这三个派别都承认脱离联邦的权利，只是在方式和时间的选择上存在着分歧而已。人们经常对此产生模糊认识。《新奥尔良新月报》在1861年1月5日抱怨说：“在新奥尔良无人知道‘合作’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人将它理解成‘延缓’，一些人理解成‘与其它州商议’，一些人理解成‘顺从’。”实质上，合作论脱离主义者希望南部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深信，各州分别退出联邦将会使力量分散和削弱。最后通牒主义者希望南部各州在向共和党人发出最后通牒方面达成协议，迫使共和党人作出让步。如果他们拒绝了，那么南部就退出联邦。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则极力主张南部暂缓行动，以便给继任的林肯政府一个表明其

和平诚意的机会。他们说，只有北部采取了侵犯南部权利的“公开行动”时，南部才应采取脱离联邦的极端行动。

在合作论者当中，只有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还对维持联邦的统一抱着较大希望，但他们只集中在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其它州的合作论者坚信，他们捍卫南部利益的热忱决不亚于那些立即脱离主义者。亚拉巴马州的合作论者坚决表示说：“我们决不同投降派搞联合。我们藐视黑人共和党的统治……。我们要反抗……。但是我们的反抗是基于和其它蓄奴州共同协商并采取一致行动的反抗。”¹最后通牒主义者要求共和党人所作出的让步乃是让其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们要求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准州的联邦奴隶法规，要求保证不对州际之间的奴隶买卖进行干涉，废除北部各州的人身自由法，补偿由于北部未实施“逃亡奴隶法”而使南部奴隶主蒙受的财产损失，此外，他们还要求北部作出其他类似的让步。

共和党发言人很快就鲜明地表示该党拒绝作出让步的立场。这使合作论者一下子后退到防守的地位。到1861年1月，下南部各州单独退出联邦已势不可挡。当一些州退出后，它们马上就派遣特使去参加将要召开的会议。这些特使在会上发表激烈的演说，敦促尚未退出联邦的其他州加入那些已经脱离联邦的队伍中去。群众集会的抨击和报界的大肆宣传增加了压力，从而使合作论者陷于瓦解。连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也见风使舵了，他们唯恐这样干下去会被当作南部的叛徒。最杰出的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被选为南部邦联的副总统。

脱离联邦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许多南方人士称脱离联邦行动是一场1776年模式的革命。林

肯当选的消息传来后,《查尔斯顿信使报》声称:“茶叶已经倒入海中,1860年的革命开始了。”原路易斯安那州道格拉斯派民主党领导人皮埃尔·索尔也在总统选举后说:“如果要在耻辱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就选择革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朱达·P.本杰明把这种“正在席卷一切的狂涛般的激情”说成是“一场革命”,“一场最激烈的革命,如同园丁的水壶扑不灭燎原大火一样,这场革命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²

本杰明对这场席卷南部的狂潮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一些群众集会上,人们常对号召南部独立的演讲人报以暴风雨般的欢呼。脱离联邦的号召就像是一个导火线,使一年前约翰·布朗起义以来所形成的使人们近乎歇斯底里的紧张局势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一位南部人这样写道:“人们的情绪如此高涨,这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弗吉尼亚保守分子哀叹道:“一些人寻求变革的欲望和许多人寻求刺激的贪心使人们丧失了理智,变得为所欲为了。”³

许多脱离主义者希望他们的这场革命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然而援引《查尔斯顿新月报》编辑罗伯特·巴恩韦尔的话说就是,他要吃所有那些因为搞分裂而被处死的人的肉;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切斯纳特据说曾扬言要饮为这个事业所洒的血。一家佐治亚州报纸宣称:“如果打内战的话,我们一定在亚特兰大奉陪。”⁴

尽管脱离主义者希望和平,但他们知道大多数革命的胜利只能靠暴力取得。所有正在脱离联邦的州都加强了民兵建设,并抓紧组织新的志愿兵连队,这些人称自己是后备民兵。这些南方州一边宣布退出联邦,一边攻占联邦的军火库和要塞,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自己的民兵。临时邦联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征召一支十万人的军队。

虽然许多邦联人士把自己脱离联邦的行动比作1776年模式的革命,但是脱离联邦这个字眼,顾名思义,并非是一场革命。反对一个合法政府的武装叛乱无疑是非法的,但是大多数脱离主义者却坚持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并不违反宪法。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路易斯·T. 威格福尔说:“假如我相信脱离联邦的行动是一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与我发誓要遵守的合众国宪法直接发生冲突的话,我就不会赞成脱离联邦了。”⁵ 然而他确实是拥护脱离联邦的主张,像大多数南部人一样,他相信宪法中的“契约”理论。这个理论是由来已久的,可以追溯到1798年的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两个州立法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出,合众国宪法是州与州之间的一个契约,在行使某种统治权方面各州仅赋予联邦政府以代理人的权力,而从未赋予其统治权。各州既然有权召集立法会议,那么它就可以退出这种契约,并且以另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充分行使统治权。脱离联邦的几个州在1861年间就是这样干的。

当然,许多邦联人士既相信脱离联邦的法律权利,又相信其革命权利。一位南部理论家说道:“一个州脱离联邦的权利与人民要革命的权利之间并不矛盾,一个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另一个是上帝赐与的天赋人权。”⁶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像邦联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所考虑的,较少强调革命的权利,而着重强调脱离联邦的合法权利。他们坚持认为,脱离联邦行动的合法性超过了革命性,其用意在于使邦联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另外,还有一些人担心过头的革命宣传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自由”与“权利”这两个词对奴隶和对奴隶主来说含义毕竟大不相同。尽管正在脱离联邦的几个州援引了《独立宣言》中关于旧政权之消亡与新政权之诞生的一段正义言辞,但却不敢提及其中关于确认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这一段。

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人也不失时机地指出了保卫蓄奴制的这场革命的不协调性——的确不符合逻辑。一位废奴主义编辑撰文说,脱离联邦运动是“有史以来最离奇古怪的革命”,“一场使非正义行为更有保障、暴政更加巩固的革命!”《纽约论坛报》将共和党人的观点作了最好的总结,它说:“杰斐逊先生起草的《独立宣言》是为了捍卫天赋人权而反对现存的制度;而杰斐逊·戴维斯先生加以可笑地丑化,是为了一种非正义的、过时的和腐败的制度的利益而去反对人们在思想上对天赋人权的领悟。因此,那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反革命——一场代表黑暗、专制和压迫的叛乱。”⁷

面临着这样的挑战,邦联领导人回答说,他们的确在捍卫现存的制度。杰斐逊·戴维斯说,“我们的行动不是一次革命,我们并不是为了人权在进行一次堂吉诃德式的斗争,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捍卫财产继承权”,特别是奴隶财产的继承权。南部最著名的记者J. B. D. 德鲍强调说:“我们不是革命者,我们正在抵制革命。我们拥护联邦宪法的真正原则。我们是保守派。”1861年3月21日,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声称,“目前这场革命”是一场“依照我们的文明形式来维持黑人的适当地位的革命”。《独立宣言》中所确认的平等是错误的。他还说:“我们的新政府是基于相反的思想而成立的;它是根据如下的伟大真理而建立的:那就是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占有奴隶——使之成为优等种族的附属品——是白人自然而正常的情况。我们的新政府是世界史上第一个以这种自然的、富有哲理的和符合道德规范的真理为基础的政府。”⁸

在脱离联邦的危机中,南部人从数以百计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和报刊社论中摘引一些言论,企图证实只有共和党人才是革命分子,而不是他们。南部人说,共和党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拥戴的人就是西沃德和林肯,这两个人是他们的领袖。如果说谁能代表共和党人的意愿的话,那么就是他们。西沃德在他的题为《不可抑

制的冲突》的演讲中，已经预料到自由劳动思想将最终取得胜利。他在1858年曾讲过：“我知道，你也知道，一场革命已经开始。我懂得，全世界都懂得，革命决不会倒退。”林肯在他的“家不和”演说中宣称，“奴隶制正走向最后的灭亡，这是民心所向”，⁹ 共和党人就是要顺应民心。

南部所惧怕的就是蓄奴制的灭亡，不管它在最终发生还是眼下。不论共和党人表现的姿态多么温和，也不论他们许下多少次诺言，说这些州的蓄奴制在他们的统治下将受到保护，但他们的要摧毁这个制度的决心是无可置疑的。《新奥尔良三角洲报》警告说，任何人都“不可上当受骗，相信黑人共和党是温和保守的，而非激进的和进步的党。事实上，它从根本上是一个革命党”。¹⁰

脱离主义者对共和党的未来行动方案作出了可怕的想像：即取缔这些准州的蓄奴制，从而产生许多新的自由州，因此南部在国会中将处于被压倒的境地，并且被自由州所包围；林肯将向最高法院派去共和党的法官，从而把作为保护南部的堡垒的最高法院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国会将废除“逃亡奴隶法”，奴隶们将成千上万地逃往北部；国会将不惜动用一切联邦财产，如要塞、军火库、海军造船厂与海关，去消灭华盛顿特区的蓄奴制；林肯将利用总统身份，从边境州开始，在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党，这并将使不占有奴隶的白人“赫尔珀化”^{*}；最可怕的是，当新的约翰·布朗们率领造反大军开进南方时，政府将袖手旁观。一位南卡罗来纳人听说了林肯当选的消息后说：“既然激进的黑人共和党人大权在握，我看他们会使我们全成为约翰·布朗。”另一位附和道：“我们的州即刻就会处在一场革命中。”¹¹

许多南方人不仅害怕黑人共和主义，而且害怕“红色”共和主

* 参阅欣顿·罗恩·赫尔珀：《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见本书第153—154页。

义。他们对自己稳定、保守的社会秩序感到自豪,而把共和党看作一个包罗所有“主义”的政治团体,而且这些“主义”已使北部社会遭到磨难。一位南卡罗来纳的教士说道:“卷入这场冲突的党派不仅仅是废奴主义者和奴隶主,他们一方面是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红色共和党人、激进分子,另一方面是社会秩序和有限自由的支持者。”一位里士满的编辑写道,共和党对宅地法的支持证明该党受到了“平均地权论”革命原则的影响。一位佐治亚州人解释说,脱离联邦这场“政治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必然与共和党的统治一起到来的“社会革命。”¹²

南方的政治技能和它在民主党内的统治地位使蓄奴州在政府中拥有过高的权力。在1789年至1861年期间,美国众议院的36名议长中就有24名,参议院的36名临时主席中就有25名是南部人。在最高法院的35名法官中就有20名来自蓄奴州;而且从1789年以来,南部一直在法院中占有多数。在72年中就有49年是南部人而且是奴隶主担任美国总统。在另外的12年中,包括19世纪50年代那关键的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由北部民主党人中“同情南部蓄奴制的北部人”任总统。林肯的当选预示着所有这一切的结束。它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未来将由北部的思想意识和体制来统治。这对旧南部来说,意味着一场灾难。因此,它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独立运动,为的是逃避这可怕的后果。一位脱离主义者承认:“这是在绝望中采取的手段,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处在绝望的时刻。不仅我们的财产,还有我们的荣誉、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一切都牵连在内。”¹³

北部对脱离联邦的反应

正当下南部地区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时,北部还处于摇摆

与混乱中。即将下台的官员的通病削弱了政府采取行动的意志。布坎南与当时的国会虽大权在握，但却没有应急的措施。11月选出的总统和国会要等到翌年3月4日才就职，到那时，邦联将成既成事实。即使共和党人在冬季掌管了政权，他们也阻挡不住脱离联邦的洪流，因为他们对此还没有明确的对策。

总统选举后的几周内，大多数共和党人主张“缓进待机”的“费边政策”。他们稳坐钓鱼台，既不鼓励脱离联邦分子，也不削弱南部联邦主义者。林肯和西沃德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们希望这股脱离联邦热任其自流，而不会有一两个以上的州退出联邦。尔后，南部会再度恢复理智和忠诚，“犯错误的姊妹”会回到联邦来的。当然，这是对南部形势的错误估计，这一点很快就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实了。

布坎南总统与这场危机

当此之际，布坎南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局势。他处境困难。他相信由于林肯的当选而引起的这场危机是林肯的责任。但布坎南的任期还有将近4个月，在此期间他还要负宪法的责任。他希望他无论如何能使政府的正常工作维持下去，在他3月4日卸任之前一直保持太平无事。然而他受到了来自他们党内南北两派斗争压力的冲击。他身边的大部分顾问都是南部人：财政部长豪厄尔·科布是佐治亚州人，内政部长雅各布·汤普森是密西西比州人，这些人都是脱离联邦主义者，都在华盛顿静待他们的州脱离联邦；陆军部长约翰·弗洛伊德是弗吉尼亚人，他被指责犯有渎职罪并被怀疑犯有向南部军火库运送军火的叛国罪，他也将很快宣布赞成脱离联邦。

尽管他的政府倾向南部，布坎南仍不同意分裂联邦。他在12月3日提交国会的近乎公开的年度咨文中，称脱离联邦为非法行

动。这位总统说，联邦不“仅仅是各州自愿联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还是一个主权国家，“任何一个契约成员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废除它。”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未“犯过让这个国家自行解体这样荒唐的错误。”因此“脱离联邦是不折不扣的变革”。所有的民族都有权进行反对残酷压迫的变革，但是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总统选举则不能“证明推翻这部宪法的变革是正确的”。联邦“是用我们先辈的鲜血凝成的，它象征着过去的光荣，寄托着未来的希望”。如果它由于某个州自己的意愿而被破坏，那么1776年实行共和自治的伟大实践就会前功尽弃。“我们80多年来在世人面前所树立起来的榜样不仅会完全丧失，而且还会被当作人民不适于自治的确凿证据。”¹⁴

大多数共和党人和北部民主党人都称赞总统的这段咨文。它表达了民族主义的精髓，以后北部为此整整战斗了4年。但是布坎南的下一个观点却和他这段美妙动听的联邦主义的言辞相矛盾，总统说，虽然政府必须继续在各个州“实施法律”，它却不能“强迫”一个脱离联邦的州回到联邦里来。共和党人嘲讽了这种所谓实施与强迫间的区别。西沃德嘲笑道，总统已经说明“任何一个州都无权退出联邦，除非它想要退出”，“总统有责任实施法律，除非有人反对他这样做”。¹⁵

怎样才算构成“强迫”只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少数共和党人积极主张诉诸武力，如果需要镇压这次叛乱的话。这样做毫无疑问即为强迫。在1860年12月期间，大多数共和党人还不想用这种手段，但他们确曾认为政府应该保卫它在南部的要塞及其它财产，应该收缴关税，并同正常情况下一样行使政府的其它职能。如果南部诸州加以反抗的话，他们将对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当然，对脱离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政策就是强迫。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威格福尔说：“如果合众国总统派海军舰队去利物浦，并企图在那里实施合

众国法律、征缴税收,而我们对它的旗舰开炮的话,难道有人会说英国政府应对这场随之而来的流血战争负责吗?”¹⁶

布坎南在他的咨文中谴责了共和党人和废奴主义者造成了这场危机。“蓄奴制问题接连不断的大肆宣传”启发了奴隶们“对自由的朦胧认识”,在南部造成了一种恐惧气氛。如果北部不停止批评奴隶制和不保证实施“逃亡奴隶法”,联邦的分裂将不可避免,而且南部将“被证明对政府进行革命的反抗是正当的”。为了平息南方振振有辞的牢骚,布坎南提出了一个宪法修正草案。草案中提出要维护各准州的奴隶制,废除北部各州的人身自由法。总统还提出购买古巴,使联邦增加一个新蓄奴州,以此作为妥善措施,帮助南部消除不满情绪。¹⁷

妥协方案

布坎南的提议与12月间提交国会的数十种妥协方案大同小异。为了研究这些妥协案,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成立了一个33人(每个州出一名)和一个13人的特别委员会。几乎所有的妥协案都具有两个共同点:北部应作出一切让步,共和党人须放弃其在各准州禁止蓄奴制的主张——该党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成立的。对于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一家共和党报纸在一篇有代表性的社论中指出,我党“决不将近来取得的胜利成果拱手相送。如果大多数人的意志不再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力量,那么,自由政府也就不存在了。”¹⁸

许多废奴主义者宁肯分离,也不愿用“妥协”作为可耻的贿赂去换得南部的忠心。加里森废奴主义者早就把宪法斥之为“与死亡订立的契约”,把联邦斥之为“与地狱达成的协议”。他们敦促那些自由州从罪孽深重的拥有奴隶的联邦内解脱出来。既然蓄奴州已经得到了解脱,加里森废奴主义者欢迎他们离开。他们深信脱

离联邦的行为将会使南部孤立，使它的蓄奴制受到全世界舆论的谴责，使北部不再履行将逃亡奴隶送回南部的义务，使美国军队不再成为镇压奴隶起义的工具，使蓄奴制加快最后灭亡。一些非加里森主义者也赞成分离反对妥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如果联邦只是靠向奴隶主作出新的让步得以维持的话，如果联邦是靠榨取黑人的血去凑合的话，那就让它灭亡吧。”¹⁹ 在1860年至1861年的冬季，鼓吹这种观点的废奴主义者在北部许多地区遭到了暴徒的殴打，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指责他们煽动南部脱离联邦。

一些共和党人赞同废奴主义者希望南部退出的观点，如果以屈从南部的要求为代价来换得联邦的话。霍勒斯·格里利的颇有影响的《纽约论坛报》也表示了“让犯错误的姊妹和平地离去”的愿望。但是格里利和其它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为掩饰他们对退出联邦的公开默许而提出了种种条件，而实质上这些条件就是将南方毫无意义地拱手相让。到1861年1月为止，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在准州蓄奴制问题上作出让步。格里利和大多数持“和平离去”观点的共和党人亦开始将脱离联邦分子斥之为叛徒。

但是，在1月份之前，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还曾暗示一种在领土问题上妥协让步的想法。他们赞成把旧“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分界线向西延伸到加利福尼亚边境的提议。此项提议正是肯塔基州的约翰·J·克里坦登向参议院的13人委员会提交的复杂的妥协案的核心内容。克里坦登妥协案包含一系列实际修正条款：承认并保护北纬36°30'以南“现有全部领地或此后获得的领地”上的蓄奴制，而该纬度以北则禁止蓄奴制；禁止国会取消华盛顿特区或一个奴隶州境内由国家管辖的任何地区的蓄奴制；禁止联邦干涉州际之间的奴隶买卖；保证奴隶主在搜捕逃奴时不受当地的阻挡。这些修正条款将具有永久的约束力，永远不得撤消和修改。还有一些国会决议案也成了克里坦登妥协案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巩

固“逃亡奴隶法”，并废弃所有与之对立的州级法令。

克里坦登相信他的妥协案将得到南、北双方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建议将其提交全国公民进行表决。但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反对它。这份“妥协案”不仅否定了他们的党的政纲，而且将支持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掀起新的帝国主义浪潮，以便将蓄奴制扩大到“此后获得”的领地上去。一些共和党人说，克里坦登的这份提案“将成为一项针对所有在从这里到火地岛拥有一块地盘的民族、部落和国家的永久性战争协定条款”。它将把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一个豢养奴隶和扩大蓄奴制的庞大帝国”。²⁰ 共和党于12月28日在参议院13人委员会中投票否决了克里坦登妥协案。当克里坦登在1月16日将他的提案提交参议院讨论表决时，共和党人又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克里坦登。*

林肯的立场

虽然林肯在此期间未公开发表演说，但他在防止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方面仍然起了重要作用。他暗中传话给共和党人，“在蓄奴制扩张问题上不要妥协，一旦我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重新骑在我们头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并且迟早还要从头开始……。接踵而来的是他们将侵犯我们整个南部领土，并在那里建立蓄奴州……。双方的较量定会开始，并且越早越好。”两年前，林肯在他的“家不和”演说中就曾说过，在蓄奴制问题上“一定会经历一场危机”。国家一定会面临这样一个抉择，到底是成为一个自由社会还是成为一个蓄奴制社会。如今“较量”已经开始，林肯无意退缩。他于1月份说：“如果我们投降了，我们的末日，以及

* 在参议院委员会中的表决结果为7：6，多数票中有五票是共和党人投的，参议院的表决结果为25：23，所有占多数的25票均为共和党人所投。来自6个不久之后退出联邦的州的南部民主党代表弃权。

我们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他们将所欲为地重新对我们故技重演。不到一年，我们将不得不以古巴作为他们留在联邦里的条件。”²¹

林肯私下对南部朋友们保证，他的政府将不干涉这些州或华盛顿特区的奴隶制问题，不干涉州际间的奴隶买卖，将实施“逃亡奴隶法”，敦促北部诸州废除或修改他们的人身自由法。在脱离联邦的那个冬天，有4个北部州的确照此行动了。在林肯的支持下，国会中五分之二共和党人参与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提出保证南部的蓄奴制不受侵犯，联邦政府将来也不对其进行干涉。*但是除此以外，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愿越雷池一步。正如林肯于12月22日给他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你认为蓄奴制是正确的，并应加以推广；而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并应受到限制。我以为摩擦就在于此。”²²

摩擦的确在于此。下南部之所以准备退出联邦是因为一个认为蓄奴制是错误的政党掌握了政权。任何妥协也抹不掉这个事实。尽管当时有许多观察家和一些历史学家都相信克里坦登妥协案在北部和上南部拥有广泛的支持者，看来任何可以构想出的妥协都不能阻止下南部诸州退出联邦。²³从危机一开始，脱离主义者就造出了类似的舆论。12月13日，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州退出联邦，也未对任何妥协案作出表决时，下南部的30名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就向他们的选民发表了一篇讲话，他们说：“该辩论的都辩论完了，一切通过委员会、议会法规或者宪法修正案的帮助在联邦中得到救助的希望都破灭了，我们相信南部不再被那些新保证的假象所欺骗了。……南部人民的荣誉、安全和独立只能从南部邦联那里

* 这个第十三条修正案是内战爆发之前由俄亥俄和马里兰两个州批准的。最后，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第十三条修正案成了宪法的一部分，即在所有的州取消蓄奴制的修正案。

得到。”杰斐逊·戴维斯在12月2日说：任何人的力量都不能拯救联邦，所有的棉花种植州都将退出联邦。”一周之后，朱达·本杰明宣告说：“我们对和解已完全无能为力。”²⁴

成 立 邦 联

于是，南部邦联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根本不理睬在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于2月4日在蒙哥马利市集会，仅用了4天的时间就炮制了一部临时宪法。这部临时宪法出笼如此迅速，因为它大部分抄袭了合众国宪法。一个月之后通过的永久性邦联宪法也如法炮制，但其中确实加进了一些新的重要条款。序言删去了合众国宪法中关于公共福利的规定，并赋予各州有新的特权，规定各个州可以“根据主权和独立的地位”行动。邦联宪法还明文规定，在一切蓄奴州和准州保护蓄奴制。它禁止保护性关税（以此和国家岁收相区别），并取消国会用于内部改良的拨款。所有这些条款的制定都是为了加强蓄奴制和各州的权力。

邦联宪法与合众国宪法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总统的任期为6年，总统有权否决单项拨款案，授权国会允许内阁成员在国会议员席上有发言的权利（这一点从未实行过）。2月9日，会议选举戴维斯和斯蒂芬斯为临时总统和副总统。之后，国会决定在11月进行正式领导人的选举，并定于在1862年2月22日为他们举行就职典礼。在此之前，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包括由其它准备退出联邦的州选出的代表）作为临时国会行使职能。

那些在南部脱离联邦问题上积极煽风点火的激进派，在蒙哥马利会议上仅处于次要的地位。扬西甚至连代表资格都没有。尽管戴维斯自林肯当选以来一直是脱离联邦主义者，但却被认为是温和派。斯蒂芬斯一直是一个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这次会议选

举这些人的目的是向上南部还未退出联邦的州作出一个温和的姿态。宪法中禁止同外国进行奴隶买卖的原因也在于此。一些激进的脱离主义者企图打开对外奴隶买卖的大门的做法只会疏远上南部，使邦联得到欧洲各国承认的希望破灭。因此会议未使这种交易合法化，而是禁止了这种交易。

上 南 部

上南部8个蓄奴州的动向成了关键问题。没有它们，邦联的工业生产力仅占联邦各州的5%，人口不足联邦的五分之一（白人人口仅占十分之一）。邦联政府派特使前往这8个州用利益和感情去劝诱他们。但是，脱离联邦运动到2月为止似有偃旗息鼓之势。弗吉尼亚、密苏里和阿肯色3个州的选民们把大多数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选为州议会代表。阿肯色和密苏里的议会于3月通过表决反对脱离联邦。虽然弗吉尼亚从那时起一直拖长会议以静观事态发展，但它终于4月作出了同样的决定。肯塔基和特拉华的立法机关拒绝召开会议。在北卡罗莱纳和田纳西，选民们也抵制会议的召开。马里兰的联邦派的州长不顾压力，拒绝召集州议会开会讨论脱离联邦问题。

这些事态似乎坚定了共和党人对南部联邦主义的信心。但上南部的联邦主义者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效忠联邦的两个条件：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政府必须保证蓄奴制不受侵犯；不许对邦联诸州实行“高压政策”。许多共和党人愿意至少满足其中一半条件。西沃德是持这种观点的核心人物。林肯已经邀请这位纽约人出任国务卿，但大多数观察家们预料，西沃德作为一个声望和经验都在林肯之上的人，将成为政府中的“首要人物”。西沃德本人也希望如此。他是共和党“自愿重建联邦”方针的最积极的鼓吹者。这种观点认

为,如果共和党人不对脱离联邦诸州采取挑衅行动,并作出一些暂时的让步,上南部就会留在联邦内,而下南部最终也会回来的。西沃德于1月27日向林肯建议说:“我们的种种想法都应该是调和的、克制的和耐心的,这样就为在准备脱离联邦诸州组建一个联邦党创造了条件,而这个党将会把他们拉回来。”²⁵

同时,西沃德还支持吸收新墨西哥(包括现在的亚利桑那)为一个州的提议。这明显地违背了共和党的纲领,因为蓄奴制在这块领地上是合法的。林肯勉强同意了这项提议,因为很明显,州的体制不会在那里得到巩固。但是,一些南部国会议员认为新墨西哥一事是一个花招儿,想用妥协的假象分裂上南部和下南部,因此他们投了反对票。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也投票反对。众议院于3月份否决了这项议案。

更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亚立法会议向各州发出邀请,要求每个州都派出代表参加2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南部主要想以此为自愿重建联邦寻求某种基础。但是这项计划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西沃德及其同僚极力劝说大多数共和党统治的州派代表参加,以示诚意。但邦联诸州坚决不参加,而反对妥协的共和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许多尊贵人物参加了大会(前任总统约翰·泰勒任大会主席),也没有对解除这场危机提出什么新的建议。经过三周的努力,会议仅拿出了一个“克里坦登妥协案”的修正稿,除此之外就再没有更能说服人的东西了。因为国会曾驳回过此类提议,故也驳回了该修正案。然而,这次和平会议的确在把上南部的力量吸引到联邦派这方面来起了一定的作用,使这些州不致在林肯宣誓就职总统前一个月内采取脱离联邦的行动。

林肯就任总统

西沃德的所作所为使反对妥协的共和党人大为恐慌，他们唯恐林肯会过分听从这位纽约人的意见。同西沃德一样，林肯也希望按照南部联邦主义的主张实行自愿重建联邦，但他又害怕过分的克制会导致脱离联邦的合法化。在林肯的构想中，他的任务就是使国家权威在南部的象征始终成为联邦主义者的灯塔，同时使南部人相信政府不威胁他们的根本利益。林肯在他的斯普林菲尔德至华盛顿的2月之行中，沿途向迫切想见一见这位并不怎么出名的草原律师的人群发表了许多简短的演说。因为他不希望被误解，所以他的大部分演说都属陈词滥调，似乎不把这场危机放在心上。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林肯的这些演说表明了他在此严峻时刻不够坚强。

事实总归是事实，林肯企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表现出一种自信而强硬的态度。在这篇演说的最初的草稿中这样写道：“我要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权力收回业已丧失的国家财产和土地；要维护、占有和控制这些以及所有其它属于政府的财产。”西沃德和其它一些顾问都劝林肯删掉有关收回被侵占的联邦财产的部分，西沃德为缓和整个演说的基调，还对其它一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林肯演说的最后定稿——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就职演说——是一篇在剑与橄榄枝之间保持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演说。它一开始就向南部保证——这样的保证已经有了一百次——政府无意干涉各州现存的蓄奴制度。“国内某些地区”对联邦政府如此敌视，以致妨碍了政府正常地行使职能，政府将“暂时”停止行使这些职能活动。这就是摇向南部的橄榄枝。林肯还说，但是联邦是“永恒的”，脱离联邦就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如能得逞，将意味着可以

由少数叛逆分子任意分裂政府。林肯企图“尽一切手段在所有的州内严格执行联邦的法律，这是宪法明确赋予我的责任”。政府将“维护、拥有和控制它的财产，并且收缴关税和进口税”。“除了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外”，将不会发生“军事入侵事件——不会诉诸武力。”最后，这位新总统以雄辩的言辞结束了这篇演说，其中部分是西沃德所建议修改的：

决定这场严酷内战的权利操在你们手里，在我的心怀不满的同胞们手里，而不是在我的手里。政府不会进攻你们。如果你们自己不以侵略者的面目挑起冲突的话，冲突是不会发生的。上帝那里没有记载着你们推翻政府的誓言，而我却有最庄严的誓言，决心“维持、保护和捍卫”联邦政府。

我们不应成为敌人。尽管热情会奋发冲动，但它不应割断我们感情的纽带。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从每一个战场、爱国者的坟墓到每个人和家庭，记忆中神秘的琴弦，一旦再次被我们的造物主美丽的天使所拨动，将会奏起强烈的联邦和弦，这是注定会发生的。²⁶

从1861年3月4日起，当代人与历史学家一直为这篇演说的含义争论不休。那些要执行法律，收缴关税以及维护、占有和控制联邦财产的诺言是意味着高压统治吗？它是说将重新夺回被邦联诸州占领的军火库和要塞，还是说要守住那仅仅四个仍被联邦政府占领的要塞——位于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彭萨科拉湾的皮肯斯以及位于佛罗里达群岛的两个并非重要的要塞？怎样收缴那些关税，由驻守沿海的舰艇来收吗？如果政府让实施法律所必需的机构——联邦法庭、地产管理部门、邮局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空缺着，又如何能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法律呢？林肯有意把这些问题说得模棱两可，以免得罪上南部并在最大程度上给自己留有余地。

各阶层和党派对这篇就职演说的反应不一。脱离主义者指责

演说是一份“宣战书”；大多数共和党人赞扬它的坚定性；许多北方民主党人批评它不是太模糊就是太有火药味。而斯蒂芬·A·道格拉斯却认为它是个“和平礼物”。这篇演说首先是针对上南部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的，他们中许多人的反映虽不热烈，却是令人满意的。一位北卡罗来纳人问道：“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南部人还能期望更高的要求吗？难道这些令人振奋的保证还不足以诱使整个南部去等待北部认真的重新考虑吗？”²⁷

萨姆特要塞与和平的结束

林肯演说的主要目的在于赢得时间——分裂联邦的热度消退的时间，设想中的大批南部联邦主义者重新获得上南部的时间，自愿重建进行过程所需的时间。在林肯就职的第二天，他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接到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报告说，倘若萨姆特的驻军在几周内再得不到给养的话，他们将被迫放弃这个要塞，这个消息似乎使他无法赢得必要的时间。两个多月来，萨姆特一直是联邦在南部存在的象征，一个同它的固有的军事重要性极不相称的象征。当此之际，联邦政府将要么被迫采取行动——果断而迅速——要么放弃它在下南部这个最后象征其权威的要塞。

萨姆特位于查尔斯顿港入口处一个岛屿上，是一个将要建成的要塞。当南卡罗来纳于12月20日退出联邦时，这个要塞还未被占领。派驻这个地区的80多名美国士兵中的大多数都驻守在莫尔特里要塞，这是个废弃的工事，它修筑在从萨姆特至这个港口一英里处的一块狭长的陆地上。这里的守军指挥官是罗伯特·安德森。他是肯塔基人，不像他的前任马萨诸塞人那么有刺激性，因此被派到查尔斯顿。陆军部在听取了安德森关于莫尔特里不能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的报告后，于12月11日向他下达了命令，指示他如

果他认为进攻已迫在眉睫的话，可自行决定将他的指挥所转移到萨姆特。安德森预料到这次进攻是有充分根据的。南卡罗来纳此时正准备退出联邦；它的官员们正要求查尔斯顿要塞投降；民兵连队正在武装起来进行操练。12月26日夜幕降临后，安德森悄悄地盖住了莫尔特里的炮筒，将队伍转移到了萨姆特。

安德森确信这次转移有助于维护和平，因为莫尔特里的薄弱能招来进攻，而萨姆特的坚固能阻挡进攻。但这次转移极大地激怒了南卡罗来纳人，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传到了白宫。此时，南卡罗来纳独立共和体的使者们刚刚抵达华盛顿，准备谈判关于要塞的投降和其它合众国财产的交出问题，并声称目前这些财产归南卡罗来纳所有。他们认为，既然布坎南曾誓言不改变查尔斯顿的现状，那么对萨姆特的占领就是违背了布坎南原来的誓言。

然而政府感到南部在这个问题做得未免欺人太甚。北部报刊高呼安德森为英雄。一位颇有影响的布坎南民主党人这样写道，“我从未见过人们在一个问题上这样万众一心，如果召回安德森或放弃萨姆特的话，我们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人反对去攻击南部。”²⁸ 由于脱离主义者的辞职以及由具有坚强的联邦主义性格的北部人取而代之，布坎南的内阁正在实行大改组。国务卿杰里迈亚·布莱克是宾夕法尼亚人，司法部长埃德温·M. 斯坦顿是俄亥俄州人，陆军部长约瑟夫·霍尔特是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联邦主义者，这些人都一跃而成了这个重新组成的内阁的强有力人物。他们使政府挺起了腰杆，拒绝了南部人要布坎南从萨姆特撤出军队的要求。布坎南一口回绝的强硬态度使南卡罗来纳人甚为吃惊。

总统又进一步采取了行动，命令给安德森派去增援。军方决定不派军舰前往，只派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去执行这项任务，这样不致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刺激。于是，被租用的“西方之星”号轮船

满载着200人的部队和给养于1月5日启航了。尽管是秘密行动，还是泄露了消息，南卡罗来纳的民兵正准备用机关枪迎接它。这次他们比萨姆特要塞主动，因为官方送给安德森的有关这支增援部队的通知被送错了地点。1月9日，当“西方之星”号驶进港口时，岸上的炮群便向它开了火，船长还未来得及掉转船头驶回北方，船便被一发炮弹击中。由于没有接到命令和不愿挑起战争，安德森在这次事件中没有还击。

北部对此事件极为愤慨，而南卡罗来纳对联邦的侵略行为的谴责声和再次要求萨姆特投降的呼声却甚嚣尘上。尽管双方都充满了战争的叫嚷，战争并未爆发。布坎南政府与南卡罗来纳一起订立了一份非正式的停战协定，暂时稳住了局势。其它州的脱离主义者都劝南卡罗来纳人暂且委屈求全，等待邦联完成组织机构并建立了军队。3月1日，杰斐逊·戴维斯命令邦联陆军准将皮埃尔·古斯塔夫·T. 博雷加德负责指挥查尔斯顿的驻军。这个任命使得头脑发热的卡罗来纳人不能再介入萨姆特问题。同时，邦联仍尊重原来美国海军与佛罗里达民兵签定的一份休战协定。协定中规定，如果海军不往岸上运送增援，南部军队便不袭击位于彭萨科拉的皮肯斯要塞。邦联派特使去华盛顿谈判有关这两个要塞的投降问题。

林肯与萨姆特要塞

3月5日，亦即林肯就任总统的第二天，他便得知安德森的给养很快就要用完，这就是林肯所面临的形势。目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关键是如何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共和党中的鹰派坚持认为，即使冒战争风险，也要增援萨姆特。从北部四面八方发来的信件和电报都是同样的意见。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林肯：“放弃萨姆特〔原文如此〕，先生，就如同约翰·布朗的肉体死亡了一样，你的

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你只能战斗。”康涅狄格州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的一位编辑告诉海军部长说：“我宁愿做一名志愿兵，冒着地狱的炮火驶进那个海港，也不愿看见我们的国旗受辱，我们的政府陷入混乱。”²⁹但是，以西沃德为首的鸽派却敦促撤离该要塞，以避免战争，并使自愿重建的大门洞开。西沃德不仅仅是推荐此方针，他未经林肯许可，实际上就在华盛顿向邦联的使者保证交出萨姆特，他还向报界透露了类似意见。

虽然林肯的确曾一度倾向于西沃德的方针，但他从未作出过这种决定。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告诉林肯，增援那个要塞是不太可能的。据3月15日内阁的一次表决情况透露，仅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一人明确表示赞成增援。面对他的顾问们提出的这些撤离要塞的建议，总统“坚守、占领和控制”这个要塞的决心动摇了。但在3月的最后两周中，鹰派得到了持北部观点的上南部的支持。共和党人开始认为政府应采取某种行动以维护其主权。共和党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标题为：“我们有政府吗？”、“要有一项政策”、“抓住要害问题”等。北部人民的焦虑与紧张的情绪几乎达到了难以克制的程度。一家报纸说：“几乎什么情况都比再一次踌躇不前强。”美籍德意志人的首领卡尔·舒尔茨向林肯反映了民众的呼声，并向他汇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对政府的不满意。舒尔茨说：“只要政府奋起进行抗击，如增援萨姆特，自由州的公众舆论将立即支持你。”³⁰

这些都增强了林肯最初要坚守要塞的决心。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原海军军官古斯塔夫斯·V·福克斯的建议也增强了总统的决心。福克斯提出了一个行动方案，给养和增援部队可以在夜间运进萨姆特要塞，如果邦联的炮火进行阻止的话，要塞和运输船两侧战舰的炮手可以压住敌人的炮火。林肯接受了这项方案，并于3月30日命令福克斯准备这次远征。与此同时，他还批准了——已

是第二次批准——对皮肯斯要塞的增援。^{*}除了西沃德与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全体内阁成员的态度与两周前相比来了一个大转弯，都拥护坚守萨姆特的决定。

这项决定使西沃德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的和平政策将垮台，他对邦联特使所下的保证将被斥为骗局，他要作为首要人物的希望也将破灭。出于想弥补这个损失的邪念，他在4月1日写给林肯的备忘录中再次提出放弃萨姆特的建议（虽然已增援了皮肯斯）。但是这个文件最重要的特点是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西班牙已经出兵干涉混乱的圣多明各政治问题；法国正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墨西哥。西沃德想从西班牙和法国那里“得到解释”，如果解释不“令人满意”就宣战。他还想从英国和俄国那里“寻求”关于违犯门罗主义的“解释”。西沃德相信，对外战争会使这个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若想实施好这项政策，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而且西沃德羞羞答答地要求去承担这个责任。林肯温和然而坚定地拒绝了这些不寻常的建议。他还提醒他的国务卿，无论作出任何决定或发布任何命令，“我必须执行它”。西沃德碰了这个钉子后再未写过这类备忘录。他从内心不再怀疑究竟谁是这个政府的首要人物。³¹

总统的确答应在下达远征萨姆特的启程命令之前会见弗吉尼亚联邦主义者的发言人。林肯于4月4日同弗吉尼亚的代表进行了谈话，但会见毫无结果，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这次谈话的记录，也

* 8月12日，林肯已命令增援佛罗里达的皮肯斯要塞，这比增援萨姆特的可行性还要大一些，因为皮肯斯位于港口入口处之外，因此不像萨姆特那样容易招致进攻，而萨姆特则被邦联数门大炮所包围。皮肯斯也不那么带有刺激性，因为它对双方来说并不像萨姆特那样是强大力量的标志。但是几周过去了，林肯没有得到他增援皮肯斯的命令是否得到执行的信息。直至4月6日，他才得知他的命令并没有被执行。那里的海军指挥官执行的是只要邦联不攻击要塞，就不增援的原协定，并且拒绝接受新的命令，除非他的海军部上司直接向他下达命令。林肯于4月6日再次下令增援皮肯斯，皮肯斯才终于得到了增援。整个内战期间，这个要塞一直掌握在联邦政府手里。

没有留下会谈特征的可靠证据。无论是什么情况，这次会谈似乎降低了林肯对南部联邦主义者的信心，至少是暂时的。他就在那天（4月4日）下定了决心，继续萨姆特远征。他给安德森少校送去一封信，告诉他增援部队和给养正在运送途中。

自福克斯最初提出那个行动方案之后，这次远征的性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援萨姆特的整个企图毫无疑问地会挑起武装冲突，而北部就将表明它是侵略者。这样将促使上南部倒向邦联一边。于是，林肯想出把增援与运送给养分开进行的办法，先运送给养，增援部队与战舰整装待命，只要邦联一阻截给养船，就采取行动。他将把这些打算都通知南部的官员们，如果他们向没有武装的运输船开火，他们将对破坏“为忍饥挨饿的人们运送粮食的仁慈的使命”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人们有理由相信邦联将阻挠给养上岸，但也不能断定他们就一定这样做。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还能维持查尔斯顿港的现状，至少可以维持短暂的和平，而自愿重建政策还有得以贯彻的希望。如果南部真的向给养船开火，挑起内战的责任将由杰斐逊·戴维斯来负。4月6日，林肯派一名特别信使去查尔斯顿，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送去一封信，通知他“希望向萨姆特要塞供应给养，只有粮食。如果南部不反对这样做的话，北部决不在事先未通知对方的情况下运进军队、武器和弹药，除非南部人进攻要塞”。²

邦联打响了第一枪

邦联接受了林肯的挑战。根据邦联的一贯方针，戴维斯政府不可能作出其它的选择。萨姆特对南部来说和对北部一样，是强有力的主权的象征。如果外国军队在其主要港口之一占领着一个要塞，邦联就不能成其为一个现存的国家。邦联临时国会于2月15日就已通过决议，“不论是通过谈判还是诉诸武力”，必须“尽快”

夺取萨姆特及其它要塞。谈判的途径已经堵死，唯一的选择就是诉诸武力。无休止的拖延已经使南、北双方的神经紧张到几乎破裂的程度。此刻采取任何行动都不能优柔寡断。邦联的领导人还坚信，一场实战将会把上南部推到他们一边来。弗吉尼亚的脱离主义者已经送信到查尔斯顿，他们表示如果南卡罗来纳“发起进攻”，³³ 弗吉尼亚将即刻与它的姊妹州并肩作战。

4月9日，邦联内阁通过了进攻萨姆特的一项致命的决议。戴维斯命令博雷加德要求要塞驻军在给养船到达之前投降，如果遭到拒绝，就让设在萨姆特周围的重炮进行轰击，以武力迫其投降。在通过这项决议时，仅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一人持反对意见。据说他曾对戴维斯说，这“将使我们失去所有的北部朋友，你将荒唐地捅了一个马蜂窝，此刻悄无声息的大群黄蜂会蜂拥而出，把我们叮死。这种做法实属毫无必要，它使我们步入歧途，它是致命的。”*

安德森拒绝了投降的要求。但是，他说如果他是孤军作战，又得不到接济的话，他将很快被迫撤离这个要塞。当博雷加德要他决定一个撤离的时间时，安德森决定，如果4月15日前得不到给养，他将在那时撤出要塞。这个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邦联知道运送给养的船只正在驶近港口。4月12日凌晨4时30分，邦联的大炮向要塞开火了，联邦运送给养的远征队眼睁睁地看着而爱莫能助。由于指挥的失误，它的最具威力的一艘战舰掉转船头向皮肯斯要塞驶去了，远在公海的其它军舰又来不及支援要塞。经过34小时的炮轰，联邦军队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邦联发射了4000发炮弹，而萨姆特仅发射了1000发），炮火摧毁了要塞的大部分。尽

* 此话为图姆斯的第一个传记作者普莱曾特·A. 斯托瓦尔在他所著的《罗伯特·图姆斯》一书（纽约，1892年）第226页中的引言。虽然人们可以怀疑这是否为图姆斯所发表的那颇具预见性的意见的原话，但后来的自传作家和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段引言是最可靠的。

管在这第一次交战中双方无一人伤亡，但一场血腥的战争却由此开始了。

4月14日，邦联降下了美国星条旗，将邦联星棒旗插上了萨姆特要塞。内战开始了。它开始的方式正应了图姆斯的预言。一场反革命竟如此有效地使一场它要避免的革命取得了胜利，这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第 二 编

内 战

第十章 同室操戈：上南部

冲突之形成

萨姆特要塞投降的第二天，林肯发布了征召75000名州民兵到联邦服役90天的命令，镇压一次“强大的而无法以正常司法程序去压制的叛乱”。¹ 总统发布这道命令就是接受了南部要打内战的挑战，这场战争不是持续90天，而是4年，并且将推翻旧南部，在战争中联邦得到维护和改造，但以至少牺牲62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萨姆特要塞陷落后的数周内，战争热潮横扫南北。一位吓破胆的波士顿商人在看到乐队狂奏、旗帜飘扬、演说家们怒吼以及人们群情激昂的情景时写道：“骚乱被煽动起来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等群情激昂的情景。”一位被纽约规模盛大的联邦集会惊呆了的纽约人也写道：“仿佛我们直到现在才有了生命，才有了一个国家。”一位在南部旅行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看到数不清的人们“涨红着脸，瞪着暴怒的眼睛，尖声地喊叫着”，那造反的叫喊声与乐队演奏的“邦联军歌”此起彼落。²

炮轰萨姆特事件使分裂的北部团结起来了。斯蒂芬·道格拉斯从病床上爬起来去见林肯，要他相信民主党支持一场维护联邦的战争，他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中立者，不是爱国者就是叛徒。”在这个政治舞台的另一端，一些废奴主义者一向反对用妥协来说服那些脱离联邦的州回归联邦，而现在则提出用武力迫使他们回来。废奴主义者相信，即使这些被召唤回来的州存在着奴隶制，政府也逃不出这场冲突。在华盛顿积极备战的热潮中，一位废奴主

义者写道：“我听见老约翰·布朗在敲他的棺材盖，并且在喊‘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奴隶制灭亡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要用血的代价将它消灭。阿门！”³ 民主党人支持打一场战争是为了恢复旧联邦，而废奴主义者盼望打一场战争是为了有朝一日建立一个新联邦。在这存在分歧的土壤中埋下了歉收的种子，但是在1861年4月，北部还是空前绝后地团结起来了。

北部的州长们热烈地响应了林肯的征兵号召，几乎所有的州都主动提出要超额完成所规定的征兵任务。但是，由于一些州的民兵减员和训练不足，许多新兵缺乏组织性、训练、武器和装备。马萨诸塞是立即拍来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电报的州。约翰·安德鲁州长比他的同代人都更早地预见到了这场战争，他在萨姆特打响之前几个月就已将马萨诸塞的民兵动员组织起来了。一听到林肯的号召，他马上就响应说：“命令已收启，我们从哪条路线出发？”4月17日。也就是两天之后，他打电报给陆军部说：“我们有两个团今日下午出发——一个开往华盛顿，另一个开赴门罗要塞；第三个团明日出发，第四个团在周末之前出发。”⁴

林肯的征兵号召发出后，每个忠于联邦的州都募集了一定数量的军队。依旧留在联邦的8个蓄奴州中的6个州长公然违抗林肯的命令。田纳西的州长宣称：“田纳西不为强权统治派出一兵一卒，但是如果为了保卫我们的和我们南部兄弟的权利，我们可提供50000人的兵力。”弗吉尼亚的州长在拍给总统的电报中说，既然总统已“选定去打内战”，弗吉尼亚将加入南部姊妹州的阵营。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也作出了类似的回答，早已打算脱离联邦的肯塔基和密苏里的两个州长拒绝服从林肯的命令。⁵

田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的州长们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这几个州的民意。文化和思想的纽带把这些州的大多数人和下南部连结在一起。只要林肯不对邦联实行高压政策，他们才

奉行有条件的联邦主义；如果强迫他们作出选择的话，他们宁肯要南部主义，而不要民族主义。4月15日在里士满，欢呼的人群打出了一面邦联旗，并从州军火库拖出了大炮，把它推到了国会大厦前，向着这面旗鸣了一百响礼炮。在罗利、纳什维尔和小石城也发生了类似事件。4月17日，仍在进行的弗吉尼亚州大会经过两个月徒劳的妥协努力，以88票对55票表决通过了一项退出联邦的法令。紧接着，阿肯色于5月6日以69票对1票表决通过了退出联邦。北卡罗来纳州大会于5月20日一致同意退出联邦。在选民们原来反对召开会议的田纳西，州议会通过了加入邦联的决议，此项行动于6月8日以二比一以上的多数获得公民投票通过。

对邦联来说，这四个州的效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弗吉尼亚、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的白人人口在十一个邦联州中分别排第一、第二和第三。包括阿肯色在内，这些上南部州的工业产量占邦联的一半以上，粮食产量占一半，拥有将近一半的马和牛，提供了占整个邦联军队五分之二兵员的兵员。没有上南部，邦联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有生命力。

但是，后来脱离联邦的这些州的高地和山区各县仍对联邦怀有深厚的感情。出于长期以来对低地蓄奴区的仇视，田纳西东部和弗吉尼亚西部地区在表决时强烈反对脱离联邦，即使在炮轰萨姆特之后也是一样。在诺克斯维尔，一向直言不讳的编辑威廉·G·“帕森”·布朗洛曾发誓同“脱离联邦运动的领导人战斗到地狱封冻，然后再到冰上进行战斗。”⁶田纳西的参议员安德鲁·约翰逊拒绝跟随他的州加入邦联，坚持留在美国参议院，这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邦联州的参议员。1861年8月，在加入邦联的田纳西州举行了特别议会选举之后，获胜的田纳西东部三个地区的联邦主义派候选人没有去里士满，而去了华盛顿，在联邦国会中得到了席位。三名来自谢南多厄河谷以西地区的弗吉尼亚国会议员也依旧效忠

联邦。在这些地区和从阿巴拉契亚高地一直延伸到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的联邦主义者已成了邦联的肉中刺。

最初发生的冲突

还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正式退出联邦之前，它们的军队便出动掠夺它们境内的联邦财产。4月18日，当1000名弗吉尼亚民兵出现在哈珀斯渡口的高地时，美国的47名驻军放火烧了军火库和军械库后就逃走了。弗吉尼亚人迅速地冲进大火，抢救出大批制造步枪的机器。与此同时，数千名弗吉尼亚民兵乘火车前往诺福克，去攻占戈斯波特海军造船厂，这是南方拥有的最大修造能力的造船厂。坚守这个造船厂的年迈的指挥官被华盛顿含混不清的命令搞糊涂了，决定放弃，并且不等这些民兵将他的数量有限的水兵和舰只打垮就毁掉船厂设施。4月20日夜间，这些联邦官兵打算烧毁厂内的六艘战舰，炸毁干坞，塞住1200门大炮的炮口。但是，他们仓惶中干得极不彻底，致使弗吉尼亚人夺得了大部分完好无损的机器和大炮。这些大炮被迅速运往南部各个要塞，同时邦联海军也着手修复吃水线以上已经烧毁的一艘美国海军威力很大的蒸汽护卫舰“梅里麦克”号。

这些战略要地之轻而易举地被夺取证明了联邦在上南部军事设施之脆弱。在1861年4月那些激烈紧张的日子里，被蓄奴州包围并充斥很多邦联同情者的华盛顿也害怕会发生脱离联邦的政变。脱离联邦的情绪在马里兰非常强烈。4月19日，一伙巴尔的摩暴徒袭击了马萨诸塞第6团的几个连，这是安德鲁州长的开往华盛顿途中的第一支民兵部队。士兵们开枪还击。混战结束后，有4名士兵和12名巴尔的摩人阵亡，许多人受伤。遭到袭击的第6团于当日晚抵达华盛顿，但在他们身后，愤怒的马里兰人焚毁了铁

路桥梁，割断了电话线，从而切断了首都与北部的联系。

因这次事件而得意忘形的《里士满考察家报》怂恿弗吉尼亚人进军华盛顿，彻底清扫一下“那个肮脏的鸟笼”。邦联的陆军部长预言，他的国家的旗帜将于5月1日之前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⁷据说还有更多的北部军队正在开往华盛顿的途中，但由于与外界隔绝，政府不知道他们在何处。最后于4月25日，一列满载着精锐的纽约第7团的火车喷着阵阵烟雾驶进了首都，紧随其后的是满载着来自罗得岛和马萨诸塞州民兵的其它列车。善于随机应变的本杰明·巴特勒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被安德鲁勉强任命为这个州4个民兵团的指挥官。巴特勒命令马萨诸塞第8团在切萨皮克湾的海角处下了车，在那里征用了一艘汽船，将他的部队载到安纳波利斯，然后命令团里的机械师和铁路工人修复被破坏了的车辆和从安纳波利斯至华盛顿的铁路线。到4月底为止，首都的驻军已达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利用巴特勒修复的铁路线抵达华盛顿的。

东部边境州：马里兰与特拉华

此时华盛顿安全了，但马里兰还存在着问题。亲邦联的部队此刻正在武装和操练。公众的压力迫使联邦派州长托马斯·希克斯召集议会开会。林肯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激烈措施，以防后患，因为一个政府的首都被敌人的领土包围着，政府就无法行使职能。他在马里兰部分地区暂时废止了“人身保护令”（实质上等于宣布了军事管制法令）。联邦军队占领了巴尔的摩和其它军事要地。由于武力威慑和西部各县对联邦日益加深的感情，该州议会驳回了脱离联邦的提议。

然而，马里兰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州。30000名白人（和9000名

黑人)加入了联邦陆、海军,为联邦作战;大约20000人投奔了南方,为邦联作战。联邦政府逮捕了许多参加亲邦联活动的马里兰人,其中有一个叫约翰·梅里曼的人,根据“人身保护令”,于1861年5月请求释放。罗杰·托尼审判长作为此案的巡回法官,发布了一份判决公文袒护梅里曼,否定总统有暂时停止“人身保护令”的权力。林肯为拒绝遵从托尼的判决,他指出,宪法第九条第一款允许“在发生叛乱和入侵时,由于公共安全的需要”,暂时停止实行这项法令。托尼则坚持认为只有国会才拥有这个权力,但是林肯统帅着军队,他的解释被普遍接受了。

虽然特拉华有很多南部的支持者,但是这个州追随联邦这一点从未发生过根本的动摇。蓄奴制在那里实际上已经消亡(20000名特拉华黑人人口中仅有不到1800人是奴隶)。那里人口最稠密的威尔明顿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与宾夕法尼亚联系紧密。该州州长是联邦主义者,州议会于1861年1月3日一致反对脱离联邦。特拉华为联邦陆军和海军输送了将近10000名白人和1000名黑人的兵员;但这个州为邦联作战的可能不足1000人。

西部边境州：肯塔基与密苏里

战争给肯塔基和密苏里带来的是痛苦的分裂和残酷的暴力。正如控制住马里兰对华盛顿的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一样,控制住这些西部边境州对西部战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密苏里的白人人口数量超过任何一个蓄奴州,除弗吉尼亚外,肯塔基的白人数量比任何一个邦联州都要多。它们拥有相当丰富的资源。密西西比—密苏里河水系交通网使密苏里的军事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而在肯塔基边境地带,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田纳西河和坎伯兰河在此汇合,使该州成为部队与给养运输的重要的军事联

络站。据说，林肯曾说过，他若想得到上帝的保佑，就必须得到肯塔基。

肯塔基

“同室操戈”这个词没有比用于肯塔基更合适的了。肯塔基同为亚伯拉罕·林肯和杰斐逊·戴维斯的故乡，它既继承了亨利·克莱的民族主义，又被蓄奴制和血缘的纽带同南部连在一起。肯塔基的军队在从夏洛至亚特兰大的战场上相互厮杀。亨利·克莱的七个孙子中，有三个为联邦而战，四个加入了邦联的军队；约翰·J·克里坦登参议员的两个儿子，一个是联邦军队的将军，另一个是邦联军队的将军。肯塔基的另一名参议员约翰·C·布雷肯里奇于1861年辞去了职务，加入了邦联军队，在那里升任陆军少将，他的三个儿子也为邦联作战，而他在肯塔基的两个表兄却参加了联邦军队。林肯夫人有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夫，其中有一人是邦联的陆军将军。

面对眼前的两条道路，肯塔基最初试图保持中立。贝里亚·梅戈芬州长发表了一项声明作为对林肯关于征兵号召的回答。他在声明中说，肯塔基决不“为征服它的南部姊妹州的邪恶目的”送去一兵一卒，但是考虑到该州大部分地区对联邦的感情，梅戈芬也同样拒绝了杰斐逊·戴维斯的征兵请求。为此，肯塔基议会召开了特别会议，发表了一项保持中立的文告，警告联邦和邦联双方不要派军队进驻或通过肯塔基。

无论是林肯还是戴维斯都决定暂时尊重肯塔基的中立立场，因为很明显，无论任何一方破坏了这种中立，都会将肯塔基推向对方的怀抱。林肯用于马里兰的策略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但是，这个州很快便成了在它的边境以南地区集结的邦联部队的骡马、皮革、粮食以及肉食的丰富的供应基地，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成

了对南部进行军用物资兴隆交易的干线。梅戈芬州长还秘密地允许南部代理人在这里征兵，许多肯塔基人偷越田纳西边境加入邦联军队。

林肯的不干涉政策可能在军事上对邦联有利，但却在政治上使联邦大受裨益。1861年，肯塔基举行了三次特别选举：一次为5月召开的边境州大会，一次为6月国会的特别会议，一次为8月产生的州议会。联邦主义者在每次选举中都以绝对压倒的多数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各方的支持者们正积极备战，以防对方突然采取军事行动。梅戈芬把邦联的支持者组成了“州自卫队”，联邦主义者则针锋相对地组织了“家乡自卫队”。林肯批准发给家乡自卫队5000支步枪，联邦主义者在夜间偷偷地将这些武器运过了俄亥俄河。总统还派遣萨姆特要塞守卫者、土生土长的肯塔基人罗伯特·安德森到辛辛那提去接收肯塔基的志愿者参加联邦军队。

由于出现了双方都在边境地带扩充军事力量以及州自卫队与家乡自卫队对峙这样一种局面，肯塔基保持中立地位的日子便屈指可数了。联邦军队几个团在尤利塞斯·S. 格兰特将军的率领下，在俄亥俄河对岸的伊利诺伊州开罗集结待命。邦联的利奥尼达斯·波尔克将军担心这些部队会攻占控制着肯塔基州哥伦布的密西西比河地带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地，因此决定偷偷地抢在他们之前，由他抢先占领哥伦布。他的部队于9月3日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波尔克的担心是不乏根据的，他的做法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抢先行动在政治上是失策的。肯塔基的联邦主义的议会谴责了邦联“侵略者”，并且请求合众国政府将他们赶出去。9月6日，格兰特乐于表示支持，协助占领了位于田纳西和坎伯兰河河口处的帕迪尤卡和绍斯兰。沉默寡言的格兰特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使人折服的实力和使一切事情成功的力量，但他却因酗酒和流浪而使自己的声名受到损害。他对这些河流要地的占领对邦联

来说是个凶兆。

肯塔基妄图以中立来避免的这场战争，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了。虽然该州少数脱离主义者于1861年11月召开了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脱离联邦的法令，并且“加入”了邦联，但这个州依然正式留在联邦内。内战期间，将近50000名肯塔基白人（以及24000名黑人）为联邦军队作战，而服役于邦联军的估计有35000人。

密苏里

一系列截然不同的事件使密苏里留在了联邦内。如果说内战是1854年从密苏里—堪萨斯边界开始，并在那里持续了11年而非4年，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内战开始后，许多边境暴民作为邦联军的成员为保卫蓄奴制继续战斗，而自由州堪萨斯的废奴游击队员则于1861年穿上了联邦军制服。^{*}一名前边境暴民头目克莱本·杰克逊在1860年当选为密苏里州州长。当林肯要求从该州征兵时，杰克逊给了他一个挑战性的答复：“你的征兵号召是非法的、违背宪法的、反叛性的、非人道和残暴的，不能予以响应。”⁸他不等联邦的拥护者们组织起来就使密苏里加入了邦联。他控制了圣路易斯警察局，并且开始动员民兵，由亲邦联的军官担任指挥。4月21日，一些民兵部队占领了堪萨斯城附近的利伯蒂美国军火库。但在杰克逊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争夺目标——圣路易斯军火库，该库拥有六万支滑膛枪和一些其它军用装备。他秘密地要求杰斐逊·戴维斯派一支炮兵部队袭击该军火库，戴维斯批准了。5月8日，8只贴着“大理石”标签、其实里面全是大炮和火药的箱子从下游运到了圣路易斯。

^{*} 关于暴民，可参见第125—127页。废奴游击队员（jayhawkers，根据一种想象中的鸟命名）是边界暴民的具有自由土壤党倾向的对手，同他们的敌人一样，他们也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搞袭击、埋伏和恐怖活动，于是密苏里的战争变得更残酷。

但是，杰克逊没有料到还有两位比他更强硬的对手。圣路易斯军火库的代理指挥官是美国第二步兵团的纳撒内尔·莱昂上尉，莱昂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坚韧顽强的新英格兰人，他在战前驻防堪萨斯时就已受到强烈的反南部宣传的影响。他的极端的联邦主义思想得到了小弗朗西斯·P·布莱尔的支持。布莱尔是来自密苏里的国会议员，林肯的邮政局长的弟弟。莱昂和布莱尔计划把这些步枪大部分运过河，转移到伊利诺伊，其余用来武装主要由圣路易斯的美籍德意志人组织起来的志愿军——密苏里联邦主义的骨干力量。莱昂将这些部队的4个团编入联邦军队。5月10日，他率领这4个团的官兵，连同正规军的两个连去包围亲邦联派的民兵营地。这些民兵因寡不敌众就投降了。当这些俘虏被押经圣路易斯时，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并以欢呼声表示对杰斐逊·戴维斯的拥护。他们还向这些“德意志雇佣军”扔石块，并用左轮手枪威胁他们。后来一个醉鬼朝一名军官开了枪，于是士兵们也开火了。这场冲突结束后，死伤了28人。当天夜里，暴徒们涌到街上游行。第二天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冲突，至少又有6人丧生。

这次事件揭示了密苏里的内幕。许多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倒向脱离联邦派一边，包括前州长、领导着亲南部派军队的斯特林·普赖斯。该州议会通过了杰克逊州长的建议，宣布全州处于战备状态。在另一方，莱昂被提升为陆军准将，并被授权统率密苏里州的10000联邦军队。6月11日，莱昂在一次与普赖斯的会见中，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撕毁了那个正在实施中的休战协定，而温和派曾千方百计想通过这个协定在密苏里制造一种肯塔基式的“中立”。莱昂对这位弗吉尼亚出生的贵族普赖斯说：“我宁肯看着你……以及这个州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死去，并被埋葬，也不愿向密苏里州让出一瞬间的支配我的政府的权利。这就是战争。”⁹

莱昂率领他的部队沿密苏里河开到首府杰斐逊城，而普赖斯则进一步向上游退却至布恩维尔。莱昂派 1700 人的部队随后追击，在 6 月 17 日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他打垮了普赖斯的民兵，并将他们的残部赶到了密苏里州的西南角。普赖斯的残部企图在那里重整旗鼓，与阿肯色的邦联军队汇合，为南部赢回密苏里。与此同时，已于 3 月驳回退出联邦法案后休会的密苏里州议会又重新开会，履行州议会的职能。它宣布州长的职位空缺，任命了一位新州长。克莱本·杰克逊则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措施，组建了一个亲邦联的影子政府，并于 11 月被邦联正式承认。

7 月 25 日，约翰·C·弗里蒙特抵达圣路易斯，就任“联邦西部战区”指挥官。弗里蒙特曾为原落基山脉的探险者，加利福尼亚的“熊旗”起义的英雄，共和党第一位总统候选人。他既有军事经验，又有政治手段。但是，密苏里混乱的形势却使他难以应付。游击战在全州各地开展起来，两支邦联部队正在南部边境地带集结，准备进犯。在弗里蒙特抵达后 4 天，一支 6000 人的叛乱部队从田纳西渡过密西西比河，占领了新马德里，直接威胁着驻守在伊利诺伊州开罗河水流汇合处联邦军队。

弗里蒙特决定增援开罗，但他不得不首先阻止驻守密苏里西南部斯普林菲尔德的纳撒内尔·莱昂的 6000 人部队的增援。莱昂的对手是由斯特林·普赖斯的密苏里人和原得克萨斯突击队员本·麦克卡洛克将军率领的邦联的支持者组成的杂牌军，面对两倍于自己的敌人，莱昂的部队有半数即将届满三个月的服役期，而且缺乏给养，远离基地，他面临这种种问题，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撤退。但他又不愿未经战斗就放弃密苏里南部。他受到一种鲁莽和跃跃欲试的冲动所驱使，决定在离斯普林菲尔德 10 英里处的威尔逊克里克对邦联军队的营地发起突然袭击。他果断地将他的小股部队分兵两路，由弗朗兹·西格尔将军率领 1200 人从侧翼袭击

邦联军队后方，他亲自率领4200人从正面进攻。两队人马于8月10日拂晓发起进攻。由于是奇袭，联邦主义者开始时打得很顺利，装备极差的叛乱部队在联邦军队的钳形攻势下仓惶撤退。然而，在关键时刻，西格尔透过硝烟看见一支穿蓝军装的部队（联邦军装颜色）出现在他的前方，他以为那是莱昂已经攻破了邦联军队的阵线，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开火。然而穿蓝军服的不是友军，而是一个路易斯安那的团。如同战争初期双方许多部队一样，他们穿的军装也是自己选择的颜色和式样。这些路易斯安那人未受任何阻击便使用毁灭性的火力压住了西格尔的军队，把他们打退。莱昂此时面对三倍于自己的敌人，拼死抗击敌人的不断的攻击，但他的部队伤亡太大，弹药也所剩不多了。莱昂阵亡后，当时战场上未负伤人中的最高指挥官（一名陆军少将）决定下令撤退。这些联邦军队官兵狼狈不堪地撤回斯普林菲尔德，又向北撤退100英里，到达铁路终点罗拉的军备供应站。

邦联在威尔逊克里克这次规模虽小但却凶残的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双方各死伤1200人）使密苏里南部和西部有直接遭受邦联侵犯的危险。普赖斯率领着10000人向北前进，边走边招募新兵，一路直趋密苏里河。在列克星敦，普赖斯以18000人的兵力包围了只有3500人的联邦驻军。弗里蒙特从与游击队作战的任务中几乎抽不出什么兵力来，但他还是设法拼凑了两个小型旅去增援列克星敦，这支增援部队的人数太少，并且为时太晚了。9月20日，联邦驻军投降了。

弗里蒙特在两个月内就丧失了将近半个密苏里。他的问题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官，他面临着一系列等待处理的复杂问题，军备承包契约必须签订；给养、武器、马匹和大炮必须立即得到供应；海军炮舰必须修造；新兵必须加以组织和训练；交通要道易阻塞问题必须解决；同情叛乱的分子必须受到监

视；联邦主义者内部纷争的派系必须统一。弗里蒙特对于处理这些问题无能为力，而又得不到千里之外的华盛顿政府的帮助。由于他太老实，被急于靠军需发财的承包商弄得不知所措，贪污受贿的报道屡见不鲜。联邦密苏里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国会议员、现任陆军上校布莱尔也转而反对弗里蒙特，并开始策动将他调离此任。

弗里蒙特被这些问题搞得心烦意乱，而对游击队日益增长的活动又惶惶不安，因此他采取了孤注一掷的作法。8月31日，他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全州实行军事管制，在联邦防线后抓获的游击队员将处于死刑，没收密苏里境内所有邦联支持者的财产，并解放他们的奴隶。这项命令的发布等于捅了马蜂窝。废奴主义者和许多共和党人将弗里蒙特捧为懂得如何将叛乱分子斩草除根的将军。但是，一位密苏里东南部的游击队头目宣称，如果北方佬杀死他们一个人，他就将“林肯的走狗绞死、挖心和分尸。”¹⁰从密苏里到马里兰，拥有奴隶的联邦主义者威胁说，如果弗里蒙特解放奴隶的命令付诸执行，他们就叛逃。因关系到边境州是否忠于联邦的重大问题，林肯认为不能让弗里蒙特的行动付诸实施。他通知这位将军，未经华盛顿方面批准，不得处决一名游击队员。同时，他还私下建议弗里蒙特修改他的没收财产和解放奴隶的命令，使其同国会在8月6日颁布的没收财产法一致，国会在没收财产法中规定，只有邦联用来作战的财产和奴隶才予以没收。弗里蒙特拒绝采纳林肯的建议。于是，林肯公开命令他修改他的公告。

总统还决定更换一个密苏里的指挥官，那里搞军备承包契约的受贿丑闻人人皆知。弗里蒙特深知只有依靠军事上的胜利才能拯救自己，他聚集了38000人，由自己亲自指挥。这些联邦战士把普赖斯的军队几乎再次赶到了阿肯色一线。但是，正当弗里蒙特准备同敌人进行最后的较量时，一道解除他指挥权的命令于11月2日

送到了他的指挥部。他的继任指挥官认为部队已过于疲乏，遂下令将其撤到密苏里中部的基地去。11月19日，亨利·W·哈勒克将军接管了新开辟的密苏里战区的权力（还包括肯塔基西部，格兰特也划归哈勒克指挥）。哈勒克是从事军事研究的学者，他有几部战略方面的专著和译作（绰号“老脑筋”），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将军，靠书本指挥作战，他具备弗里蒙特所欠缺的行政能力，很快便将密苏里混乱的组织机构整顿得井井有条。

在内战期间，大约80000名密苏里白人（以及8000名黑人）在联邦军队服兵役；至少有30000人参加了邦联军队，有3000多人参加了南部游击队。游击队中有臭名昭著的威廉·匡特里尔，他的队伍里时常混有像科尔·扬格、弗兰克和杰西·詹姆斯这样的亡命徒。这些游击队的破坏能量简直超乎他们的人数比例。堪萨斯废奴派游击队员立即组成了反对这些游击队的兵力，他们越过边境进行的袭击活动，使堪萨斯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不断地进行残酷战斗。尽管密苏里地处这场战争主要战场的边缘地带，而它遭受袭击、小规模战斗以及游击队骚扰的破坏却要比其它州严重得多。

后来，这四个边境蓄奴州经历了各不相同的过程，尽管它们有相当数量的人支持邦联，但它们还是留在联邦内。这场战争本身还创立了一个第五联邦边境州——西弗吉尼亚。

西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西部地区有横贯其间的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巴—俄）铁路线，有流经该地区或其边界200英里的俄亥俄河，故被称为战略要地。1861年5月，邦联军队在哈珀斯渡口以西地带切断了巴—俄铁路线，从而对这个重要地区进行了第一次打击。乔治·B·麦克莱伦将军承担把他们赶出这个地区的任务。他在俄亥俄州组织

了一支20000人的军队，并派遣了一支先头部队于5月底渡过了河。这支部队占领了巴—俄线上的格拉夫顿，然后又向南行进了15英里，于6月3日拔除了邦联在菲利普的一个小前沿哨所。邦联向弗吉尼亚西部派去了由罗伯特·加尼特将军率领的增援部队。加尼特在菲利普以南20英里处的山里把守着两个山口。此时，在哈珀斯渡口的邦联驻军受到联邦军队从背后向他们推进的威胁，另一支联邦军队在正面的波托马克河对岸集结，他们只好撤退到温切斯特附近一个更易于防守的地带。

联邦军队此时控制了巴—俄线，但麦克莱伦的计划还不仅仅是夺回这条铁路。他率领12000人分两路前去袭击加尼特的5000人部队。一路佯攻劳雷尔山的最难攻克的山口，另一路于7月11日猛攻里奇山的邦联阵地。麦克莱伦采纳了威廉·S·罗斯克兰斯将军制定的作战计划，并派他的旅从背后包围并袭击叛乱部队，而主力部队则从正面发起进攻。罗斯克兰斯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的部队勇猛地冲进了邦联军的设防，将幸存者赶进了贝弗利城，550人在那里举手投降。麦克莱伦的正面进攻显得薄弱，使其余的敌人向北溃逃，在途中与另一支从劳雷尔山撤退下来的邦联军汇合。7月13日，联邦的追击部队在卡里克斯浅滩袭击了邦联军的后卫部队，加尼特在企图集合他的溃散的部队时被打死。

联邦军队以不足100人的伤亡代价给邦联造成了10倍于自己伤亡人数的损失，其中包括700名俘虏。被打败的南部军队向东逃窜，将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大部分弗吉尼亚领土让给了联邦。虽然取得这些胜利的许多功劳应归于麦克莱伦的部下，特别是罗斯克兰斯，但是麦克莱伦善于在撰写电文中标榜自己。北部的报刊称赞这位34岁的将军是“年轻的拿破仑”，说他将开进邦联的山区的侧翼，并将长驱直入里士满。但是，即使在崎岖的阿勒格尼山道上运送给养这样困难的问题得以解决的话，麦克莱伦的兵力太少而

难以胜任。麦克莱伦的大部分兵力要用来保卫铁路和防御游击队和骑兵部队袭击其他军事要地以及对付意料中邦联军队的反击。

里士满政府派罗伯特·E·李去夺回弗吉尼亚西部。李是旧军队中最有希望的军官之一，他已于4月18日拒绝了林肯要求他负责指挥联邦陆军的任务，并于两天后辞职。李对蓄奴制不感兴趣，并反对脱离联邦，但他又不愿“用我的手去打击我的故乡。”在国家与故乡之间，他选择了故乡。他在里士满当了一段文职将军之后，于7月28日到西部山区担任正在重新组织的15000人邦联部队的总指挥。这些部队面对的是占领着弗吉尼亚的整个阿勒格尼的11000人的联邦军队。李决定袭击驻扎在奇特山山口的一个联邦旅，而通过这个山口，就是连结谢南多厄山谷的斯汤顿与俄亥俄河岸的帕克斯堡的大道。由于暴雨的阻截以及部队中流行的麻疹和伤寒病的困扰，他手下三分之一的人都病倒了。李的复杂的围攻部署于9月12日化为泡影，他只得战而退。

后来，李南下至卡诺瓦谷，负责约翰·弗洛伊德和亨利·怀斯的旅的指挥工作。弗洛伊德和怀斯是弗吉尼亚的政治家，这两个人并不是积极去打击敌人，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勾心斗角。李将怀斯调回里士满，从而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争斗。但他诱攻罗斯克兰斯指挥的一支联邦部队的计划却落空了。此时，罗斯克兰斯已退回到严密防御的地位，使李难以进攻。疾病、中伤、将领间的不和以及在崎岖山路上运输给养的重重困难已经将李压垮了。虽然他将罗斯克兰斯阻挡在谢南多厄谷以外，他的3个月的远征却宣告失败了。南部报纸称他为“李婆婆”，批评他连吸引北军作战的本领都没有，更谈不上动摇他们在弗吉尼亚西部的统治了。李还未来得及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就险些由于出师不利而毁了自己的名声。

联邦在弗吉尼亚西部所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地区的居民很少有人拥有奴隶。数十年来，这里的

人们一直对苛捐杂税以及被排斥在州政府之外而怨声载道。他们同那些“潮汐区贵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的经济与文化倾向于其东面的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当弗吉尼亚退出联邦时，许多返回家乡的阿勒格尼会议代表决心脱离弗吉尼亚。联邦军队到达这里时，发现群众集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许多西北部的弗吉尼亚人像欢迎救世主一样地欢迎联邦军队。来自整个阿勒格尼34个县的代表们在惠灵举行了两次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他们于8月2日表决通过了将自身组成为弗吉尼亚合法政府的决议。紧接着这次会议又通过了一项法令：于1861年11月在惠灵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一个新的州，这个州将被命名为“卡诺瓦”（后来改为西弗吉尼亚）。此项动议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获得通过，在表决时，只有效忠联邦的人才允许投票。1862年5月，一个联邦主义的“议会”宣告了这个新州的诞生。该议会从理论上代表整个弗吉尼亚，但实际上仅代表西部诸县。这种做法在技术上应验了美国宪法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即未经所在州议会的批准，不得在所在州境内成立新州。

尽管这些程序是非正规的，联邦国会于1862年终于承认西弗吉尼亚为一个州（在要求其废除蓄奴制之后）。这个新州有50个县，然而在其中将近半数的县内，可能亲南派占大多数，这些人表示宁愿作为邦联的弗吉尼亚的一部分。西弗吉尼亚送25000人参加了联邦军队，尽管他们中许多人仍受着叛乱游击队的约束，这些游击队在整个内战期间都出没在这一带山区。大约有15000名西弗吉尼亚人为邦联作战。同密苏里一样，西弗吉尼亚在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打自己的内战。

东田纳西州

林肯政府希望东田纳西能发动一次联邦主义的起义，像西弗

吉尼亚一样使那个地区重归联邦。1861年9月,在联邦军队占领了肯塔基北部后不久,联邦代理人即同东田纳西的联邦主义者取得了联系,准备共同发起地方起义,由北军从肯塔基穿过坎伯兰隘口侵入东田纳西。这支入侵的小部队的指挥官是乔治·H.托马斯将军,他是弗吉尼亚人,一直效忠联邦。

10月底,田纳西的联邦主义者按计划开始焚毁桥梁,破坏邦联的运输线以及为他们的北方救世主而去削弱敌人的抵抗力,但是北军没有到来。联邦俄亥俄战区指挥官唐·卡洛斯·比尔将军担心邦联可能会对肯塔基中部发起突然袭击,便撤销了托马斯的入侵计划。他说,道路糟糕透顶,山道崎岖不平,冬季已经来临,一支联邦占领军即使能够到达那里,也难以在如此困难的郊野坚持下去。他坚持认为,正确的军事行动路线应该是紧靠田纳西中部和西部的河流沿岸一带。由于得不到外界的支持,东田纳西的抵抗力量于11月被打垮了。邦联士兵逮捕了许多联邦主义者,处死了五名,其余的全被囚禁起来。

比尔对这次冬季进攻所持的悲观态度是正确的,但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不断的压力使他违心地命托马斯于1862年1月南下。冬季的雨水使托马斯的马车和大炮陷入泥潭中,深至车轴,那道路比印第安人的小路强不了多少。他手下的5000人中有五分之一的人生了病,或在赴洛根交叉路的90英里的行军中掉了队,而那里距离坎伯兰山口还有80英里。一支4000人的邦联部队在乔治·克里坦登和费利克斯·佐利科弗的率领下,于1月19日拂晓在洛根交叉路给了托马斯一个突然袭击。联邦的士兵们虽然一开始被打得向后败退,但他们很快集合起来,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击毙了佐利科弗,彻底打败了叛乱分子。这对托马斯来说是一次关键的战术上的胜利,但其战略意义却微乎其微。在寒冷的冬季,若想在坎伯兰河以南的荒山野岭中向前推进是不可能的。直到春天,西田纳西的重

要战役将联邦军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边的战场。使林肯感到悲哀的是，东田纳西注定还要被邦联控制一年半的时间。

纵观全局，1861年上南部重大斗争的结果可能对联邦有利。尽管这个地区有4个州(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阿肯色)倒向邦联一边，这个损失仍可由同上述州人口数量相等的5个边境州来弥补(包括西弗吉尼亚)，这5个州支持联邦。这5个州的粮食、耕畜、铁、铅、盐以及其它军需物资的产量高于邦联的4个州。联邦控制的肯塔基北部以及密苏里提供了通向西部战场那些主要河流系统的战略要道，这使北部在1862年通过水路成功地向邦联纵深地带入侵。虽然联邦边境州有将近10万人为邦联作战，而在上南部的邦联州，最终为联邦作战的人数至少有45000名白人和相同人数的黑人。

然而，在1861年春季，大多数事态还要看将来的发展。在这场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双方的主要精力还只用于宣传鼓动、训练和装备各自的陆军和海军以及制定如何用兵的战略方针。

第十一章 战争动员

组织武装部队

对战争之无准备状况

没有一个国家像1861年美国那样对一场重要战争缺乏准备了。不足16000人的正规军分成小部队分驻在全国各地，大部分驻扎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将近三分之一的军官正准备辞职而加入邦联。设在华盛顿的陆军部还在昏昏沉沉地干着和平时期的例行公事；8个军事机关的指挥官们除一人之外，全都是1812年战争以后一直服役的老军人。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年已74岁，并且患有浮肿和头晕病。那里没有一个像总参谋部这样的机构，没有精确的军用地图。当亨利·W·哈勒克1862年着手指挥西部战场的战役的时候，他使用的是从一家书店买来的地图。西点是一所优秀的军事学校，但它的过硬专业是工程学、数学以及筑城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几乎不学战略学、参谋工作及战场上的战术指挥。西点军校的许多毕业生，包括乔治·B·麦克莱伦，尤利塞斯·S·格兰特，威廉·T·谢尔曼，托马斯·J·杰克逊，杰斐逊·戴维斯以及布拉克斯顿·布雷格都已辞去军职而从事文职工作。

海军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90艘军舰中只有42艘能使用，其余大部分都停泊在远处水域的军事基地，仅有三艘能用于执行美国沿海的紧急任务。海军受的是深水作战训练，对沿海和沿岸的实战则缺少经验，而这在内战中将是非常需要的。的确，海军的军官们对外国的沿海防御工事和要塞比对南部的更了解，因为他们从来

未想过会攻打自己的要塞！

从理论上，州民兵是一支由所有适龄青年组成的后备军，但实践起来又是那样荒谬可笑地缺乏理论根据。民兵在战争中经常是不太可靠的；到19世纪30年代，它已成了和平时期被人嘲弄的笑柄。民兵的集会往往成了狂饮的节日。这些民兵组织很不认真对待操练。一些民兵团是墨西哥战争期间招募而来的，他们没有参加过战斗，因为那次战争依靠的主要是志愿军团。到19世纪50年代，自愿原则已普遍取代了全民义务兵役制。精锐的志愿兵连队在南北各地普遍组织起来。一些州认识到这种必然趋势，将这些连队按民兵建制而组织，让他们去做一切实际工作，但是自愿的，有选择的，而不是强迫的，绝对的。他们主要是社会团体而不是军事组织，因此不需要真正的军事训练和纪律。然而，正是这些人首先响应了1861年的征兵号召。

南、北双方都普遍认为，这场由民兵参战的战争不会长久。美国人是以墨西哥战争作参考，那场战争的实际作战阶段仅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结果征服了一个比邦联还要大的国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859年的法—奥战争持续了不到3个月。萨姆特要塞陷落后，《纽约时报》预言道，南部的这种“地方动乱”只要“30天”就能平息下去。《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它可能需要两个或三个月。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没有大多数人那么乐观，但也坚信这场战争会于1862年春取得胜利。邦联的估计更不现实。许多南部人看不起北方的新英格兰人，认为他们是“庸俗的，狂热的，骗人的跳梁小丑”。一位北卡罗来纳人称北方人为懦夫：“只要对着那些地地道道的新英格兰人开三、四炮，他们就会像绵羊一样地四处逃散。”许多南部人相信叛军能够以一当十，因为“北部军队是由世界上的渣滓组成的，而我们的官兵均有崇高而古老的南方高贵血统。”¹

当然，并非所有的南部人或北部人都抱这种幻想。杰斐逊·

戴维斯和他的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试图告诫他们的下属，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艰苦的战争。在萨姆特刚一陷落，威廉·T.谢尔曼就撰文说：“我认为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非常持久的——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想象的都要持久的战争。”谢尔曼在评论林肯关于征募75000名服役期为3个月的民兵的号召时说道：“你也是想用水枪喷灭一座熊熊燃烧的房屋的大火。”²

但这只是在1861年春天热血沸腾时期少数人的意见。双方的男人在战争结束前都踊跃地报名入伍。他们都怀着想看看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模糊而又非常罗曼蒂克的思想。他们幻想中的战争该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军乐队、旗帜、大队人马迈步通过广阔的战场，走向光辉的胜利。即使有牺牲，也是光荣而毫无痛苦的。谁也不去想象那泥泞的道路、令人窒息的尘烟、筋骨酸痛的疲劳、烧灼般的干渴、饥肠辘辘的绞痛、行军或露营中刺骨的寒冷和令人头昏的炎热；那枯燥的军营生活，部队简陋医院中痢疾患者肠肚撕裂的疼痛或伤寒病人神志昏迷时的胡言乱语；战斗中的硝烟、轰鸣、混乱和恐惧，外科手术帐棚中的斑斑血迹、高声尖叫和截下的肢体。即使预见到一场持久战争的人也绝难想象这场战争需要动员如此多的人力物力，绝难想象这场战争最后会如此野蛮地摧毁这些生命和资源。

征兵与给养

林肯认识到，即使打一场短期战争，三个月的兵役期也是不合适的。5月3日，总统发出号召，招募42000名服役期为3年的志愿兵，为扩充正规军而补充23000名新兵并直接为海军招募18000名水兵。林肯采取这些措施的唯一法律根据，是他作为总司令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所拥有的权力，但他希望国会在7月14日开始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批准他的行动。国会批准了他的行动。在他提交给特别

会议的咨文中,还要求批准至少再招募40万志愿兵,国会批准了50万。最后,根据1861年总统与国会的这个决定,共招募了70万,其中大部分新兵的服役期为3年。一些服役期为3个月的团又重新被改为3年,许多其它民兵部队的士兵在他们服役期满后又被应征到服役期为3年的新团。

征召一个3年服役期的团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些重要人物成立一个征兵办公室,并负责组织征兵集会,当入伍的人满100名后便被编成一个连,当时的十个连组成一个团。根据长期以来在民兵和志愿兵中形成的传统作法,大部分连的士兵选举产生连级军官(上尉及中、少尉);而连级军官再选举团级军官(上校,中校和少校)。州长正式任命团级军官,但通常任命那些由下级军官选举上来的人。实际上,各级军官的选举常常取决于他们组建连队时所起的作用或者他们的政治影响。军官的当选往往是对他们的领导资格在形式上的认可。征兵与部队编制主要以地域为基础。一个连,有时甚至整个团的人都来自一个城镇,县或市。联邦军队中许多团的组成是由种族决定的。许多团,有时整个旅主要由美籍德意志人或美籍爱尔兰人组成。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军服和其它装备由各州或地方提供。这就使得军装的颜色和式样各不相同,从深蓝色上衣和浅蓝色裤子的正规军军装到根据著名的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军军装制作的华丽的“义勇军”军服。最初,一些联邦团穿灰色军装,而一些南部同盟部队着蓝色军装,结果在早期的战斗中经常造成悲剧性的误会。直到1862年,联邦军队的军装才一律改为蓝色。

北部征兵过程明显表明,地方一级的积极性很高,然后上至陆军部,效率一级不如一级。征兵动员工作也是各行其是。陆军部长西蒙·卡梅伦力不胜任。当各个团开到各州集合地点或训练营地时,都出现军用物资严重缺乏和混乱现象。尤利塞斯·S·格兰特

将军在1861年11月从他的伊利诺伊开罗基地发来的报告中抱怨说：“运输工具严重不足。我没有救护车。收到的衣服大都质量低劣而且数量不足。……军需部门的资金太少，因此政府的贷款已经用完。”格兰特在圣路易斯的上级亨利·W·哈勒克将军以简短的语言作了形容：“这里的情况一团糟。”³

由于1861年急需签定战争物资承包契约，出现了一系列的丑闻和对牟取暴利的指控。少数服装承包人供给部队的是用碎羊毛料压制而成的布片制做的军装，这种布料被称为“软再生毛”，只穿几个星期便撕裂了。直到国会设立了一个监察委员会，由埃德温·M·斯坦顿于1862年1月接替了劣迹昭彰的卡梅伦的陆军部长职务，契约和供给联邦军队的给养才真正照定单和效率办事。迄1862年为止，北部军队大概成为有史以来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但是毫无作战准备的整个社会还需要整整一年才能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

从某些方面来说，南部的战争动员工作较北部进展得迅速。尽管邦联开始时没有正规军或海军，并且几乎不具备创建海军的条件，但南部的许多志愿兵连在他们的州一退出联邦就立即改为战时编制。1861年3月6日，在攻打萨姆特之前5个多星期，邦联国会就批准招募了10万志愿兵，5月又颁布了两个再增加40万人的征兵法令。虽然南部的人力资源还不到北方的三分之一，但到1861年7月，它进入战争状态的部队却已几乎相当于联邦的三分之二。

南、北双方的征兵过程颇为相似，州和地方采取主动，向陆军部输送志愿兵的数量超过了其装备能力。被脱离联邦州夺取的美国军火库内存有15万支滑膛枪，但其中大部分都过于陈旧，许多已不能使用。邦联的志愿军士兵大都携带自己的武器。许多连队开始时背的是散弹枪、猎枪以及老式燧发枪。在1861年，各团都穿各自

的军装,样式与颜色之杂与联邦军队一样。邦联规定了学生灰为统一军装颜色,但却从未能统一起来。许多士兵根本穿不上像样的军装;最常见的颜色是“灰胡桃”色,一种由灰胡桃树皮或胡桃壳制成的染料染成的灰褐色。

陆军编制

联邦和邦联陆军在编制上大体相同,基层部队是团;三个战斗兵种是:步兵、炮兵和骑兵。步兵是炮兵和骑兵的中坚力量。内战期间,联邦征召了相当于2047个团的陆军兵力:1696个步兵团,272个骑兵团和78个炮兵团。邦联方面团的数目或大概数目不详,因为当时的纪录丢失或毁掉了。但据估计有764个到1000个团。

一个步兵团有10个连,每个连的正式编制为:82个二等兵,13个中士和下士,2个少尉(邦联一些团设3个)和一个上尉。团指挥官是一名上校,其次是一名中校和少校,再其次是一个小型的参谋部。因此,一个步兵团的正式编制大约1000人。新兵入伍时,大多数团都接近这个总数;但疾病、伤亡以及开小差现象很快便使这个数字减少。到战争第二年,双方的老团平均战斗人员不足500人;到第三年和第四年,平均为350人或不足;到1863年为止,许多团实际参战人数还不到200人。

各州宁愿成立新团,也不愿补充老团,使其达到应有的编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每一个新团都通过任命战场指挥官,为州长提供一次官职任命权,赋予有雄心壮志的人以使命,而这些人若加入到军官编制已满的老团的话,他们就得不到被任命的机会;二、各团按地域编制使前方将士同后方同胞之间产生了一种固有的彼此感情相通和自豪的关系,如果一个团里掺进了外地人,这种感情就会被削弱。大部分地区后来都为“它们的”老团补充一些新兵,

但这些团的编制一直未能满员。1862年夏秋之际，在联邦陆军招募的服役期为3年的42.1万名新兵中，仅有5万人被编入老团。指挥作战的将军们一再批评了这种效率低而代价高的征兵制度。但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为供养一支由民兵组成的志愿军所花费的代价。随着征兵任务的到来，应征者与补充者可以被分配到老团去。由于邦联的征兵比联邦开始得早，它各个团的编制稍微接近满员——但双方的差距不很大。

联邦骑兵团每个团有12个连，而不是10个连（在骑兵中称骑兵团），除这一点外，其编制与步兵团相同。炮兵有两种：驻守永久性要塞的重炮部队和跟随快速部队作战的轻型或野战炮兵部队。因为邦联自攻下萨姆特要塞后极少进攻联邦要塞，一些联邦“重炮”团在战争后期被改编成了步兵团。野战炮兵的基本战斗单位是炮兵连，装备有4—6门大炮及炮车和用来拖拉大炮和炮车的4—6匹马。炮兵连的指挥官是一名上尉，它的编制大小与步兵连相同，所不同的是炮兵连在编制上一般要保持接近满员，因为发射炮火和管理设备必须有足够的人负责。

步兵团，间或有一些骑兵团被组成旅，由一名准将指挥。起初是4个团组成一个旅，在以后的战争中，随着团的编制的缩小，又扩大到5—6个团。3个或4个旅组成一个师，师长通常由少将担任。在内战的第一年左右，陆军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师，但到了1862年，双方都采用了军这种更大规模的编制，一个军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师（通常为3个）。在邦联，军长由中将担任，而在联邦陆军中由少将担任（1864年至1865年期间，北方除格兰特外，再没有比少将军衔更高的军官）。炮兵连根据战斗势态的需要，可以组成旅、师或者军。

联邦与邦联在陆军之间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不同。联邦政府向它的骑兵和炮兵调拨马匹，而邦联则希望这些兵种的官兵们自己

解决马匹问题。由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买得起军马，这就在邦联军队中，特别是在骑兵与步兵之间造成了等级差别。从某种程度来讲，邦联像保留贵族的珍藏一样保留了中世纪的骑兵传统（“武士”或骑士）。然而，在实际上等级差别并不大，尤其是在邦联西部的陆军中，在那里当一个人没有战马时，他有机会偷一匹或从敌人手里缴获一匹。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所属部队的骑兵几乎不是人们所想象的贵族。偷马探险是骑兵的一种重要才干，而且被福里斯特麾下认为是一种高超技艺。

领导与者部队训练

在许多方面，邦联军队同它的敌人一样实行充分的民主，或许比它的敌人还多一些。约翰尼·里贝的连级军官也 同样通过选举产生，甚至有的团级军官也如此。无论是北部还是南部，职业军人都对这种作法表示遗憾。但在志愿军里，士兵们对选举这类事已经习惯了，他们选举自己的州长、国会议员及总统，所以在他们看来，选举军队领导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如杰斐逊·戴维斯所说的那样：“这些部队来自平民。……由这些人组成的部队，谁又那么善于评价一个连、一个营或者一个团的指挥工作是否得当呢？”任何一个聪明的公民都能学会政治家或军人的技能，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信念。大多数平民都深信，一个普通的律师或商人能够“一开始就将他的所有专业特长教会给一个普通军官，并且使其在一年后在该行业中击败自己”。⁴

人们不难想象这种制度会给军队纪律带来何种影响。士兵们起初只愿遵从那些他们认为合理的命令。有些人认为过去在家乡时是同自己地位平等的邻居，此时已是佩带肩章的上级，人们对此很难转过弯儿来。如果执行纪律就意味着自己可能在选举中下台，或者可能在战后本县的选举中遭到失败，军官们就不愿执行它。军

官们被他们的部下瞧不起也是常有的事。许多军官对如何训练和指挥士兵知之甚少或毫无所知。一名宾夕法尼亚士兵于1861年写道：“罗伯茨上校对大部分简单军事动作要领一窍不通。我们的团没有一套管理制度……。我们只能被称作一群不能与敌人交战的乌合之众。”但是，如果相信邦联职业军人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敌人情况也并不妙。哈珀斯渡口驻军指挥官约瑟夫·E·约翰斯顿将军于1861年7月抱怨说，他的军官和士兵是如此之缺乏“纪律和训练”，因而“无法将他们送上战场”。在谈到一个团时，约翰斯顿说：“我不愿用一个正规连去换一个整团。”⁵

由于认识到一个军官能力应具有起码水准，联邦军队于1861年7月对军官们进行了一次考核。不及格者将由及格者来接替。虽然这种考核并没有废除新团的军官选举制度，但却起了一定作用，使得那些选拔出来的军官具有一定的水准。老团里的提升晋级依靠的是功绩，而不是选举，尽管州长对军官的任命仍起作用一事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消除政治色彩。到1863年，联邦军队实质上已废止了军官选举制度。邦联在这一点却落在其后。虽然南部于1862年10月建立了军官考核办法，但直到战争快结束时，邦联国会才废除了连队实施的军官选举制度。

尽管如此，在战争的最初一两年间，邦联军官的素质或许比联邦的同等级别的军官要强。南部的军事传统以及像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这样的高等军事学府培养的一大批毕业生，为它的军队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指挥官。1861年弗吉尼亚诸团的军官中有一半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该学院的1902名毕业生中就有1702人在邦联军队中供职，南部其它州的高等军事院校毕业生去向也大体如此。而北部在这一点上是望尘莫及；联邦军队大多数连、团级军官不得不在实践中学习军事业务。

1861年从美国正规军辞职后加入邦联军队的313名军官也成

了邦联军队的领导骨干。当然,其它767名正规军军官仍留在联邦军队,但遵照温菲尔德·斯科特作出的一项政策性决定,他们大多数人仍留在联邦正规军里,没有被派到志愿军团队去发挥他们军事教官和指挥官的骨干作用。斯科特需要在策略上保持他认为可以完全依赖的这个唯一战斗实体——正规军作为志愿军的榜样,而不是作为他们的领导。后来,虽然有几百名正规军军官被允许加入了志愿军,但许多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仍一直在这支小小的正规军里任上尉、中尉或少尉,而志愿团却在那些从平民中提拔的上校的指挥下一路跌跌撞撞。南部在利用训练有素的军官去熏陶它的志愿军方面较北部领先了一大步。

双方大多数将军都出身平民。在583名被联邦军队授予将军军衔的军官中仅有194人(占33%)在战争初期在正规军供职,有70人(14%)上过西点军校或其它军事学校。在邦联的425名将军中有125人(占29%)来自正规军,有69人(占16%)上过包括西点在内的高等军事院校。

双方军队中非职业军人出身的军官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因政治影响和派系关系而被任命的“政治将军”和大多由于战功卓著而从较低级军官提升的“平民将军”。这些政治将军得到了一个军事上无能的名声,这多少有点咎由自取。虽然南部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如人们公认的约翰·弗洛伊德、吉迪恩·皮洛、亨利·怀斯和罗伯特·图姆斯,但“政治将军”这个字眼通常指像本杰明·巴特勒、纳撒尼尔·班克斯、约翰·麦克勒南德、小弗朗西斯·布莱尔等这样的北部人。那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其中有些是战前的民主党人,在军内担任职务是为了赢得北部各选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他们有些人得到任命是对他们招募大批志愿军的奖赏;有些人的任命是由于有重要州长或国会议员的举荐;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是种族集团的领袖,如弗朗茨·西格尔和卡尔·舒尔茨均在美籍德

意志人中享有重要的地位；而“爱尔兰旅”的指挥官托马斯·马尔则为了这场战争协助动员了他的同胞。

这些政治将军的指挥能力相当于选出的连级军官的指挥能力，但两者都是民主社会的民兵部队所必需的。职业军人不满意这种状况，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必要性。哈勒克将军在就任总参谋长之后感叹道：“将重要的指挥权交给像班克斯、巴特勒、麦克勒南德、西格尔以及卢·华莱士这样的人简直比谋杀强不了多少，但似乎又势不可当。”⁶这种政治任命制度有利也有弊。格兰特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少将旅长是由于他的朋友伊莱休·沃什伯恩，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的影响。谢尔曼得到同样级别的任命是由于政治上的裙带关系，这种裙带关系还包括他的弟弟、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一些最有政治性影响的将军逐渐成了最高级别的军人，而许多西点军校毕业生却令人惊叹地名落孙山。不管怎样，职业军人掌握着大部分最高指挥权：在60次最大的战斗中有55次是由他们指挥的，西点毕业生承担了双方军队的全盘战略指挥任务；在其它5次战斗中，也有一次是由双方的职业军人指挥的。南、北双方的一些政治家和非职业军人抱怨说，“西点派”形成了一个封闭集团，它剥夺了外界的贤能者被提拔的机会。

在内战开始的第一年，大部分军官和类似军官的人都是未经过训练的新兵。按照欧洲军队的标准，美国新兵简直就是武装起来的群氓。军官们在训练他们的士兵们之前，必须先教会自己。在反映内战的文学作品中尽是描写上校和上尉为了比他们的士兵先学一步而在午夜煤油灯下学习关于操练及战术法典的情景。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北部最高层领导人中，如亚伯拉罕·林肯为了当好总司令，阅读了大量有关战略方面的书籍。最后，这些美国志愿军成了顽强的、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可以同任何欧洲军队在军

事技术上匹敌；而且他们在动力因素上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有比历史上任何军队都高的文化素养，他们作为普通公民和选民更懂得为什么而战。

这些民兵所具有的平等主义思想还要求军官不仅仅是指挥员，还应该是领头人。尽管内战期间指挥员可以待在后方指挥所，但屡建战功的指挥员都是亲临前线，而不是在后方指挥所指挥作战。从双方军队的伤亡比例来看，军官阵亡率高于士兵。邦联陆军伤亡人数占全军总人数的12%，而在战争中伤亡的将军却占将军总人数的18%；联邦将军的阵亡率占将军总人数的8%，而全军阵亡率占总人数的5.5%。

海军与海上封锁

邦联海军

如果说在内战开始时邦联陆军的备战工作好于它的敌人的话，那么海军的情况则正相反。实际上，邦联几乎没有什么海军。在1861年期间，美国共有1457名海军军官和7600名水兵，其中只有237名军官和一小部分水兵叛逃到邦联。南部人是尚武而不善航海的人民。主要的造船业都在北部；全国的商船都归北部所有；大部分商船船员都是新英格兰人。在这种情况下，邦联海军部长斯蒂芬·马洛里在白手起家创建一支海军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邦联自己制造或在战斗中缴获了130多艘战舰，大部分都属只能装载一门炮或几门炮的小艇，但到战争末期，他们已经造好的或正在制造的装甲战舰就有37艘，其中有一些是“撞角舰”，舰首装有沉重的铁角，专门用来撞沉敌人的军舰。但因为南部缺少工业生产能力，致使邦联没有一家机械厂能制造一台足以发动这些军舰的引擎，所以大部分撞角舰只能闲置一旁。

但是，邦联也确实为海军参战搞了一些技术革新。著名的是重新改造了被缴获的“梅里麦克”号战舰，使之成了第一艘参加战斗的装甲舰。南部还研制了各种不同的水雷(叫作“鱼雷”)，这些水雷炸沉或炸毁了43艘联邦军舰。邦联制造了若干艘“鱼雷艇”，这是些雪茄烟状的小型半潜水舰艇，载有一颗装在圆筒上的水雷，这只圆筒从船头伸向前方。南部还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战斗潜水艇邦联“亨利”号，这只潜水艇在试制过程中曾三次潜入水底，但每次都牺牲一些船员，后来终于在1864年2月17日在查尔斯顿附近海面用鱼雷击沉了一艘联邦封锁舰，结果“亨利”号同这艘封锁舰同归于尽。

邦联海军最突出的战绩就是对商船袭击。起初这种古老的官方海盗行动是由私掠船来进行的(由交战一方的政府特准的私人船只，用来掠捕敌方商船)。1861年4月17日，杰斐逊·戴维斯向所有愿意劫掠北部商船的船只颁发了特许证。许许多多的私掠船很快驶出各个小海湾，沿南方海岸掠捕没有武装的商船。

林肯拒绝承认邦联为合法政府，并发表声明进行还击，宣布被俘的私掠船员将以海盗罪被处以绞刑。戴维斯则立即发表声明说，只要绞死一个私掠船员，就要绞死一名联邦战俘。到1861年秋，一些被俘的私掠船员被半死不活地囚禁在北部监狱中，等待审判。尽管法官们和陪审团不愿作出判决，但私掠船中臭名昭著的“戴维斯”号的船员还是被宣告有罪，在费城被判处死刑。戴维斯为了不自食其言，在联邦战俘中实行抽签，中签者——其中包括保罗·里维尔的孙子——将被绞死，如果北部执行费城的宣判的话。林肯犹豫了，最后改变了原来的主张。1862年2月3日，他宣布私掠船员将以战俘论处。

但是到这时，由于联邦之封锁以及中立港拒绝私掠船捕获的船只入港，掠捕商船的活动才告结束。袭击商船的任务改由邦联

海军巡洋舰承担,他们一改私掠船过去的做法,不是将捕获的船只卖掉,而通常是将它们统统毁掉。20艘灵活、行动迅速和全副武装的叛乱巡洋舰在海上游弋,搜索北部商船。在这些巡洋舰中,有几只是英国制造的,最闻名的是“亚拉巴马”号,在利物浦制造,大都是由英国水兵操作。船长是拉斐尔·塞姆斯,亚拉巴马人,退出美国海军后成了邦联最早的海上英雄。“亚拉巴马”号在1862年9月至1864年6月9日在法国瑟堡附近的海域被美国舰“基尔萨吉”号击沉为止,至少摧毁了62艘商船和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其余闻名的掠捕商船的武装快艇是“萨姆特”号,“佛罗里达”号以及“谢南多厄”号。它们的英勇行动使美国商船陷入了瘫痪,始终未能恢复元气。这些武装快艇摧毁了257艘商船和捕鲸船,使700只商船改挂外国旗,并迫使其余大多数船只停泊于港内。如此少量的船只取得了这样令人瞩目的战绩,但对整个内战的胜负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

联邦海军

邦联海军在极其重要的南部沿海和江河上无法同它的敌人抗衡。联邦海军在内战中起了决定作用。尽管战争初期能被调动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舰为数甚少,但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和他的精干的副部长,新英格兰同乡古斯塔夫斯·V.福克斯立即租用或购买了民用船,将它们改造成战舰,并着手签订制造新舰的合同。到战争的最后一年,联邦海军已从1861年时的42艘战舰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一支拥有各种类型战舰的强大舰队,从吃水浅的炮舰到装甲炮舰共671艘。这些战舰承担了3500英里海岸线的封锁任务,迫使从诺福克至新奥尔良的邦联一些要塞投降,并闯进南部的内河系统,直捣邦联的腹地,从而保护了联邦沿海与内河运输给养的庞大舰队。陆海军在南部诸河流沿岸采取的联合

军事行动不仅对西部战场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在战术学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海军在为北部赢得胜利中所作的贡献是同它的人数不相称的。联邦海军大约有10万官兵，仅占陆军总人数的5%。

联邦海军比联邦陆军更正规。极少人因政治原因而到舰艇上任职，连那些确信任何人都能学会陆地作战技术的人都承认，海上作战需要更多的专门技术。联邦海军很快成立了军官考核机构，在1861年期间任命了1000名新军官，其中大多数是从商船船员中选拔出来的，水兵也是通过同一渠道招募的。同志愿兵不同的是，他们从参军的那天起，除了枪炮射击技术外，就已经懂得航海技术。1861年6月，韦尔斯任命了一个海军战略委员会，在陆军里未曾设过相应的机构。

封锁

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封锁。4月19日，林肯正式宣布对邦联港口实行封锁。既然国际法承认封锁可以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武器，那么对邦联的封锁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其交战国的地位，而这一点正是林肯在宣布将私掠船作为海盗论处时所极力加以否定的。虽然联邦的封锁随着战争的进展逐月加强，但却从未完全奏效。对南部189个装卸货物的港口和海湾都进行巡逻是难以做到的事情。但在5月1日，亦即宣布实行封锁后的第11天，海军捕获了第一艘试图突破港口封锁线的船只。在其后的3周内，所有的南部主要港口都处于被监视中。到1864年底，联邦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就有471艘。

邦联需要欧洲的军火和物资，欧洲需要南部的棉花，而通过封锁线运送这些东西又有利可图，这就使突破封锁线的船只生意大为兴隆。其中一些船是破旧的、行驶缓慢的货船，但只是由于战争第一年封锁中存在的漏洞，它们才取得了成功。随着封锁之加强，

冒险性也不断加大，但牟取的利润仍不断增加。英国制造了船体光滑、速度快、专门用作突破封锁的轮船。这些船被漆成灰色，不容易被发现，几乎全部烧无烟煤；而且在设计上干舷低、吃水浅，向后倾斜的烟囱能够和甲板叠合在一起。这些船多次避开了北部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在昏暗的月光下，在南部各港口溜进溜出。拿骚、伯米达和哈瓦那成了这些突破封锁线的船只往来的主要港口。在威尔明顿港下方的开普菲尔河口处有许许多多的小港和浅滩，这是联邦海军在巡逻中最感头疼的港口。

大部分突破封锁线的船都属私人所有，但随着战争的发展，邦联政府及各州政府拥有的这类船只也越来越多。邦联陆军部长试图要求私人船只至少将三分一的货运量以合理的运费率用于军用物资的运输。但当时运输丝绸、酒及其它消费品的利润最高，许多船主愿意运送这类货物，而不愿为军队运军火、军鞋或咸肉。最后于1864年2月，邦联政府禁止奢侈品的进口，并要求所有的船只以固定运费至少腾出一半的货运量为政府运输。

汉普顿公路和基韦斯特的各海军封锁舰队基地距离像查尔斯顿、萨凡纳和新奥尔良这样的敌人要塞600英里以上。这就意味着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返回基地补充煤、给养及维修船只所用的时间同它们执行封锁任务的时间相同。而海军不可能将每一个突破封锁线的船和私掠船往来的小港都进行巡逻。因此，联邦海军战略委员会于1861年7月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攻占南部沿海的一些小港和港口，关闭这些突破封锁线的船出入的港口，为封锁舰队多建立一些基地。

8月27日，这支由7艘军舰和900名士兵组成的首次陆海军联合远征队在本杰明·巴特勒的率领下到达了风暴袭击过的哈特拉斯角附近的海域。这支舰队用炮火迫使保卫哈特拉斯港的两个要塞投降。巴特勒的部队占领了这两个要塞，北部人从此控制了

这个在以前的6周内至少通过了100艘突破封锁线的船的通道。两周之后，联邦海军又未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附近的希普岛，并在那里为巡逻格尔夫港的联邦海军建立了一个基地。

南卡罗来纳的罗亚尔港是南部沿海最好的自然港。它位于查尔斯顿和萨凡纳之间，是头一个被联邦海军选为南大西洋封锁舰队基地的港口。陆海军远征夺取这个港口的准备工作于1861年秋在悄悄地进行。舰队司令(后来的海军少将)塞缪尔·杜邦指挥这支由14艘战舰、26艘运煤和运输给养的船以及25艘运载12000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运输船组成的舰队。虽然哈特拉斯附近一阵强风破坏或严重损坏了几艘运输船，但是舰队的其它船只于11月初到达了罗亚尔港湾附近的水域。装有43门重炮的两个要塞保卫着这个港湾，但杜邦的战舰载有120多门炮。11月7日，杜邦的舰队排成长椭圆形，驶入两个要塞之间，以每分钟24发炮弹的发射率连续猛烈地轰击两要塞。邦联的托马斯·德雷顿将军(美国海军攻击舰之一的“波卡汉塔斯”号舰长珀西瓦尔的弟弟)决定放弃已成了一片废墟的要塞。联邦陆海军占领了罗亚尔港和从萨凡纳至查尔斯顿之间的整个一连串的沿海岛屿。南部的白人撤下10000名奴隶和数以百计的富饶的长绒棉种植园，纷纷逃往内陆。

进攻罗亚尔港的胜利大大出乎联邦的意料。当海军在这里建立一个庞大基地的时候，陆军没有准备向内陆乘胜进逼，但加强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海陆军协同远征，夺取了南至圣奥古斯丁的沿海要地；4月，在海岸附近岛屿一带活动的陆军炮兵轰击并攻陷了萨凡纳的普拉斯基要塞，从而关闭了这个突破封锁船的港口。

北卡罗来纳也未逃过这股蓝色浪潮的进一步冲击。安布罗斯·

Ⅴ. 伯恩赛德将军,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罗德岛人,组织了一个由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新英格兰人组成的分舰队。1862年1月,伯恩赛德的11500人的分舰队在由一支由浅水炮舰、拖轮、运输船和驳船组成的小型舰队的配合下,在哈特勒斯港渡过浅水地带,沿帕姆利科湾驶至罗阿诺克岛。这个岛控制着帕姆利科和阿尔伯马尔海峡之间的水路,因此也同样控制着除威尔明顿之外的每一个北卡罗来纳港口的河口。邦联在这个岛上设了要塞,但他们2500人的部队没有丝毫的优势。在2月7日至8日的水陆联合进攻中,汽船将长长的一串满载士兵的破浪艇拖至浅滩,战舰同时驶于两旁,掩护他们登陆。伯恩赛德的士兵潮水般地涌上海滩,成扇形散开,勇猛地扑向叛军的战壕。当联邦的炮舰从敌人前方冲破水道障碍时,他们从背后夺取了敌人的要塞。这是一次非常顺利的战斗,联邦方面仅以278人的伤亡代价共抓获了2000名邦联俘虏。在之后的几周内,北军又占领了长达150英里的北卡罗来纳海湾各港口的大陆地带。

“莫尼特”号与“梅里麦克”号

在1861年秋至1862年冬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内,邦联方面从沿海地区得来的都是坏消息,然而他们仍指望用一件强大的新式武器来扭转局势。自从他们于1861年4月夺取了诺福克海军造船厂以来,就一直在重新改造被缴获的“梅里麦克”号,想把它改造成一艘带撞角的装甲舰。由于缺乏一些原件,这项工作进展得很缓慢,但到当年冬天,这艘重型装甲舰已接近制成。它不是世界上第一艘装甲舰。法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使用过装有铁甲的“流动炮台”;法国海军在1861年就有一艘装甲舰,英国海军有两艘。1861年10月,联邦海军与出生在瑞典的发明家约翰·埃里克森立约承购一艘完全新型的装甲舰“莫尼特”号。它的船身只有吃水线那么

低,有一个装有两门炮的转塔,整个军舰看起来像“一个放在圆卵石上的罐头盒”。大约就在“梅里麦克”(重新命名为“弗吉尼亚”号)正准备从诺福克启航,与汉普顿罗兹的联邦封锁舰较量之时,“莫尼特”也在纽约制成了。

1862年3月8日,“弗吉尼亚”号发起了攻击,在夜幕降临之前,摧毁了两艘军舰,使另外三艘搁浅后在次日被摧毁。联邦军舰轰击它的炮弹从它的装甲外壳上弹出去,没有对它造成任何损伤。华盛顿为此大为恐慌。然而就在当日晚,“莫尼特”号到达了汉普顿罗兹,并于翌晨与“弗吉尼亚”号交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两艘装甲舰之间展开的战斗。经过3个多小时的近战,双方水兵都感到精疲力竭,战斗宣告停止。两艘舰各直接中弹20余发炮弹,均未造成严重损坏。“弗吉尼亚”号装甲舰失去了对联邦封锁的威胁。虽然这次交战未分胜负,但“莫尼特”号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由于它吃水更浅(吃水深度为11英尺,而“弗吉尼亚”号则是22英尺),因此它的速度更快并具备更强的机动性;因船身低矮,它的中弹范围减少了三分之二;它的双炮转塔对准一个方向所发射的火力相当于“弗吉尼亚”号的10门轻型炮。当诺福克于1862年5月落入联邦之手时,“弗吉尼亚”号装甲舰不得不凿沉,因为它太不适于航海而不能逃往公海,而且又因吃水太深而不能沿詹姆斯河航行。然而“莫尼特”号却成了内战期间联邦制造或开始制造的58艘装甲舰的样板舰。邦联对联邦海军的主要海上挑战宣告失败。

封锁之结果

联邦封锁的效果在内战期间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邦联的国务卿坚持认为它是一个“名义上的封锁”,是不会受到国际的承认的。为了支持这种观点,一些历史学家列举了数字或估算数字,指出南部至少出口了100万包

棉花,进口了60万支步枪,50万双军鞋等等。1861年期间,至少有十分之九的突破封锁线的船通过了封锁线。到1865年,联邦海军将这个比例缩小至二分之一。但在整个内战期间,突破封锁的成功率据估计达8500次,而联邦海军捕获或摧毁的突破封锁线的船仅1500艘。因此人们争辩说这次封锁是失败的。⁷

但是,这些数字又能证实一种相反的观点。重要问题不在于有多少船只突破了封锁线,而在于如果不实行封锁,会有多少货物被运过封锁线。内战的后3年出口的100万包棉花同战前3年中出口的1000万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内战前的4年中,有20000艘船只进出南部各港口,其中大部分船的货运量都超过了内战期间这8500艘突破封锁线的船的货运量。许多突破封锁线的船在被追击时为了加快航速,不得不向海中投弃一部分货物。联邦的封锁将南部的海上贸易减少至正常情况下的将近三分之一。况且战争年代还属非常时期,因为南部缺乏工业基础,需要进口大量的物资投入战争。尽管封锁在战争初期并未显示多么重要的军事意义但它最终对战争的胜负却起了重大作用。

第十二章 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

美国内战往往被人说成是第一次“现代”战争。这种说法的含意也总是不明确，因为每一次战争都比前一次更现代化一些。不管怎样，许多被称为第一的东西都与美国内战有联系。第一次广泛地将铁路和电报用于战争；第一次使用装甲舰对装甲舰作战；第一次更多地使用装有来福线的野炮和轻型武器；第一次使用连发步枪；第一次试验性地制造原始机关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一次在战斗中使用潜艇，并普遍实行阵地战；第一次大量地使用气球进行空中观察；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普遍征兵入伍；第一次把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体制”应用于制造军用物品。

但是，在许多方面，美国国内战争与其说是现代战争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与半世纪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更酷似50年前的拿破仑战争。尽管它使用铁路和汽船，军队还是靠畜力运输军需品。在冬季和大雨时节，战役进展缓慢或停滞不前，这是由于存在着拿破仑所称的战争中的“第五因素”——泥淖。尽管连发式武器和射击方法是先进的，但大多数步兵还是背着前膛枪；而且在战争的第一年，大部分都是滑膛枪。骑兵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兵种。以火力代替人力的现代思想观念还处于开始阶段。武器和机器在这次战争中至关重要——但人和马匹则更为重要。

人 力 和 资 源

在1861年，联邦适合当兵年龄的白人差不多为邦联的三倍半。

当然,在南部,奴隶是一种军事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做北部自由人所做的战争后勤工作,从而使同等数量的白人解脱出来而到军队服役。另一方面,北部也吸收以前的奴隶参加军事劳役,最后为军队征募了15万多人。总的说来,估计有210万人为联邦作战,有80万人为邦联作战(准确的数字不详,因为联邦的记录列举了征募的数目,而对此数目必须核对,以避免重复计算再次应征入伍的人。此外,南部邦联的许多记录已遭毁坏)。在北部,只有一半以上适龄男人在陆军或海军服役;而在南部,有将近五分之四的白人在陆军或海军服役,如此众多的兵源只有在奴隶制存在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

邦联的征兵法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部为保护个人和各州权益去反对中央政府而进行备战,不得不比北部提早一年制订征兵法令。最初几个月掀起的志愿从军的热潮,到了1861年秋就开始逐渐减弱。有一名叫约翰尼·列布的人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对士兵的生活已有足够的了解,确信它并不像所吹捧的那样。”一位邦联的将军在10月20日从弗吉尼亚前线来信写道:“第一次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使许多人参加军队,但他们现在后悔了。这里冬天的前景正使人不安,他们在开始想方设法回家去。”¹入伍的邦联士兵有一半以上是一年服役期的志愿兵,他们是在1861年春入伍的(其余是3年服役期的志愿兵)。在1862年,正当北军发动春季攻势而大部分军队的军心动摇的情况下,邦联议会在12月通过了一项法令,给那些重新入伍的一年志愿兵以50美元的奖金和一个月的休假。如果重新入伍兵不喜欢旧团队,可以参加新选出的军官领导的新团队。1862年3月,担任杰斐逊·戴维斯军事顾问的罗伯特·E.李,极力主张通过一项国家征兵法,作为避免灾难的唯一办法。

邦联议会在4月份立法规定，从18岁至35岁的健壮白人男性（包括那些正在服役期满的），应入伍服役3年。对于那些从事某些军用品生产的人以及民兵军官、文职人员、牧师和教师，法令豁免了他们的兵役。最后列出的一项豁免充满了灾难，因为许多新的学校突然兴办起来，明显地超过了对教师的需求。1862年通过了一项补充征兵法令，规定凡拥有20名或20名以上奴隶的任何种植园，有一名白人可免服兵役。邦联还允许应征入伍的人雇用他人代替服役。欧美过去已有这样的惯例（在独立战争期间，国家征兵曾允许请人顶替）。这种顶替服役办法是为了改善强制性的征兵。但这只是对那些有钱雇人顶替的人有利。到1863年，顶替服役的市价上升到600元邦联货币（约金本位600美元）。随着“二十黑奴法”的实施，这种顶替办法产生了一种辛酸的说法：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但却是一场穷人打的仗”。

由于邦联的兵员短缺日益严重，乃加强征兵法。在1862年9月把服役年龄最高界限提高到45岁，到1864年2月又提高到50岁（最低年龄界限从18岁降到17岁）。1863年12月废除了顶替服役的条款。曾经代人服役的人符合应征条件。豁免服役的范围也加以修正（尽管有争议的“二十黑奴法”条款仍然以修正形式保存下来）。1864年2月通过的新征兵法要求正在服役的全部男子都留在部队，从而确保1861年征募的三年服役期士兵在期满也不能回家。

征兵法不得人心，在南部的一些地方就不能实行，特别是在非乡村地区和一些山区。在非蓄奴的地区，“富人的战争”的论调特别强烈。一位亚拉巴马山区农民这样说：“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把你调动起来，去为他们那些可恶的奴隶打仗；在你打完仗之后，你一无所获，他们也对你漠不关心。”²在某些非乡村地区，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人组织武装团伙，杀了一些征兵官员，抗拒整个邦联当

局。

南部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还宣称。征兵违背了邦联正在奋斗的目标。佐治亚州好斗的州长约瑟夫·E·布朗说：“在佐治亚州退出联邦前的任何美国政府法案对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的打击，也没有像这个征兵法那样厉害。”布朗竭力挫败征募士兵的做法。他委派许多佐治亚州人担任免除服兵役的文职官员或民兵军官的职务。这个州的民兵军官之多，到了官多于兵的地步，因此一位南部邦联的将军以厌恶的口吻叙述一个典型的民兵连队，说它由“三个校级军官、四个参谋、十个上尉、三十个中尉和一个有肠胃病的列兵所组成”。³其它一些州长，特别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泽布伦·万斯也以公民自由权和各州权益为理由反对征兵。他们的反对已成为各州权益与中央集权之间巨大冲突的一部分，从而妨碍了邦联的战争工作。

但是，尽管征兵法遭到反对，而且在执行中效果不大并发生种种舞弊现象，但它的确为邦联军队招来了士兵。倘若不是征兵，南部就很难使战争坚持到1862年，因为征兵法除输送新兵到部队之外，还使老兵不能退役。在邦联军队服役的人数可能总共有12万人，估计有70000人是顶替的。实际上有多少人顶替服役还是个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许多有关顶替的证明文件都是假的。不管怎样，与联邦军队8%相比，邦联军队中征来和顶替的士兵大概占20%。在南部，强制志愿兵重新入伍，这就意味着每一个邦联士兵在战争期间长期服役，除非战死或因伤病退役。而在联邦则相反，服役期满的士兵不能被征用，或被强制重新入伍。所以，虽然在联邦服役的士兵总数比在邦联服役的士兵大两倍半，但在部队中老兵的数目在任何时候都相差不大。因为一个老兵被认为最少可抵得上两个新兵，所以邦联在人力方面的劣势实际上不是那么大。

然而，在发动战争所需的资源方面，南部的弱点比人力方面的弱点还要大。北部拥有接近90%的全国工业生产能力。在某些对军工生产重要的工业中，联邦的优势甚至更起决定作用。根据1860年的统计数字，北部的大小舰艇就比南部多11倍，北部比南部多生产14倍生铁、16倍纺织品、23倍火车机车，31倍枪支（但是，枪支的重要市场往往是在南部）。在食品生产方面，北部的优势稍高于二比一（或按人口计算大约和南部一样）。但是，联邦每平方英里铁路密度大两倍以上，机车和汽车的总数多出几倍。南部在铁路方面的劣势由于缺乏补充能力而剧增，造成了运输紧张，往往使前方缺少食物和补给品。北部牲口稍占优势，但不足二比一；邦联的许多牲口是在上南部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不久便被联邦军队所控制。

邦联的有利条件

由于上述的劣势，南部人怎样才能指望取得胜利？有一个邦联的新闻记者这样写道：“有些条件要比数字更能加强军队。”他坚持认为：南部“在某些有利条件方面可以抵消北部在物资资源方面所占的巨大优势”。⁴

战争的目的和士气

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从作战双方相反的战争目的中产生的。邦联“取得胜利”的目的不是要侵占北部，也不是摧毁其军队；他们只是坚持防卫，防止北部摧毁南部军队。南部人寻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那种精神，当时英军的物质优势比1861年北部的优势大得多。他们也注意其它小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竭尽全力不能扑灭尼德兰的反叛。奥地利军团向小国

瑞士进军而徒劳无功。杰斐逊·戴维斯在1861年4月26日给邦联议会的第一篇战争咨文中这样说过，像那些热爱自由的叛逆者那样，“我们不谋求任何征服、任何扩张，也不谋求我们刚刚组成的邦联各州作出任何让步。我们所要求的是不要干涉我们”。⁵

为了取胜，北部不得不入侵、征服和摧毁南部的力量和反抗意志。侵略和征服在逻辑上比保卫领土难得多。英国军事专家回顾1776年英国军队的经验，在1861年承认，像邦联那样大的国家是不能被征服的。在内战早期，伦敦《泰晤士报》曾这样评论：“把反叛者从波多马克河南岸赶走甚至占领里士满是一回事，但征服和永久控制几乎像欧洲俄罗斯那样大的一个国家则是另一回事，……任何独立战争莫不以胜利告终，除非在这一战争中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就像英国在独立战争时期不得不放弃对殖民地的征服一样，所以，北部也将不得不放弃征服南部。”⁶

那种无形的但却是重要的精神因素对一支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军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一位邦联首领这样写道：“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为我们的生存而战斗，我们就具有巨大的有利条件。纵观全球，难道说100万在本土保卫自己抵御外侮的军队从单纯军事观点来看，不比入侵别国的500万外国军队更强大吗？”⁷当邦联变成了侵略者的时候，这种士气上的有利条件就转向北部了。在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一天，一位联邦的官员就这样写道：“我们士兵战斗的热情比他们在弗吉尼亚时高三倍。宾夕法尼亚州遭到侵略，而我们正在自己的本土上进行战斗，这种信念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情绪。”当邦联在葛底斯堡战斗后撤到弗吉尼亚时，李将军的一位参谋军官说：“必须承认，我们的士兵在波多马克这一边（南边）作战时，情绪是饱满的。……他们不愿在人民对他们抱有敌意的国家里作战，而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确实比三天前强两倍。”⁸

地理和后勤

南部重要的军事优势之一是地理条件。邦联拥有很大的国土——75万平方英里——有1776年时的13个殖民地两倍大。邦联东部的地形有利于抵御入侵。阿巴拉契亚山脉是一重难以对付的屏障。它抗拒敌人的突破直到1864年谢尔曼入侵佐治亚。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河谷形成一条入侵的自然通道，但它有利于邦联而不利于联邦，因为它走向西南，而远离里士满和弗吉尼亚的主要战场。的确，邦联三次利用这河谷入侵和威胁北部（杰克逊在1862年，李在1863年葛底斯堡战役和朱巴尔·厄尔利在1864年）。因为在那一地区，从河谷直指重要的北部城市，其中包括华盛顿本身。南部大部分地区林木覆盖，为军队防卫作战提供了掩护。

在华盛顿和里士满之间，东西横贯6条大河和无数的溪流，每一条河溪都是一道防御线。相反，在邦联西部地区，河流系统却对入侵军队有利。坎伯兰和田纳西河是入侵田纳西，北密西西比和北亚拉巴马的通道，而密西西比河却像是一支射向下南部心腹地区的箭。

但是，除了河流，入侵军队还得依靠铁路和公路，而铁路特别容易受到游击队和骑兵的攻击，他们创造了破坏路轨、桥梁和机车车辆的技艺。联邦工程技术兵团的修复工作也变得同样的熟练（一个北军建筑连队曾建造一座有40万板英尺木材合成的800英尺长的桥梁，从树木到桥架只用四天半时间），但北部的军事调动由于后方供给线受到破坏而经常延误或停顿。这样，几百名游击队或骑兵就可以使全军无法行动，并迫使它派遣数以千计的士兵去护卫交通。

部队一旦从军需运输终点站或水路补给基地开出，其行军队伍、炮兵和给养车队就不得不从陆路行进。联邦在南部作战，平均

每40个士兵有一辆给养车，每2—3个人有一头骡马。一支10万人的入侵军就要负担2500辆给养车和至少35000头牲口，每天就要消耗600多吨或更多的补给物资。南部道路情况恶劣在军事上使邦联大占便宜。大部分都是泥土小路，又没有沟渠或别的排水设施以防雨季不能通行。给养车和炮车往往陷入泥泞，深达车轴，特别是在弗吉尼亚，那里的红土形成了一种几乎象流沙一样的泥浆！内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是有关泥土的故事。一位在1862年参加过弗吉尼亚半岛战役的联邦军官坚持说，他曾看到过一头军骡除了两只耳朵外，全都陷进泥浆不见了。但是他承认“这是一头小骡。”

当然，道路很坏，这对叛乱者或北军来说都是一样。但一支军队在本土作战，比较接近基地，所需的补给车也少一些，因为他们可以从友好的乡村征收到很多粮草。另外，南军士兵的行装也比北军要轻一些。邦联步兵行军携带用毯子包着仅有的用品而不带背包，没有帐篷也可以过得去，吃的也较少，因此行军装备一般是30—40磅，还包括步枪和弹药。而联邦士兵的全副装备约50磅。北方军工生产十分充裕，使得某些联邦将领对军需挥霍无度，因而使部队的供给难以维持。阿伯拉罕·林肯曾经愤怒地告诉过一位将军：“辎重的增大和堆积至今几乎成为我们的祸根。”直到1864年，北部某些指挥官才懂得早在两年前邦联将领理查·尤厄尔所发表过的意见：“过多的辎重使部队无法沿着通向胜利的大道行进。”⁹

联邦军队越向敌区深入，其补给线就越长，因此就越需要派部队保卫补给线。到1864年谢尔曼抵达亚特兰大的时候，他的全部军队只有一半是在前线的，其余部队则固守在从查塔努加和纳什维尔到路易斯维尔全长470英里的铁路生命线上。作为入侵军，联邦军队还得派出大量部队去执行占领任务。

因此,到1864年初,在联邦军队服役的661000名士兵中,不到半数在前线作战;而邦联在总数278000名士兵中可能有四分之三的人在前线作战。所以南部通常对战败(“先生,他们永远不会击败我们,除非他们是四比一。如果我们走运,或人数不是那么悬殊,我们就会赢得我们的事业而独立了。”¹⁰)的解释需要作一些修正。的确,有一位撰稿人认为,在50次主要战斗中,联邦参与战斗的人数平均比敌军多2%。¹¹这样说可能是对联邦在人数上的优势打了折扣。一份根据对此问题的精确统计研究所列出的60次战斗得出的计算数字表明,联邦军队比邦联军队人数平均多37%。¹²即使是这样,也离许多有关内战史所叙述的“压倒的数目”相去甚远。

邦联打防御战的其他有利条件是内线交通、熟悉地形和道路、情报网优越。“内线”一词,简言之就是在弧形防卫线以内的部队从一地转移到别地的距离比在外线作战的入侵部队所经的距离要短。在弗吉尼亚战场就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例。最明显的是在1862年7—8月间,李把军队从半岛转移到拉帕哈诺克,距离约75英里,而驻守波多马克的联邦军队得走三倍那么远的路程,部分地方还要经水路。有些联邦的队伍抵达过迟,不能参加布尔河的第二战役。

在南部,偏僻的乡村道路纵横交错。这些道路在任何地图上都是没有标出的。只有了解当地情况的人才能引导部队沿路行进,而许多道路通过茂密的森林,这样可以隐蔽行动,避免敌人发觉。但是一步走错,就会使整师人迷失方向而陷入绝境。在这里;邦联却有很大的优越条件。叛军利用这样的道路向敌军发动突然袭击。这种袭击的范例是杰克逊对钱瑟勒斯维尔发动的侧翼攻击。这次袭击是沿着过去为炼铁炉运送木材的狭窄小道经过一天的行军之后进行的,由炼铁炉主人的儿子作向导。还可以举出很

多袭击事例来说明联邦军队由于地图不准确或没有地图而在这样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我只关心自己的荣誉，我总会选择在自己的国家内打仗的，因为在国内每一个人都是密探，敌人采取任何行动我都不可能不知道。”¹³罗伯特·E·李也会这样说的。在抱有敌意的居民中活动，联邦军队在军事情报方面是明显地处于劣势。一位北部官员报告说过：“甚至连妇女和儿童都争相出谋划策去收集并送给敌人一些我们力图保密的情报。”¹⁴邦联对通过这样渠道取得的情报往往采取保留态度，而主要依靠他们出色的骑兵部队。当然，骑兵部队在友好的居民区比在敌对的居民区中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可以举出许多由平民密探传递的重要情报的实例。最著名的是1862年杰克逊的谢南多厄河谷战役中比利·波德的工作。

邦联的游击队

关于南部游击队对战争的影响，历史学家的意见还不一致。布鲁斯·卡顿撰文说，游击队的多次的袭击“使联邦高级指挥陷于混乱，使入侵者得不到有关对方的部队和位置的准确情报，切断了供应和交通线，并有效地使联邦在人员方面拥有的巨大优势失去作用。”游击队领袖约翰·辛格尔顿·莫斯比的传记作家声称，游击队1864年在弗吉尼亚联邦战线后面的活动，是“使战争延长到¹1865年的重要原因”。¹⁵但其他历史学家则认为，游击队对邦联的事业则弊多于利。据称，他们耗尽了正规军队的潜在的人力，他们野蛮地攻击平民百姓和后方军事人员，使南部的事业信誉扫地，从而引起了无情的报复。根据这种说法，对联邦补给线成功袭击的功绩不应归于游击队，而应归于像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

约翰·亨特·摩根那样的指挥官所领导的骑兵部队。¹⁶

事实真相可能就在这两种论断之间。虽然关于游击队使战争拖长一年之久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但莫斯比的游击队的确给联邦的指挥官以无穷的困扰，也的确妨碍了联邦在谢南多亚河谷的活动。在别的战场上，游击队也在联邦的后方挑起了动乱。关于不是游击队而是邦联骑兵完成这些任务的论断，是没有认识到在游击队与骑兵两者之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有时也是很小的。几乎全部游击队都是骑马，绝大部分人作为“游骑兵”与邦联军有某种关系。很多骑兵人员与摩根、福雷斯特和其他骑兵部队将领并肩作战，他们都是当地人，在进行袭击之后又恢复为典型游击队模样的平民百姓。

游击战在南方曾享有颇富魅力的声誉，这是源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沼泽狐”弗朗西斯·马里恩的英勇行动。在邦联陆军部的同意下，1861年成立了几支游骑队，特别是在弗吉尼亚西部，他们骚扰联邦占领军，反复切断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线。在密苏里和阿肯色的邦联将领们支持威廉·匡特里尔和其他游击队领袖早期的行动。联邦的将领则组织反叛乱的部队，跟踪并摧毁叛军游击队，但正像近期的战争那样，这些行动多遭失败而很少成功。

1862年4月，南部国会批准正式组建游骑兵部队。这些游骑兵部队将成为邦联军队的编制。莫斯比的游骑兵是这些部队中最著名的。莫斯比的勇敢行动（包括在离华盛顿仅10英里远的地方把联邦将领从床上活捉的事迹）成为传奇，从而赢得了J. E. B. 斯图尔特和罗伯特·E. 李将军的赞赏。莫斯比的队员的装备与其他游击队不同，他们常常穿着邦联的军服；他们常用抢来的联邦军外衣作为伪装，这样他们就能随便通过北军的阵线。

尽管游骑兵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到1863年，一些邦联领袖开始对游骑兵的价值提出了疑问。许多未来的新兵都愿意加入这些

游骑兵部队，因为纪律比较松弛，生活富于冒险性，而且可望得到战利品。大部分游击队比“砍杀队员”（联邦方面给他们起的名称）好不了许多。用一位联邦的官员的话来说，他们是“为杀人而杀人，为爱财而掠夺”。¹⁷在这些砍杀者中最著名的是匡特里尔。他在邦联军队中任上尉。1863年他带领人马袭击堪萨斯州的劳伦斯。这是一个古老的自由的要塞。他烧毁了这个不设防的城镇，残酷地屠杀了183名男性居民。这一次袭击和其他由密苏里游击队搞的声名狼藉的袭击使所有游击队员得到一个砍杀队员的形象。1864年1月，邦联议会废除了承认游击队的法律，并命令他们与正规军合并，但这只是一纸空文，大部分游骑兵部队仍继续活动。

如何处置被俘的游击队使联邦政府颇伤脑筋。在内战初期，有些将领威胁说要处死他们，但这样只能以牙还牙地使被俘的新英格兰人得到相应的报复威胁。1862年联邦陆军部决定把游击队员作为一般战俘对待，只要他们为邦联正式承认。但是，由于游击队的暴力升级，而许多游击队员不穿军服或不受官方的约束而行动，因此联邦指挥官在俘获他们的时候，有时就把他们杀死。1864年7月北部议会批准了这种做法。当菲利普·谢里登于1864年8月在谢南多厄河谷统率联邦军队时，格兰特告诉他：“莫斯比的人一经抓获，不用审判就可就地绞死。”¹⁸ 谢里登的一个名叫乔治·A. 卡斯特的骑兵指挥官处决了六个游骑兵，因此，莫斯比让6个被俘的卡斯特的骑兵在行刑队面前抽签处死。

作为邦联游击队活动的游击队员，可能不超过10000人（不包括正式的骑兵部队）。似乎有理由这样说，他们对联邦战斗力的损害比前线同等数量的军队的危害要大一些。他们在别的战役中，以游击战的方式，牵制了比自己大数倍的担负防卫或搜索破坏任务的正规军。但是，不管游击队的军事价值怎样，可以肯定，游击队的袭击和联邦部队的报复加剧了敌意和暴力行为，从而促使这

场内战成为一场全面的战争——一场不只是军队的，同时也是人民参与的战争。

人 力 和 武 装

凭着在本土进行自卫战的多种有利条件，打成僵局将是胜利。也许南部的想法是对的，他们认为一个南部人能对付10个北部人——或者最少3个。在内战初期，邦联的普通骑兵或步兵也许都比敌人强些。南部大多数孩子把骑马和狩猎作为成长过程的必要部分。大部分叛军士兵不用教练就会射击，而许多北部人则需要学习射击。军事价值观念对南部文化来说，比对北部文化更为重要。不那么现代化的南部社会表明了在内战前半期的军事优势；但在战争中人和马匹的传统军事素质逐渐地让位于工业和战车的现代化优势。

骑兵部队

邦联在初期享有骑兵部队的最大优势。骑兵曾引证卡尔·冯·克劳塞维兹^①的名言，说一个国家将会打一场与其社会制度相称的战争。南部没有好的道路，南部人不得不从小就骑马，而大多数北部人是坐着马拉车旅行。训练一个骑兵比训练一个步兵或炮兵需要更长的时间。正规军的骑兵军官大多数是南部人。在领导方法、骑马技术和同等重要的马匹饲养工作中，邦联的骑兵一开始就得心应手。骑兵吸收了南部人那种随遇而安的素质。谢尔曼将军贴切地描述了这种素质：

^① 克劳塞维兹是普鲁士19世纪时的将军，卓越的战略家，写有《战争论》等几部著名的军事科学著作。——译者

南部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种植园主的儿子，城镇的律师，台球和各种运动的好手……。他们在本质上恨北方佬，对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毫不在乎。他们只要有良好的马匹、丰足的草料和开阔的土地，就心满意足。……他们是卓越的骑士，一流的射手，而且完全不顾后果的。……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骑兵。¹⁹

在战争的头两年，邦联骑兵围绕着北方骑兵兜圈子。用一位英国观察者夸张的话来说，这些北方骑兵“甚至在马小跑时也很少骑上”。²⁰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骑兵在内战期间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不久就被废弃。他们是陆军的眼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人兵力多寡和行动的情报，同时掩护自己的陆军免受敌人骑兵进行同样的侦察。这种侦察作用在南部森林地带变得特别重要。叛军骑兵在内战头两年间使北方佬相形见绌。骑兵的另一任务是在前方或行军部队或作战部队的两翼进行巡逻，以防突然袭击和侦察敌人侧翼的活动。在战争初期，邦联骑兵这种工作也做得很好。铁路的重要地位也提高了骑兵作为一支深入敌后的袭击部队所起的作用。

马刀已几乎成为礼仪上的一种武器，有些骑兵不愿佩带马刀。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后膛装弹卡宾枪。因为南部卡宾枪短缺，许多叛军骑兵都携带散弹枪。大部分骑兵还带左轮枪。骑兵部队在某些战斗中实际上是徒步的，他们主要利用马匹作为向战场快速运输的工具。美国内战使骑兵的马下战术有了新的发展。福雷斯特就是这方面的革新者之一。谢里登在1864年指挥波托马克骑兵队时就进一步应用了这种方法。虽然骑兵比步兵打的硬仗少，但步兵那种半嘲笑半嫉妒地提出“谁曾看见过一个阵亡的骑兵？”的问题是不反映现实情况的。到1863年后期，一些联邦骑兵队配备7响卡宾枪，这就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火力，并在马下战斗中使同等

数量的步兵无法匹敌。火力的加强,再加上马术、领导方法和经验的改进,使联邦骑兵到1863年达到了邦联骑兵同样的水平;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又使他们在一个拼一个方面占了优势。

炮兵

正像邦联初期的骑兵优势反映南部社会现代化前各方的情况一样,联邦在整个战争中的炮兵优势也反映了北部的技术优势。关于制造大炮、炮弹、火药和引线的工业实力,当然是北部强于南部。旧军队的炮兵军官大部分都是北部人。在北部,很多人具有数学才能并受数学方面的培训,这对于射程和仰角的计算是非常需要的。

在战争头两年,邦联方面俘获的大炮要比它自己制造或进口的大炮还多。这些战利品不仅包括在退出联邦时从要塞和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夺来的重炮,也有在战场上缴获的野炮。可是,到了1863年南部生产了大部分大炮,主要是在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的出品。邦联方面制造了将近3000门榴弹炮(北方7000多门)并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白手起家建起了世界最大的火药厂。但是,许多南方制造的榴弹炮有缺陷,而且容易爆裂,炮弹引线也不可靠(联邦方面的也一样,但缺点少一些),使大部分炮弹过早或过迟爆炸,或者根本不爆炸。

内战时期的榴弹炮有两种基本类型:滑膛的或有来复线的。有来复线的大炮是新式的。在1859年,法奥战争中曾用过一些有来复线的大炮,但在美国内战时,才使这种大炮得到首次广泛应用。有来复线的炮筒使炮弹射程更远,速度更快并更加准确。联邦的榴弹炮约有一半是有来复线的,邦联的榴弹炮三分之一也有来复线。大炮的炮弹基本上有三种:炮弹、远程实弹和对付步兵进击近距离防卫榴霰弹(霰弹筒或葡萄弹)。榴霰弹是装在炮弹之中,炮

弹爆炸时发出几百个小子弹(霰弹筒)或9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炮弹(葡萄弹)。一门榴弹炮向近程的军队发射榴霰弹的效果就像一支锯短了的散弹枪的效果一样。尽管有来复线的榴弹炮威力更大更准确,但炮兵仍喜欢使用12磅的拿破仑式的滑膛炮。炮弹引信不可靠降低了有来复线的远程炮的价值。而可以发射多种炮弹的拿破仑式滑膛炮,则是发射榴霰弹的最好的火炮。

最早的粗制机关枪是在内战期间研制出来的。R S. 威廉上尉为邦联发明了用旋转的凸轮轴操纵的枪支,凸轮轴从漏斗以每分钟20发的速率向后膛送入子弹。显然这种枪早在1862年就用于战斗了。当时最少制造了24支,但容易发生故障,没有多大作用。北部研制的两种快发的枪支也是这样,它们是“咖啡碾磨机枪”(林肯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输弹器酷似一个咖啡碾磨机)和格林式机枪,都是由印第安纳的理查·格林发明的。这种多管的格林式机枪在正常转动时每分钟可打250发子弹,成为战后现代机关枪发展的模式,但由于机枪可靠性差,在战争时期无法在重要的战斗使用。

步兵

尽管骑兵有魅力,炮兵有威力,但步兵仍是内战军队中最重要的军种。在联邦的作战部队中,80%是步兵,骑兵不足15%,炮兵约占6%。在邦联的军队方面,炮兵的比例是一样,骑兵高一些,接近20%,而步兵较低,只占75%。步兵蒙受了80—90%的战斗伤亡。步兵在内战中的相对重要性比其他任何战争都要大一些,因为来复枪已取代滑膛枪成为步兵的武器。

来复枪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懂得,在滑膛枪管里刻上螺旋槽沟使

子弹急速旋转就会增大射程和准确程度。狩猎武器通常是有来复线的。18世纪的一些军队就有专门的来复枪团。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滑膛枪还是步兵的主要武器。为什么这样？因为用来复枪发射的子弹大，是难以穿过前装式枪枝的枪管的。一枝来复枪打过几次之后，黑色炸药的渣滓积存在槽沟里，不擦干净就不能再装子弹。因为快速装弹和确保连续而持久的发射是军用武器的重要条件，所以来复枪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

枪支设计者长期以来一直试验各种办法，以克服这些缺点。法军上尉克劳德·E·米尼埃曾被委托解决此一问题。他在1840年代发明了一种细长的子弹，子弹后面带有铁质或木塞质插头插在底座，一触发底座就会膨胀至来复线。子弹的直径比枪管口径稍小，能容易装入枪膛。当子弹发射通过枪管时，膨胀的底座能使槽沟保持干净。米尼埃弹造价很贵，而且因采用木质或铁质底座，容易发生故障。内战时期来复枪使用的著名“米尼埃”弹是由哈珀斯渡口军火厂的一位名叫詹姆斯·H·伯顿的美国人研制出来的。它没有插头，而在底座上刻有一个凹窝，发射子弹的火药爆炸时产生的气体能促使底座膨胀起来。

这种简单的发明使军事技术发生了变革。滑膛枪最大的射程约250码，但士兵很少能命中80码以外的任何目标。在1861年，伊利诺伊团队有经验的射手用滑膛枪朝着180码以外的面粉桶打了160发，只打中了四枪。与此相对比，新式的斯普林菲尔德和恩菲尔德来复枪的射程则超过1000码，有效射程约400码。新罕布尔什一个队在1861年10月得到斯普林菲尔德来复枪后，有个士兵写信回家告诉父母：“我们有一天外出试了一试这种枪，射程600码，有360发打中了老杰弗里那样大小的目标。”²¹在射程上增加了5倍，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步兵对付骑兵和炮兵的力量。这么一来，骑兵袭击步兵就等于是自杀，因为骑兵还未接近步兵，而大部分马匹和骑

兵就已被打中了。由野炮部队随进击的步兵一起进军或打头阵的拿破仑战术不再有效,因为当炮兵靠近敌人能作出较大的杀伤前,炮手和马匹已被击中了。

来复枪在战术防御上比进攻有较大的优越性。传统的战术是用步兵对防御阵地发动密集的正面攻击,防守者在进攻者用刺刀逼近他们之前,仅仅有用滑膛枪打一两枪的时间;但使用来复枪时,防守者能在5倍远以外的距离对进攻者射击。进攻的行列很少能靠近到能使用刺刀的地步(内战伤员受刺伤的不到1%)。但西点军校出身的司令官对来福枪的新威力不够重视,因为他们西点军校教科书中学过拿破仑战术,并曾经历过墨西哥战争,而在这一战争中密集攻击往往是成功的。双方的将军们晚到1864年时,还下令作正面攻击,结果遭到反击,伤亡惨重。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防守方面也从阵地战的发展中得到好处。当然,战地壕沟不是新鲜的东西,但来复枪的出现就迫使部队比以前更需要寻找隐蔽的地方。到1863年,两军的士兵实际上在每个军队部署区都修建壕沟和胸墙工事。1864至1865年各次战斗在弗吉尼亚和佐治亚州乡村留下的创伤,恰似一批大鼯鼠曾经在那里挖沟打洞。精锐部队在牢固的战壕里可以抵御3—4倍那么多的进攻部队。就像机关枪和战壕完全支配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一样,来复枪和战壕支配着内战后期的战场。

然而,在1861年,双方大部分团队都用滑膛枪,因为在战争开始时,还没有足够的来复枪去装备为数不多的正规军。联邦和邦联政府、一些州政府和一些私有公司都派出代理人到欧洲,他们在那里竞相出价购买英国和欧洲大陆多余的武器。联邦和北部各州在欧洲共买了100多万支滑膛枪和来复枪,其中有些没什么价值,但大部分是有用的。到1863年,国内军火工业为联邦军队生产了足够的来复枪,从而停止了向外国购买。马萨诸塞州的斯普

林菲尔德美国兵工厂生产了近80万支来复枪，私家制造厂另外制造了斯普林菲尔德型来复枪90万支。北部工厂和政府兵工厂在内战期间生产了250万支各种小型武器，这一空前成就标志着军火工业的现代化效率。

邦联是无法赶上这一产量的。邦联内部来复枪生产情况不明，可能不超过25万支。此外，南部进口了60万支来复枪，其中大部分是恩菲尔德型。在内战开始第一年，邦联急需武器；在1862年，得胜的叛军缴获了10万支联邦来复枪，偷越封锁线的船只又带进20万支，从而使南部的小型武器不再短缺。到1863年，双方的大多数步兵都配备了现代化来复枪了。

这些枪尽管是“现代”的，但仍旧是单发的前装枪。这种武器要装上子弹，程序很复杂。士兵从弹药盒里拿出用纸包装的装有子弹和火药的子弹筒，用牙齿把纸撕开，将火药倒下枪管，把子弹放进去，用通条把子弹和火药向下夯实，把击铁板搬起一半，在火门上安上火帽，扳动击铁，瞄准，然后发射。有经验的士兵每分钟能打2—3发。在战斗中，人声嘈杂，情绪激动，许多士兵因有一两步发射程序没有做好，枪就不能发射。筋疲力竭、心烦意乱的士兵，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又夯下一筒子弹，这样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许多次都发射不成。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在战场上发现24000支装了子弹的来复枪，其中有一半的枪管里有两枚子弹，有6000支装着3枚以上的子弹。有一支出了名的样板枪，在枪管里竟塞满23发子弹。一个士兵即使每个动作都正确无误，但通常是站着或跪着去装子弹（虽然有些敏捷的人学会在躺下时也能装上子弹），因此，就使自己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

显然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来复枪的枪闩处装上子弹。军队的后膛枪已配备多年了。令人烦恼的是，这种武器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火药爆炸热烟从枪闩冒出，这就使枪支发生故障，因为

枪管发热而无法迅速使用。在19世纪50年代，有几位发明家（包括成为联邦将领的安布罗斯·E. 伯恩赛德）研制出铜质子弹筒或其他装置，大大地解决了泄气的问题。后装式的卡宾枪一生产出来，就配备给了联邦骑兵；而一些叛军骑兵也装备了这种卡宾枪，这是他们缴获的，或从里士满兵工厂少量产品中得到的。康涅狄格州精明的新英格兰人也发明了后装式的连发枪。性能最好的是斯潘塞7发卡宾枪，它用枪托上的弹簧夹供弹，这种枪支是1864—1865年北军部队最喜欢的武器。

后膛装弹和连发的技术不仅用于卡宾枪，也适用于来复枪（两者主要的差别是来复枪的枪管较长，所装的炸药量较重）。但美国军械局对于为步兵配备后膛枪的意见迟迟不予接受。愤怒的进步人士把军械局局长詹姆斯·里普利称为“不识时务的里普利”，因为他反对用后装式来复枪。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里普利在1861—1862年订购大批后膛枪和连发枪，战争就可能会缩短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事实上，在林肯强迫里普利在1863年9月退休前，并没有生产多少后装式步枪。²²

但这个问题又有另外的一面。里普利和其他官员最初对后膛枪和连发枪所持的怀疑态度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辩解说：第一，在1861至1862年，这些新式武器的优点还没有得到证实。如果等到全部军队都用上这种可靠的斯普林菲尔德式前装枪时再抽调资源进行转产，那是愚蠢的。第二，由于从欧洲买回和国内生产一些型号的前装枪，军械局要为不同的团队供应合适的弹药已感到十分困难，而更不用说还要为当时已有的十几种不同的后膛枪提供弹药了。第三，士兵使用后膛枪可能浪费弹药，因此就加剧了已经严重的后勤问题。虽然最后证明用后膛枪和连发枪武装的士兵在发射中比以前更有效和准确，但是，在战争早期乱放枪、浪费弹药的情况就足以表明这种争辩是有道理的。尽管前装枪有缺

点，但在战场上尸体遍地也残酷地说明斯普林菲尔德式和恩菲尔德式前装枪是致命的武器。

但是，反对里普利的一部分指控是有根据的。后膛枪尽管有缺陷，但还是较好的武器。如果不是里普利反对，就能早一点生产更多这种枪。为联邦军队总共制造了约10万支夏普式单发后膛枪（9万支卡宾枪、1万支步枪）、55000支伯恩赛德式单发卡宾枪、85000支斯潘塞式7发卡宾枪及步枪和至少有10万支其他型号的后膛枪和连发枪。这些枪支在内战后期给北军士兵带来了强大的优势。

南部和北部的战时生产和供给

邦联士兵的武器装备虽然往往比他们的敌人差，但在1862年以后军械已不再短缺。邦联军械局的后勤工作是很成功的。这种成功的缔造者是军械局长乔赛亚·戈加斯，宾夕法尼亚人，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并娶了一个南部女子为妻。戈加斯在开始时除了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外就别无所有。他创办了几十个工厂，生产了大量军火弹药。他有即兴创作的才能。他向南部教堂和种植园发出呼吁，把钟交出来熔化铸成大炮。南部妇女从夜壶尿碱中滤取硝石去制造火药。军官们打扫战场回收铅去制造子弹。军械局官员到农村去找蒸馏器具，以便熔化后取铜去制造步枪雷管。戈加斯的成就可以用他在1864年4月8日日记中的话作最充分的描述，他写道：“曾作为陆军部供应最差的一个局”，

但军械局现在是最好的。大的兵工厂已经在里士满、费耶特维尔、奥古斯塔、查尔斯顿、哥伦布、梅肯、亚特兰大和塞尔马等地建立起来了，在奥古斯塔建起了极好的火药厂。……我在彼得斯堡建起了炼铅厂；……在梅肯建起了制造重型武器的火炮铸造厂，在梅肯、哥伦布、佐治亚和奥古斯塔建起

了铸铜厂；在北卡罗来纳的索尔兹伯里建起了制造子弹和炮弹的铸造厂。……在这里(里士满)已经建起了卡宾枪制造厂，在阿什维尔建起了来复枪厂(转移到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在这里，3年前我们不能生产一支枪炮、一支手枪、一把马刀、一颗子弹、一颗炮弹(除在特里迪加工厂以外)、一磅火药，可现在我们能大量地制造所有这些军火来满足我们庞大军队的需要。²³

但是，当我们谈完邦联军械局再转向邦联的兵站局和军需官员局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的景象。像拿破仑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军队饿着肚子进军，那么南军的机动性则是格外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难得有足够的食物。南部铁路很坏、急剧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经济混乱以及兵站总监卢修斯·诺斯罗普的工作无能(据说他的留任完全是出于戴维斯总统对他的偏袒)，这一切使得食物供应成为邦联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1862—1863年冬季，李的部队每天定量减少到4盎司咸肉、8盎司粗玉米粉，偶尔有一把米或黑豆。数以千计的人有坏血病，只有春天到来能使士兵们吃上檫树树根和野葱时这种病才会消失。1864年1月李曾写道：“除非有转机，否则我担心军队就不能保持战斗力，也不能确保不遭瓦解。”²⁴

士兵可以穿着破烂衣服打仗，许多南军就是这样干的。但是，如果没有鞋穿，要每天行军20英里或在冬天站岗放哨，那是很困难的。可是，邦联方面的士兵也办到了。有些南部士兵几乎是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鞋穿的。当李的军队在1862年入侵马里兰的时候，有数千士兵掉队落在后面，因为他们不能光着脚在多石的马里兰道路上行进。这些人如果在安蒂特姆的战斗中出现，他们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

联邦的军队有时也缺乏适量的食物。在1862—1863年间，由于兵站部的腐败和无能，在波托马克河军队中发生了食物短缺和

坏血病。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北军的供应都是丰足的。兵站总监蒙哥马利·梅格斯是一个出色的官员。北部的工、农业所生产的军服、大衣、鞋子、猪肉和“硬饼干”（联邦的一种3英寸见方大的定量供应的硬面包）和其他物品很丰富，使北军士兵浪费了不少供应的东西。一位联邦将军承认：“用我们浪费掉的东西就足够供应一支相当于我们的军队一半的法国军队。”²⁵

最后，北方经济的巨大资源和生产力使联邦军队能够压倒邦联方面在本土防御作战所拥有的优势。从兵对兵来看，北军士兵并不比南军好多少；起初他们可能并不好，但北军比南军人数多，而他们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好。

为战争筹措资金：邦联

邦联经济最严重的缺陷是它本身的财政结构。南部由于主要把资金投入土地经营和奴隶买卖方面，所以没有建立起能适应战时经济要求的国家财政体系。邦联不得不印发货币以促使金融发展，但通货膨胀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上升，不可抑制。

这是战争的一种残酷嘲弄，因为邦联的财政部长克里斯多弗·梅明格是主张使用硬币的，他认为滥印纸币是筹集钱财最危险的办法。²⁶ 为战争筹措资金有三种办法——征税、借债和财政部证券（纸币）——梅明格主张采用第一种办法，但邦联议会对增加新的税收又抱谨慎态度。美国人已经有35年不给联邦政府付内部税收了，政府战前有节制的预算资金是由关税和土地买卖提供的。南部的立法人员认为战争的时间不会太长，加重赋税会减弱人们的爱国热情，因此在1861年8月以前都没有通过一般的税收办法。当时征收的少量的直接财产税可通过这样的办法予以减轻，就是只要他们在1862年4月1日以前向邦联财政部交付税收

的话,可以减少税收限额的10%。除三个州外,其余州都这样做了,但不是收税而是发行了州债。

比征税更令人惬意的是发行债券,由后一代人偿还,他们可能会享受到战争一代的牺牲而赢得的独立所带来的好处。邦联的第一批债券(1500万元)在1861年的一派爱国热情中完全被认购完了。但是,这一债款吸收了南部的大部分现有硬币,但却支付不了上升的耗费。资金的短缺萌发了一种“产品公债”的巧主意,这将会使农民以收成的部分所得作抵押以购买相当于他们抵押品市价的债券。这种产品公债,在1861年5月第一次批准发行5000万美元;到8月份,增加到一亿美元。但反应是令人失望的。抵押物来得慢,政府要费劲去收取。棉价迅速增长促使棉农拿着棉花等待高价,甚至偷运棉花越境到敌方赚取北方的黄金。邦联的产品公债只发行了3400万元——大部分是在战争后期,这时候货币已经贬值到几乎不值钱了。

为了填补财政上的缺口,国会在1861年和1862年先后发行了一亿一千九百万美元和四亿美元的纸币。一旦以这样大的规模开始印发货币,就势必如火上加油——印得愈多,达到同样结果的需求就愈大。在由于封锁、联邦入侵和南部铁路状况恶劣造成各种物资短缺的同时,这样发行纸币就使物价指数在1863年达到162(1861年1月为100)。州、市政府在货币泛滥中又印发了他们自己的纸币。印刷粗劣的伪造邦联纸币也广为流传。南方转向物物交换的经济,因为贷方要求用货物支付而不要贬值的货币。农民抱怨说,庄稼被军需官员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征购。工资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南部的实际工资在战时最少下降65%。城市居民应付不了扶摇直上的食品价格和房租。在1863年,一些城市都因食品短缺而引起骚乱。

到1863年,每个人都认识到滥印纸币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

因。在1861年曾经反对过高税收的各家报纸却改变腔调，令人奇怪地说什么人民要求纳税。国会对此作出反应，并在1863年4月24日通过了值得注意的综合税收提案。提案包括：消费品8%的消售税，批发商10%的所得税，货物税，商业和专业的执照税（后来的修正案对拥有土地和奴隶增收5%的税收）。累进所得税从收入一千美元和一千五百美元的1%到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15%。另一个罕见的特点是对农产品实行“实物税”。农民在留下家庭的定量粮食后，要把余粮的十分之一交付政府。

这些税收是失败的。由于联邦入侵的压力，邦联政府又面临崩溃，因而逃避税收的现象很普遍，而强制征收又难以正常进行。在两年之中，税收款以严重贬值的通货计算只有11900万美元。实物税只有价值6200万美元的产品。后一种税收特别不得人心。靠近战场或铁路的农户发现，他们应交的税额全都被税务官员所攫取，而远离军队或运输线的农户却交得很少或根本不交。当存放在政府仓库里的实物税粮食因缺乏运输工具而腐烂时，农民更痛心不已。

1863年7月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军事失利之后，通货膨胀就愈加恶化了。唯一的补救办法看来就是加快印刷纸币。到1864年春，人们要用46美元才能买到三年前一美元的东西。邦联议会为了改变这种趋势，要求把财政部证券变为低息的公债（实际上是一种强迫性借贷）或以三张旧券换两张新券的比率去兑换财政部新证券。这种不公正的赖债方式的确使通货稳定了几个月，但这是以破坏邦联财政信誉为代价的。到了1865年春，物价上升到战前的92倍。

不妥当的财政政策是邦联失败的原因之一。政府靠各种税收占其收入不足5%，靠贷款占收入35—40%，余下60%是靠发行流通券，这种办法是解决灾难的不错的诀窍。但它逐渐削弱了老百

姓的信心，使大多数人遭受苦难。急剧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以一种没收性赋税沉重地转嫁于穷人身上。然而，邦联议会和财政部不应受到各种指责，他们力所不及的种种因素——联邦的封锁、北部的军事胜利、欧洲国家政府拒不承认邦联——也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祸害是南部失去平衡的农业经济，它不能适应现代的全面战争的要求。

为战争筹措资金：联邦

起初，联邦政府对为这场重要战争筹集资金方面似乎并不比邦联有较多准备。在1857年经济恐慌后的萧条已减少了税收的收入。正当经济正在恢复的时候，退出联邦的危机又使它陷入衰退的境地。联邦预算从1812年战争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赤字，而且持续了4年。林肯任总统时，国债比以往高，政府公债券以低于票面值的价格卖出，财政部发行的证券几乎全部卖空了。新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任命不是因为他具有财政知识(微乎其微)，而是他有政治影响。

即使蔡斯是一位财政天才，1861年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很难调动起来应付战争。虽然，北部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经济之一，但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将一个过时的财政结构强加给联邦政府。1846年独立财政法案曾禁止政府把资金存放银行，并要求对政府的一切支付或政府的一切支付都用硬币进行。这就使15年前已经开始的运动达到了顶点，以致破坏了美国第二银行并使联邦政府脱离国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各州特许成立的银行和作为通货流通而发行的纸币，在信用上有很大差别。在1861年有7000种不同的纸币在流通，其中有许多是伪币，有许多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发行纸币的银行已经破产了。在这种金融动乱中，在私营企业已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实力，因为健全的银行主要是在活期存款体制上起了作用(与现代的支票帐户类似)，即使不甚健全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提供了一种交换媒介，以低于票面值的不同折扣在市面流通。但联邦政府的工作仍然是处于金融的马车时代：“一吨黄金还得用大车来回拖运。用马和挑夫花多少小时去做的事，记帐员只需片刻就能完成。”²⁷

这样的一种制度可能在和平时期是可行的。在和平时期，联邦政府在经济上起的作用很小。19世纪50年代，政府的年度预算平均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现在是22%)。但内战改变了这一切。在战争期间政府的开支跃升到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南北冲突使政府的金融结构不得不实行现代化。正当南部经济表现出不适应全面战争要求的时候，北部经济的潜在力量使联邦在1865年出现比以前更健全的财政体制。

但是，在战争的头一年，联邦财政部的形象是很不好的。1861年8月国会的确采取了空前的步骤，在收入超过八百美元时征收3%的所得税。但这种所得税到1863年初才征收。同时，财政部不得不主要依靠国会批准的借贷权力。政府按惯例向东部的银行借为日常工作所需的短期贷款。蔡斯想改变这种方法，直接提出向公众发行公债。人民的战争应该用人民的借款去维持。这就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发行巨大公债的起源。在美国内战中，这种新奇主张是逐步开始实行的。1861年秋天，银行签署发行第一批公债15000万美元。费城的杰伊·库克的小银庄成功地促使公众认购这些公债。但是，在别的地方，公开销售的还不多。普通公民从未见过政府公债，更谈不上想去购买了。况且，公债必须用硬币购买，而很少人有多余金币。

钱币的问题也使银行感到困扰。银行的储备可能要下降而低于支承纸币和活期存款所必需的数量。后来，在1861年11月，由于

捉住了乘坐英国“特伦特”号船旅行的邦联使者，从而使北部和英国之间爆发了潜在的灾难性外交危机。股票和公债下跌，金银被囤积起来，或流出国外，北部好像又在走向财政危机。“特伦特”号事件的和平解决并没有使这一危机得到缓和。12月30日，所有银行和财政部都停止支付硬币。有一段时间，士兵和政府承包人都没有薪水，银行也没有用金元兑换它们的纸币，从抱着悲观的态度的人看来，好像北方就要因失去信用而输掉这场战争。

美钞的产生

但是，国会用一种办法解决了这一危机。这种办法对国家未来的金融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国会辩论中出现三种主要提议。蔡斯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银行系统，使银行以政府公债为后盾去发行纸币，而政府公债又以国库储备为后盾。这是一种具有远见而最终会取得成果的建议，但它不能及早实施以应1862年早期的急需。若干银行家提出第二个选择的建议：发行在“市场发售”的公债——即不管公债的价格，即使售价低于票面值也行。这就把硬币从囤集中取出，使它们在市场上流通，从而给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这样可以使银行家和投资者获大利，因为他们将以折扣的价格买入公债，而最后得到的是票面值的钱加利息。国会否定了这种意见。第三种提议就是联邦已经实行的那种做法——印制法币，这是国会选中的一个提议。国会在1862年2月25日通过“法定货币法案”，批准发行纸币15000万美元——这就是有名的美钞。

国会只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制定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符合宪法吗？把美钞变为法定货币去偿付原来签约的债务，这是不是违犯契约？这样做是明智的吗？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发行的纸币曾经贬值或者像邦联发行的纸币正在贬值一样，美钞会不会

贬值？美钞是正当的东西吗？有一位银行家说：“举国一致认为，金银是价值的唯一真实的尺度。这些金属是上帝为这一用处而准备的。”国会的民主党人以 3 : 1 的比数投票反对“法定货币法案”，正如其中一位民主党人所说，因为它把“国家推向一系列的试验，在我们掌握国家权力之前，管理这个国家的明智人士甚至也不会允许进行一系列的试验。”²⁸ 共和党对这种试验更加开放，以 3 : 1 对此法案投了赞成票。而大多数都是怀着焦虑的心情这样做的。国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皮特·费森登说：“它使我的政治、道德和民族荣誉的概念受到震动。这事情本身是不对头的，但在这危机时期使政府没有资源则是不可想象的。”蔡斯是一位在思想上支持硬币的人，他勉强地支持这种纸币只是因为“马上行动十分重要。国库已几乎空虚了”。²⁹

法定货币法案使赞成者的希望得到了满足，但没有使他们的恐惧得到证实。它给政府提供金钱去支付其应付的款项，结束了银行危机，并给硬币严重短缺的经济输入了流通的媒介。虽然美钞与金元相比是逐渐贬值的，但联邦并没有经受过毁灭邦联财政的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没有呢？第一，联邦美钞与邦联的纸币不同，它是法定货币，是除了进口税款和国债利息之外公私债务均可接受的货币。银行、契约者和政府本身，除了上述的例外，必须按票面值把美钞作为合法的货币去接受。一些反对这些例外的共和党人提出质询，说公债持有者为什么可以得到用黄金支付的利息而对冒着生命危险 of 士兵只能用纸币来支付？赞成用金元支付利息的人据理力争，说这一种政策对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是必要的，他们可以以票面值去购买 1862 年 2 月政府批准发行的占 6 % 的 5 亿美元的公债。这种辩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以黄金作为保证去支付利息以反对通货膨胀，这些公债就不可能按票面值售出。要求进口税用硬币支付的要求，就保证政府拥有维持以黄

金支付利息的手段。

选定发行美钞时间的偶然性是成功的第二个原因。联邦军队和海军在1862年冬、春的胜利提高了北部的士气,并有助于美钞在新的活泼轻快的气氛中流通。联邦美钞比以前任何流通券较少贬值的第三个原因是国会原先的想法,认为必须征收新的和繁重的战争税。1862年7月1日林肯签署的岁入议案实际上对一切都要征税:它对收入在6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征收3%的所得税,对10000美元以上的征收5%的所得税(1864年作了修正,收入在6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5%,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10%)。从烟、酒到游艇和台球要抽货物税;收取执照税、印花税、遗产税和几百种产品的附加税。还提高了关税,并保护生产厂家免去内部税征收的附加费用。在战争的后三年,这些税收提高到6亿美元以上。在这同期还售出了十亿五千万美元的公债,各种税收吸收了战时经济发生的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压力——尽管后来三次发行了美钞而把通货总额提高到四亿四千七百万美元。

战时公债

美国财政部发售了各种令人迷惑的战时公债。最普通的就是有名的“5—20年”公债(偿还期最快是5年,最迟不超过20年)占6%,销售了6亿美元以上。在1862年夏季,这些公债销路不好。邦联在弗吉尼亚的军事胜利抵消了联邦早期在西部所得到的利益。欧洲对邦联的承认看来已迫在眉睫。只要前景不明,公债6%的利息对投资者是没有吸引力的。到晚秋时,财政部几乎面临像1月份时的那种严峻的危机。在此关键时刻,蔡斯指派杰伊·库克作为特别代理人去发售滞销的5—20年公债。库克以高度的活力和技巧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宣扬购买公债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实惠。他组织了2500个分销代理处在北部每一

个地方销售公债。库克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购买了政府的公债券。差不多有一百万北部人——每四家人有一家——买了战时公债。这就有助于迫使普通人不仅献身于战争工作，而且献身于为战争筹措资金的日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有助于使库克的银行变成美国最主要财政机构之一。

国家银行

根据内战的经验，财政方面创建了国家银行体系，这个体系一直保持美国金融结构的主导地位，直到1913年为联邦储备系统所取代。创建国家银行有几个动机：需要建立一个战时公债市场；具有辉格党特色的共和党人希望恢复被杰克逊派破坏的集中的银行结构；财政界的许多领袖，特别是在东北部，希望确立一种更加稳定的纸币通货。在1863年2月，国会通过了国家银行法案（1864年6月补充了第二法案），法案规定了一些准则。根据准则，一个银行可取得联邦颁发的执照，并可发行高达其所持有的美国公债价值的90%数额的国家纸币。这种立法是要以统一的国家体系代替过剩的州立银行和其纸币，这得到了78%的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他们勉强地压倒了对法案投反对票的91%的民主党人。

为国家银行颁发营业执照的工作起初进行得很慢，因为许多州立银行看到参加联邦系统没有什么好处。到1864年末，领到营业执照的国家银行不足500家。而还有1000多家州立银行仍在营业。在胜利的民族主义情绪冲击下，国会在1865年3月颁布了对州立银行纸币征收10%的税。这样不久就达到了从流通领域中驱逐这些纸币的目的，并迫使大多数州立银行申请联邦的营业执照。到1865年末，1294家国家银行就拥有多达尚存的349家州立银行5倍的财产。到1873年，州立银行的纸币实际上已不再出现

了。*

邦联靠印发纸币筹集资金的60%，靠税收筹集不足5%，而联邦战时资金包括13%的纸币和21%的税收。正当邦联通货膨胀率超过9000%的时候，北部的生活费约上升80%，然后慢慢下降，到战争结束后趋于平稳。**作为对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通货膨胀率为80%，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72%。在内战期间，由于工资的上升比物价上升的比率低，实际工资在北部下降约20%，但到1866年恢复到战前水平，随后又继续上升。联邦没有实行配给或对物价实行控制，在克服第一年的缺乏经验和危机之后，就成功地为战争筹措了资金。北部人民除了棉布之外，对食物和各种必需用品并无严重缺乏的现象。北部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既能生产枪炮，又能生产黄油。

* 但不是州立银行。的确，到1873年，州立银行数目达到1330家，而其财产总额差不多是1968家国家银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国家银行必须购买最少等于其资本的三分之一数额的美国公债。这一要求使许多小银行失去信心，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地区，不敢申请国家的营业执照。因此，大部分国家银行集中在东北部。这种事实，再加上把全国纸币限制到3亿美元的数目（后来稍有提高），就使地区性的纸币分配严重不均，这就伤害了西部和南部的经济，并使这些地区在战后产生了对金融改革的要求和通货膨胀。

** 通货膨胀率与黄金超过票面价格的情况不同，是通货贬值的另一标志。前者以一美元可买的东西来衡量其变动，后者则以一美元的价值与黄金价值的比例来衡量其波动。虽然这种波动对国内物价有些影响，但它主要是反映美元的国际地位。随着在1862年停止硬币支付和发行美钞，美国实际上放弃了金本位制，即使它在国际贸易上仍使用黄金。美元的黄金价值随着军事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很大波动。在1864年7月黄金价格升高到284（即用2.84美元通货才能买一美元的黄金），当时格兰特和谢尔曼好像是在彼得斯堡和亚特兰大之前处于困境。邦联将领朱巴尔·厄尔利领导部队对华盛顿郊区进行了一次袭击。到战争结束时黄金跌到了127。

第十三章 内战外犯

布尔河第一次战斗

战争最重要的战略发展之一是政治决策。在5月21日，邦联议会接受弗吉尼亚的建议把首府从人口过于拥挤和衰败凋敝的蒙哥马利迁移到繁华的工商业中心里士满。邦联把首府设置在离华盛顿100英里以外，把弗吉尼亚的北部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虽然里士满在工业上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都将成为冲突的焦点，但它的政治重要性使邦联放弃西部，而把主要战略考虑集中于弗吉尼亚战场。最后邦联在西部打输了这场战争。

如果防御战略符合南部的战争目标，那么北部决定恢复联邦就需要制订某种进攻计划。5月3日司令官温菲尔德·斯科特提出这样的方案，他将通过封锁海域并派遣一支小舰队南下侵入密西西比直捣墨西哥湾，以便从四面包围邦联，这样就可“包围造反的各州，比用其它方法能较少流血去迫使他们就范”。¹

虽然封锁已经存在，斯科特提出南下密西西比河的建议预先考虑到后来西部战争的过程。但1861年他的这个计划有两点错误。第一，在封锁南部之后，斯科特计划按兵不动，等待邦联窒息而亡和南部的联邦分子重新掌权。斯科特本人是弗吉尼亚人，他还抱着一个幻想，认为如果北部的行动坚决而有所节制，他的南部兄弟会醒悟过来的。其次，斯科特的计划是需要时间的——用5个月的时间建造炮舰和训练士兵，再用几个月时间沿下游作战并进行有效封锁。但是，北部对南部的联邦主义已经失去信心了，

而舆论要求立刻进攻去“粉碎”叛乱。当斯科特建议的细节泄漏之后,报纸把它嘲讽为“蟒蛇计划”。编辑们号召行动起来。6月26日起,有影响的《纽约论坛报》在报头连日刊登“向里士满进军”的口号,还发表社论,叫嚷不许反叛的议会在7月20日开会。

在欧文·麦克道尔将军指挥下的35000人的联邦主力部队从华盛顿越过波托马克河扎营。在25英里以外,博雷加德将军指挥的20000邦联军队在布尔河的南岸部署,控制着马纳萨斯的主要铁路中枢。在谢南多厄河谷西北50英里处,在美军前兵站总监、现为邦联高级军官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将军指挥下的1200名南军对抗着罗伯特·帕特森指挥的一倍半的联邦军队。罗伯特·帕特森已69岁,是1821年战争的老兵。林肯命令麦克道尔起草一个对马纳萨斯地方博雷加尔军队发动进攻的计划。麦克道尔是以前正规军的少校,在战斗中从来没有指挥过多到一个排的战斗,但他有参谋工作的经验,并曾在西点军校教过战术。他提出的计划是一个好的计划——对有经验的军队来说。正当帕特森进攻约翰斯顿在河谷的部队以阻止他们支援博雷加德的时候,麦克道尔就从华盛顿出发,佯攻布尔河强兵守护的浅滩和桥梁,并派出一支大的纵队包围邦联防卫地带,并渡河进攻他们的侧翼。林肯欣赏这个计划,但麦克道尔表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最少数周——去训练他的没有经验的队伍,但林肯不肯等待,他说:“你们没有经验,这是事实,但他们也没有经验。你们都是一样地没有经验。”总统要麦克道尔采取行动。²

麦克道尔发布命令要在7月16日开始前进,但一开头就出了问题——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帕特森被来自华盛顿的含糊的命令弄得晕头转向,因而对在河谷进攻约翰斯顿表现不太热情,随后就撤退了。这时候,邦联已从在华盛顿邦联间谍网的头子罗斯·奥尼尔·格林豪那里了解到麦克道尔的计划。杰斐逊·戴维斯

命令约翰斯顿用马纳萨斯隘口铁路运走大部分军队去支援博雷加德。约翰斯顿留下一个骑兵队作掩护，在詹姆斯·E. B. (杰布)斯图尔特的指挥下，欺骗帕特森，而调他的大部分军队向铁路终点的兵站进军。帕特森受到斯图尔特的进攻花招所迷惑，他甚至在7月20日之前还未发现约翰斯顿已经撤离。到这个时候，只有一个邦联河谷旅已抵达马纳萨斯。帕特森不能在河谷扼制住约翰斯顿这一事实表明，即将来临的战斗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也说明了在上一章所说的邦联所拥有的三个优越性：优越的情报来源、优秀的骑兵部队和在内线调动部队的能力。

尽管邦联拥有种种优越条件，如果麦克道尔能够按计划那样快速运动，联邦也可能保持优势。但从亚历山德里亚到布尔河的进军变为一场混乱和延误的恶梦。这就说明了一个军事原则，对于训练不足的队伍来说，恪守行军纪律比恪守作战纪律还难办。在7月份炎热天气，士兵们在全线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每次停下就是几个小时。队伍从阵线退下来就去摘黑莓或在荫蔽处睡觉。缺乏经验的军官不懂得怎样使成千名士兵听从指挥。部队行军22英里就需要两天半时间，这样的距离在战争后期老兵们只要一天。由于需要重新发给由粗心的士兵消耗或损失的配给物和弹药，需要勘查这个绘制得很差的、罕为人知的地形图，又进一步耽搁了时日。麦克道尔终于在7月21日(星期日)准备行动。在这一天从华盛顿来的马车坐满了国会议员和各种观众来看“鞭打叛匪”。

麦克道尔的侧翼纵队12000人在凌晨两点起床，在黑暗中蹒跚地穿过矮树丛林，越过萨德利斯普林斯浅滩后就布署散开，这比原计划迟到3个钟头。与此同时，联邦其它部队佯攻布尔河的石桥和下游滩头，扼制住那里的邦联军队，而由侧翼部队包抄了他们。起初，虽然时间迟缓了，但行动还是有效的。联邦军团匍匐越过

沃伦顿关卡北面的田野，没有连续进攻，而是把数目超过自己的邦联军队赶走。这支邦联军队已经调离阵线以对付他们左翼受到的威胁。其他联邦部队涉水渡过浅滩，参加进攻。由于左翼的溃败，邦联方面急忙增援，其中包括弗吉尼亚人托马斯·J. 杰克逊指挥下的一个旅，他在亨利豪斯山担任守卫。到中午，叛军被迫退到山上。巴纳德·比将军企图重新组织南卡罗来纳州的溃散的队伍，指着杰克逊的队伍高声叫着：“瞧，杰克逊像一堵石墙屹立着！振作起来，支持弗吉尼亚人！”即使巴纳德·比本人已战死，但他们的确振作起来了。这就是“石墙”杰克逊传说的由来。

正当博雷加德和约翰斯顿到达亨利豪斯山亲自指挥他们重新组织的军队时，联邦军队因胜利而喜气洋洋，但他们的组织涣散。他们停下来重新编队，准备继续进攻。经过两小时后，从下午2时至4时，剧烈的战斗在山上此起彼伏。在某一地方，因各种军服引起的混乱使联邦的一次攻击受到损失。一个穿蓝色军衣的团队开出森林向两个联邦炮兵连移动，联邦军队误认他们是支援的步兵就停止射击，直到这支原来是第33弗吉尼亚团突然举枪瞄准他们，在射程范围内排枪射击，杀死许多炮手，打垮了这两个炮兵连。战斗继续着，但在这个地方联邦军队前进的势头减弱了。麦克道尔在战斗最剧烈的时刻，亲自给旅、甚至团发号施令，但在英勇战斗中他忽视了全面指挥的职责，未能把后方的两个预备旅调到前方来。

相反，博雷加德和约翰斯顿现在已牢牢掌握着他们的军队，包括从山谷调来的最后一个旅，他们刚在马纳萨斯下火车，并在下午4时行军进入战斗部署。博雷加德在这些部队和其他部队的支援下，发布命令，以他的生力军进行反攻。南军向前冲锋，发出南部人的呼啸。高声悲壮的尖叫，这种著名的呼啸所起的作用和北军士兵在战斗中发出的低声呼喊所起的作用一样——它

使紧张的神经松弛，在同伴间产生一种团结和力量感。南方人的尖叫声的出处不明（有人说是源于猎狐者的喊声，其他人把它比拟为呼唤猪猡的声音），据说是一种可怕的声音。一个联邦的老兵写道：“在凶残地区的这一边没有那样的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况下，使你的斗志下降的这种特殊感觉是永远无法表达的。你需要去体会。如果你说你没有体会到但只听到了这种狂叫声，那么你就是不曾身临其境。”⁸

许多北军士兵在异常酷热的7月，缺食缺水，一直行军战斗了13个小时，已经弄得筋疲力竭了。在这种可怕的反攻面前，他们顶不住了——起初是慢慢后撤，但在被迫越过布尔河后队伍就更加混乱。随着红日西沉，许多北军惊慌失措，使撤退变成了溃败。这说明了另一军事原理：有秩序的撤退对没有训练的军队来说是最难执行的军事调动。一些军车和在混战中抓来的老百姓的狂乱马车纠缠在一起。北部一个国会议员被俘了，另外几个政治要人力图把散兵集合起来，但被怒目的士兵推到一旁，这些士兵只想着怎样逃跑脱身。人流一整夜向华盛顿涌去，而撤退的速度要比进军时快得多。

布尔河之战（邦联方面称为马纳萨斯之战）是南部决定性的策略胜利。实际上每一方都有18000人参加（双方也有几个团队未投入战斗），邦联战死的有387人，北部战死的有481人；邦联伤者1582人，北部伤者1011人。北部有1200人失踪，大部分是被俘。在这场战斗中，约有七分之一的伤员后来因伤死去，所以每一方战死和受重伤的人数约有600人。虽然按以后的内战标准来看这是一场小的战斗，但它是到那时为止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和代价最高的战斗。

当杰斐逊·戴维斯本人在胜利的高潮抵达布尔河战场的时候，他敦促约翰斯顿和博雷加德向华盛顿推进。但约翰斯顿认为，他

的军队在胜利的时候比联邦军队战败时更加混乱。⁴后来，南部就未乘胜追击的责任问题发生了争论。博雷加德指责戴维斯不赞成前进，而事实上对方却是曾经主张前进的。不管怎样，邦联是很难攻克华盛顿的。麦克道尔在森特维尔已经建成了由生力军担任的坚强后卫，这也许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其他的联邦士兵部署在波托马克河沿岸的防御工事里，这是难以逾越的防线。战斗后第二天，大雨倾盆，道路变为无底泥潭。而且，邦联方面并不具备向前推进的后勤能力。在马纳萨斯地方的供给品已几乎耗尽，战斗后有些士兵空腹行军，超过了一昼夜的时间。

布尔河战斗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邦联方面来说，好像一个南部人就可战胜十个新英格兰人——即使数量相等和南军差一点被击败。他们在大多数战斗中坚持防守，这通常是一种有利条件，对没有经验的军队来说尤其应该这样。然而，邦联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使弗吉尼亚的南部军队产生了一种信心，这给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以心理上的优势。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使这一战场上的一些联邦官兵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也许，正像南部人经常声称那样，南军毕竟比北军强。这种潜在的自卑情绪，将在以后两年的东部战场证明它具有重要的军事影响。

麦克莱伦和波托马克军

因胜利而激起的兴奋促使南部后方过于自信，许多人认为战争已告结束。然而，与此同时因败北而引起的震惊使北部不得不面对现实。春天时人们表现出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现在则以不屈不挠的倔强精神所取代。如果南部人认为北军因挨了一顿打就撤走了，此时他们也就很快就有不同的认识。3年服役期的志愿兵涌向征兵站。政府迅速行动，改组东部的最高指挥部。从弗吉

尼亚西部得胜刚刚归来的乔治·B·麦克莱伦被派到华盛顿新近命名的波托马克军任指挥官。麦克道尔被降为师指挥官。帕特森由于未能把约翰斯顿阻于河谷，他的职务由马萨诸塞的政治将军纳撒尼尔·P·班克斯所代替。

麦克莱伦当时只有34岁，曾参与墨西哥战争并表现杰出。他在欧洲学习过军事，从1857年至1861年相继出任中西部铁路的主任工程师、副总管和总管之职。他后来曾这样写道，当他在7月26日抵达华盛顿时，他“发现无军队可供指挥——只集中了一些团队，畏缩在波托马克河畔，有些完全是新兵，其余由于最近的败仗而情绪低落”。⁵虽然这是有些夸大，但情况是够糟的。麦克莱伦以坚定的手腕重新组织和训练这些军队。不称职的军官被免职，新招来的士兵在严格训练下由新兵变为战士。他们重新得到在布尔河失去的某些自尊感。作为一个出色的组织者，麦克莱伦正是1861年军队所需要的人。

报界为麦克莱伦欢呼，称他为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有些热心人谈起他时，把他当作下一届总统（他是民主党人）。阿谀奉承使麦克莱伦冲昏头脑。他逐渐不把自己当作总统和将军的下属，而作为他们的主宰。在给妻子和友人的信中，他不自觉地流露了救世主的情绪，他写道：“我收到一封又一封的信，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谈话，要求我去拯救这个国家，还暗示总统职位、专政……等等，通过某种奇特的魔力作用，我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强有力的人……。上帝已使我肩负重任……。我奉命去完成这一重任。我那以前的生涯似乎不知不觉地奉献给这一伟大目标。”麦克莱伦的士兵增强了他的自负。他写给妻子的信说道：“你不知道，当我来到士兵中间时，他们是何等的兴高采烈。你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呼喊……。我可看到每一只眼睛在闪耀着。”对于林肯和斯科特将军，他写道：

我在不遗余力地提高我们的实力，但老将军总是在碍

事……。人民要求我去拯救这个国家,我必须这样做,不能顾及任何妨碍。……总统是个傻瓜,老将军又昏聩无能。……如果〔斯科特〕不能在我的前进道上被挪开,我就不留任,而要辞职,让政府好自为之。⁶

在11月1日,斯科特终于辞职了,而由麦克莱伦取代了他的职务。当林肯告诫他说,司令官和波托马克军指挥官的双重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这位将军回答道:“我能胜任。”⁷

布尔河战役后三个月,在弗吉尼亚战场没有重大的行动。正当麦克莱伦训练日益增多的军队(到10月份人数为12万人)的时候,约翰斯顿在森特维尔也同样地训练不足50000邦联军队。南军把前哨推进到可以看得见华盛顿的距离之内。在那里,双方的警卫队伍互相监视,偶尔也互相射击。就在这一阶段,有位北部妇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波托马克河边静悄悄”,南方的一位作曲家把它配上乐谱。萦绕心怀的调子和伤感的诗句使这首歌成为在波托马克河双方最流行的战时歌曲。

这些日子是舆论声中麦克莱伦的甜蜜岁月。但是,当晴朗的10月天气已经过去,而麦克莱伦的“雄师”却按兵不动时,政府和公众开始不耐烦了。麦克莱伦已经开始显露终于导致其垮台的种种弱点。他的第一个弱点就是过度地追求尽善尽美。他的准备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了,但准备工作再完善也永远不能使他满意。军队永远处于几乎待命行动的状况。与此有关的是麦克莱伦一直夸大对手的实力。当约翰斯顿只有41000人可待命出动的时候,麦克莱伦估计敌人的数目有15万人,并以此作为延宕的理由,直到他能把自己的队伍壮大到20万人为止。麦克莱伦的情报处,以著名的“平克顿侦探所”的阿伦·平克顿为首,因常常过高估计邦联军队的规模而使这位将军产生恐惧。但麦克莱伦相信他自己的想法。他也认为南部军事优越,因而使他常常夸大了敌人的力量。

麦克莱伦缺乏伟大将领所必备的那种精神和道义上的勇气、行动的意志和欣然面对真正的可怕时刻。为了掩盖他的弱点，他居心不良地想找替罪羊。他给妻子的信这样写道：“我是处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敌人兵力比我们大三四倍。总统、老将军不能也不愿看到事态的真相……。我在每一转折关头遭到了反对和欺骗……。”⁸

麦克莱伦瞧不起林肯使他在判断上犯了严重错误。例如，他没有让政府知道自己的计划。当他不得不说明不采取行动的理由时，他怒冲冲地回答或不作答复。在私下里，他把内阁说成是“鹅群”，把总统说成是“原始大猩猩”。有一次林肯想了解有关他的计划时，这位将军悄悄溜走，“以避免‘闲逛’的总统之类的一切敌手”。在几个晚上以后，在1861年11月，林肯和国务卿西沃德过访麦克莱伦，有人告诉他们说将军已外出，但很快便会回来。当麦克莱伦回来并知道有客人时，他不予理睬竟上楼去了。林肯和西沃德又等了半个钟头，一个仆人才终于告诉他们说，将军已经睡觉去了。⁹

麦克莱伦并不掩饰他对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的鄙视。早在一年前，他的一些亲密的政界朋友曾是布雷金里奇的民主党人。他那赞成蓄奴的思想倾向和拒绝打击叛军的行动在一些共和党人中产生了阴郁的想法。在10月1日，蒙哥马利·希莱尔说道：“林肯已开始怀疑起来。”怀疑麦克莱伦对北部事业的忠诚是没有根据的，但他的确委派同伙的民主党人担任一些重要的职位。他们像他一样想在克里坦登妥协的方案基础上恢复联邦。他们对蓄奴制是“软弱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南部也是软弱的。由于进过西点军校，又与南部军官在旧军队共同服役（麦克莱伦在1861年11月曾写道：“一些邦联的将军曾是我的挚友。”），他们不可能同意共和党人激进的、自由劳动的思想意识。他们不愿意去打那种废奴主义者

和激进分子开始所要求的那种战争——即摧毁蓄奴制并以自由土地概念去改变南部的一种战争。麦克莱伦写信给一位有影响的民主党的朋友这样说：“请帮助我摆脱黑鬼。我在为保持联盟的完整而战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能参与黑人问题。”¹⁰

麦克莱伦的个性和政治观点就这样与军事战略和战争目的掺和在一起了。在军队和共和党的高层集团之间危险的两极分化发展了。波托马克军开始参与了政治，这对其未来的战斗力产生严重的后果。

这种分化首先从鲍尔布拉夫战斗及其后果开始。当麦克莱伦命令查尔斯·P. 斯通将军派出他的师的部分侦察人员越过波托马克河向弗吉尼亚的利斯堡以弄清那里的邦联旅的实力和活动，而斯通在10月21日这样做时，这场战斗就打响了。南军伏击蓝衣北军团队，迫使他们跳下峭壁落入河中，有几个企图游到安全地方的士兵也被击毙或溺死了。200多名联邦军士兵伤亡，700多名被俘。被杀的有爱德华·贝克上校，他是侦察部队的指挥官、俄勒冈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也是林肯总统的密友。这次战斗的军事意义虽然不大，但却是一次耻辱的失败。然而，它的政治意义却是很大的。1861年12月，国会组织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当前的战争行动”，特别是鲍尔布拉夫和布尔河的战斗情况。调查战争行动的委员会是受激进的共和党人支配的，它产生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它调查了军队的医疗服务、与敌人的非法贸易以及军备承包合同。它有助于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效率和忠于职守，但它也使民主党的将军们感到烦恼，并强化了影响波托马克军的政治紧张局面。

斯通将军是委员会调查的第一个目标。斯通作为西点军校的学生和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曾经命令加入他的部队的逃亡奴隶回到主人那里去。就为了这一件事，他受到州长安德鲁的谴责，并在议会上受到查尔斯·萨姆纳的抨击。据说，他还曾在利斯堡

与邦联军官有过接触。他是个不忠的人吗？他是不是有意派遣贝克和联邦部队进入鲍尔布拉夫伏击圈吗？委员会调查了针对斯通的流言蜚语。虽然这位将军的罪名毫无疑问是赞成蓄奴制，而且可能与邦联的朋友保持不明智的接触，但说他不忠的种种传说没有一件得到证实。委员会威吓斯通，拒绝让他盘问证人，甚至不告诉他对他的具体告发罪名。没有出庭受审，也没有军事询问，他在1862年2月入狱6个月。虽然后来恢复了他的工作，任次要的指挥官，但他这一生算是给毁了。

欧洲与战争

大规模的内战会变为国际战争，这是一个规律。但美国内战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南部寻求外国介入，而欧洲大国也想来美国混水摸鱼，但邦联甚至没能得到一个欧洲国家政府的承认。这一失败有许多因素：北部的外交技巧、欧洲在波兰和丹麦的利益转化为国际性危机、大部分欧洲人怀有反蓄奴制情绪、英法害怕与北部交战带来的后果，等等。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邦联军队未能取得连续的胜利足以使欧洲各国政府相信南部可以维持其独立。外交胜利是以军事胜利为转移的。外交政策的节奏是受到战争的结果所支配的。在1862年秋，邦联军队所表现出的威力几乎赢得外国的介入，但7月份联邦在安蒂特姆的胜利保持了外交承认的成果，而南部则是鞭长莫及了。

欧洲对美国内战的态度，通常可归纳为以下一些看法。据说上层阶级，特别是在英国，一直是亲邦联的，因为南部种植园主和欧洲贵族之间存在着姻亲关系。英国的纺织工业依赖南部的棉花。英国制造厂主和船运商人高兴看到他们的竞争者新英格兰人的失败。欧洲各国政府看到北美共和国的削弱也不觉得遗憾，因为共

和国显著的发展会威胁他们在西半球的利益。欧洲的统治阶级高兴地看到美国民主试验的垮台，而这一试验的成功会激起他们国家中那些蠢蠢欲动的群众起来仿效。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自由中产阶级据说是同情北部的，把它看成世界上共和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伟大象征。联邦的胜利是自由劳动和民主的胜利，它的影响会推进欧洲自由主义的事业，而邦联的胜利将象征着蓄奴制和反动的胜利。

虽然这些看法颇具真实性，但这样的概括过于简单化了。新近的研究揭示出欧洲方面的态度是相反的和矛盾的。诚然，英国工人一般说来是同情北部的，但兰开夏纺织工厂的工人失业使那里的许多工人赞同进行干涉去支持南部以取得棉花。另一方面，许多英国制造厂商发现战时的北部是有利可图的客户而不是竞争对手。欧洲一些自由主义者看到，只要北部只是为联邦而不是为解放而战，那么在联邦的事业中并无道义可言。同时，作为反对现有政府的叛逆者，南部的贵族在欧洲统治阶级中引起了忧郁和羡慕。虽然一些英国政治家内心希望北部共和国垮台，但另一些人又害怕，这个接着而来的权力真空会在西半球产生纠葛和不稳定局面。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三世的确利用美国的冲突在墨西哥扶植了一个傀儡王朝。但有着权力平衡政治传统的法国，并不比俄国更渴望看到美国海军力量的衰落，因为它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起着抵消的作用。

出于对实力和国家本身利益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社会舆论的种种考虑，最终确定了欧洲对美国内战的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演变中，英国是事关重大的国家。作为世界上工业和海上的大国，英国的利益深受美国内战的影响，而英国也是最能装备以进行干预的国家。拿破仑三世玩弄企图单方介入的把戏，但最后因为没有英国的合作而不采取行动（在墨西哥是例外）。

棉花王的幻想

在1861年,南部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棉花就是王”这种理论上。按照这种理论,英、法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棉花。英国五分之四的棉花是来自南部。中断棉花供应就会使英国经济崩溃,使工人濒于挨饿,并使政府垮台。英国会被迫打破这种封锁从而挑起与北部的战争,这样将确保邦联的独立。

南卡罗来纳的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在他1858年著名的演说“棉花王”中曾花言巧语地问道:“如果有三年不供应棉花,情况将会怎么样呢?英国就会马上垮台,而且除了南部,整个文明世界将跟着垮台。不,你们不敢就棉花发动战争。任何世界上的大国都不敢就此发动战争。棉花就是王!”在1861年,邦联方面很少人怀疑这种论点的逻辑性。密西西比州州长曾对一位英国的战地记者说:“独立自主的密西西比州没有英国比起英国没有密西西比州能大干一番事业。”另一个南部人说:“呃,先生,我们只要切断棉花供应几个星期,就能在大英帝国制造一场革命。”一个查尔斯顿的商人相信,如果联邦的封锁减少了英国的棉花进口,“你们将会把他们的舰船沉入海底并承认我们。我想,在秋季前就可见分晓了。”¹¹

邦联并不想单靠联邦的封锁来祈求保护棉花王的统治权威。南部公共安全委员会颁布了棉花出口禁令。棉花禁止出口,虽然从来就没有被邦联议会批准,但在南部却得到广泛支持,并且得到彻底执行。1860年的大部分棉花已经装船外运,但1861年的大部分棉花却滞留在南部。1862年南部种植园只种植常年棉花面积的三分之一,而把其余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1863年和1864年棉花产量更少,不到战前平均产量的八分之一。1862年英国从邦联进口

的棉花大约是1860年的1%。

但是,对棉花王的理论来说,可惜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棉花丰收已使原棉和棉织品供过于求。颇有讽刺意味的是,1861年的棉花禁运实际上对正因市场棉花过剩而苦恼的英国纺织公司是有利的。直到1862年下半年,大量倾销的棉花发生严重歉收才严重地影响英、法两国。

即使没有1861年棉花过剩的那种偶然情况,禁运也不可能引起英国的干预。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大可能屈从于经济讹诈。棉花王的统治权威是一种幻想。英国在印度和埃及开辟了另外的棉花来源。虽然这种棉花的质量比南方棉花差,而且数量最初也很小,但到1864年,英国棉花进口已上升到将近美国内战前平均进口量的四分之三。大部分棉花是从印度和埃及进口,但也有一些来自联邦控制的南部港口,有些来自邦联。到1863年南部也改变了它的禁运政策,试图尽量通过严密封锁线运出棉花以支付军备进口所需的费用。

英国干预的经济动机在1862年末达到了高潮。当时棉花荒处于最严重关头,数以千计的兰开夏工人在受苦。但是,如果英国的这个经济部门因美国战争而暂时萧条,而其它部门就会兴旺繁荣。即使在战前,纺织厂在英国已逐渐失去其重要地位。联邦和邦联购买战争物资刺激了钢铁、造船和军火工业的迅速发展。这些部门的战时繁荣吸收了许多失业的棉纺工人。对其他工人则增加穷困救济使之度过难关,直到1863年棉纺厂恢复生产。最后才真相大白,是密西西比州需要英国,而不是英国需要密西西比州。

封锁与外交关系

联邦的封锁成为战争第一年外交上的主要问题——不是由于

其经济影响,而是由于其法律与政治上的纠葛。林肯宣布封锁,这是违背了他坚持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内部暴乱的观点,因为封锁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武器。1861年5月14日英国政府发布了中立声明,从而把交战一方的地位授予邦联。其他欧洲国家跟着发表中立声明。承认南部的交战地位,就给南部在中立国签约借债和购买补给品的权利和在公海执行交战任务的权利。北部对此极为愤怒,而南部则喜不自胜,因为双方都认为这是在外交上承认邦联的前奏。但实际上,英国除了承认邦联的交战国地位外,没有选择余地。欧洲的一些外交使节对北部所爆发的忿怒表示惊讶。正如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所说的那样:“交战国权利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¹²

与北部的恐惧和南部的希望相反,承认交战国地位并不是走向外交承认的第一步。事实上,欧洲宣布中立从长远看是对联邦有利的,因为声明里包含着正式承认封锁的意思。根据国际法,封锁必须对中立国实行确实有效的法律约束。但“确实有效”不过是定义而已。它是否意味着每一个港口一定要用军舰组成的一条密不透风的警戒线封锁起来?作为前几次欧洲战争中立国的美国,曾坚持这样的理解,但作为世界上主要海上大国的英国一直认为,如果巡逻战舰力求不让船只进出敌人港口,这种封锁是合法的。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曾使这两个国家在1812年陷入战争。但是,现在处境不同了,美国是海上交战的一方,而英国是最主要的中立国。联邦采取了英国关于封锁效果问题的传统立场,而邦联重申美国传统立场。英国有理由宣布封锁是非法的,如果英国这样做的话,因为邦联的使节提出了一长串曾偷越封锁线的船只的名单。英国政府不希望制造先例,以免在未来战争中使他们的海军自食其果。1862年2月15日,外交大臣罗素勋爵宣布联邦的封锁是合法的,只要战舰在港口巡逻时“有足够的力量以阻止越过港口或对进出港口船只

产生明显危险。”联邦的封锁当然是符合明显危险这一标准的。¹³

在以前的战争中，英国海军曾提出了“继续航运”法规，以证明攫取中立港船只上的货物是合理的，如果有理由认为这些货物最终是运往敌人港口的话。在半世纪前，美国反对这种法规，但是，现在联邦海军要比英国走得更远。通常送往邦联的军用物资是从一个欧洲港口运进南部海岸较近的另一中立港；在那里，再把这些物资装到偷越封锁线的船只上。联邦的战舰在英国商船抵达拿骚、哈瓦那和其他换船港口以前就开始捕获它们。在“斯普林波克”号（1863年）事件中，纽约处理战利品军事法庭曾坚持没收开到中立港的英国商船“斯普林波克”号，理由是船货最终是运给邦联的。英国政府不管商人的愤怒抗议，除把这一先例记录在案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863年，联邦海军把继续航行法规扩大到陆地运输。这一年，为邦联运货最繁忙的中立港之一是马塔莫罗斯，它是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在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口的对面。1863年2月，海军在加勒比海的圣托马斯附近捕获英国商船“彼得霍夫”号。“彼得霍夫”号是开往马塔莫罗斯的，它装运的是一些供给物品和其他军用走私物品。一个战利品军事法庭坚持把这些物品没收，因为有证据证实货物将从陆路越过边界运进邦联。英国报界不止一次地叫嚷着对狂妄的新英格兰人进行报复，但英国政府承认美国“继续运输”的法规，并把这些先例记录在案，以备后用。半个世纪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美国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恶报，英国利用继续运输的法规反对美国经中立国荷兰运送军需品到德国。

“特伦特”号事件

有一宗联邦干预英国船只的事件几乎引起一场英美战争。

1861年11月8日,美军舰“圣哈辛托”号拦住了英国邮船“特伦特”号,它是从哈瓦那启航开往圣托马斯的。在“特伦特”号船上,有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梅森和路易斯安那的约翰·斯利德尔,他们是邦联派到伦敦和巴黎的代表。“圣哈辛托”号舰长查尔斯·威尔克斯派出一伙人上船逮捕了梅森和斯利德尔,带走后把他们投入波士顿的联邦监狱。

此一事件使北部大为庆贺,把威尔克斯捧为英雄。众议院颁给他一枚特别奖章。消息传到英国,报界和公众极为愤怒。首相帕尔麦斯顿子爵对紧张的内阁说道:“你们可能忍受得了。……但我可忍受不了!”¹⁴英国海军调出舰只增援北美海军中队,陆军准备派远征军到加拿大。大西洋两岸都普遍议论着战争。

但是,这样的战争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双方很快更认识到这一点。英国写好了一个措词激烈的照会(但不是最后通牒),要求道歉和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艾伯特亲王在临终前又表示意见说,威尔克斯的行动可能不是奉命行事,因而缓和了照会的语调。这样就让联邦政府作出让步而不失面子。事实上威尔克斯是凭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行动的合法性由于国际法模棱两可而受到怀疑。在公海上搜查和没收走私货的正当权利已被确认,但外交官是否属于“私货”,还不太明确。如果威尔克斯曾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特伦特”号,把它带到战利品军事法庭上去,英国会毫无办法反对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在技术上利用这一点承认威尔克斯做得不对。林肯下令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而英国也把这作为是道歉,接受了美国的做法。这一危机乃宣告结束。梅森和斯利德尔取道往伦敦和巴黎,在那里,他们试图为争取外国的承认和干预而白白地花了3年时间。

第十四章 北部瞩望之春

尽管联邦军不久就要赢得一连串激动人心的胜利，但1861年1月的华盛顿依然笼罩着阴郁的气氛。“特伦特”号事件余波未平，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已使舆论界大失所望。北部的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已暂停硬币支付，军备承包合同的丑闻充斥报纸头版版面。波托马克军，除派出的四个团在鲍尔布拉夫战役受挫外，6个月来迄未采取重大行动；而这时麦克莱伦将军正患伤寒病。甚至乔治·托马斯将军在肯塔基的克罗斯罗兹的大捷，也未能消除阴郁气氛，因为胜利到此便停滞不前了。在密苏里军区司令亨利·哈勒克将军寄来的一封信，阐释了他的部队不能沿密西西比河挺进的理由，林肯在信函背面写道：“事态令人极为沮丧。要是到处都这样，将一事无成。”有一天，无精打采的总统来到兵站总监蒙哥马利·梅格斯的办公室，对他说：“将军，我该怎么办？民众已经不耐烦了。蔡斯财力拮据……上将患了伤寒。情况严重啊。我该怎么办？”¹

1月17日，林肯颁布“第一号作战命令”，命令全军于2月22日（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向前推进。这一颇欠高明的策略，林肯曾希望它能缓解人民的焦虑情绪，并且可以推动一下麦克莱伦，然而这一纸命令并未产生军事效果。但它确实迫使麦克莱伦告诉林肯，他计划把波托马克军经水路运往切萨皮克湾，在那里登陆后，对森特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邦联军翼侧发动攻击。当林肯正在反复考虑此项计划时，从西部却传来了富有戏剧性的消息。

亨利要塞与唐纳尔逊要塞

1861年，邦联政府任命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勿与弗吉尼亚的约瑟夫·E. 约翰斯顿混同）为西部军区司令。他是肯塔基州人，旧军队高级将领之一，曾被联邦授予最高指挥权，但他愿意归附南部。当唐·卡洛斯·比尔和尤利塞斯·S. 格兰特统率的联邦军于1861年秋占领肯塔基北部时，约翰斯顿构筑了一道横贯该州南部的防线，调集重兵据守鲍灵格林和密西西比河畔的哥伦布。比尔计划对鲍灵格林发动春季攻势，但是当他正在筹划之际，格兰特就抢先行动了。

约翰斯顿防线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亨利要塞和唐纳尔逊要塞，它们位于肯塔基与田纳西州界南侧的田纳西河畔和坎伯兰河畔，相距12英里。联邦以一支由三艘木质舰和四艘装甲炮舰（尚有更多的舰只在建造中）组成的舰队控制了水路。统率这支舰队的旗舰司令是安德鲁·富特，一位倔强而滴酒不沾的康涅狄格州新英格兰人。他对亨利要塞和唐纳尔逊要塞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与格兰特的看法不谋而合。哈勒克也觉察到此点，遂授权格兰特进攻亨利要塞。格兰特亲率15000人，在舰队配合下，向田纳西河上游进发，在距该堡四英里处登岸，准备从背后袭击，而舰队则从河上炮轰。而后来的情况是，在步兵开抵战场之前，炮舰已单独干起来了。亨利要塞位于低洼地，地势不利，逼近的北军对它的威胁几乎像暴涨的洪水。2月6日下午1点，富特的炮舰猛烈开炮；该要塞也毫不示弱地还击，一颗炮弹击中了一艘装甲舰的锅炉，使该舰失去了战斗力。然而，南军火力终于被压制住了。守军的大多数经由陆路逃往唐纳尔逊要塞，邦联军指挥官于下午3点投降。

这场短促战斗的后果非同小可。现在联邦炮舰沿着田纳西河

巡弋，直达亚拉巴马州的弗洛伦斯。格兰特挥师循陆路朝唐纳尔逊要塞进军，而装甲舰则顺流而下，驶入坎伯兰河，再次配合陆军行动。约翰斯顿濒临绝境。防线已被突破；由于联邦军已控制了田纳西河，鲍灵格林和孟菲斯之间的铁路联系亦被切断；驻守亨利要塞的格兰特威胁密西西比河畔哥伦布的邦联军据点的侧翼。如果唐纳尔逊要塞亦告失守，驻守鲍灵格林的约翰斯顿主力部队，势必受到格兰特在后和比尔在前的夹击，而纳什维尔本身亦难以困守。如果把可以调用的兵力都集结在唐纳尔逊要塞，就会冒损兵折将的风险；如果率军撤退到田纳西州中部的新防线，唐纳尔逊那支势单力薄的守军，将像熟梅坠地一样落入格兰特之手。约翰斯顿采取了折衷措施，把驻守鲍灵格林的半数兵力派往唐纳尔逊要塞。这样就使该要塞守军达到1700人，而他则率剩余部队向纳什维尔撤退。指挥唐纳尔逊守军的将领不是别人，正是约翰·B·弗洛伊德，此人是弗吉尼亚州的政客，在弗吉尼亚西部失败后，乃被派到肯塔基来。

格兰特麾下那支满怀信心的大军，集结于唐纳尔逊，并在该地得到增援，兵力扩大到27000人。格兰特打算部署部队从陆地一侧包围该堡，而富特舰队则从河上轰击，像对付亨利要塞一样，迫使它屈服。但是，唐纳尔逊要塞却显得棘手得多。占地15英亩的土木工程要塞，掩护着架设在河岸峭壁上的12门重炮。要塞外围，是沿着山脊开挖的环形战壕，这些山脊可以俯瞰险峻的林木茂密的深谷。假如能够不使可畏的炮舰靠近的话，那么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是可以固守战壕，至少能抗击两倍之敌。战役伊始，邦联军颇为得手。他们在2月13日击退了联邦步兵发动的不成熟的试探性进攻。翌日，装甲炮舰驶来发动进攻，原来这些庞然巨物毕竟不是坚不可摧的。经历一场激战，南军炮兵竟准确地击毁了其中的三艘，负伤的富特(后因伤重而死)下令停止进攻。

虽然邦联军首战告捷，但弗洛伊德及其部属依然感到进退维谷。北军使他们陷入水陆被围的困境；看来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了。当天夜间，邦联军的军官会议决定于2月15日晨突围，以便让守军逃出。正值联邦军右翼部队准备进早餐之际，万名南军士兵发出尖锐的呼号声，突然冲出森林，滑膛枪喷吐着火舌。鏖战数小时之后，南军迫使联邦军右翼后撤，从而打开了通往纳什维尔的通道。在这场激战中，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上校所部弃马奋战的骑兵营战功卓著。

后来事态的发展一直是引起争论的话题。突围之路已经打通，但邦联军吉迪恩·J·皮洛将军却命令部队返回战壕，弗洛伊德略经思考，竟同意了这一命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此举确实令人费解；另一些人认为南军指挥官在顺利实现突围计划时，骤然不知所措。事实真相看来是南军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长时间苦战，已疲惫不堪，组织涣散，在撤离以前需要稍加歇息，以便重新整顿，补充装备。

然而，这次停歇是致命的。格兰特在作战时没有在场，而是在上游3英里处的旗舰上与富特磋商军情，上风使他听不到战斗的喧响声。他返回前线后，发现自己的右翼已溃退，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他推测南军一定是抽调了右翼兵力去进攻他的（右翼），乃命令左翼部队攻击正面敌壕。衣阿华和印第安纳士兵在呐喊声中占领了防御薄弱的第一道堑壕；与此同时，格兰特在右翼重新组织士气低落的伊利诺伊和俄亥俄的两个团发动反攻，收复了早晨失守的大部分阵地。

2月15至16日夜，邦联军军官再次召开军事会议，不顾福雷斯特的强烈反对，决定投降。弗洛伊德唯恐由于自己在布坎南总统时期任陆军部长时的行径可能被指控犯有欺诈、叛国罪，便把指挥权移交给皮洛。而皮洛是一名政客，也担心落到联邦手里，便

将指挥权移交给西蒙·B·巴克纳，而巴克纳对这种怪事并未觉得可笑。当弗洛伊德和皮洛带领2500士兵乘船逃之夭夭，福雷斯特带领700骑兵蹚涉洪水漫没的道路出逃时，巴克纳就准备率残部13000人投降了。具有讽刺性的是，当格兰特在旧军队失意潦倒之时，巴克纳曾资助过他。然而，当巴克纳请示投降条件时，格兰特无意以德报恩。他答复说：“除立即无条件投降外，没有谈判的余地。我准备马上攻击你的阵地。”²

这番话使格兰特名声卓著，不过，唐纳尔逊大捷的影响超乎个人。这个要塞的陷落提高了北方的士气，而南方却是士气消沉。邦联驻英代表詹姆斯·梅森从伦敦来函写道：“最近亨利要塞和唐纳尔逊要塞的失守，已经使此间朋友们深感遗憾。”³ 事态还会更糟。由于联邦海军此刻已控制了坎伯兰河，纳什维尔势难据守，邦联军遂于2月23日撤离。该城是工业和交通的重要枢纽，也是沦于北军的南部第一个州府。

剩下来的问题便是撤退到密西西比北部科林斯铁路接轨点的艾伯特·西德尼的约翰斯顿指挥部了。他们在该地与撤离肯塔基州哥伦布的守军以及来自下南部的援军会合了。3月间，在距科林斯仅20英里的田纳西河畔的匹兹堡码头，格兰特建立了前进基地。他得到3个生力师的增援，其中之一是由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指挥的。哈勒克现在任田纳西—密苏里战区总指挥。他命令比尔手下的俄亥俄军从纳什维尔进军，与格兰特的西田纳西军会师，以便75000人的联邦部队此刻协同对在科林斯集结的45000邦联军发动攻势

夏 洛 战 役

但是，约翰斯顿无意坐待格兰特的进攻。博雷加德将军在

弗吉尼亚州和杰斐逊·戴维斯发生齟齬后，已被派往西部。约翰斯顿打算和他协同作战，趁河水泛滥、桥梁坍塌，因而使增援格兰特的比尔部队受阻之际，向格兰特的40000大军发动突然袭击，以夺回主动权。约翰斯顿拥有一个突出的有利条件——联邦方面没有任何人预料到他会发起攻势。在纳尔逊要塞陷落后，邦联军溃退，这使格兰特确信南军士气已一蹶不振。在匹兹堡码头，北军竟把时间消磨在操练上，并不挖掘壕沟，因为他们的指挥官热衷于打进攻战，毫不采取防御措施。

约翰斯顿拟命令部队从科林斯出发，进抵靠近联邦防线的宿营地。他们将在4月4日从这里发动拂晓攻击。可是出师不利。约翰斯顿发现麦克道尔9个月前在布尔河战役时就已发现的情况，即一支缺乏训练的庞大队伍，不可能火速地由此地转移到彼地。邦联军费时3天才完成了18英里的进军。可以肯定，突然袭击的优势已经丧失，比尔和格兰特此刻已经会师，博雷加德想完全取消此项计划，撤回科林斯。毫无疑问，他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邦联士兵已大喊大叫地进入阵地。他们已和谢尔曼的师的前沿骑兵前哨交火。格兰特明白南军在打什么主意了，或许要进攻驻守在下游5英里处克鲁普码头的分遣师，但他电告哈勒克说，他“几乎不相信会对我们发动全面攻击”。该师一名敏感的上校报告说，南军在森林里集结，谢尔曼轻蔑地对他说：“把你们那个混帐的团开回俄亥俄去吧。博雷加德决不是一个大傻瓜，竟然会离开他的作战基地，来我们的基地攻击我们。除科林斯驻军外，没有更近的敌人了。”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刻，约翰斯顿在两英里远的地方作出了决定。他最后已使部队逼近了敌军的地点，因此便不会倾听撤退的意见了。约翰斯顿于4月5日傍晚对军长们说：“纵使他们拥兵百万，我也要进攻。先生们，明天拂晓我们将出击。”⁴

翌晨，南军向谢尔曼的军营发动第一波攻击。该军营位于一

座叫做夏洛的木质小教堂附近。像某些报纸事后报道的那样，北军并不完全感到吃惊。联邦巡逻队拂晓时出发巡逻，曾与邦联军散兵遭遇，并高声叫喊着退回自己的防线，这样就为正面的两个师（分别隶属谢尔曼和本杰明·普伦蒂斯，均由未经训练的新兵组成）赢得了时间，奋起迎击朝他们涌来的灰色波浪。

在那漫长的一天，40000邦联军缓慢而牢固地击退了33000名联邦军（格兰特的分遣师直到夜幕降临才赶到战场），双方伤亡惨重。在茂密的树林里和在小块的林间空地上，各旅各团都失去对士兵的控制，战斗分成了许多片，猛烈交火。格兰特正在下游7英里处的指挥部进早餐，听到了射击声。他命令抵达的比尔军先头部队开赴战场，还征用了一艘轮船，急忙赶到前线，在那里和师长们共同协作，支撑了摇摇欲坠的蓝衣军战线。到下午3点，一个战斗格局已经形成。联邦军的两翼被打得均已后撤，只有普伦蒂斯率该师残部及其他师的一部，据守着设在一条凹陷道路的中部防线，邦联军贴切地称这条路为“大黄蜂窝”。当约翰斯顿在这一防区附近亲自指挥一次进攻时，他受了致命伤。博雷加德接替指挥。南军并不包围和绕过大黄蜂窝，而是调来62门大炮，以密集炮火连续猛轰，企图突破北军的中部防线。毫不放松的南军终于包围了普伦蒂斯，他于下午晚些时候率2200名残部投降，但已经为格兰特沿匹兹堡码头的山脊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赢得了时间。将近黄昏时，比尔军的第一个旅渡河与格兰特会师；两艘炮舰和山脊的50门大炮，向邦联军队倾泻炮弹；博雷加德明智地决定，拒绝派出他那支疲惫之师参与一次决定性的拂晓攻击。

南军已把蓝衣军击退两英里多，但未达到突破的目的。这时，形势对格兰特有利。他那个失去联络的师，终于从下游抵达这里，同时比尔指挥的三个师也在夜间过了河。次日，格兰特将增加25000名生力军，而邦联军却不能指望得到增援。夜幕降临，雷雨

交加，浇淋着 2000 名阵亡的士兵，还有上万名横卧沙场的伤兵。双方士兵几乎没有能够睡眠。炮舰彻夜不停地以 8 英寸炮弹轰击那些疲惫的邦联军宿营地。当潮湿的早晨终于来临时，坚强的北军便发起全线反攻。他们逼使南军步步后退，越过昨日战场，直到午后 3 时许，博雷加德才停止抵抗，开始踩着污泥向科林斯困乏地后退。联邦军似乎已满足于收复原先营地，仅略事追击，就受到福雷斯特所部骑兵的狙击。

会战后的败退和追击

许多历史学家批评格兰特没有乘胜给予一次强有力的打击，而这种打击本来是可以置南军于死地的。的确，邦联军向科林斯退却时陷在泥泞的路上。战斗结束后的当天上午，一名军长布拉克斯顿·布雷格写道：“我们的处境真可怕。部队溃不成军，士气低落。道路简直无法通行。口粮告罄，草料全无。”⁵ 然而，正像布尔河战斗后的情况，胜利者像败北者一样，也是溃不成军，疲劳不堪。尽管比尔的一些部队比较缺乏经验，格兰特本人却不能给他们下达命令，而比尔又缺乏战场杀戮本能。

一场重要战斗刚一结束就去追击败敌，这决不像纸上谈兵那样轻而易举。士兵们情绪倦怠，体力耗尽。他们在战斗以前就经常长途跋涉，一连数日吃不饱，睡不好。只要行动尚处在昂扬状态，体内肾上腺素的循环倒还可以使他们坚持下去，而战斗了几个小时后稍一停歇下来，就会出现情绪松懈，口渴难忍，找水喝便成为头等要事。夏洛战斗结束后，一名联邦士兵在家信中写道：“我们追击他们约四分之一英里，我们一停下来……便躺在地上休息。哎哟，妈妈，可累死我啦！战斗的兴奋已经消失。……到处是成堆的尸体和伤兵。我给一些可怜的伤兵喝水，接着又到附近一座被遗弃的营地去搜寻食物。”在另一次战役后，一名幸存者说道：“我

一生中从未亲眼见过这么多精神崩溃、疲惫不堪的士兵。我像一匹马一样病倒了，浑身沾满血污和汗垢，我们好多弟兄由于过度疲劳而呕吐。……我们舌干口渴，因缺水而皸裂，我们的脸被火药和烟尘熏黑了。”⁶

一支败军往往具有不顾困乏而仓猝逃命的动力，但对胜者来说，进一步鼓劲就更难了。经过了几次战斗——如著名的安提塔姆战斗和葛底斯堡战斗——联邦军拥有了新的久经沙场的部队作为后备，这些部队本来应该用于奋力追击逃敌的。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像在夏洛一样，士兵打仗过于疲劳，除休息和为自己的幸存而感到惊奇以外，什么也干不成了。而且在内战的多次战斗期间或战斗之后，例如在夏洛，大雨搅得道路泥泞不堪，阻滞了追击。

夏洛战斗至今仍是西半球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场大屠杀，尽管它在以后的内战战斗中在这方面名列第七。每一方的阵亡数字都超过了1700人，伤者逾8000人。在总数达16500伤兵中，有2000人将迅速死亡。夏洛是美国在整个内战中经历的一次洗礼。“唉，太骇人听闻，太可怕啦”，邦联军的一名幸存者写道：“祈求上帝让我永远不再参与这样的场面吧……。一旦得到解脱，我将毕生充当和平拥护者。”⁷

联邦在西部的其他胜利

1862年春季的一些时候，邦联似乎就要垮台。在一个月前，联邦军在夏洛以西四百英里的皮里奇会战告捷，把南军（除游击队外）逐出了密苏里，联邦达到了控制阿肯色州北部的目的。1861年11月，当弗里蒙特离开密苏里以后，塞缪尔·R·柯蒂斯将军便开始担任该州联邦军主力战地指挥。在一次冬季战役中，柯蒂斯的12000名士兵把斯特林·普赖斯部下的8000名密苏里籍邦联军诱

入阿肯色州，在那里普赖斯再次和本·麦卡洛克率领的一支小部队会合。这支16000人的南军混合部队(包括切罗基部族印第安人三个团)*，由好战的厄尔·范多恩担任全面指挥。柯蒂斯把其蓝衣军部署在阿肯色州北部的皮里奇正南一带。为避免正面进攻，范多恩绕过皮里奇北侧，在夜间从翼侧迂回，于3月7日晨袭击联邦军的后方。柯蒂斯的侦察员曾就邦联军的动向提醒过他，于是他便叫他的部队改变主意，准备迎击进犯者。他的炮兵击溃了切罗基团，一名狙击手击毙了麦卡洛克将军，蓝色防线遭到数量上占优势的南军步兵接二连三的冲击，竟岿然未动。翌晨，柯蒂斯准确地断定范多恩弹药告罄，乃发起反击，在一些地区击溃了南军。

随着邦联军在密西西比河东西两侧的退却，控制这条大河的时机已经成熟。南军已在密西西比河的第10号岛上设防；在那里靠近肯塔基—田纳西边境的地方，密西西比河形成一个巨大的S形。只要邦联军据守此岛，北军的舰艇就不能顺流而下。哈勒克命令约翰·波普将军组成拥有20000兵员的密西西比军，与河上舰队协同作战，夺取第10号岛。波普从该河的密苏里一侧驱退了邦联军；他的工兵开凿出一条穿过沼泽地带的运河，以便使运输船能绕过该岛；在岛上的炮兵火力拦截下，两艘装甲炮舰夺路闯过去了；然后波普调用炮舰和运输船，在该岛的下方将部队摆渡过河，他们在那里占据了田纳西河一侧河岸。那7000名守军，陷入北军

* 切罗基部族是五个“开化的部落”中最大的一个(另外几个是奇卡索族、乔克托族、克里克族和塞米诺尔族)，早在该世纪初，东南各州的白人就把这些印第安人的大多数逐出世居土地，美政府将他们重新安置在印第安人领地(即今俄克拉荷马州)。1861年，邦联与五个部落的一些首领议妥联合协定，让他们在邦联议会中派驻代表，给南方军队提供兵员。但大约半数的开化部落的印第安人继续忠于联邦。大体上说，纯血统的印第安人都留在联邦方面了，而混血种的则归属了邦联。后者中的一些人拥有黑奴。亲联邦印第安人反对亲邦联的印第安人的战斗，均局限于印第安人地区；皮里奇战斗是主要的例外。切罗基首领斯坦德·沃蒂擢升为邦联军准将，直到邦联军其他部队投降之后，他才率部投降。

部队和炮舰的四面夹击，遂于4月8日投降，还交出重炮150门。就在同一天，吃了败仗的邦联军，正踉踉跄跄地踩着泥浆，从夏洛朝科林斯转移。

新奥尔良的陷落

恰恰在北部庆祝田纳西大捷的时候，从下南部也传来了海军获得赫赫战果的捷报——占领新奥尔良。邦联军最高指挥部认为，联邦对密西西比河下游构成的主要威胁将来自上游，因而抽调了海湾沿岸部队（他们参与了夏洛会战），还派遣了8艘炮舰驶往北部，以便在孟菲斯上游对抗联邦河上舰队。为了防御来自海湾的攻击，新奥尔良只剩下3000民兵作为陆上防卫力量、两艘尚未造成的装甲舰、数艘武装汽轮以及位于城市下游70英里处河道两侧的要塞。这正是联邦军来犯之路，而且这次远征是由出类拔萃的战时海军司令戴维·G. 法拉格特领导的，南部的厄运正在于此。

法拉格特出生于田纳西，和一个弗吉尼亚女子结了婚，但他依然效忠星条旗。内战爆发时已年届六旬。他九岁便参加海军，成为海军军官候补生，并参与了1812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作为一个斗志旺盛的人，法拉格特相信，可以把战争尽量推进到舰船能够驶到的腹地。1862年，他统帅的海湾远征军，包括载炮210门的17艘木质战舰、20艘迫击炮艇以及本杰明·巴特勒指挥的15000名士兵。4月中旬，舰队朝上游进发，驶抵新奥尔良以南的两个要塞。在那里，海军准将戴维·D. 波特指挥的迫击炮艇，开始发炮轰击，长达一星期之久，发射了17000颗13英寸炮弹，但未能把要塞摧毁。这些场面虽壮观但毫不奏效的烟火，使法拉格特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于是他决定让战舰闯过这两个要塞。4月24日凌晨两点，舰队起锚，逆着流速每小时3海里的急流，排列成单行溯河而上。两要塞的百门大炮开炮射击；战舰的全部舷侧炮齐射反击；无畏的南

军舰试图撞击几艘联邦战舰，并且推出火攻木筏以对付其他舰艇（几乎使法拉格特的旗舰着火）。一个联邦军官把当时的场景描绘得像是“世间所有的地震，所有的闪电雷雨，在2英里的空间内一起怒吼，霎时间一切都爆炸了。”⁸ 尽管炮声惊心动魄，战况猛烈，法拉格特毕竟闯过去了，战舰仅沉没一艘，三艘失去战斗力。他驶抵新奥尔良，该地那支孤立无援的民兵，慑于舰炮威力，未发一弹便弃城逃窜了。4月25日，该城向法拉格特投降。下游两要塞内的邦联军士兵哗变，向巴特勒投降；而巴特勒留下一个团驻守，统率其余健儿北上去占领南部最大城市和主要港口。

法拉格特并未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战绩。他率舰7艘继续沿河北上，在那里，巴吞鲁日成为第二个陷落的州首府，由于联邦舰队的火炮瞄准它的街道，它就像新奥尔良一样投降了。纳奇兹城也未抵抗就投降了，然而，维克斯堡——凭仗高踞悬崖之巅的重炮群——拒不投降，于是法拉格特便向下游撤退。到5月底，从新奥尔良到维克斯堡，密西西比河是一条400英里长的联邦交通干线。为了避免受制于敌，北面的河上舰队夺路下驶到孟菲斯，6月6日，联邦装甲舰和撞角舰在那里击沉或俘获了邦联军河上舰队8艘舰船中的7艘，当时，怏怏不乐的孟菲斯市民在悬崖上目击了这一场景。该城投降了。

联邦胜利的步伐停滞不前

当美国海军正在赢得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之际，西部大军的情况如何呢？夏洛战斗后，邦联把一切可调用的部队都集结在科林斯，使全部兵力达到70000之众，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列入病号册的。而哈勒克在夏洛旧战场集结的联邦部队兵力达10万余人，亲自担任指挥，开始徐缓而有条不紊地朝科林斯推进。作为墨守典籍的军人，哈勒克更相信18世纪关于攻占“战略要地”的军事

思想而不重视歼灭敌军。因此，极其重要的科林斯铁路接轨点，便成为他的目标。如果博雷加德不战而弃守的话，哈勒克会感到高兴，博雷加德这样做了，他在5月底悄悄地溜走。哈勒克认为这一行动是联邦的胜利，但格兰特却认为是祸患，因为他相信，采取坚决的行动本来是可以歼灭一部分邦联军的。

可是这时候，正值格兰特烦恼失意之时。从旧军队时期起，他一直以豪饮闻名军界，自从唐纳尔逊之役使他声威远扬以后，他嗜酒的传闻又不胫而走。夏洛会战以后，谣言纷起，传说联邦军因指挥官在那里酗酒而感到愕然。林肯并未听信这些无稽之谈*。总统对一个带来这种谣传的来访者说：“我不能不要这个人；他能打仗。”⁹

但是，哈勒克显然认为可以不要他，因为在科林斯战役中，他将格兰特委任为副指挥，使他闲置而无所事事。格兰特要求调动，甚至考虑辞去军职，可是在谢尔曼的力劝下，他留任了。7月间，哈勒克赴东部后，格兰特开始担任田纳西西部和密西西比北部所有联邦部队的指挥官。

可是在那以前，哈勒克已经把他那支庞大的部队划分成几个部分。比尔率军35000人，对查塔努加发动一次无效的攻击（最后受到挫折）。其他部队开赴阿肯色，以对付邦联军在那里的新行动。其余的部队则分散在他们过去4个月里攻占的45000平方英里的

* 关于格兰特嗜酒的传闻，是以琐事为根据的谣传，是对名人进行诋毁的一个实例，谣言经报纸和闲言的补充而变成“事实”。1854年，格兰特上尉被派往加利福尼亚前哨基地，就开始明显地贪杯，试图消除厌烦乏趣和离妻别子的孤寂之感。为避免因读职罪而受军法审判，他辞去军职，后来从事各种职业，无何显著成就，直到1861年才重返军界，任伊利诺伊志愿军集团上校。1864年，擢升为三星军衔，引起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军官的嫉妒，他们遂散布关于他嗜酒的流言。根据格兰特传记的作者，即著名的内战史学者布鲁斯·卡顿的说法，在战争期间，格兰特饮酒甚少——比联邦军其他将领少——而他履行职责的能力，却从未因酒精而削弱过。

邦联领土上,占领城市,防守交通线。许多历史学家对哈勒克分散兵力的做法一直持批评态度。他们争论说,在占领科林斯后,如果50000大军集拢在一起,他们本来是能够南下攻取维克斯堡、杰克逊,甚至莫尔比的。这个论点有点道理。但它忽视了派遣大批部队守卫补给线、管理占领的城市以及处理占领区全部问题的需要。它还忽视了夏季在美国南部作战发生的疾病问题。

1862年春,驻守科林斯的邦联军中发生了可怕的瘟疫。在出征科林斯期间,联邦军也遇到类似问题。联邦军占领该城之后,连哈勒克、波普和谢尔曼在内的几名将领也患了病(谢尔曼患了疟疾)。疾病也使联邦军对维克斯堡的最初战役遇到困扰。

1862年6月,法拉格特再次率舰队和3200名步兵向上游进发,奉命攻占维克斯堡。联邦河上舰队从孟菲斯驶来支援。防守维克斯堡的,有60门重炮和由范多恩指挥的10000名士兵。海军的迫击炮和舰炮天天猛轰防御工事,但收效甚微。步兵在该河U字形急转弯处的地峡开凿了一条水道,指望急流将它冲宽而成一条新航道,俾使北军舰船能绕过维克斯堡。但该河并不听命协作。维克斯堡三面环河,还有无法通行的沼泽,只有东面能受到陆路攻击,而那里又有一道高耸的山脊作为屏障。发动这样的攻击,不仅需要数量庞大的部队,使后勤供应难以解决,而且联邦现有的士兵和水兵中,有三分之二因疟疾、痢疾和伤寒而躺倒。数以百计的士兵病得奄奄一息,加之大河水位下降(危及法拉格特的深水舰),联邦军遂在7月底放弃了对维克斯堡的首次攻击。法拉格特朝南撤退,河上舰队则驶向北部;邦联这才暂时占有从维克斯堡到路易斯安那州哈得孙港之间200英里的密西西比河航道。在这一航道上,他们也设防了。

尽管1862年未能攻占维克斯堡,从2月6日亨利要塞陷落到

6月6日孟菲斯陷落的4个月，是联邦在西部获得显赫战绩的时期。“对南军的每一次打击都极其奏效”，1862年5月23日《纽约论坛报》为此而高兴地说，“叛军惊慌失措，没精打采。预测这场斗争的结局，现在已无须去作漫无边际的预言了。”

1862年5月，南军的确士气消沉。他们不仅在西部溃退，而且在东部，麦克莱伦的波托马克军10万劲旅，距离里士满已不到5英里。联邦在弗吉尼亚的其他部队，每条战线的兵力在数量上都超过了邦联军，看来已作好7月4日前粉碎叛乱的进军准备。然而，在那个日期以前，在李和杰克逊的英明指挥下，已扭转了弗吉尼亚的局势，并使北部迅速取胜的希望成为泡影。

第十五章 杰克逊和李的回击

弗吉尼亚州的半岛和河谷战役

随着弗吉尼亚1862年春季的来临，麦克莱伦将军在筹划一次用心良苦的侧翼行动，以波托马克军攻打森特维尔的邦联军，以避免代价颇高的正面攻击。为了抢在这一行动之前，邦联军司令约瑟夫·E·约翰斯顿破坏了这一行动计划，并于3月初便向南撤退到40英里处的库尔佩珀。在那里，他能够更有效地保卫里士满，使它不受来自各方的威胁。当麦克莱伦在考虑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北部的新闻记者们巡视了邦联军撤离后的防线，发现了几根涂着黑漆的圆木，很像加农炮，再加上其他物证，显示约翰斯顿的阵地并非那样坚固，军队也不像麦克莱伦声称的那样众多。“假炮”使麦克莱伦不胜尴尬，也助长了共和党不断增长的疑窦，认为他确实不愿击溃南军。3月11日，林肯解除了麦克莱伦的司令官职务，因为他身为出征大军的指挥官，在即将上阵之际，无法履行对联邦全军的职责。这是合乎道理的，但也暗示着对麦克莱伦的不信任。

由于邦联军这时隐蔽在拉帕汉诺克河的那一侧，麦克莱伦计划把自己的出征基地进一步向南推移，把波托马克军用舰船运送到切萨皮克湾，直抵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半岛顶端的门罗要塞。此举使部队处于可以在靠近里士满的地点建立基地的有利地位，从这里渡过两条河，便可到达邦联首都里士满。但是，这将使里士满而不是南军成为第一位目标，这与林肯考虑的顺序恰恰相反。在林肯看来，它还有缺陷，一旦南军从西部或南部发动进攻，就使华

盛顿处于防务空虚的状态。麦克莱伦答应把足够的部队留在华盛顿附近保卫首都，还向林肯提出保证，他进军弗吉尼亚半岛，势将迫使邦联军远离华盛顿，而撤向东南去对付里士满面临的威胁。林肯勉强批准了这一计划。

3月末，一支由300余艘舰艇组成的舰队，开始把70000士兵，还有马匹、货车、军需品以及300门大炮，从亚历山德里亚运往门罗要塞。欧文·麦克道尔将军统率的一支数达35000的精锐部队待命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稍后移师南进，与麦克莱伦配合，攻击半岛南部的邦联军防御阵地。除波托马克军外，还有另外两支联邦军也在弗吉尼亚战区作战：一支是纳撒尼尔·班克斯所部25000人在谢南多厄河谷；另一支是约翰·C. 弗里蒙特统率的8000人在弗吉尼亚西部，他是林肯因受国会压力而被委以指挥权的。其中一些部队是麦克莱伦考虑留下来保卫华盛顿的。麦克莱伦实际留在华盛顿防御工事里的团，也比他答应留下的少，而且差不多都是新兵。总统对首都的安全感到忧虑，对麦克莱伦感到气恼，因为他对此显然漠不关心。

林肯认为，班克斯在河谷的兵力雄厚，对付斯通沃尔·杰克逊在该地的那支为数不多的军队绰绰有余，遂下令将班克斯的一个师调往距华盛顿较近的马纳萨斯。然而，这是无视杰克逊的非凡才干而作出的决定。杰克逊笃信宗教，个性内向，不可捉摸，他在南北战争中最后成为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发布命令，防止班克斯把任何军队从河谷调到弗吉尼亚东部去。3月23日，杰克逊率领仅有4200人的部队，大胆地袭击了驻守克恩斯顿村的一个人数比自己大两倍多的师，该村位于温切斯特的南面。他虽被击退，损失惨重，但这次战术性失利却证明是一次战略性胜利，其后果非同小可。林肯推想，杰克逊驻守河谷的兵力很可能比原先设想的多，于是便命令班克斯全军留在该地，而从麦克莱伦部队中抽调一

个师增援西弗吉尼亚州的弗里蒙特。为了在华盛顿附近保持足够的兵力以保卫首都，林肯命令麦克道尔的一个军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而不按原先计划去和麦克莱伦会师。

麦克莱伦向里士满进军

麦克道尔一个军的留守，是引起麦克莱伦及其支持者大为不满的几件事情的第一件事。他们指责说，共和党政府无意让这个民主党将领获得成功。这一指责毫无根据。不管怎样，在4月份的第一周以前，麦克莱伦已拥兵70000（还有30000人迅即抵达），而相对峙的是在约克敦革命战争时期旧战场* 附近的半岛南部挖壕据守的邦联军，有15000人。麦克莱伦对这条堑壕防线只是围而不打。他过高估计了据守约克敦防御工事的敌军人数。邦联军指挥官约翰·B·马格鲁德将军竭力促成麦克莱伦的错觉。马格鲁德这位业余戏剧表演迷，给联邦军做了一番表演。他使他的部队往返行军，将炮兵部队不停地转移，凭借这种办法给人们造成他的兵力比他实际兵力要大的印象。

林肯对麦克莱伦在约翰斯顿把大部分军队转移到半岛以前未能摧毁约克敦防线，感到失望。4月9日，总统警告麦克莱伦说，旷日持久的围困，只能证实人们对将领不愿作战的疑虑。“对你来说，你很有必要去进行一场攻击……。我从未怀着比此刻更加强烈的亲切感给你写信，或跟你谈话，也从未以更加充沛的意志支持你……可是，你必须行动。”尽管约翰斯顿已将40000余士兵调到了半岛，麦克莱伦的唯一行动便是慢慢地紧缩包围。约翰斯顿视察

* 约克敦革命战争旧战场：位于弗吉尼亚东南部的约克河畔，1781年，华盛顿率军在此围攻英将康沃利斯统率的英军，并迫使他投降。革命战争即指1776年—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译者

了约克敦防线以后,评论说“只有麦克莱伦才不愿进攻。”¹

麦克莱伦终于在5月初以前把大炮拖入包围圈阵地。但是,约翰斯顿并没有坐待大炮将他的防御工事炸得肢离破碎,竟然于5月3日夜撤离战壕向里士满退却。联邦的几个师追击退却的南军,5月5日在威廉斯堡袭击了他们的后卫部队。一场激战之后,已耽搁了追击,邦联军已经撤走,并有足够的时间掩护后勤供应车队撤退。滂沱大雨把道路变成泥淖,联邦军继续追击已陷入困境。雨几乎持续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多种瘟疫在流行,在泥泞深不可测的道路上铺上大量木排(即铺上圆木和木板),在暴涨的河上架起无数的桥梁,还有无休止的咒骂——可是几乎没有战斗。

邦联军的退却使诺福克不得不弃守,这样就打开了联邦军舰驶入詹姆斯河的通道。5月15日,包括“蒙尼陀”号在内的5艘炮舰,溯河而上,进攻里士满下游7英里处的德鲁里高地的邦联军要塞。政府准备撤离首都,但联邦海军却在德鲁里高地受到打击。“蒙尼陀”号的大炮无法仰射足以命中100英尺高度的高地邦联军炮队;其他炮舰遭到南军炮火和沿岸狙击手的重创,他们把甲板上的北军水兵逐个击倒。假如里士满要被攻占,麦克莱伦的军队本来是应当攻占它的。

在5月20日以前,约翰斯顿已在离城5英里处构筑了一道防线,邦联军60000人在那里与联邦军10万人相对峙。援引阿伦·平克顿的特工的报告,麦克莱伦估计约翰斯顿的兵力有15万之多,他要求增派援军,才能发起攻击。林肯允诺把麦克道尔部的40000人调拨给他,这支部队能马上从弗雷德里克斯堡进军,与仍留在邦联军和华盛顿之间的麦克莱伦右翼会师。然而,“石墙将军”杰克逊在谢南多厄谷河的战绩,再次打乱了联邦军进攻里士满的作战计划。

杰克逊在河谷

3月,克恩斯顿之役结束后,杰克逊就撤向河谷(向南),班克斯警惕地跟踪追击,但不时受到南军游击队的骚扰和骑兵的袭击。在4月末,杰克逊招募了新兵部队,并得到理查德·尤厄尔将军指挥的一个师的增援,使他的全部兵力达到17000人,北部面对着班克斯的15000人(班克斯的一个师已撤回去增援攻击里士满的部队),西部面对着弗里蒙特在数处分散布署的15000人。作为杰斐逊·戴维斯的军事顾问,罗伯特·E.李,在里士满向杰克逊建议,在河谷再发动一次佯攻,以阻止联邦进一步增援里士满前线。杰克逊其人还真是将此建议付诸实施的最恰当的人了。他甚至对自己的军官们也守口如瓶,以免泄密。他把半数部队开往东部,越过蓝岭,然后让他们在夏洛茨维尔附近乘上火车,接着又把他们运回西部的斯汤顿。而斯汤顿是受到弗里蒙特部分军队威胁的一个重要供应基地。这一路线曲折的行军已迷惑了敌军,5月8日,在斯汤顿西部山区进行了一场激战之后,杰克逊将弗里蒙特的两个旅驱往北部。

当游击队搞得弗里蒙特心神不宁的时候,杰克逊又挥军东进,发现班克斯的另一个师已奉命与麦克道尔会师,以实现与麦克莱伦预期的会合。因为这正是杰克逊极需防范的,于是他便迅速采取行动,攻击班克斯。班克斯的部队已减至8000人,遂沿河谷大道撤至斯特拉斯堡,并派出一个团到弗兰特罗亚尔,扼守卢雷河谷的山口。杰克逊装作跟踪班克斯到斯特拉斯堡,但突然转向东部,翻越马萨努登山抵达卢雷。他在此地顺便率领尤厄尔师,进军弗兰特罗亚尔,并在5月23日击溃了该地联邦守军。在全部的军事行动中,杰克逊那支由特纳·阿什比指挥的无畏的骑兵队,颇有成效地掩护了杰克逊的行动(即阻止联邦骑兵接近,使他们无法发觉杰克逊的真实意图。)在此次战役中,南军步兵行军迅速,行程颇远,因

此以“杰克逊的步骑兵”而闻名。

杰克逊行动疾速而诡秘，已使班克斯迷惑不解，而对弗兰特罗亚尔的袭击更使他不胜震惊。这时邦联军位于他的翼侧10英里处，兵力比他多两倍。杰克逊敦促部队前进，以切断班克斯撤往温切斯特基地的退路，但是困乏的“步骑兵”已经在前4天沿着恶劣的道路行军70英里，行动破例地缓慢下来。班克斯使他的大部分军队进入温切斯特的阵地，但杰克逊毫不放松地连夜追踪，于5月25日拂晓发起攻击。联邦军在短促抵抗后便溃散了。班克斯残部涌向北部，直奔波托马克河。杰克逊希望追击并歼灭敌军，但他那支疲惫不堪的步兵再也走不动了，而阿什比部下那支纪律松弛的骑兵队，在掠取了缴获的北军供应品后，作为战斗部队已经解体了。尽管班克斯使大部士兵渡过波托马克河，但杰克逊的军队已俘虏或击伤击毙3000名联邦士兵，并缴获数量可观的运货车、供应品、药品、大炮和马匹。

关于班克斯溃退的夸大其词的报道，引起了北部的惊恐。据报道，杰克逊正率军40000部队横渡波托马克河，向华盛顿进军。林肯并不相信这一报道。他对事态的反应并不是为首都担忧，而是想不等杰克逊部队撤回河谷便设下罗网加以歼灭。总统再次命令麦克道尔暂停向里士满推进，并命令他派出20000人赶赴斯特拉斯堡，直插杰克逊的后方。他命令弗里蒙特率15000人从阿勒格尼山脉出发，进抵哈里森堡公路，如果杰克逊远离公路，便加以拦击。他命令班克斯重新改组所属部队，重渡波托马克河，从北部追踪杰克逊。如果运筹得当，杰克逊部队将陷入联邦40000人合围大军的罗网之中。

由于杰克逊发动河谷战役的目的是阻遏麦克道尔驰援麦克莱伦，林肯已经因为让李和杰克逊占了便宜而受到了非难。但林肯首先消灭杰克逊的决定，可以视为正确的军事部署。因为将领们

行动缓慢,又不协调,后来计划失败了。弗里蒙特从西部而不是依照林肯的命令从南部逼近斯特拉斯堡。5月30日,弗里蒙特和麦克道尔的先头师师长詹姆斯·希尔兹将军相距仅20英里,在杰克逊穿过斯特拉斯堡逃窜的路线上集结了25000人。两支军队均比邦联军更靠近斯特拉斯堡。然而,由于道路泥泞,也由于邦联骑兵队的佯动,更由于缺乏战斗士气,联邦部队行动缓慢,而杰克逊军队在罗网布好之前,却急行南下,沿河谷碎石公路逃逸。

弗里蒙特和希尔兹向南分别沿着马萨努登山两侧的公路追击杰克逊。邦联骑兵队比联邦军抢先抵达卢雷河谷的三座主要桥梁,把它们付之一炬,阻滞了希尔兹的追击,而杰克逊的后卫部队还焚毁了河谷公路的一座桥,使弗里蒙特的行动放慢了。两支联邦军可能会师的唯一剩下来的一座桥梁,位于里帕布利克港,那是座落在斯特拉斯堡以南60英里处的一个村落。杰克逊首先到达该地,部署自己的师守卫桥梁,留下尤厄尔部6500人对抗在克罗斯基斯的弗里蒙特所部12000人,该地是位于北部数英里处的另一村落。6月8日,弗里蒙特在那里对尤厄尔发动了并不凌厉的攻势,在开始无何效果的炮击以前,只从24个团中派出了5个团的兵力。翌日,杰克逊率领尤厄尔部队的半数士兵开赴里帕布利克港,参与对希尔兹师的两个旅的进攻。由于在数量上以二比一超过联邦军,杰克逊希望迅速歼灭对手,然后转而挥师进击弗里蒙特。然而事态的发展难从人意。希尔兹的部队出人意料地顽强。杰克逊在经历数小时的苦战之后才将他们击退,但自己的部队却损失惨重而不能追击弗里蒙特了。邦联军撤到蓝岭,烧毁了里帕布利克港的桥梁,延宕了弗里蒙特的跟踪。

军事院校仍在研究杰克逊的河谷战役,把一支利用地形和机动性的小部队如何获得战场优势而战胜兵员众多但失之分散的敌军当作一个范例。在一个月內(5月8日至6月9日),杰克逊的

17000人部队挺进了350英里，四战四胜总兵力比自己大两倍的三支敌军，使敌军遭到的伤亡比自己多两倍，缴获大量的急需物资，并且使约60000敌军无法行动。杰克逊使林肯三次搁置调遣麦克道尔全军驰援麦克莱伦的计划：3月间克恩斯顿会战和5月间温切斯特战役之后，还有6月间里帕布利克港之战后。虽然麦克道尔的一个师最后确实和麦克莱伦会合了，而其余三个师仍留在谢南多厄河谷内或附近一带，以对付令人生畏的杰克逊决定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后来麦克莱伦对国会“战争指导委员会”说，“要是麦克道尔将军的部队在5月与波托马克河军会师……我们就会在一周内攻占里士满了。”² 虽然人们对此有理由怀疑，认为不论麦克莱伦拥有多少军队，他也不肯进攻，但事实到底是，杰克逊发动的河谷战役已经达到了罗伯特·李和戴维斯预期的全部目的。它还扩大了邦联军在弗吉尼亚的一系列胜利，从而使南军取得对敌军的心理优势。

七棵松战役

当5月31日杰克逊正在逃脱林肯设在斯特拉斯堡的罗网时，半岛上的军队正在里士满以南5英里处进行一场大规模战役。奇克哈默尼河流经里士满和麦克莱伦设在约克河畔的供应基地之间。为了保卫这一基地，为了使自己的右翼与预期从北部开来的麦克道尔军队会师，麦克莱伦的部队部署如下：把部队两翼设在奇克哈默尼河的两岸。该河在最佳季节也毗连沼泽地带，5月的大雨已使它变为狂奔的激流。5月30日一场倾盆暴雨，使联邦两翼大军之间唯一赖以联系的4座桥梁遭到被冲毁的危险。约翰斯顿利用这场暴雨的有利时机，于5月31日投入三分之二的兵力，向大河南侧的联邦两个军的一个军猛攻。

如果得手，这次袭击也许会使麦克莱伦遭到致命的打击。然

而，口头的而非书面的命令，竟引起南军一片混乱。约翰斯顿的作战计划，要求三个师从三个不同的方向进军。这对他那个缺乏经验、人手不足的参谋部是过于复杂而难以掌握。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将军的一个师走错了路，竟跟邦联军另一个师纠缠在一起。预定的拂晓攻击一直拖到下午才发动。几个旅还没有投入战斗，其余的旅零零散散地发动了进攻。这就给联邦将领提供了增加援军的时间。麦克莱伦命令埃德温·萨姆纳将军，一位在内战前经历了42年戎马生涯、皮肤被刺伤过的宿将，率军渡过奇克哈默尼河，加强联邦军翼侧。尽管桥面水深没膝，倔强的老“雄牛”萨姆纳，使包括炮兵在内的全部人马都渡过了河。他的先头师反击南军，在薄暮时遏止了他们的前进。翌晨，邦联军重新发动攻击，但战果甚至不如前一天。到了下午，他们几乎已被驱退到七棵松和费尔奥克斯（此战役即以两地命名）之间公路一带的出击点。这是一场伤亡颇重的混战，战斗在森林和沼泽地里进行，无法协同作战。而且有些伤兵一陷入泥浆中便溺毙了。双方投入战斗的兵力大约都是42000人，南军伤亡达6000人，北军达5000人。

这次战斗并未取得重大的战略效果，但对双方最高指挥官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麦克莱伦见到遍横战场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便丧失了斗志。他写道：“代价如此惨重，我看胜利并无诱人之处。”麦克莱伦关怀士卒，这是他素孚众望的一个原因。然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麦克莱伦钟爱士兵，乃是一种危险的感情。这使他忘记了无法否认的事实，即士兵为战斗而存在，而且可能死亡。”³ 这就使他更加主张调兵遣将和围困，而不是作战。

如果七棵松战役使联邦指挥官更为谨小慎微，而它对邦联领导人的影响却截然相反。约翰斯顿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就负了伤。接替他的是罗伯特·E·李。因为李早期在弗吉尼亚西部表现并不突出。他的任职几乎未能使南部感到振奋。麦克莱伦评论他的

新对手时说：“肩负重责，谨小慎微，意志薄弱……，一旦繁重任务急迫，就缺少精神上的坚定性……，可能会表现出怯懦，优柔寡断。”可是一名熟识李的南军军官说，尽管他举止文雅，有贵族仪态，但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的名字可以叫‘大胆’。他将有更多的冒险机会，而且要比这个国家其他任何将领来得更快。”⁴

李把他的军队命名为北弗吉尼亚军。他即刻着手筹划对麦克莱伦的优势兵力发动一场进攻。6月12日，他派遣 J. E. B. 斯图尔特将军执行骑兵侦察任务，以便发现麦克莱伦的准确位置。斯图尔特作为一个无畏的、精神抖擞的传奇式人物，具有一个骑士的典型形象。他是一个优秀的骑兵统帅。他不仅搞到了李所需要的情报，而且还凭高明的骑术在麦克莱伦大军的周围活动。在为时3天的冒险中，以1200人包围了10万敌军，抓了一些俘虏，破坏了联邦军的补给品，智胜追踪的敌骑，回师时仅损失一名士兵。斯图尔特对李说，麦克莱伦的右翼“没有掩护”（没有天然屏障如河流、山脉的防护），容易受到包围。

七天战役

麦克莱伦已经把他的大部分军队调往奇克哈默尼河南面，留在北岸的仅有菲茨·约翰·波特的一支30000人的增援部队。李决定向这支部队发起攻击。为了达此目的，他打算将杰克逊的部队从河谷调来，以18000人袭击波特的翼侧，而半岛部队的45000人则横渡奇克哈默尼河进攻正面。这一行动的风险是，当他加强自己的左翼以进攻麦克莱伦的右翼时，奇克哈默尼河南侧的70000名联邦军可能冲垮他们正面对峙的25000邦联军。然而李了解麦克莱伦，所以认为值得去冒这个风险。为了使北军产生错觉，李首先派出一个师给在西部90英里处的杰克逊。联邦情报员及时密报了这

一调动。但与此同时，杰克逊却极秘密地利用铁路、公路，把军队运送到里士满正北，他在那里将能和李发动协同攻势。

这段时间麦克莱伦在干些什么呢？两周来他几乎每天向林肯保证，天气一旦好转，而“必要的准备工作”完成后，他就开始进军，但同时，他要求政府能否给他增派更多的兵员。他抱怨说供应匮乏和援军不足，但并没有什么根据。虽然他未能得到麦克道尔的整军的增援，可是其中一个较大的师已抵达他那里，而且从4月份起，他原来的部队已经得到总数达35000人的增援，6月20日，他拥有的战斗部队将近10万人。即使在杰克逊抵达之后，邦联军兵力仍不足90000人，但麦克莱伦的蹩脚的情报处竟把此数字夸大为20万——这便成为他按兵不动的理由。然而麦克莱伦于6月25日搞了一次武力侦察——显然这便是他久已应诺的进攻的开端。

但在第二天，李部渡过了奇克哈默尼河发动了攻击。从那时起，南军便掌握了主动权。虽然进攻开始时不甚得手——出人意外的是，失利主要归咎于杰克逊。李的部署是要求杰克逊的三个师袭击波特的右翼和后方，这将是李军各师进击梅卡尼克斯维尔村附近联邦军前线的信号。可是素享盛名的杰克逊步骑兵在6月26日并未抵达战场。位于中央的由A.P.希尔指挥的邦联军先遣师等不及了，遂于下午3时发动进攻，将联邦军警戒哨逐出梅卡尼克斯维尔，但随即遭到驻守在村东沼泽地一条小河彼岸的蓝衣军的扫射，伤亡颇重。杰克逊在不到3英里处听到了射击声，但未去支援希尔。人们对杰克逊在这一次以及后来以“七天战役”闻名的日子里所表现的奇怪行动议论纷纭。据说联邦军焚毁桥梁，砍倒树木以阻塞本来就难通行的道路，使他迟迟不能向梅卡尼克斯维尔村进军；据说李的命令含糊不清，邦联军参谋部工作失当；杰克逊部队经历河谷战役和后来向里士满的行军，已感困乏；在熬过几个近乎不眠的夜晚之后，杰克逊本人已是精疲力竭，缺乏生气。不论理由

如何，杰克逊并未像他在河谷那样对半岛发动同样的进攻。

6月26至27日夜间，波特将他全军撤到盖恩斯磨坊正东的博茨韦恩沼泽地后侧的坚固防线。李跟踪而至，并于6月27日下午以57000之众对波特的已经加强的34000人的部队发起全面攻击。杰克逊再一次缓慢地进入邦联军左翼阵地，李的中间各师接二连三地受到猛攻而后退，直到薄暮时分，全线最后出击，才突破了北军防线。波特在夜间渡过奇克哈默尼河退却了。

当这场战斗继续向北推移时，大河南面的部队在干些什么呢？约翰·马格鲁德的演戏才华再一次起着作用。李命令他搞些演习和游行，以这些花招使麦克莱伦认为他准备进攻。马格鲁德重演了约克敦故伎。他的炮兵隆隆轰鸣；步兵步伐整齐地前进和后退；军官们站在能听到联邦军前线动静的森林里，佯作向团队高声发令；有些连队对北军阵地发动短促突击。诈骗术真起了作用。麦克莱伦果然给华盛顿拍发电报说，他在奇克哈默尼河两岸受到“占压倒优势兵力的攻击”，虽然事实上他在该河南侧拥有的兵员优势是2.5比1。⁵

麦克莱伦决定把基地转移到半岛另一边更加安全的詹姆斯河去。当天夜里，他便下令部队南撤到詹姆斯河。紧接着，他给陆军部长斯坦顿发出电报，表示当天的事情已使他不知所措：

因为我部兵力过少，此次战役失利了。……政府不必要也不能追究我对战斗结局的责任。……我看到那么多的同伴阵亡和负伤，使我只能感到政府没有支持这支军队。……假如我现在挽救了本军的话，我要坦率地告诉你，我不会感谢你，也不会感谢华盛顿的任何人。你为了牺牲本军，已经尽了最大努力。⁶ *

* 电报局里的一个感到愕然的上校，在拍发电报给斯坦顿之前，删掉了最后两句。

写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个吃了败仗的将领，尽管他统率的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两方面都超过敌军。拿破仑说过，战争中真正举足轻重的不是士兵，而是这种人——负责指挥的将领。麦克莱伦印证了这一点。

李打算趁联邦军横过半岛撤退之际冲击其侧翼和后卫。他的计划从纸上谈兵来说是高明的，但师长们执行起来却感到棘手。他们两次袭击退却中的蓝衣军——6月29日在萨维奇车站，6月30日在格伦代尔。邦联军每一次都未能很好协调他们的攻势；在格伦代尔，他们8个师只将两个师投入了战斗。另外两次杰克逊也贻误了战机——一次是在奇克哈默尼河上一整天搭桥，而不是涉水而过（水位已下降）；另一次是因对方炮火狙击和白橡林沼泽地一座断毁的桥梁使自己受到制约，而没有命令各师涉过浅滩，直逼格伦代尔的联邦军侧翼。

7月1日，联邦军构筑了一道横过莫尔文高地的坚固的防线，该高地是高达150英尺的斜坡，两侧是深壑，正面是长而开阔的火力阵地。蓝衣军炮队在正面横列配置了100门大炮，另外150门配置在侧翼，作为后备。这阵地看来坚固难攻，但李认为，撤退的北军胡乱遗弃的装备就说明了士气颓败。他相信，再发起一次攻击，在他们抵达詹姆斯河并取得炮舰掩护以前，可能歼灭之。邦联军炮兵发射密集炮火以削弱敌方阵地，然而，联邦军大炮却发射出犹如外科手术般精确的反击炮火，将他们的大炮一一摧毁。李决定命令步兵无论如何要发起攻击。用邦联军将领丹尼尔·H.希尔的话说，随后发生的“不是战争——而是屠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均被联邦军发射的炮弹和榴霰弹粉碎了。在莫尔文高地，北军炮兵比内战期间其他战役更显示出优势。邦联军伤亡有半数是炮火造成的，这对这场战争的每一方的确是仅有的一次。后来希尔声称，拥有邦联军的步兵和北军的炮兵，他就能举世无敌。

莫尔文高地之役，是“七天战役”最后的战斗。蓝衣军撤退，以便在哈里森码头休息和重新装备，而南军则医治创伤。虽然李在第一个月的指挥中成就是非凡的，但他感到失望的是，麦克莱伦未遭到更严重的损失便逃之夭夭。李一反常态，大发雷霆，对他的一名将军厉声说，这一事态的发生，是“因为我不能使我的命令得以贯彻执行”。⁸后来李把几名将领从弗吉尼亚战区调走，并把该军的八个步兵师改编成两个军归朗斯特里特和杰克逊指挥，才纠正了参谋部和指挥机构的弱点。

无论南军统帅部存在什么弊端，都比不上作为作战将领的麦克莱伦的缺陷。在整个的“七天战役”中，联邦军实际上仅受挫一次——盖恩斯磨坊之战——邦联军伤亡20000人，联邦军16500人（后者中的6000人是失踪者，大部分是被俘者；如果只计算阵亡者和伤者，南军伤亡近20000，北军约11000）。莫尔文高地之战结束后，邦联军损失严重。甚至包括麦克莱伦的门徒菲茨·约翰·波特在内的几名联邦将领，都建议反攻。麦克莱伦不但没有采纳，反而下令撤往哈里森码头，据说脾气急躁的师长菲利普·卡尼此时曾说：“我们不但不该撤退，而且应该穷追敌军，攻占里士满。……我对你们大家说，这样一道命令只有懦夫和叛徒才会给予支持。”⁹

在死者与生者中间

像西部的夏洛战斗一样，“七天战役”揭开了东部全面战争的序幕。那么多北军和南军曾怀着无忧无虑的浪漫主义投入战争，这情怀已一去不复返了。纽约义勇兵一个团的上校参加半岛战役归来后写道：

出征和归来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我们出征时是春天，快活、漂亮，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战鼓咚咚响，军号呜呜吹，带有褶纹的洁净丝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秋天未到，我们就

踏上了归途，悲伤、疲顿、混身泥垢，军服褴褛……。红色马裤哪里去了？义勇兵短上衣哪里去了？穿着军装的那些人[哪里去了]？……在威廉斯堡阵亡了，在费尔奥克斯阵亡了，在格伦代尔阵亡了，在莫尔文高地阵亡了；受伤或生病躺在医院里。¹⁰

战役结束后，那些曾参与掩埋死者的士兵，有时滔滔不绝地描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那困扰着我们的景象和臭味，简直难以形容——死尸膨胀到原先的两倍那么大。由于受到恶臭气体和蒸气的压力作用，有些尸体竟然爆裂。腐臭气令人作呕，……不一会儿我们都感到恶心，并口贴地面俯卧着，我们大多数人大口大口地呕吐着。”但是，有许多士兵对死亡景象变得无动于衷了。一个新英格兰人写道：“我们看到死人与看到死猪一样满不在意。”而一个沉思的南军士兵则仔细地说：“我不可能描述这一转变，也不知道是何时发生转变的，然而我知道发生了转变，因为我此刻差不多以这样的感情看待一个士兵的尸体，倘若那是一匹马或一头猪，我也会同感。”¹¹ 61年的孩子们已经成为62年的老练战士。

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和更具破坏性，双方士兵的相互态度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一方面，仇恨的程度随着杀戮的程度已逐步升级。“七天战役”以后，一个弗吉尼亚籍列兵在日记中写道：“祈求上帝替我们向穷凶极恶的敌人报仇。……‘要宽恕你的仇敌’是上帝的箴言，[但是]，怎能宽恕我们正与他们进行斗争的那样的仇敌呢？掠夺我们的财产，把我们家园和朋友那里赶走，在战场上杀死我们最优秀的公民，罪行确凿，不容宽恕。”另一个南军士兵在1862年春致妻子的信中说：“教育我的孩子们要怀着刻骨仇恨去仇恨他们，在任何情况下，若不是想法消灭对方，就永远不许他们见面。”北部士兵作为侵略者而不是被侵略者，很少表现出这种赤裸裸的仇恨。然而，北军是可以犯下野蛮暴行的。在半岛战役期间，关于南军虐害俘虏和伤员的残暴行径的许多传闻，在联邦军营中流传着。

一个纽约团对此深信不疑，发誓要以牙还牙。当一个邦联哨兵拒绝他们提出的投降要求，反而射杀他们的一个伙伴时，激起怒火的纽约州人便把他抓获，正像一个旁观者所报道的那样，“用绳索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吊在树上，把他那悬空的身躯当作射击靶子，接着割断绞索把他放下来，用刺刀捅了十几下，随后把他拖到大路上，他们在那里守候着，直到一长队运货马车把他的尸体辗成肉酱。”¹²

另一方面，南军士兵与北军士兵之间的友善交往已成为传奇轶事。他们操同一种语言，享有共同的历史和多方面的共同文化，彼此以弟兄或堂弟兄——有些情况确是这样——相称。他们在安闲的时候，有时把滑膛枪架起来，以烟叶（北部很罕见）换咖啡（南部几乎搞不到），一起玩纸牌，同声咒骂他们的军官和挑起战争的政客。7月4日，在莫尔文高地附近前哨线之间的一小块黑莓地里，发生了一桩典型事件。“我们的士兵和北方佬达成了互不射击的协议”，一个南军列兵写道，“并且都从阵地走出来到黑莓地里，每方的哨所仅留下一名士兵看守武器，一起采摘黑莓，谈论战事，交换烟叶和咖啡，还交换报纸，彼此和睦而亲切，似乎过去的七天里未曾发生过一场相互的厮杀。”¹³ 此类事件——曾发生过多次——反映出内战的嘲弄和悲剧。

联邦陆军与全面战争

麦克莱伦在里士满前沿的挫败，使北部的舆论从春季异常欢欣的高潮，坠入夏季绝望的深渊。“此间人们的沮丧情绪十分严重”。纽约一个知名人士于7月份报告说。民主党人抨击林肯和斯坦顿未支持麦克莱伦；不少共和党人谴责麦克莱伦是赞成蓄奴制的，是叛徒，林肯是让他担任指挥官的傻瓜。总统郁郁寡欢，但并

不惊慌。他宣布说：“我希望把这一斗争坚持到胜利，或直到我离开人世，或我被征服，或任期届满，或国会、国家把我遗弃。”¹⁴ 和平调解的希望已经消失。双方都无意和解；双方都无意让步；双方都不肯罢休，直到双方遭到彻底的、毁灭性的全面失败而不得不那样做。

早在一年前，联邦军在布尔河的败北，使北部大为惊骇，从而使北部更加坚决地去争取胜利。无数的新兵成群结队地涌向军旗，政府改组了指挥机构。1862年的“七天战役”后，又出现了这种势态。但这一次北部公众的反应颇不一致，缺乏信心。

当务之急便是征募新兵以加强部队，重新发动进攻。林肯担心在弗吉尼亚撤退之后号召征兵，会被认为惊惶的征兆，于是便安排由北部州长“吁请”总统下令各州征募30万名服役期为3年的新志愿兵，以便“继续扩大联邦军近来取得的战绩”。林肯于7月2日据此行事，给各州按人口数分配了名额。¹⁵ 未来的上校和上尉再一次在各县奔走，号召男子报名应征，为上帝和国家作战。纽约的废奴主义者詹姆斯·S·吉本斯，虽是教友派教徒，但“在紧急情况下很有理智地动了肝火”。他谱写了一首在征募集会上演唱的爱国歌曲：“亚伯拉罕爹爹，我们来啦，又来了30万人。”

然而，这一次30万人可不是爽快地招募来的。厌战情绪已取代了战争狂热。有几家报纸极力主张征兵。可是，敌视征兵的情绪如此强烈，政府决定首先试试可供选择的办法。不过，在1862年秋季，制定一项准征兵法令还是必要的。8月4日，陆军部长斯坦顿给各州发出征调通知，要求征募服役期为9个月的30万民兵（除一个月前征募的服役期为3年的志愿兵外）。斯坦顿援引最近通过的《民兵法》（7月17日）的一项条款，宣布凡是完不成分配名额的州，将受到民兵法的约束。根据陆军部颁布的繁琐条例，凡超额完成志愿兵分配额的州，每超额一名服役期为3年的新兵，就等于民兵分配

额中4个服役期为9个月的民兵。这一条例旨在对各州施加压力，激励志愿参军，以避免征募。这在大多数地区是行得通的——不过很棘手，而且预示将来会出现麻烦的。尽管一些州不得不凭借民兵征募法去这样做，但大多数州终于完成了分配名额。这在一些地区激起了反征募骚乱，尤其在宾夕法尼亚煤田的美籍爱尔兰人和在威斯康星的美籍德意志人中间。有些州允许被征人雇佣顶替者。有几个州和地区为服役期3年的志愿兵付出100元或更多的补助金。他们认为，给那些放弃理想职业而参军的人发放补助金以赡养士兵家属的作法，是合理的。但是，这笔支付款项却把雇佣因素引入了志愿从军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越来越糟。1862年7、8两月的征调令，最终得到421000名服役期为3年的志愿兵，以及87000名服役期为9个月的民兵。这次招募不是靠全国征募，而只是因为征兵工作中潜伏的威胁才得以完成的。

这些措施给军队征募了新兵。但是，即将指挥他们的新军官如何呢？林肯在6月就把约翰·波普从密西西比召回，任命他统率新组建的弗吉尼亚军，那是由弗里蒙特、班克斯和麦克道尔所部的个别部队组成的，它们在谢南多厄河谷抗击杰克逊的战役中表现不佳。波普因在西部战区军功卓著，又因发表声明批评麦克莱伦和反对蓄奴制而赢得了激进共和党人的支持。可是，波普统辖新部队一开始就不顺利。7月14日，他向部队讲话，声称东战区部队比不上西战区部队，说“在那里我常常把敌军撵走”。他希望弗吉尼亚军抛弃诸如“构筑坚固阵地并据而守之”，或者保护“撤退路线”之类的念头。“让我们研究敌人可能的撤退路线，而不要管我们自己的了。让我们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前进就能取得成功和光荣，殿后就潜伏着灾难和羞辱。”¹⁶ 不管斯坦顿是否记下了这番话，如波普后来所言，这番话简直不是博得东战区士兵忠诚的最好方式。

波普的下一步行动也触犯了众怒。他宣布，他的部队将没收叛

乱者的财产，一旦需要就为部队所用；要处死游击队员，并拘留那些帮助和支持他们的平民；要把拒绝忠于合众国的平民从联邦境内驱逐出去，如果他们返回，就以密探论处。这些严峻的命令，使波普成为邦联所憎恨的人物；而邦联认为这些命令就是北方佬嗜好掠夺和屠杀的铁证。罗伯特·E·李写道：“必须镇压这个卑鄙的波普。”李说，他可能宽恕他的支持联邦的一个侄子，但是，他永远不会由于他是波普参谋部的成员而宽恕他。¹⁷

尽管波普关于游击队员和平民的命令并未实施，但那些关于叛乱者财产的命令，不管有无具体指令，正由这支大军和其它联邦部队执行着。入侵军所到，沿途的平民财产已成为整个战争的一个首要目标。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弗吉尼亚北部的战役使所有的县都遭到蹂躏。如果一座桥梁被破坏，工兵营会毫不迟疑地拆毁最近的房屋或谷仓进行重建。一连好几英里的树木和栅栏都不见了，而成为士兵营火的燃料。农民的牲畜和玉蜀黍谷仓无一幸免于难。甚至麦克莱伦统辖下的士兵竟把詹姆斯河畔一些古老而漂亮的种植园住宅洗劫一空。尽管南部的传闻夸大了北部入侵者的恣意破坏，但事实情况是够严重的。士兵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争辩说，同叛徒作战而不触动他们的财产，简直毫无意义。这是不容置疑的逻辑。这一逻辑构成了1862年7月17日国会批准的一项没收法令的基础。它也构成8月从华盛顿发给格兰特将军的命令的基础：

最理想的是，你要扫清西田纳西州和北密西西比州的全部有组织的敌人。如有必要，拘捕一切积极同情分子，或者把他们当俘虏拘留起来。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要严厉对待那个阶层，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充公，一旦玉蜀黍长到可以作粮秣时，你们就从密西西比叛逆分子手里把能够搞到的一切补给品都弄到手，现在该是他们开始意识到存在战争的时候

了。¹⁸

有一个不赞成以这一方式进行战争的联邦将领，他便是麦克莱伦。7月8日，林肯亲临哈里森码头，视察“七天战役”后波托马克军的状况。磋商以后，麦克莱伦递交给林肯一封信，概述了关于正确指导战争的意见。他写道：“战争不应该着眼于去征服任何州的人民，不论对没收财产，对人们进行政治处分，对各州领土进行整顿调整，或对强行废除蓄奴制，全都不应作片刻考虑，……宣布激进的观点，尤其是涉及蓄奴制的激进观点，将会迅速瓦解我们现在的军队。”¹⁹

林肯看这封信时，默默无语。但是，臆猜他的想法并不困难。麦克莱伦的观点和林肯六个月前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在那六个月里，势态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战争已冷酷无情地爆发。林肯业已决定起草一项解放宣言。麦克莱伦关于战争目的和策略的观点已不合时宜。更糟的是，这些观点看来是在争取两年以后民主党总统选举的提名。纽约民主党知名人士已经在探询麦克莱伦对此问题的看法。这个将领表示赞成“软性”战争，这就加深了共和党人对他无意从事这一战争事业的猜疑。如果林肯需要一个敢作敢为、顽强作战的将领，一个相信只能依靠残酷无情、毫无保留地战斗才能克敌致胜的人，那么看来麦克莱伦并不是这样的人。

第二次布尔河战役

7月11日，林肯将哈勒克从西部召回，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麦克莱伦把这一任命看作是给他的一记耳光，因为现在他不得不在一个“我知道此人将是我的部属”²⁰的人手下供职。林肯希望“老智囊”将调整联邦全军战略，并筹谋发动新的大胆攻势。但在这方面他将大失所望。哈勒克原来是一个学究式的、碌碌无为的和缺

乏想象力的人。他不久便安于日常例行公务，很少从事战略计划和指挥工作，而林肯正是为此才调他来到华盛顿的。后来，总统把哈勒克说成是“只不过……一等办事员”。然而，哈勒克的才干却不应该轻易抹煞。他是个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能把陆军部颁布的文官指令用军事术语转译给将军们，能把军事报告用政府能够理解的语言转译出来。他的命令和报告条理清晰，精确谨严。在战时迅速发展的军事官僚机构中，这些都是重要的才能。哈勒克也许当过办事员，但至少是个一等办事员。²¹

哈勒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驻守哈里森码头的麦克莱伦的90000大军。麦克莱伦说，如果拨给我50000援军，我就要攻占里士满。他不久就把求援数字增加到10万，他估计与他对峙的李军有20万之众。林肯大为失望，并对一名内阁成员说，如果他调拨给麦克莱伦20万士兵，那个将军就会突然发现李已拥兵40万。林肯曾经希望，麦克莱伦的90000大军从东面，波普的45000人从北面，同时向里士满挺进，就可能使李军陷入巨钳的夹击之中。然而，波普和麦克莱伦互相藐视；麦克莱伦几乎没有进军的迹象；他的部队正因疾病而受到削弱，而遍地沼泽的半岛上最严重的疾病流行季节就要来临。林肯和哈勒克终于决定将波托马克军从半岛撤出，经水路去加强波普从北部发动的攻势。

麦克莱伦强烈抗议这一决定。他对这一决定的反对和他对政府的蔑视，*在他将迅速而有效地执行对自己所鄙视的将领给予增援的任务时，并没有显示出来。既然他部下的许多官兵都持这种态度，那么当他们到达波普那里时，怎么会在他指挥下奋力作战，便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 此时，麦克莱伦在私人信札中写道，林肯“是老顽固，而且又很缺少才华”，斯坦顿是个“十足的恶棍”，整个来说，政府拥有“一班残忍的家伙。……我无法向你表达我对这些人的蔑视。”

甚至在麦克莱伦接到从半岛撤军的命令以前，李就已派遣杰克逊率军24000人去反击波普的南进了。杰克逊希望重演河谷战术，决定在其它联邦部队开到之前，就向他的老对手班克斯指挥的两个先头师发动突然袭击。可是这一次，班克斯竟于8月9日在锡达山首先发动了进攻。战斗初起，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北军便把南军打退，甚至击溃了杰克逊最老的部队，著名的“石墙将军”旅。但是，杰克逊把援军调了上来，狠狠地打击了蓝衣军。

这次战斗之后，李以赌注断定，麦克莱伦肯定将永久撤离半岛。他率领另外30000人的部队北上，在波托马克军增援波普之前，与之决战。在十天的军事调遣期间，李迫使联邦军后退渡过拉帕汉诺克河，但未能创造有利的进攻时机。由于麦克莱伦大军的先头师这时已与波普会师，李决定将部队作一次特别大胆而冒险的调遣。他把部队分为两部分，先派遣杰克逊军进行大迂回的侧翼进军，绕过波普的右翼，切断他的供应线。在两天内（8月25—26日），杰克逊的步骑兵疾走50余英里，袭击了马纳萨斯的联邦军巨大的补给品仓库。那是内战期间极了不起的一次进军。杰克逊迅速撤退。他那些饥肠辘辘、双脚疼痛的士兵尽可能地夺取了全部的联邦供应品，不是吃掉便是带走，并把残余的东西付之一炬。

波普希望，在李和朗斯特里特军与杰克逊会师之前，要把这场灾难转而成为击溃杰克逊的良机。可是，首先他必须找到杰克逊。诡计多端的“石墙将军”，使所属的3个师从马纳萨斯到布尔伦河旧战场正西的树木繁茂的山脊地带，沿各自的路线行军。8月28日，当一系列有关南军行踪的相互矛盾的报告不断送到波普司令部时，他竟发出了混乱而且相互矛盾的命令，枉费心机地想查明杰克逊的行踪。似乎毫无目标的行军和逆向行军，引起官兵们尤其是波托马克军的菲茨-约翰·波特部队官兵的诅骂，说波普是犯大错误的人。波特像麦克莱伦一样，是亲蓄奴制的民主党人。他感到

甚至比自己的上司对波普及支持他的反蓄奴制的共和党人还怀有敌意。早在两星期前,波特曾给一个民主党人编辑写信说,政府对弗吉尼亚战役指挥无方,活该败北。他以令人震惊的声明作为结束语:“要是这支军队留在华盛顿去铲除那些断送我们国家的政府当政者就好了。”²²

8月28日薄暮,波普的一个师发现了杰克逊。当这个师不知不觉地走近隐蔽在树林中的邦联军时,杰克逊就忍不住向他们发动了攻击。在沿着沃伦顿公路展开的这场激烈而持久的战斗中,蓝衣军直到夜幕低垂一直顶住了人数两倍的敌人。一份份突然发出的命令再一次到达在8月29日拂晓开始集结在杰克逊正面的联邦部队。南军已沿着一条未竣工铁路的路基和沟渠摆好了阵势。当波普各师在当天进抵杰克逊正面时,这个联邦将领便命令各师向南军防御工事猛攻。波特军开到联邦的左翼,处于向杰克逊侧翼进攻的位置,但由于没有明确命令,而且又因斯图尔特骑兵队扬起的尘雾竟使他误信他的前面有一队实力强大的步兵,因此波特没有采取行动。虽然步兵支援部队正在途中,尚未到达杰克逊那里,但由于波普忘记派遣一支劲旅去封锁索罗费尔隘口,朗斯特里特军已经在前晚夺路通过该隘口。8月29日正午,朗斯特里特(与李结伴)已经抵达波特的正面。由于未发现这些敌军已经开到,波普为时过晚地命令波特在下午晚些时候攻击杰克逊侧翼。由于朗斯特里特的出现,波特感到不可能服从命令,于是就按兵不动。因此他后来受到军法审判,并被撤职。*

在8月29日傍晚以前,联邦大军右翼那一半兵力,在对杰克逊

* 波特继续指挥波托马克军第五军,一直到11月。1862年12月和1863年1月,军事法庭举行审讯。波普指控波特蓄意违抗进攻命令。波特争辩说,他不能服从命令,因为朗斯特里特的部队位于他的正面,并与杰克逊的侧翼相衔接。尽管军事法庭陪审团当时并不晓得这一点,其实这是千真万确的。根据缴获的邦联军记录资料以及战后南部军官的作证,才真相大白。经过大量的辩论以后,波特终于在1886年推翻了军事

军发动的6次伤亡很重的攻击中,已连连受到重创;而双方的另一半兵力却依然闲散无事。当天夜间,邦联军撤回一些连队以加强他们的战线,并准备第二天再搞一次侧翼行动。波普仍未觉察到朗斯特里特的30000部队就在战地,竟错将这些行动当作撤退的准备。大约在8月30日中午,他派出自己的前卫各师去切断臆测中的退路,但是,他们迅即发觉杰克逊部队已摆好阵势,严阵以待。一场恶战再一次沿着未竣工的铁路线展开了。有一些邦联军的团队因弹药耗尽,便向北军猛掷石块。穿蓝军服的进攻者,在数处突破了南军防线,迫使杰克逊求援。此刻,李命令朗斯特里特倾全军兵力进行反击,直扑联邦军左翼。朗斯特里特的士兵发出南方那种震耳的狂嘶嚎叫,迅猛冲锋,几乎未遭抵抗,因为波普为加强对杰克逊的攻击,已撤走联邦军左翼防务。朗斯特里特的反击,迫使整个联邦战线后退了一英里多,在那里部队在黄昏时拼命死守亨利豪斯山才终于顶住邦联军的推进。夜间,这支士气沮丧、吃了败仗的联邦部队,困乏地朝森特维尔撤退。李并不径直跟踪,而是派遣杰克逊那些疲惫的、饥饿的士兵进行另一次大迂回侧翼进军,冒着滂沱暴雨,绕过波普的右翼。9月1日,这些部队与两个联邦师遭遇。在一场倾盆大雨中,两军在尚蒂利短兵相接,邦联军受到了阻遏。与此同时,波普把其余部队撤回华盛顿,充实首都防务。

联邦军再一次在马纳萨斯附近遭到耻辱的挫败。李的50000余众,反以伤亡9200人为代价,使波普的60000大军遭到16000人的伤亡。败绩对北部来说更加令人惊愕,因为在波普发出杰克逊不日即将“就擒”的自夸函电之后,消息便接踵而至。这次战斗之后,互

法庭的判决。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在某种程度上,波特是共和党敌视麦克莱伦式将领的牺牲者。但是,除了拥兵11000人在附近发生激战时拒不采取行动外,波特还对波普、对共和党人以及对解放奴隶,怀有不加掩饰的敌意,使他受到充分怀疑,即在与波普协作方面比他本来可能做到的要少。

相尖刻指责。波普指责麦克莱伦和波特不予协作。麦克莱伦本人已在亚历山德里亚，他在那里曾抵制了哈勒克关于火速派出他的一个军支援波普的命令。8月29日，当战斗蔓延到南部时，麦克莱伦向林肯建议，最好的做法也许是调动一切可调用的部队集中保卫华盛顿，“让波普自己去摆脱窘境”。战斗结束后，林肯对私人秘书说，麦克莱伦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他“希望波普吃败仗”。7名阁员中有4名在信上签名，要求林肯撤销麦克莱伦的职务。斯坦顿认为麦克莱伦应受军法审判，而蔡斯则说应该把他枪毙。²³

可是，麦克莱伦既未被枪毙，也未被解职。林肯让他留任指挥波托马克军，该军已收编了弗吉尼亚军。而倒霉的波普则被流放到中西部担任无关紧要的指挥。共和党人感到这是不得不忍受的屈辱。但在此情况下，林肯觉得没有选择的余地。军队士气低落，几乎就要爆发反对波普的哗变，许多士兵认为他应负战败之责。尽管林肯已失去对麦克莱伦的信任，甚至试图把最高指挥权授予安布罗斯·E. 伯恩赛德(他谢绝了)，但他了解麦克莱伦是能够重整军队和重振部队士气的唯一人选。总统承认麦克莱伦“不愿给国家造成的后果，搞垮了波普”，“表现恶劣”，但却对密友们说：“没有别的办法。麦克莱伦已掌握了这支大军。”没有别的人能够“把我们这些军队整顿得有他的一半那么好。……即使他不能亲自战斗，却擅长使别人乐于战斗。”²⁴ 而在一场对国家和蓄奴制的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战役中，这是格外急需的，因为李正在带领他那支衣衫褴褛的、可畏的、骨瘦如柴的灰胡桃人渡过波托马克河进犯马里兰州了。

第十六章 蓄奴制与内战： 北部的政策 1861年—1862年

内战最初两年间的军事、外交和政策，是在有时不公开承认蓄奴制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蓄奴制是南北冲突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冲突已引起了战争。南部已经脱离联邦，以维护它的特殊制度，使它的前途免受已经察觉到的共和党的威胁。尽管邦联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但北部就战争目的发生的分歧却比南部严重。南部是为争取独立而战斗。只要北部单纯为恢复联邦而战，北部的团结就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究竟要恢复什么样的联邦，这一难题不久就使北部分裂了。正像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个没有蓄奴制的联邦呢？还是像民主党人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联邦保持原样，宪法保持原样呢？”究竟南部是在保持原来的权利和政权的情况下回归联邦呢，或是以自由劳动的北部为模式进行重建呢？关于对最终目标的争执，不久又转为对手段的争执。究竟是一场为争取全面胜利而进行的全面战争呢，或是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以期早日召开和会，并通过妥协去恢复联邦呢？

北部的战争目的与政策

林肯的领导

1861年夏秋两季，由于执行一些错误的政治路线，北部的团结

是脆弱的。共和党是一些人士的联盟，这些人早在数年前曾经是辉格党人、民主党人、一无所知党人、自由土壤党人或废奴主义者。北部民主党人依然带有道格拉斯与布坎南派别斗争的痕迹。在一些忠诚的边境州，几个派系争夺新“联邦主义”派的领导权。林肯的任务就是将这些迥然不同的人士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能够在打赢战争的同时，还要就胜利包含些什么作出明确规定。这本来是艰巨的任务，几乎是办不到的。林肯作为战争的伟大领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当同时代人询问林肯对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的政策时，他有时答复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对被激怒的询问者来说，这一答复似乎是无礼的，或含糊其词的。林肯并无那个意思。他确实有一项政策——要赢得战争和恢复联邦。但是，因为询问者时常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尖锐地提出对立观点，他知道过早地答复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很可能破坏支持战争的不太稳定的情绪。林肯善于选择时机。他懂得如何作出一系列小的决策而为一项重大决策奠定基础。他知道如何等待最适当的时机宣布主要政策，例如，解放奴隶，而与此同时还要容忍那些谴责他的软弱领导的人们所进行的批评。对废奴主义者来说，他的行动似乎太迟缓了；对保守主义者来说，他的行动又实在太快了。但是，正如总统本人有一次对一名属僚所说的，如果有一半人认为你已走得太远，而另一半人认为你走得不太远，那么你可能已做得恰到好处。

林肯和内阁的关系，提供了说明他的领导才能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内阁体现了共和党的每一观点，从边境州的保守主义（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到反蓄奴制的激进主义（财政部长蔡斯）。它包括从前的辉格党人（西沃德、贝茨、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以及林肯本人），从前的民主党人（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和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一名自由土壤党人（蔡斯），以及陆军部

长西蒙·卡梅伦，他是一名曾与辉格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偶尔合作过的前民主党人。在1861年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认为西沃德在蓄奴制问题上持过激观点，在内战期间他成为内阁成员中最保守的阁员之一。埃德温·M·斯坦顿是前布坎南派民主党人，于1862年1月取代了不称职的卡梅伦，成为仅次于蔡斯的最激进的内阁成员之一。4名内阁部长——西沃德、蔡斯、贝茨和卡梅伦——均是186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中与林肯角逐的人。蔡斯参加内阁后，继续谋求最高官职。他野心勃勃，踌躇满志（一名参议员曾经说过，“蔡斯是个善良的人，但他的神学观点是不健全的。他认为三位一体还有个第四者。”），在财政部培育了一批政治助理骨干，这些人为提名他作1864年总统候选人曾进行了活动。他还与国会内批评林肯的共和党人策划密谋。内阁中有一些阁员成双结对，长期进行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与这些思想和政治发展趋势交织在一起。

这样的内阁肯定要发生倾轧，而不是协调一致。但是，总统以其老练机智、坚韧耐心和幽默感，把他们结成一个富有成效的集体。林肯让每个部长主管该部的纯行政事务。但凡属政策问题，由总统作出重大决定。他宣布诸如《解放宣言》和任免军队指挥官之类的重大行动，而不提交内阁辩论。蔡斯抱怨说，在存亡攸关的战争问题上，整个内阁“很少磋商，也可以说根本不磋商”。林肯愿意与内阁成员个别地商议此类问题。他与斯坦顿和西沃德极其亲密地共事。总统兼有无比的坚毅和随和，作出决断时表现出外柔内刚，又有幽默机智，这就使他能够支配他的属僚，而看不出有任何支配。“他和部长们的关系一向是完全真心诚意的，没有矫揉造作的，”陆军部长助理回忆说，“从未表现出他是上司的想法，但是，作出一个决策的往往是他的意志，他的命令。”¹

林肯与国会的关系，同样显示了随和与坚毅相济。在与战争

不相关的财政和国内立法问题上，他听从国会领导人的意见。在这方面，他符合辉格党内一个软弱的行政官员的传统作风。但是，凡是在涉及战争和重建的一切问题上，林肯行使的权力或许比其他任何总统都多。他对总统的战争权力的解释可谓大得惊人。他说道：“我想，在非常时期，我能以军事为理由采取行动，而国会按照宪法是不能这样做的。”² 由于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处于非常时期，他采取了许多行动，以致引起民主党人甚至某些共和党人都公然指责他“专横”和“独裁”。

在内战的最初80天里，林肯的行动确立了他行使行政权力的基调。在炮击萨姆特要塞之后，他没有立即召开国会紧急会议（像杰斐逊·戴维斯所做的那样），而是在7月4日才召开会议。在此期间，林肯根据自己的权限采取了许多大胆的步骤。他在4月19日宣布下令海上封锁，实际上就是宣战。^{*} 根据5月3日的行政命令，他扩充了正规陆海军并超过了法定限额。他还下令征募服役期为三年的志愿兵，这通常是国会的特权。在从4月到7月，林肯发布4个公告，宣布在全国许多地区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他还把200万元交给纽约的一个委员会，用于“保卫和支持政府所需的军事措施”，尽管宪法规定“除了法定拨款，不得从财政部提款”（第1条，第7款）。³

1861年夏，国会特别会议追认批准了林肯为动员和扩充军队所采取的行动，“似乎这些行动都是事先在国会明确授意下完成的”。⁴ 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和边境州联邦派不是弃权，便是跟多数共和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大多数民主党人也投票赞成扩军和

^{*} 林肯下令，是否合法，最高法院于1863年在“海上捕获案”中作出裁决。原告论证说，以违反海上封锁令而被没收的船只，是在1861年7月13日国会宣布存在战争状态以前遭到非法捕获的。表决结果是五票比四票，最高法院确认总统在战争紧急状态下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最高法院这五名法官中有三名是林肯任命的。首席法官塔尼坚持异议说，镇压叛乱的权力不等于进行战争的权力。

筹措战争经费的议案。^{*}这个反对党尚未分裂成后来为人们所知的民主党主战派和民主党主和派。这种分裂的根源在于民主党人的见解，他们对一些战争议案持反对态度，或者给予勉强支持。但是，两党合作的精神到这时为止还占着主导地位。

联邦的意旨

两党合作精神所以占着主导地位，是因为大多数北方人，包括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认为，联邦的概念具有如此卓绝的价值，几乎可与宗教等量齐观。芝加哥一家报纸宣称，叛乱“已蹂躏了宪法，蔑视了一切法令，践踏了那面一直是光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美国自由的旗帜”。4年后，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用这些话概括了内战的意义：“双方都反对战争，但其中一方宁愿发动战争而不顾国家的生存；另一方宁愿应战也不肯让它毁灭。于是战争就爆发了。”⁵

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美两洲都融合在一起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的起义。依照林肯的观点，南部为维护蓄奴制而战，这使它与欧洲的反动势力沆瀣一气了。在东半球，帝国政府企图从上述这一地区扑灭民族主义；在合众国，各洲独立主义的势力企图从内部破坏它；在东半球和西半球，因循守旧和特权威胁着民主的民族主义。林肯在1861年说道：“实质上这是人民的争论。”

就联邦方面而言，这是一场维护世界上这个政府的形式和实质的斗争。这个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给所有的人提供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开端。以及生

^{*} 由于边境州政党忠诚的实况是混乱不清的，本届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精确数字很难详细说明。众议院有共和党人106名；民主党人42名；“联邦派”28名，大多数来自边境州。参议院有共和党人31名，民主党人10名，“联邦派”6名。

活历程中的一个公平机会，……渗透于这场斗争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需要……证明民众的政府并非荒谬。现在我们必须解决这一问题，一个自由政府中的少数派是否有权在他们选定的什么时候瓦解政府。⁶

斗争“并不完全是为了今天”，林肯接着说，“而是为了遥远的未来”。它“不只关联着这些联邦州的命运。它给整个人类提出了一个问题”，正像两年后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表明的，即一个国家“信仰自由，奉行人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否能够永世长存”。⁷ 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受到了联邦事业同样景象的激发。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写道，邦联的胜利，“将是邪恶势力的胜利，它将鼓励进步事业的敌人，而使整个文明世界的朋友们沮丧。[美国内战]注定要成为人类事业进程的或好或坏的转折点”。⁸

这一想象——尽管朦胧不清，而且常常无法言喻——却在1861年促成了北部的联合。不久，它突然出现在歌曲里。联邦军中最流行的歌曲就是《约翰·布朗的尸体》，它以士兵所熟悉的野营布道会赞歌的曲调作谱。它是马萨诸塞一个困于1861年春首先唱起来的，到年底为止，已在全军风行传唱。它那轻快的节奏使之成为一支绝佳的进行曲。它适用于任何即席独唱——世俗的或宗教的，雅俗共赏。流传极广的歌词提到约翰·布朗的尸体在坟墓里腐烂了，提到约翰·布朗到上帝的军队里去当兵了，还提到把杰夫·戴维斯吊死在一棵酸苹果树上了。无论独唱词是什么，合唱句总是以约翰·布朗的灵魂正在继续前进结束。

后来，朱莉娅·沃德·豪把这首歌收进民族文学里。她的丈夫塞缪尔·格里德利·豪曾经援助过真正的约翰·布朗。1861年¹月，她参观了华盛顿附近的军营后，半夜醒来，强烈的创作欲使她奋笔写下了《共和国战歌》的歌词。虽然把杰夫·戴维斯吊死在一棵酸苹果树上的主张要比捣毁贮存“愤怒的葡萄”的葡萄产地的想

法在军中更加普遍，但这首根据约翰·布朗之歌改编的高雅的歌词在《大西洋月刊》刊出后，也同样受到欢迎。在葛底斯堡演说之后，《战歌》的歌词作为北部为之而战的最崇高的表现形式，已世代流传下来。两者都以某种方式将意图诉诸上帝的令人敬畏的利剑威力，这把利剑已使那么多人失去生命；他们为使自由得以永存而献出了最后的满腔热诚。

蓄奴制问题

热望使人类获得自由的崇高词藻反映的问题，乃是1861年北部为恢复蓄奴制的联邦而进行的战斗。林肯在7月4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重申就职演说中的誓言：他“无意直接或间接干涉南部各州已经存在的蓄奴制”。3周后，国会几乎一致通过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确认进行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废除或干涉那些州的权利和已建立的制度”，而仅仅是为了“捍卫和维护宪法的无上权威和保存联邦”。⁹ 难怪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大失所望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开始质问：既然“北部不宣布废除蓄奴制，又从不假惺惺地声称为反对蓄奴制而战”，那么为何“我们能够完全接受呼吁，对联邦的事业表示热烈同情呢”？¹⁰

国会中投票赞成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当然都是反蓄奴制的。林肯也不止一次 詈骂 蓄奴制“是对黑人、白人，也是对国家的极大不幸。……蓄奴制极不公正的行为……使我们共和政体的楷模失去在世界上应有的影响——使自由制度的敌人以其花言巧语嘲笑我们是伪君子”。¹¹

一点不错。既然如此，林肯为什么不宣布不仅为联邦而战，而且为自由而战，从而对这种嘲笑作出反应呢？因为作为所有州的总统，他依然认为，宪法保证诸州的蓄奴制，使自己受到约束。联

邦政府进行战争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即脱离联邦是非法的,尽管邦联诸州暂时处于叛乱分子控制之下,却仍然是联邦的合法组成部分。林肯和国会确保蓄奴制的另一原因,就是需要保持边境蓄奴州的忠诚。除此之外,则是两党支持战争的愿望。在1861年大选中,自由州选民几乎有半数投了反林肯的票。北部民主党人是赞成蓄奴制的派别。战争政策中出现任何反蓄奴制的迹象,都可能导致北部的分裂,并得罪大多数民主党人。

反蓄奴制的论据

废奴主义者和一些共和党人不同意这个分析。几个知名的反蓄奴制的国会议员在表决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时弃权或投了反对票。对大多数废奴主义者来说,让奴隶获得自由比联邦更有重要意义。既然“生死盟约”因南部脱离联邦而遭到破坏,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就支持联邦的战争,因为他们相信“与南部奴隶统治者的死亡格斗”,必定会成为与蓄奴制本身的死亡格斗。正如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于1861年5月所说:“美国人民和华盛顿政府可以暂不承认这种格斗;但是,‘事情的不可抗拒的逻辑’,最终将把它强加于他们;因此目前在这块国土上进行的战争,乃是一场维护和反对蓄奴制的战争。”¹²

但是,由于北部是为了维护蓄奴制的宪法而战斗的,解放主义者就不得不寻求宪法之外的理由去反对奴役制——这些理由能迫使人们足以克服已使北部长期容忍蓄奴制的那种冷漠、保守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惯性。废奴主义者马上想到解放奴隶的“军事必要性”论据。他们坚决认为,蓄奴制对南部的战争尝试关系重大,而废除蓄奴制对北部的胜利更为必要,所以希望把他们的主张写入尽可能被广泛接受的政纲——一个能够博得全体联邦派同情的政纲,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

者，是平等主义者还是种族主义者。尽管他们自己想以正义和道德为理由提出解放奴隶，但他们在战争早期的基调中却回避了这一主题。查尔斯·萨姆纳于1861年11月写道：“你们将注意到，我提议不进行废奴战争，解放奴隶将严格地作为军事必要性的一种措施提出……而并非以博爱主义为根据。……废除蓄奴制不会成为战争目标，只不过是战争的一种动力。”¹³

蓄奴制对邦联的军事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邦联11个州共有350万奴隶，几乎构成总人口的40%，又占劳动力的大部分。南部的报纸自诩说，蓄奴制是“邦联的可靠支柱，因为这使它按照白种人口比例投入战地的兵力比北部多得多”。¹⁴ 邦联的钢铁业、盐业的重要矿山工人，半数是奴隶。迄至1864年，邦联的两个主要兵工厂，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和塞尔马的海军工厂，黑人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二。邦联军队医院的护士，至少有半数是黑人。奴隶充当厨师、仆役、马车夫、建筑工人，甚至是邦联军随军乐师。奴隶所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军事当局从战争初起就强制他们服劳役，并大大早于邦联着手征集白人男子入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有理由惊呼，“这叛乱的真正核心是以奴隶形式出现的黑人。夺取黑人手里的锄头，你就能打中要害而将叛乱消灭。”¹⁵

废奴主义者坚持认为，解放奴隶只有根据“战争法”才能完成。随着宣布海上封锁和把南军俘虏作为战俘的决议，冲突已具有战争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国内叛乱了。废奴主义者坚决主张，邦联诸州的蓄奴制不再享有宪法的保护，但应以国际法取而代之。国际法确认，没收敌方财产是一个交战国的权利。奴隶属于敌方的财产；而这些财产的一部分正是直接用来支持叛乱，所以应该加倍没收。

1861年5月，根据这一理论，第一个采取行动的是一个使人觉得不太可能的人。他就是本杰明·巴特勒将军，原为布雷肯里奇

的民主党人，现任弗吉尼亚海岸门罗要塞联邦部队指挥官。作为一名机敏的政治家，巴特勒已经觉察从故乡马萨诸塞刮来的反蓄奴制的风浪，因此就准备向共和党激进派迈出朝圣的第一步。5月23日，当3名在邦联军防御工事服劳役的奴隶逃入巴特勒的战线时，他拒绝把他们送还原主，而把他们当作“战时逃奴”。这一名词颇受欢迎，凡是战时进入联邦军战线的其他奴隶均被称为战时逃奴。消息很快就在弗吉尼亚半岛的奴隶中间不胫而走。到了8月，麋集巴特勒军营中的战时逃奴已达千名，于是废奴主义者便制订建校计划，并给他们派去传教士。

交战国的没收权已写入林肯于1861年8月6日签署的法令中，它规定没收包括奴隶在内的用于支持军事叛乱的一切财产。这一没收法令仅适用于当时联邦部队力所能及的少数奴隶，而且并未明确规定要解放他们。但是，像巴特勒的战时逃奴政策一样，那是开头细小而以后大有希望的解放奴隶事业。它也表明背离了仅在两周前通过的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在那两周期间，联邦军在布尔河败北的意义十分深刻。战争决不会是短暂而轻松的。对战争政策进行重新评价，结果对奴隶主叛乱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大多数共和党人此刻至少愿意考虑采取有限步骤去反对蓄奴制，以作为一种取胜手段，即使它尚不能作为目标。但是，民主党人却不是这样想的。国会凭政党路线所投的票表决没收法令时，共和党人除6名外，其余都表示赞成；而民主党人除3名外，其余都反对。这是两党战时阵线第一次真正的裂痕。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由于冲突转向全面战争，这一裂痕变得更广阔了。蓄奴制问题在联邦国会1861至1862年的会议上成为中心问题。当1861年12月国会再开会时，7月份曾投票赞成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的众议院53名共和党人，改变了投票态度；因此，众议院不再确认该决议案。对蓄奴制的态度问题，不仅把共和党

人和民主党人分隔开来,而且使得共和党内3个派别界线分明: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

蓄奴制与共和党

所有共和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对蓄奴制的。但在程度上确实存在差异。保守派希望奴役最终消亡,但他们是渐进主义者,相信各州会自愿采取行动,而不愿联邦采取强制性行动,而且主张把解放奴隶和向海外迁移自由奴结合起来。激进派是不折不扣的反蓄奴制鼓吹者,他们想借助于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立即消灭这种制度。温和派是不那么容易划分的一派。他们憎恶蓄奴制,并希望宁早勿迟地废除,但担心鲁莽行动会造成社会影响。在战争早期,他们与保守派很难区分;然而,随着战斗日益加剧,全面战争的紧急行动迫使他们更加靠拢激进派。

首要的温和主义者当然是林肯本人,他在1861年12月3日首次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说:“在考虑镇压叛乱所采取的政策时,我一直焦虑和慎重的,希望为这一目标而发生的这场无法避免的冲突不会成为一场残酷无情的革命战争。”¹⁶ 总统的渐进主义性情,以及自负地深信大多数北方人和边境州联邦主义者一样,不容许对蓄奴制采取过激行动,这些曾是他修正弗里蒙特将军1861年9月在密苏里颁布的解放奴隶命令的理由。为了相同的理由,林肯于12月采取了使激进派大为恼怒的另一行动。陆军部长卡梅伦未与总统磋商,便把赞同解放并武装那些进入联邦战线的奴隶的一节写入他致国会的报告中。林肯获悉此事,便下令收回该报告,删除该节。数周之后,卡梅伦就像在他之前的弗里蒙特一样,被撤职了。在这两个事例中,渎职和在军备承包合同中接受贿赂是撤职的主要理由。然而,在激进派看来,似乎强有力的反蓄奴制人士正从政府和军队里被清洗出去,而赞成蓄奴制的一些将军,例如麦

克莱伦和比尔，却春风得意。

与林肯不同，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确实相信会有一场“残酷的和革命的”战争。一名废奴主义的编辑希望内战变成“光荣的美国第二次革命”，以完成第一次革命的未竟事业——“全国废除蓄奴制”。¹⁷《纽约论坛报》1862年1月24日的一篇社论，把联邦的危机比作1789年大革命时的法兰西危机，这一定会使保守派感到沮丧。法兰西共和国为内部派系斗争所困扰，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和来自外部的外国干涉的威胁，仅仅依靠向全欧输出革命才幸存下来。“像1793年的法国领袖们一样，《论坛报》宣称，“我们必须让被压迫者获得自由并向他们提供保护，对压迫者发动战争。”国会最激进的共和党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同样直言不讳。“要解放每个奴隶——杀死每个叛逆者——烧毁叛逆者的每一座宅邸，如果这样做对维护这座自由宝殿是必要的话。”史蒂文斯这样说。我们必须“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并改造我们的制度”。¹⁸

尽管激进主义者从未构成共和党的多数，但他们却是党内最富有进取心的派系。这是一个强而有力和坚定不移的少数派，他们明确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目标和怎样达到目标。他们往往占有优势，尤其在危急之际。激进派控制着国会主要委员会主席职位。在参议院，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和亨利·威尔逊分别担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新罕布什尔州的约翰·P·黑尔任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密执安州的扎卡赖亚·钱德勒领导商务委员会，俄亥俄州的本杰明·韦德担任准州委员会主席兼战争指导联合委员会主席。在众议院，激进的宾夕法尼亚人加卢沙·格罗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坦任两项最重要的职务——议长和岁入调查委员会主席。几名在1862年经常支持激进立场的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也身居委员会主席要职，著名的有伊利诺伊

州的莱曼·特朗布尔(司法委员会),以及缅因州的威廉·皮特·费森登(财政委员会)。

新英格兰是国会激进主义的发祥地。众议院最杰出的10名激进主义者中,有5名(连史蒂文斯和格罗在内)是在新英格兰出生成长的。在参议院,12名激进主义者中有8名、13名温和主义者中有9名均是新英格兰人,而在7名保守主义共和党人中只有两人是新英格兰人。新英格兰在参议院的影响非同小可。来自该地区的参议员据有11个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人担任其他11个委员会中的5个委员会主席。只有一名新英格兰参议员不担任委员会主席职务。新英格兰一直是废奴主义的根源,并且是南北战争前期实行现代化的先导;现在该地区在筹划内战时期反蓄奴制的现代立法方面亦起着支配作用。

国会与蓄奴制

1861至1862年,即使国会想回避蓄奴制问题,也办不到。联邦海军攻占南卡罗来纳沿海岛屿,曾把万名战时逃奴带到联邦战线内部;每周还有数百人源源涌进奴隶地区的蓝衣军营地;联邦军在田纳西州和路易斯安那的推进,又带进了数千名。这些战时逃奴的合法身分依然含糊不清,但是,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州有些北部指挥官,已经把他們看作自由人。另一方面,边境州的联邦将领竟根据忠诚的奴隶主的要求交还了逃奴,密苏里州的哈勒克将军颁布了一道完全拒绝逃奴进入他的战线的命令。由于没有华盛顿的指令,军事区的战时逃奴问题形成混乱和矛盾。

国会共和党人在几个方面抨击了蓄奴制。迄至1月中旬,至少有7项涉及解放奴隶和没收叛乱者财产的各种议案,已由委员会提出了报告。第一个行动便是3月13日通过的陆军新法规;它规定禁止陆军军官把逃亡奴隶引渡给原奴隶主,违者受军法审判。

议事日程的下一项是在4月16日讨论华盛顿特区废除蓄奴制问题，决定付给奴隶主的赔偿金平均每名奴隶300元。继此之后就是制定法律在华盛顿特区为黑人儿童建校，允许黑人在特区法院作证。6月，国会在全部领土取缔蓄奴制，并批准与英国缔结的一项新条约，以便更有效地制止大西洋奴隶买卖。

尽管这些法令至关重要，但对蓄奴制仅仅是触动了一下。而意义更加深远的则是没收叛乱者所有财产的法令。这是根据“战争法”和宪法所规定的国会权力，为惩罚叛逆而采取的一项全面战争措施（第3条，第3款）。正如7月17日法案最后通过的那样，这第2道没收法案规定没收反对合众国的叛乱分子的财产，并且具体说明凡是逃入联邦战线内的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将被作为战俘，并将永远获得自由”。¹⁹

这一法令远远超过了以前在8月份颁布的第一道没收法令。它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但事实上，它的眼前效果和长远效果都是有限度的。根据这一法令规定的财产没收和奴隶解放，将取决于确定奴隶主是否已曾参加叛乱的法律程序。由于林肯相信，战时解放奴隶的问题必须由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总统来处理，所以他几乎并未以这样的身份根据第二道没收法令采取行动。这一法令的解放条款不久就因总统本人发布的反蓄奴制的行政法令而蒙上了阴影。

林肯与蓄奴制

1862年春夏的几个月间，林肯似乎无意做反对蓄奴制的事情。5月间，占领南大西洋沿岸岛屿和飞地的联邦部队司令戴维·亨特将军，发布了解放“南部军区”全部奴隶的命令；从理论上说，这一军区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全境，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林肯取消了该命令，声明自己保留作出如此重要决定的权力。废奴主义

者和激进派都谴责总统。“吞吞吐吐”，“踌躇不决”、“敷衍塞责”、“优柔寡断”、“意志薄弱”、“昏聩糊涂”，这些都是他们加给林肯的定语。“显然，他的血管里没有一滴反蓄奴制的血液，”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写道，“让[边境州的]‘忠诚’见鬼吧，那只是靠容许它操纵政府的政策才得以保持的！”²⁰

加里森错了。到1862年春季，林肯已逐渐相信战争必须结束蓄奴制。但他仍然希望以尽可能少的革命分裂，逐渐地实现奴隶解放。这就有助于解释他在1862年提出的关于边境州自愿解放奴隶的建议。3月6日，总统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建议通过共同决议，向任何“能够采取渐进方式废除蓄奴制”的州提供财政援助。国会通过了决议，共和党人全体一致赞成，民主党人有85%表示反对。但是，边境州的发言人却抱怨联邦的强制手段，并就拟议中的赔偿费数目以及国会为此目的拨出专款的宪法权力争吵不休；他们还表示担心种族战争和经济崩溃，即使按林肯的建议，在30年内逐渐实现奴隶解放。总统感到失望，遂于1862年5月再次向边境州呼吁。林肯说，如果他们采纳他的计划，那么解放奴隶所产生的变革“将像天堂的甘露一样缓缓降临，既不会分裂，也不会毁坏什么”。但是，如果他们什么事都不干，激进派将抢先得理。总统告诫说，“你们不能对时代的趋势视而不见。”²¹

尽管北部解放奴隶情绪的势头不断增长，但边境州的代表仍然对趋势视而不见。波士顿一家保守派报纸于1862年夏评论说，“这一年超乎寻常的现象，便是这个[解放奴隶]决议招来的超乎寻常的紧张局势。一年前，人们无论如何一想到采取这非常手段，也许会犹豫不前。大多数人目前不想追求它，但是，我们明智地说，他们大部分对此是有所准备的。”7月12日，林肯再一次召边境州代表来到白宫。他这次恳求合作是以坦率的警告作后后的：“战争事变无法避免。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仅仅是倾轧和

摩擦，就能断送你们各州的制度……。你们不会再有宝贵的东西代替它。”在取消亨特将军的解放奴隶的命令时，“我即使不惹人发怒，也使许多人不满，而我们国家又不能失去他们的支持，然而事情到此并非了结。在这方面我依然承受着压力，而且压力与日俱增。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要求，会使我感到宽慰”。林肯的恳求再一次没有被人理睬。表决结果是20票对9票，边境州的代表们拒绝了他的计划。²²

当晚，林肯决定发表一项早在几天前就开始起草的解放宣言，那是麦克莱伦在“七天战役”中从里士满前线被打败以后的事。总统已经得出结论，这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一年前就已申明的结论：“反对奴隶主而不反对蓄奴制，只不过是半心半意地工作，做起事来两手瘫痪无力。”7月13日，林肯把自己的决定私下透露给西沃德和韦尔斯。7月22日，他召集内阁会议，向部长们正式通报。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反对发布这项宣言，因为他担心那可能使民主党人在秋季大选中获胜。内阁其他部长则以不同程度的热忱表示赞同。可是，西沃德指出，由于“我们〔在军事上〕受到挫折而使公众情绪沮丧”，这个宣言“可能被认为是一筹莫展的政府采取的最后一着，是要乞求援助”。他建议林肯“暂缓发布，直到在军事胜利的支持下再向全国发表”。²³

林肯接受了西沃德精明的劝告。但是，结果等了漫长而恼人的两个月，在这期间北部的士气到这时已下降到最低点，关于蓄奴制的舆论进一步趋向两极分化，弗吉尼亚军队在布尔河遭到第二次令人屈辱的挫折。

北部对南部的同情者

战争使北部民主党人处于窘境。该党逐渐分裂成“主战派”和

“主和派”。凡是对击败邦联似乎是必要的措施，民主党主战派通常均表示支持。有些民主党主战派人士成为共和党人，有少数人——例如本杰明·巴特勒，陆军部长埃德温·M. 斯坦顿——终于完全转向该党的激进派。民主党主和派起初赞成依靠军事力量维护联邦。但是，当冲突转向全面战争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指摘共和党关于摧毁南部并按照北部自由劳动的模式改造南部的决定了。反对共和党的战争政策，有时变成反对延续战争。尽管共和党竭力渲染这是亲邦联的立场，但未必是这样。民主党主和派极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妥协恢复联邦，但他们中间比较鲁莽的人，有时以这样的方式讲话或行动，乃至对共和党人指控他们的不忠提供具体事例。民主党内“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相对实力，随着北部在战争中的运气而起伏变化。不过，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例如解放奴隶和军事拘捕。两派都一致反对政府。

在1862年夏季，由于北部的士气骤然低降，民主党“主和派”，即“对南方的同情者”（亦称“铜斑蛇”）的希望随之萌发。“铜斑蛇”像许多政治绰号一样，乃是敌手杜撰出来的贬词。1861年秋，俄亥俄的一些共和党报纸把反战的民主党人比喻为有毒的铜斑蛇。这个名词不久就流传开来，并且不加区别地用于全体民主党人；可是，此处加以改变而专指民主党主和派。虽然“铜斑蛇”得到北部每一个社会经济集团的支持，但他们极其雄厚的实力却集中于中西部的南部地区的灰胡桃居民以及城市天主教移民中间。这两个群体都厌恶黑人、废奴主义者、禁酒改革者、北方新英格兰人，以及破坏传统文化基础的现代化变革。由于战争表现出共和党反蓄奴制运动的势态，灰胡桃人和天主教异教徒就变得日益反战了。

在战争期间，经济问题继续加剧了中西部的南部地区反新英格兰的情绪。该地区在国会内的代表，一致投票反对国家银行法令、所得税、关税法以及战时其他财政法令。他们重弹杰克逊派老

调,斥责“这个荒谬的银行法案”和“新英格兰金融垄断”。1863年中西部一个民主党人说:“图谋摧毁诸州的固定制度,逐步建立一个中央金融专制政府。”另一个问题:“难道我们将永远沦为那些残酷无情、专事投机的新英格兰人的奴隶——受关税敲诈、赋税剥夺和铁路垄断资本的诈骗吗?”²⁴

种族文化的敌对状态,使这些反新英格兰经济的态度更加强烈了。俄亥俄州国会议员塞缪尔·S. 考克斯于1863年说道,正是新英格兰人“破坏宪法、蔑视法令和偏爱黑人的伪善”,才逼使南部脱离联邦的。新英格兰人“要把政府变为道义革新协会的倾向……是国家目前特殊的祸根”。罗马天主教的许多报刊,都参与了对“偏袒黑人的新英格兰人”和“引起这场战争的伪善的废奴主义清教徒”的攻击。²⁵

在中西部的南部地区,人们纷纷议论把该地区组建为“西北邦联”,与南部议和,重建旧联邦,而不要新英格兰。尽管事后认识到这一方案似乎是异想天开,但在战时却是被严肃地提出来的。考克斯说:“由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灌溉的诸州要成立一个独立共和国,已是所有其他西部人街谈巷议的话题。”²⁶ 邦联的代理人在中西部暗中活动,煽动反战情绪。“金环骑士团”(1850年建立的秘密团体,提倡南部向加勒比海扩张)在中西部组建分会,发起创立西北邦联。尽管共和党人夸大了这种活动的程度,企图诬蔑民主党人不忠,但金环骑士团和类似团体的存在并不是神话。

由共和党战争政策造成的急剧变化,威胁着铜斑蛇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便是民主党主和派采用“今日宪法,昨日联邦”口号的原因。他们说,战争的延续将产生“可怕的社会变革和革命”。“这种最激进、最革命和具有破坏性的教条”,“靠战争风行一时;这就是消灭我们制度的全部结构的教条”。首要的“铜斑蛇”分子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克莱门特·L. 瓦兰迪加姆。他是弗吉尼

亚州一个家族的后裔，并和马里兰州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结了婚。瓦兰迪加姆明白他想恢复的是什么样的联邦。他写道：“我内心的愿望是，恢复联邦，按照40年前联邦的样子。”他在1861年1月说道，“一旦共和党的这场战争延续下去，在我面前什么都看不到，只有普遍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无政府状态和流血，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相比，可谓仁慈的天祸。”²⁷

民主党人与解放奴隶

反对解放奴隶，不仅成为“铜斑蛇”分子重整旗鼓的主要口号，而且也几乎成为全体民主党人的口号。“我们的意见是，美国……将成为白种人的国度，……而黑鬼永远不能跟白种人平等，”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在一份典型的声明中说道。一个殷富而又有影响的纽约民主党人宣称：“尽管杰夫·戴维斯不是善良之辈，但公正的历史将断定他的地位肯定会大大超过给我们引来这场革命的废奴主义畜群。”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宣布，天主教徒“决心要战斗到底，以维护国家宪法、政府和法律。但如果……他们将为废除蓄奴制而作战，那么，他们将的确会厌恶地避开一个并非爱国的任务。”²⁸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862年解放奴隶问题那样使政党发生如此严重的分裂。这一点可以根据对国会1862年表决四项反蓄奴制议案的剖析得到证实：禁止送还逃奴的陆军法规议案、华盛顿特区解放奴隶议案、在准州禁止蓄奴议案以及第二项没收法令议案。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投票表决这些议案的结果是99%投赞成票，而民主党议员表决结果是96%投反对票。假若国会中很多共和党议员的选民坚持反废奴主义和反黑人情绪，那么对解放奴隶议案实质上的一致支持，表明了思想的威力和全面战争的紧迫，而去克服“例行的政策”。然而，正像蒙哥马利·布莱尔曾经告诫过的那样，在1862年秋季的选举投票中，共和党人也会面临麻烦。

种族恐惧感激发了北部许多白种人的反废奴主义情绪。民主党的报纸利用了这种恐惧感。它详细论述了解放奴隶将使大批自由黑人涌进北部的问题。“[没收法令]行将解放的几十万奴隶，如果不是几百万人的话，将来到北部和西部，”《辛辛那提调查者报》声称，“或许将成为我们白人技工和劳动者的对手，通过竞争使他们失业，或许他们只得像乞丐和罪犯一样靠公费供养起来。”其他编辑警告说，将有“两三百万半野蛮人”来到北部，与白人工人的“子女们”混杂在一起。纽约一家民主党报纸经常刊登报道和社论，并冠以这样的标题：如“白人至上抑或与黑人混合？”“黑鬼能征服美国人吗？”“黑人非到北部来不可吗？”“工人阶级与黑人可同等看待吗？”密尔沃基一家德文报纸发出了行动口号：“工人们！当心啊！组织起来，反对这个将使你们遭到穷困和毁灭的危险因素吧”²

毫不奇怪，白人劳工在头面人物的指点下，于1862年在北部六个城市聚众滋事，爆发了反对黑人的骚乱。大多数暴徒是美籍爱尔兰人，他们袭击充当码头装卸工和舱面水手的黑人雇工或破坏罢工者。有时，暴徒们涌进黑人聚居区，在街道上和家宅里袭击他们。在伊利诺伊州南部，灰胡桃农民和农业工人袭击从田纳西州带来帮助收割的战时逃奴。

怀着对解放奴隶的恐惧感的，并不仅仅是灰胡桃人和爱尔兰人。共和党人悲叹地承认，北部大部分地区均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说道：“我们的人民对黑人即使不是极度憎恨，也是十分憎恨。”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承认，“西部存在极其强烈的反感——我知道我的州是这样——反对让自由黑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的人民不想跟黑人往来。”³⁰许多士兵也是同样情况，但如果共和党反蓄奴制政策持续下去，这些士兵将被要求去为解放奴隶而战斗。

联邦军队与解放奴隶

北部士兵的种族情绪，反映了他们原来所在的社会。尽管有些人参军是为反蓄奴制而战，但一名细心的学者研究了联邦士兵数以千计的信札和日记后断言，在冲突期间的任何时候，对解放奴隶本身真正感兴趣的士兵不会超过十分之一。”³¹许多士兵同意那个士兵的说法：“我出来参军是为恢复联邦而战，使蓄奴制不进入准州，而不是为了解放黑鬼。”有些北军士兵毫不掩饰他们的种族歧视观点。一个纽约人于1861年写道：“我认为解决如何处置黑人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们枪毙。”³²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全面战争需要把南部白种人当作敌人，把南部黑人当作潜在的同盟者，这使得大多数北部士兵改变信念：解放奴隶——即使不是正义行动，至少也是战争的需要。1863年3月，一个明尼苏达州士兵写道：

直到这场战争已使我决定相信蓄奴制的罪孽比我们政府所能承受的还要深重，我才赞成废除蓄奴制——于是，我参加了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我相信蓄奴制是……属于黑暗时代的制度——而且像我们这样地位的国家，长久保存这种野蛮行径是不幸的，这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在我看来，这场叛乱只不过是那个畸形怪物的垂死挣扎。³³

战时逃奴把北部士兵当作“救星”来欢迎，给他们提供食物，引导他们找出在丢弃的种植园里埋藏财宝的地点，还为入侵部队充当向导、侦察员和密探。奴隶们时常庇护逃脱的联邦军战俘，帮助他们返回北军战线。这种友善的表现必然影响北方士兵的态度，其中有些士兵便以教逃奴读书写字或以其他方式帮助他们，作为报答。俄亥俄州一个团的反蓄奴制的士兵募集捐款，将一名有前

途的逃奴送到奥伯林学院。其他获得了自由的奴隶也得到类似的帮助，前往北部。

大部分涉及黑人的真实材料出自战争的下半期士兵的信函，这些信函多数是由新英格兰人及上北部其他反蓄奴制地区的士兵写的。社会阶级在种族态度上也有差异：受过相当教育的军官和男人比受教育较少的列兵和男人，可能更多是反蓄奴制的。尤其在战争的前两年，后者中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是司空见惯的。这些士兵时常残忍无情地对待那些天真地把他们当作“救星”来欢迎的奴隶们。驻扎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骑兵于1861年11月写道：“纽约第47团约有8—10名士兵，追逐几个黑人妇女，但她们逃脱了，于是，他们便抓住一个7—9岁左右的黑人女孩，把她强奸了。”一个康涅狄格州籍的士兵从弗吉尼亚州写信说，他的几个同伴抓获了“两个黑鬼少妇，……将她们头朝下提着，把烟叶、碎木屑、枝条、点燃的雪茄和沙粒塞入她们的臀部。”³⁴

把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殖民地

总的看来，尽管北方军队终于成为一支解放大军，但它的许多士兵充其量只是勉为其难的解放者。然而，一个赞成解放奴隶的伊利诺伊州士兵却在1862年10月宣称，“我不赞成解放黑人，让他们获得自由，与我们混杂在一起，林肯的意图也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把他们打发走，让他们移民出境。”³⁵当时林肯发表的意图的确是这样。1862年8月14日，总统曾将华盛顿的5名黑人领袖邀请到白宫，并极力要求他们考虑移民出境的主张。林肯对代表团说，蓄奴制是“强加给每个人的最大错误”。然而，即使制度被废除，种族差异和偏见将依然存在。“你们的种族在我们中间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饱经苦难，而我们的种族也由于你们的存在而蒙受忧

患。在美国，黑人绝少有平等的机遇。况且他们不愿意你们获得自由，尽管这可能是无情的，我们的民众的有色人种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的意思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我们应该处理的一件事提出来。即使我愿意，……我也不能改变它。所以，隔离对我们双方都比较好。”林肯恳求听者召集几百名黑人伙伴研究一项海外移民计划，以证实种族问题这一“解决办法”的可行性。³⁶

不出所料，北部的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均谴责总统的建议。30年来，他们一直反对移民，而在胜利的前夕，他们现在更无意罢休。费城的一位殷富的黑人废奴主义者罗伯特·珀维斯直言不讳地写信给林肯说：“你跟我谈到‘两个种族’及其‘相互对抗’，这是无益的。就人权而言，只有一个种族，那便是人类。……先生，这是你们的国家，同样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愿意离开它。”大多数激进派共和党人，至少在私下流露了同样的观点。蔡斯在日记中抱怨林肯在建议中承袭种族偏见。“坦率地反对肤色偏见该多么好！要作出明智的努力，让自由民在美国建立家园。”³⁷

然而，这仍是北方少数人的意见。从托马斯·杰斐逊到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家们得出相似的结论：只有把获得自由的奴隶殖民海外，解放奴隶工作才行之有效。否则，南部将忍受种族战争的恐怖，而获得自由的人不是遭到灭绝，就是沦为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堕落阶级。1862年解放奴隶的实际前景，加深了这些忧虑。废奴主义者“可能随心所欲地轻率地说，蓄奴制的终结就是冲突的终结，”波士顿一个保守主义者告诫说，但是，“巨大的困难才刚刚开始！这问题乃是一个意义深远、令人生畏的种族问题。”³⁸

不管移民的实际成就如何，但它是上策。林肯决心颁布一项解放宣言，认为最好把这个苦丸药裹上一层移民糖衣。甚至有些激进分子也接受了这一论调。“我实际认为[移民]是令人讨厌的骗人鬼话，”有个人说道，“可是，那将合乎民众的心意。”³⁹1862年，国会

拨款60万元,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自愿移民的费用。共和党激进派最初反对此举,但是,当事情已清楚表明这项拨款对保证通过1862年的没收法案是绝对必要时,他们有一半人最后才改变了主意。

海外移民最后变成一个骗局。林肯设法招募了450名黑人,让他们定居海地沿海一个岛屿。然而移民队却遭受天花病和白人承办者胡作非为之害,该人已与政府签订了包揽这一冒险事业的契约。政府于1864年承认此举是错误的,遂派出一艘海军舰船接回了368名幸存者。到这时,战争的势头已使北部舆论摆脱了1862年的保守主义思想,移民的事再也不提了。一个废奴主义者为这个可悲的插曲发表了如下恰当的墓志铭:“由此可见,‘保守主义’吹嘘的明智原来是如此愚蠢,而‘狂妄的激进分子’的‘狂热’以经验证明却是绝顶明智。”⁴⁰

林肯关于解放奴隶的遁词

1862年8月—9月

在决定颁布解放宣言至实际发表日期的10个星期内,谨小慎微和拐弯抹角的战略支配着林肯的公开宣言。在北方士气急剧下降的这段时间,激进分子从左的方面非难他保留麦克莱伦的指挥权,以及拒绝宣布解放奴隶,而民主党人则从右的方面抨击总统,并且指望秋季大选获胜。林肯表面上始终保持镇定自若,态度暧昧。他拒绝过早地透露解放宣言,唯恐把保守分子和民主党主战派推进“铜斑蛇”的怀抱。同时,他还暗示即将发生的事,免得激进分子彻底背弃他。林肯的时机选择观念从未像在1862年晚夏这些窘困的日子里显得那么好。

表现林肯战略的一个例证,便是8月22日答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于《纽约论坛报》的一封公开信,题为《两千万人的呼吁》。格

里利抱怨“联邦事业因错误地尊重南方的蓄奴制而受到损失”。他恳求林肯把战争转变为争取自由的讨伐运动。总统在这一不寻常的公开答复中，作了谨慎的解释：“我在这场斗争中的首要目标乃是拯救联邦，而不是去拯救或摧毁蓄奴制。如果不解放任何奴隶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通过解放全体奴隶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通过解放某些奴隶而不顾另一些便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那样做。”林肯在结束时说，这体现了他的“公务观点；而我无意改变经常表示的个人愿望，即四海之内人人享有自由”。⁴¹ 这里给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留下某些回味；一个断言是，为了联邦而非解放奴隶是北方的战争目标；但也有个暗示是，为了拯救联邦，解放奴隶可能是必要的。

林肯在9月13日答复一批曾把自由请愿书带到华盛顿的芝加哥牧师时，把赞成释奴和反对释奴同样地加以权衡。总统承认“蓄奴制是叛乱的根源，或者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他还承认“解放奴隶将在欧洲对我们有所帮助，使他们相信激励我们的是某些东西，而不是勃勃雄心……，到那时，由于撤走他们的劳动者，叛军毫无疑问将受到削弱，而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另一方面，随着邦联军的进攻和联邦军的溃退，由我发布一个解放宣言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不想发布一份全世界必然会视之为不起作用的文件，好象教皇对彗星颁发训令一样！当我甚至不能在叛乱诸州实施宪法时，难道我的话能解放奴隶吗？”⁴²

这里还有使双方回味的事。林肯的声明可看作是一种表态，即他认为一纸解放命令是不起作用的。但是，由于总统讲话时那份实际的宣言就藏在办公桌抽屉里，所以他的真实想法是，宣言只有在联邦军赢得一次重大胜利时，才会起作用。到那时，他可能会在南部实施解放法令和宪法。因为当林肯会见芝加哥代表团时，他的脑海里在考虑马里兰正在展开的一场决定性的戏剧性战役。

第十七章 第一个转折点：

安蒂特姆与解放奴隶

安蒂特姆战斗

在通常情况下，第二次布尔河战役结束后，李的那支获胜部队人困马乏，早就该扎营休息和重新装备了。食物粗劣，成千的士兵赤着脚，而他正面的联邦军几乎比他的多两倍。然而，李凭借重大冒险行动在此之前已打破了对方的优势；现在，他打算在一次大胆的战役中冒更大风险，为邦联夺得马里兰州，并赢得英法的外交承认，甚至可能迫使联邦求和。要入侵北部，还需要在秋收季节把军队从受到战火摧残的弗吉尼亚调出来，并使这支饥肠辘辘的南军士兵在一个时期内要依靠敌方领土供养。

在斯图尔特的骑兵队掩护下，北弗吉尼亚军于1862年9月4日在距华盛顿40英里的上游，开始涉渡波托马克河。但是，由于缺少鞋子，或由于吃了未熟的玉米棒和未熟的苹果而得了病，已有数千名士兵落在后面。另外还有许多士兵在摊牌战斗之前，因精疲力竭或双脚淌血而掉队。9月7日，邦联军集结在弗雷德里克。令人失望的是，投奔南军旗帜下的马里兰人寥寥无几，因为马里兰州西部在感情上倾向联邦主义。李希望向南山（蓝岭延伸入马里兰的部分）西部移动，以便开辟一条进入谢南多厄河谷的供应线。不过，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他需要消灭哈珀斯渡口的万名联邦守军。9月9日，他命令杰克逊的一个军和朗斯特里特军的部分部队，集中围攻并占领哈珀斯渡口。完成此举后，他们将汇合其余部队，按既定计

划行动，在哈里斯堡切断宾夕法尼亚铁路。李再一次——这是三次战役的第三次——违背了军事教材的准则，分散了兵力。这种作法以前很起作用，因为李对敌手缺点的估计是准确的。他估计麦克莱伦行动迟缓，希望在联邦军追上他之前重新聚合部队。

在此期间，麦克莱伦已有效地训练了波托马克军，正率该军80000人朝北部移动，寻找叛军位置，他估计南军兵力为12万（是实际兵力的两倍半）。6月13日，麦克莱伦突然交了意外的好运，这样的事几乎没有几个将领曾经遇到过。在弗雷德里克一个弃置的邦联军营地，一名联邦军下士偶然发现一份由李签署的命令文件，这张裹着三支雪茄烟的命令文件原来是一个粗心的南军军官遗失的。这个文件使麦克莱伦对李军行踪了如指掌。李的军队划分5部分：3个独立纵队集中围攻哈珀斯渡口；两个师在黑格斯敦；另一个师在特纳山峡附近的本兹伯勒，国家公路在该地横贯南山。在这5部分中，每一个部分距其余任何部分至少相距8或10英里；间隔最远的两部分在波托马克河两侧，相距达30英里；麦克莱伦及其大部分军队距最近的邦联军部队仅12英里。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所描述的那样：“没有一个内战将领曾经得到这样一个天赐良机，能将敌军一下子消灭一大半。”麦克莱伦兴高采烈。他对一名将领说，“我手里有一张牌，如果我不能靠它击败‘博比·李’，我情愿回家。”¹

然而，麦克莱伦在采取行动之前等待了16个小时之久，而不是即刻进军，强行通过南山各隘口，袭击李的分散的各师部队。当他的两个军抵达特纳斯隘口，另一个军进抵距此以南5英里的克兰普顿斯隘口时，李已得到报告，匆忙派兵扼守要隘。9月14日下午，联邦将领威廉·B. 富兰克林的第六军冲过克兰普顿斯隘口，挥师南下，朝俯瞰哈珀斯渡口的马里兰高地推进，但是当围攻该渡口的邦联军几个旅转身迎战时，他们竟胆怯地停止前进了。这时，在特

纳斯隘口经过一整天鏖战之后，人数处于优势的邦联军伤亡达2700人，而联邦军伤亡为1800人。于是，李朝夏普斯堡村退却。虽然他的入侵计划宣告破产，但麦克莱伦的迟缓多给了他一天工夫，使他那溃散的部队得以从毁灭中解脱出来。他准备下令撤到弗吉尼亚。但是，当他获悉杰克逊部队已于9月15日晨攻占哈珀斯渡口并俘获守军时，他便改变了主意，命令部队集结，在夏普斯堡迎战。

继之发生的安蒂特姆战役(南部称之为夏普斯堡战役)，是邦联军进行拼死防御，联邦军坐失良机的一段战史。李的部队占据了村正东面纵贯南北长达4英里的低矮山脊，左翼靠着波托马克河，右翼俯临安蒂特姆河。根据一些理由(或许由于他们缺乏铁锹和斧头)，邦联军竟未挖掘战壕，一年之后这一疏忽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由于士兵掉队，也由于在南山的伤亡，李的兵力已不足45000人，要对抗麦克莱伦的75000人。9月15日下午，在杰克逊从哈珀斯渡口赶来跟他会师之前，李在夏普斯堡的部队只有19000人。可是，麦克莱伦再次小心翼翼地移动，误失了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15日发起攻击的机会。翌晨，杰克逊各师从哈珀斯渡口陆续到达，尽管联邦军在战场拥有60000余兵力对付李的30000人，但仍然按兵不动。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而麦克莱伦经过慎重考虑，才拟定了次日进攻的计划，到那时麦克莱伦全军和李的除了A. P. 希尔师(留驻在哈珀斯渡口监督投降)以外的整个部队，都将排成队列。

9月16日下午，约瑟夫·胡克和约瑟夫·曼斯菲尔德指挥的联邦第一军和第十二军，渡过安蒂特姆河，准备翌日进攻由杰克逊据守的邦联军左翼。伯恩赛德指挥的第九军，拟在邦联军左翼强行渡河。联邦其他三个军将留作后备，以支援这些攻击，如果李一旦抽调中央防线兵力去驰援两翼，就实行中央突破。

这是个完善的战斗计划。胡克在拂晓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的攻击首传捷报。他的绰号“战斗的乔”果然名不虚传。他那12000名

士兵从一片树林中猛然冲出,此后这片树林就以“北森林”而闻名。大炮和滑膛枪火力摧毁了邦联步兵正在潜伏着的40英亩玉米地。“在我写报告的那个时候,”胡克后来报告说,“在玉米地的北部和大部,每棵玉米秆都像被刀子削得短短的。阵亡者恰好成排地躺着,正像几分钟以前他们曾摆好的队列那样。命运之神从未让我目睹一个比这更加血腥淋漓的凄惨的战场。”² 很多参战者后来撰文提到这次战役时,都承认这是他们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半野蛮的“战斗狂热”使士兵着了魔,驱使他们采取勇敢的或拼命的行动,实为世人所罕见。蓝衣旅蜂涌穿过玉米地,冲到“西森林”的边缘,挨近一座属于和平主义的邓卡德教派的白色小教堂。在那里,约翰·B·胡德的灰衣师终于阻止了联邦军,迫使他们退回玉米地的那一边。不久以后,曼斯菲尔德军的联邦生力军,便从“东森林”越过玉米地发起攻击,迫使已崩溃的邦联军战线退入并穿过“西森林”。但是,当数以百计的士兵倒下时,联邦军的攻势再一次停顿了。曼斯菲尔德阵亡,胡克负伤,大部垮掉的师经过3个小时未见缓和的拼杀后,均撤回整编。上午10点左右,联邦将领埃德温·萨姆纳率第二军朝“西森林”进击。他的先头师已深深楔入阵地,突然有两个邦联师出现在它的左翼,将致命的炮火倾泻于北军各旅之间,20分钟内就击毙2200人。接着杰克逊横越玉米地发动反攻,但被击退,伤亡惨重。这块玉米地已变成了无人地带。据一个士兵回忆,那里尸陈遍野,人们走过去时踩不到地面。

正午以前,邦联军左翼的战斗结束了。每一方都打得对方再无招架之力。13000士兵非死即伤。因为联邦军的进攻是按顺序而非同时发动的,所以进攻已告失败。邦联军已得到时间转移部队,并调来后备队,以对付攻击。麦克莱伦必须对此承担部分责任。他的战役部署阻止了曼斯菲尔德与胡克的联合进攻,而他本人也把萨姆纳发动的攻势耽搁了一个多小时。

麦克莱伦还要对联邦军未能实行中央突破负责。萨姆纳军的两个师已从攻击“西森林”转向左面，在一条低洼的农田道路上闯入一条邦联军战线，此后这条路就以“流血巷”闻名。在那里，邦联军拼命死守，已挖好壕沟达三小时之久，直到一道被误解的命令让联邦的两个团对该路进行侧射，把那些未当场毙命或负伤的据守者赶走。邦联军中央防线大大敞开了。“在这个局部战场上，没有任何邦联步兵部队能够顶住一场凌厉的攻势，”一名南军将领写道。“当罗兹旅离开那条低洼的道路时，”朗斯特里特部下一名炮兵军官补充说，“李的军队已经毁灭，邦联的末日即将到来。”³ 富兰克林部下尚有第6军的8000名生力军可实行突破。他请求麦克莱伦让他放手行动，但是，这个指挥官为上午的大残杀所震惊，担心会受到一支他认为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军的反击，遂以“发动攻击未必审慎”⁴的话回绝了。稍后，另一名联邦将领力劝麦克莱伦派遣富兰克林军的一个师和波特的第五军的两个尚未确定用场的师，穿越实力削弱的邦联军中央防线，但麦克莱伦再一次拒绝了。

在此期间，联邦左翼的伯恩赛德情况如何呢？麦克莱伦整个上午反复命令他让精锐的第9军向前推进，渡过安蒂特姆河，击退邦联军右翼。但是，这一行动说时容易做时难，因为该防区河上的唯一桥梁，正处于邦联军炮兵和步兵的严密控制之下。不过，伯恩赛德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些。在那个季度，安蒂特姆河有数处可以蹚涉而过，但伯恩赛德却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那座桥。在下午早些时候，他的几个旅终于发现了浅滩；大约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强行闯过了那座桥。但是，当时伯恩赛德各师未能及时进行布署，直到下午3点才开始进击实力已经削弱的邦联军右翼。蓝衣军的挺进一时所向披靡，直逼夏普斯堡近郊，距李军向波托马克河浅滩退却的路线仅半英里之遥，看来邦联军又要一败涂地了，这时突然间，伴随着南军嘶号声，A.P.希尔师迅猛冲进战地，该师来自哈

珀斯渡口,以7小时行军17英里。当他们猛烈冲击联邦军侧翼,并阻遏了联邦军当天的最后推进时,希尔的一些老战士穿的是缴获的蓝衣军服,从而加强了奇袭的效果。

夜幕降临战场,惨状难以描绘:2100名北军和2700名南军士兵阵亡,另外有18500人(两军差不多各占一半)负伤,其中3000人受了致命伤。那是战争中杀人最多的一天。*双方的全部连队实际上已经毁灭,而团甚至旅的伤亡普遍达到50%。在十天后的视察了这个战场的英国军事观察员写道:“在大约7—8英亩的森林里,简直没有一棵树不是满布弹头和弹片痕迹的。难以理解,在这里的那种炮火下,谁能逃生。”⁵

这样的勇猛和牺牲得到了什么呢?会战在战术上未分胜负;但对邦联军来说,却是一次战略失利。李怀着一举结束战争的雄心前往北部;随着希望的破灭,他那支丧失了战斗力的军队,一瘸一拐地返回弗吉尼亚。但是,麦克莱伦的失败更为严重。他有数次已胜券在握,只因指挥失策和怯懦不前,才失之交臂。同时投入战斗的联邦军兵力,从未超过20000人。这使得李可以把部队从安宁无事的地点调到受威胁的防区。占联邦军四分之一以上的20000名士兵,几乎未参与作战。这就使麦克莱伦致妻子信中的说法成为笑柄:“我信赖其判断力的那些人对我说,这一会战我打得太好了,并说是一种艺术杰作。”⁶

9月18日,旭日东升,看得出遭到痛击的邦联军仍在原地。麦克莱伦在上午得到13000名援军。连同先前未确定用场的20000人,这使他得到的生力军比李的全军残部还多。但麦克莱伦仍不重新

* 作为比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D日(指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译者),美军伤亡6000人——大约是安蒂特姆会战伤亡数字的四分之一。美军在安蒂特姆一天的战斗中阵亡、受致命伤人数,相当于1812年战争、墨西哥战争和美西战争伤亡总数的两倍以上。

进攻,李遂于9月18日夜渡过波托马克河,逃之夭夭。第二天北军略事追击,被南军后卫部队击退。李部平安无事地撤到温切斯特,而联邦军却在埋葬阵亡者,为伤员建立野战医院。有5个星期之久,波托马克军主力不愿再次渡河进入弗吉尼亚。林肯抓住安蒂特姆会战把它当作是期待中的胜利,以便发表《解放宣言》。但是,总统对麦克莱伦大失所望,因为他再一次犯了错误,而未能把敌军团团围住并加以消灭。不过,林肯目前暂缓在东部战区采取重大军事决策,因为西部的局势正濒临危急关头。

邦联军侵犯肯塔基

5月底,博雷加德从密西西比的科林斯撤退后,他在杰斐逊·戴维斯的眼中声望已经大为下降。戴维斯任命布拉克斯顿·布雷格取代博雷加德,担任邦联密西西比军的指挥官,后者原先曾在该军任指挥官,是一个严格执行军纪的军官。7月,布雷格将该军划分为三部分。他留下16000人由厄尔·范多恩指挥,另外16000人由斯特林·普赖斯指挥,防守密西西比州。他率领余下的30000人经绕远的铁路线抵达查塔努加,支援埃德蒙·柯尔比·史密斯的18000名邦联军部队防守田纳西州东部,以抵御正在推进的比尔指挥的俄亥俄军。虽然联邦军只须再走四分之一那么远的路程,而且早在6星期前就出动了,但布雷格在比尔抵达查塔努加之前,就捷足先登了。

比尔的难题说明了在敌方领土上铁路后勤的困难情况。在此以前,西部的联邦军主要依靠水路获得供应。但是,1862年夏季的干旱,迫使比尔依靠铁路,当他通过亚拉巴马北部向东进军时,只得重新修筑铁路。游击队的袭击,使他一向慢腾腾的行动更像蜗牛爬行了。比尔是个像麦克莱伦一样的民主党人,主张“软性”的战

争，不肯残酷无情地对付游击队，也不肯依赖农村供养他的军队。当他在7月迫近查塔努加时，他开辟了一条通过纳什维尔到路易斯维尔的新铁路供应线。但是，他的烦恼才刚刚开始。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约翰·亨特·摩根发动的骑兵袭击，屡次切断铁路线，阻滞比尔的前进。倒霉的联邦骑兵，几乎无力抵抗野蛮凶悍的南军骑兵，后者依靠农村生活，袭击后便混入当地村民中间。

这时，布雷格一到查塔努加，便采取攻势。杰斐逊·戴维斯命令布雷格和柯尔比·史密斯侵犯肯塔基，把比尔引出田纳西。邦联首脑人物相信，肯塔基人渴望从北军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入侵军带去15000支额外的步枪，以便武装他们指望入伍的人。起初诸事顺利。柯尔比·史密斯的万名士兵，绕过联邦军扼守的坎伯兰隘口，长驱直入，进抵肯塔基中部；在这里，他们于8月30日打败并俘虏了里士满（位于列克星敦正南）的大部分联邦守备部队。布雷格率军30000从查塔努加向北进发，迅即穿越田纳西，循着一条位于史密斯以西百英里远的平行路线，进入肯塔基境内。比尔只得放弃延误时机的查塔努加战役，全速北上，以阻止南军攻占路易斯维尔。

虽然邦联军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那些衣衫褴褛、赤着脚的士兵在肯塔基也像在马里兰一样认识到，侵入联邦领土是一回事，而留在那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邦联军士兵在行军和作战方面是很出色的。但是，南部缺乏把一次大规模袭击变成一次真正入侵的后勤能力。当南部军队走过那里的城镇时，尽管邦联国旗迎风招展，漂亮的姑娘们满面笑容，但肯塔基人原来和马里兰人一样，并不乐意参军。那一万支步枪就闲置在货车里。柯尔比·史密斯果然占领了州首府法兰克福，并且准备举行邦联州长就职盛典。但是，只要比尔的大军继续留在肯塔基，另外80000名北部新兵在

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受训，那就毫无意义了。除非能够设法消除这些支持联邦的士兵和工业能力，肯塔基州的大多数居民不论对南部的感情多么强烈，但会重新考虑公开宣布对邦联的忠诚。

到9月中旬，比尔已得到格兰特的3个师援军，当时已拥兵50000。在此期间，邦联军俘虏了肯塔基州门弗德维尔另一支数达4000人的守军。北部非难比尔的声浪已臻高潮。不管邦联军入侵的根本弱点是什么，看来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南军俘获了8000名联邦士兵，已将另外50000人的部队调出田纳西，并且正在威胁着路易斯维尔，乃至辛辛那提。比尔似乎没有采取行动去阻止他们。哈勒克预先告知一个西部军官，比尔若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将被免职。“政府似乎决心要对失败的将领动用断头台，”哈勒克接着说，“将领若不是犯有过失，这样做看来相当困难，不过，或许此刻对我们来说，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某些严厉的措施还是需要的。”⁷在9月底，林肯的确想用乔治·托马斯取代比尔；但托马斯坚决反对，表示在战役前夕不宜更换指挥官，从而使命令才暂停发布。

佩里维尔战斗

比尔终于出兵袭击南军。他派出两个师向法兰克福发动佯攻，使邦联州长就职盛典陷入一片混乱，并把柯尔比·史密斯部队和布雷格军的一个师从主战场吸引过来。比尔军的其余部分成三路纵队，向佩里维尔进发，而布雷格在那里集结了他的剩余部队准备迎击。接着而来的战役准备工作，颇受寻找水源的影响，因为除较大河流外，干旱使一切水源都干涸了。联邦一个军绕道去寻水；这时另一军的先头部队于10月7日黄昏抵达佩里维尔时，他们立刻发动进攻，企图控制该市西南2英里的多克特河，结果没有成功。菲利普·谢里登师的一个旅又发动拂晓攻击，不仅占领了那条河，

而且攻占了彼岸的高地。年仅31岁的谢里登，身材矮小，罗圈腿，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冲劲。在他攻占并据守高地而打退一次反攻之后，比尔军的余部排成纵队进入左右两翼阵地，形成一道6英里长的战线。

但是，当时主动权却转移到邦联军手里，而他们在战场只有16000人，相当于比尔军的三分之一。利奥尼达斯·波尔克将军指挥布雷格军的部分部队，他是基督教主教团主教。他向联邦军左翼发起全面进攻，仅留下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向联邦中央防线和右翼示威。南军进击联邦左翼那些素乏训练的部队，守军未来得及进行抵抗，便后退一英里多，还被击毙了两名将领。在此期间，谢里登抓住战机反击正面的缺乏战斗力的邦联军，逼使他们穿过佩里维尔村，迅速后撤两英里。

于是，到黄昏时，战场北半部的军队已逆时针方向调转了四分之一大圈。比尔军右翼那一半根本未参战。由于风向和大气条件（通称为声屏）的突变，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到，甚至未觉察到左面一两英里外正进行一场激战。由于同样的理由，比尔本人直到下午将尽的时候才知悉战况。那些交战中的军队（联邦军23000人，邦联军15000人）伤亡颇重：4200名北军和3400名南军士兵阵亡、负伤或失踪。比尔打算在翌晨倾全力投入攻击，但是，布雷格却在夜间悄悄溜走，与柯尔比·史密斯部队会合了。不过，即使联合起来，两支邦联军的数量也少于对方。他们还缺乏供应品，更为大批伤病员所拖累。布雷格心灰意懒，决定撤离肯塔基。比尔畏怯地追踪，尽管掌握着大好时机，却没有进攻溃退的邦联军。

艾尤卡战斗与科林斯战斗

布雷格作出撤退决定的一个理由，乃是发生在距此300英里远

的密西西比北部的一系列战斗。范多恩和普赖斯统率的人数不多的邦联军在该地的任务,就是阻止格兰特增援比尔;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便进攻北部,与布雷格的进攻相配合。但是,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已使这两个目标落空了。曾在佩里维尔作战的数千名联邦士兵,连同谢里登部在内,都是格兰特派给比尔的援军。在两次战斗中——艾尤卡和科林斯——罗斯克兰斯破坏了普赖斯和范多恩侵犯田纳西西部的计划。

9月中旬,普赖斯占领了密西西比东北部的艾尤卡。格兰特想出一个方案,要围歼处于两支即将会师的联邦军之间的14000名邦联军。罗斯克兰斯率9000士兵从南部开来,而爱德华·奥德将军麾下的来自密西西比军的8000人,则从西部沿铁路线逼近。然而,把两支分隔的部队在战场集拢起来的困难程序出了岔子,在没有无线电通讯的情况下,这种事屡见不鲜。罗斯克兰斯姗姗来迟,并于9月19日遭到普赖斯的袭击;可是他坚守了阵地,而声屏却使奥德未听到战斗的声音。当晚,普赖斯觉察到已陷入罗网,遂沿一条未被封锁的道路逃出,与西面40英里处的范多恩会合,而联邦军则折返科林斯的基地。

10月3日,范多恩和普赖斯的混合部队,对驻守科林斯的罗斯克兰斯所部兵力相等的蓝衣军(22000人)发起猛攻。在最初的突击迫使北军后退两英里之后,南军因夜幕降临便停止前进。翌晨当他们重新进攻时,联邦军顽强的抵抗竟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邦联军遂朝南退却;而罗斯克兰斯部队的战斗力过于削弱,无力追击,格兰特新派来的一个旅仅仅拘留了数百名南军掉队的士兵。在艾尤卡和科林斯两次战斗中,联邦军伤亡总数是3300人,邦联军

* 波普将军于6月份调往东部战场后,罗斯克兰斯便到西部担任密西西比军团指挥。

伤亡5700人，占兵力的四分之一。

从9月17日至10月8日，邦联军对联邦领土的三次尝试性进攻都被击退了。这是南部通过军事协调进攻去夺取胜利的雄心勃勃的尝试。尽管李将在1863年6月再次侵犯北方，但全部的邦联主力军再也不会同时向北进军了。尽管三大战斗——安蒂特姆、佩里维尔和科林斯——没有一次是联邦的不容争辩的胜利，它们共同标志着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它们扼杀了欧洲承认邦联的机会；它们还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把维护联邦的战争一变而成为为维护联邦与自由的战争。

《解放宣言》草案

安蒂特姆会战结束5天之后，林肯召集内阁会议，宣布发表《解放宣言》的决定。几个月来，总统已提醒顾问们，他已设法说服边境州采取反蓄奴制的行动。目前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不久，他们就[可能]接受，即使不是即刻；因为他必定相信蓄奴制[已]受到奴隶主的致命打击——它不可能在叛乱过后残存下来。”至于北部民主党人，林肯不愿再说服他们，因为“他们的会议经常用来反对我们可能采取的方针”。⁸

1862年9月22日的法令实际上是宣言的草案，因为它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仍处于叛乱状态的任何一个州的奴隶，“将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宣言认为只以军事需要为理由解放奴隶是正当的，赞成获得自由的奴隶志愿移民，重申林肯关于在忠诚的蓄奴州逐步解放奴隶的主张。这种保守态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革命性措施在全国引起的反响尚不确定。总统宣布此文件，在某种意义上旨在使它不致引起轩然大波，并使释奴手段看起来不过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条件。大多数激进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都

理解这一点。“一份拙劣的文件，然而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法令，”这是马萨诸塞州激进派州长约翰·安德鲁对宣言的评论。一名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认为，从语言纯正癖者的观点看来，宣言尚有若干瑕疵。但是，“我不能拘泥于这些。欢乐、鸣谢、感恩、新的希望和勇气，充满了我的胸怀。”⁹

林肯与公民自由权

签署《解放宣言》两天之后，林肯便发布第二道法令；这一法令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批准对“全部南军士兵、暴乱分子和他们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煽动者，以及一切妨碍志愿兵应募、抵制民兵征募或者犯有不忠诚罪行的人”¹⁰实行军事逮捕。民主党人公开指责这一行动是与解放奴隶酷似的专横产物。两份宣言给反对党提供了1862年国会选举的主要争论点。在谈论这些选举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战时北部公民自由权问题。

尽管战时没有固定的报刊审查制度，在1862年1月以后，政府确实利用对电报的军事管制，控制了记者的电讯。邮政局不时从邮件中清除“叛逆倾向”的报刊。将领们有时查禁卫戍区内的某些报纸，因为它们把军事情报提供给敌军。政府有好几次勒令某些报纸有限期地停刊。查禁报纸事件，大多发生在蓄奴州的占领区，虽然也有几次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北部。北部的暴民曾捣毁了几家属于“铜斑蛇”的报馆及印刷机。至少有两伙肇事暴民是由联邦士兵领导的，他们并未因这类行动而受到惩罚。

在1861年内，国务院负责加强国内的安全。西沃德组织了特工和情报人员的秘密情报网，他们的热情往往超过了他们的判断能力。政府在边境州逮捕了数以百计的人，而且不经审讯便拘留起来。在马里兰州，联邦军关押了数名州议会议员和一名州法官。

军队还在南部占领区和边境州逮捕并惩处了许多间谍、破坏者和游击队员。

根据1862年2月总统的命令，林肯把国内全部安全事务的责任转移到陆军部。斯坦顿减少了逮捕数字，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当时正在拘留中的犯人案件。他们大多数人在宣誓表示忠诚之后释放。当北部确信不久即将赢得战争的胜利，遂在1862年春季几乎停止逮捕了。然而，夏季的挫败，迅速滋长的“铜斑蛇”情绪，以及1862年秋对民兵征募工作的抵制，引起军事逮捕的新高潮。林肯9月24日宣布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主要是针对对征募工作的抵制的。

在战争期间，总计联邦当局至少逮捕了15000名平民。这是对公民自由权的过分压制吗？不少同时代人肯定会这样想。他们对逮捕敌特和破坏者，或者在交战的战区对游击队员和间谍进行军事审讯，都不表示怀疑。（有些评论家甚至赞成对逃避征募的人，和怂恿开小差或抵制征募的人，实行军事逮捕和审讯，虽然这些活动有些是发生在北部诸州，那里的民事法庭正在履行职责。）但是，他们谴责任意逮捕编辑、政府官员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的唯一罪行是书面或口头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或是赞成和平。其中有些被捕者是谣言阴谋的牺牲者，这种谣言阴谋已成为心理战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有些人被监禁几个月，一直未受到起诉。这一切似乎可以证实，政府关于公民自由权的记录是很糟的。

但是口头反战活动与明显的叛逆活动的界限，往往不易划分。发表煽动性的言论鼓励新兵拒绝打一场废奴主义的战争，这究竟是在行使言论自由呢，还是在帮助和支持敌人呢？林肯生动地陈述这一问题说：“对那个引诱士兵开小差的狡诈的煽动者，我连一根毫毛都未碰过，我能忍心枪毙一个头脑简单的年轻逃兵吗？……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煽动者住嘴，挽救那个小伙子，不

仅符合宪法,而且是极大的仁慈。”总统坚决主张,在严重的紧急关头,逮捕过多要比逮捕过少好。他写道:“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身保护法的掩护下’,叛乱者指望在我们中间稳固建立一支很有效的间谍、告密者、接济者以及他们事业的同谋者的队伍。”民事法庭办事极为缓慢,而没有处理非常时期的这些案件;如果根据人身保护法予以释放,等候审讯,这些人就会继续从事叛逆活动。军事逮捕的目的是预防,而非惩罚。人们遭到拘留,所以他们就不能援助叛乱了;在危险过去以后,他们不经审讯迟早便会获释,要求更早而非更晚。林肯承认,这些都是强硬措施,在和平时期是违反宪法的,然而“在叛乱和入侵的情况下”,是符合宪法的。林肯用一个朴实而给人深刻印象的比喻写道,“我不会听信,由于事实表明特效药不是健康人的有益食品,它就不是病人的良药;我更不会听信,由于事实表明在和平时期采取强硬措施是不合法的,而政府在叛乱时期采取同样措施就是违宪的。”¹¹

一位认真研究战时公民自由权的学者替林肯政府辩护。他觉得,大多数拘留犯在监禁期间受到宽待。大多数人是“根据充分的理由”而锒铛入牢的。大多数人在遭到比较短暂的拘留之后便获释,除非证实犯有像从事间谍活动或叛乱之类的实际罪行。在军事委员会审讯平民时,通常是因为在战争区内犯有军事罪。15000起逮捕案的绝大多数,均发生在南部占领区或边境州内,而这些地区由于游击队活动和间谍活动实际上已成为战争区的一部分。“考虑到紧急情况的迫切需要,在实行逮捕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克制。……在没有通过‘惩治间谍条例’或‘惩治叛乱法’的情况下,政府因受到严重辱骂而深感痛心。为了维护言论自由,乃至容许人们发表极端叛逆言论。”¹²虽然军队在边境州监督投票以排除未宣誓效忠的选民投票,但整个战时实行自由选举,政府候选人却经常落选,而且在1864年的一些时候,看来林肯本人也难以重新当选。比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厉执行惩治间谍及叛乱的法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禁美籍日本人，1861至1865年这一更加严重的国内危机时期，侵犯公民自由权的问题看来的确轻微。尽管如此，但在1862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却从“任意拘捕”中捞取了政治资本。对民兵征集工作的怨愤也对他们有利。然而，根据大量的讲话来判断，唯一最重要的争论点还是《解放宣言》。

1862年北部的选举

民主党人呼吁选民在1月1日林肯发布最后的解放宣言以前，抛弃共和党人。在纽约州，这里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霍雷肖·西摩希望选举使他一举蜚声国内；当地党的喉舌宣称，“投票赞成西摩，就是赞同保护我们白人劳工免于跟南部黑人合伙与竞争。”中西部的民主党演说家声称，“北部的每一个白种人，凡是不愿被一个自由的黑鬼替换掉的，都应该投民主党的票。”¹³

许多观察家把选举的结果视为对共和党人和解放奴隶的强烈非难。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净增32个席位。几乎全部新增席位均来自下北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民主党人也赢得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州长职位，并且控制了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议会。（仅有的偶然情况是，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州长及议会选举是在奇数年举行的，而且1860年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已选出了任期4年的共和党州长，阻止了这些州政府在1862年以后受到民主党的控制。）民主党人是充满活力的。报纸的典型大字标题宣称：“废奴主义遭到惨败”，“不准解放奴隶”。按照俄亥俄众议员塞缪尔·S. 考克斯的看法，选举产生了一个新的训条：“你切勿以释奴造成民族混杂，而降低白种人社会地位。”¹⁴

几位历史学家赞成对1862年选举作出的这一评语。其中一人写道，“投票的意见清楚地表明，北部人民反对《解放宣言》，反对政府侵犯个人权利，并反对征兵。”¹⁵然而，事实上这次选举结果决非如此。对共和党人来说，那是一次挫折，但不是失败。共和党人赢得了整个新英格兰、上北部、太平洋沿岸两个州和边境诸州。毫无疑问，联邦军队不准脱离联邦主义的同情分子参与边境诸州的投票；但即使没有这些边境州，共和党人也会保持对国会以及除了两个州长职位和两个州议会外的所有州的控制的。从任何意义上说，如果这次选举是就解放奴隶与林肯对战争的指导问题进行公民投票，那么北部大多数选民都是支持这些政策的。

1862年12月，当国会召开留守议员会议时，共和党人重申了解放奴隶问题。首先，他们否决了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众议院决议，该决议宣布，政府中的任何人，“为了颠覆或干预美国任何一州的权利或现有体制”而打算进行战争，便是犯了“重大的违宪罪”。于是，依靠全党一致的投票，众议院通过一项支持《解放宣言》的决议。¹⁶最后，国会通过法案，要求解放奴隶以西弗吉尼亚取得州地位作为条件。*

然而，在1862年12月，谣言纷起，说林肯行将撤消《解放宣言》。这些流言出自1862年选举后民主党人不切实际的愿望，并从林肯12月1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增添了活力。总统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在“当今存在蓄奴制”的每一个州内有赔偿地、逐步地（延续到1900年）解放奴隶。焦虑不安的共和党人询问，如果林肯打算发布一个解放宣言，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但是，那些把咨文看作是代替解放宣言的人，并没领会它的实

* 这一授予权力的法令规定，凡是1863年7月4日以后出生的人应获得自由；所有其他的25岁以下的人，将在25岁生日时获得自由。西弗吉尼亚把这些条款编入了它的1863年宪法。但是，渐进主义的特点不久就被《第13条宪法修正案》清除了。

质。林肯还说，在9月22日宣言的前提下，他的建议不会贻误任何工作进程，并说所有“凭战争机缘”获得解放的奴隶，将“永远获得自由”。总统已明确表示，战争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自由的新生。

公民同胞们，我们不能规避历史。……我们在光荣或屈辱中经历的火的考验，将照亮我们，乃至最近的一代……。安宁的往昔的信条已不适用于动乱的今天……。由于我们遇到新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重新思考，重新采取行动。……在把自由赋予奴隶的时候，我们保证自由人获得自由。……我们必须解放自己，然后才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¹⁷

林肯私下向共和党人再次保证，他对于解放奴隶不会动摇。“总统是坚定不移的”，查尔斯·萨姆纳对波士顿的朋友们说，“他说，即使他能够，但他不愿意搁置《宣言》；即使他愿意搁置，他也不能够。”¹⁸

1月1日，林肯签署文件，宣布凡当时尚未被联邦军占领的邦联任何州的地区内所有的奴隶应获得自由。*南部首脑人物指摘《宣言》居心叵测地煽动奴隶暴动，或者是伪善的北方佬的诡计，只“解放了”北部鞭长莫及的那些奴隶，而使其余的人处于奴隶状态。北部民主党和保守派以类似调门作出了反应。很多激进派人士对豁免边境州和被占领的邦联地区感到烦恼。他们因伦敦《观察家》的嘲笑而辗转不安，该刊说《宣言》的原则“不是一个人不能公正合法地拥有另一个人，而是如果他不忠于合众国的话，他便不能拥有他。”¹⁹

但是，这样的评论并未领会要点。《宣言》乃是对付敌方人力资

* 被《宣言》豁免的邦联的一些地区，包括弗吉尼亚的几个县和路易斯安那的几个教区，还有整个田纳西州。因为这些地区(除田纳西东部外)已被联邦军占领，由总统任命或批准的军事或民政当局管辖，实际上它们已是联邦的一部分，所以不受《宣言》的约束，《宣言》作为军事措施，只施用于敌方领土。东田纳西所以被豁免，是因为林肯认为，那里的白人居民是忠于联邦的。

源的一种军事措施。根据战争法则，总统和军队有权夺取这些资源；但对于不归敌方所有的奴隶，他们并不拥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在联邦控制线以内的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弗吉尼亚及别的地方，已经有10万或更多的战时逃奴因战争的现实而得到解放。西弗吉尼亚已决定信奉自由。强大的解放奴隶的团体正在密苏里、马里兰和田纳西崛起，他们不久也要将这些州解放出来。《解放宣言》宣布了一个新的战争目标。从此，联邦军就正式成为一支解放军。北部现在正在为建立一个新联邦而战斗，而不是为了恢复旧联邦。

解除麦克莱伦和比尔的指挥权

1862年9月，有些共和党人对联邦军，尤其是波托马克军及其民主党各级军官对《解放宣言》会作何种反应，一直忧心忡忡。尽管存在令人焦虑的理由，实际上绝少有士兵扔下武器或拒绝为黑人的自由而战的。当然，士兵们会有不少怨言。波托马克军的一名列兵披露说，他的弟兄们正在说“他们不愿为争取黑鬼与白人平起平坐而打仗，说他们一直在受蒙骗，还说他们只是为了维护联邦才当兵的，不是为了别的”。²⁰

不过，更具有代表性的是印第安纳第9团一名上校的一封信，他说尽管他的士兵很少是废奴主义者，“却希望摧毁能够给予叛逆者以力量的一切东西”。所以“这支军队愿支持《解放宣言》，并且用刺刀去贯彻执行”。早在1863年，陆军总司令哈勒克就曾把这样的话传给格兰特：“战争的性质在去年内已发生极大变化。现在跟叛逆者和解的希望已不可能了……。我们必须战胜叛逆者，否则就将被他们征服。……从敌军退出每一个奴隶，都相当于使一个白人士兵失去战斗力。”²¹

然而,正如他们的共和党评论家担心的那样,麦克莱伦及其波托马克军的某些军官对《解放宣言》作出了反应。麦克莱伦私下谴责《宣言》“开创奴隶战争”。菲茨-约翰·波特将军称《宣言》为“一个政治懦夫的荒唐宣言”,还说它在“军中引起不满”,作战的士兵“对战争感到厌倦,渴望早日看到战争体面地结束”。²²有些军官甚至敦促麦克莱伦进军华盛顿,胁迫撤销《宣言》。麦克莱伦参谋部的一位少校承认他曾说过,李的军队并未在夏普斯堡被歼灭,因为“那并非一场游戏;客观情况是两军之中没有一个显著优于对方;双方将继续呆在战场直至精疲力竭,那时我们将和解,并拯救蓄奴制。”林肯将该少校撤了职,并解释说:“我认为他那糊涂的叛逆言论纯系‘参谋的闲言’,我要惩一儆百。”²³麦克莱伦觉得这种“参谋的闲言”正成为这样的问题,以致他在10月7日发布一道特别命令,指出制订政策是政府的责任,而军队的责任是执行。但与此同时,麦克莱伦的命令毫不隐晦地涉及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如果他们犯了政治错误,只能在民众的投票行动中找到补救办法。”²⁴

尽管麦克莱伦的民主党政策显然使他和政府受到损害,但由于他的军事上的错误终于使他垮台。这位将军由于坚信他打的安蒂特姆战役是一大“杰作”,所以首先希望按自己意愿。会战三天以后,他写信给妻子说:“我坚决主张把斯坦顿免职,把哈勒克的总司令职位让给我。……对国家来说,对我来说,唯一安全之计就是把他们这批人统统免职。”²⁵麦克莱伦很少对现实如此盲目。事实的真相是,他在安蒂特姆未能有力地穷追逃敌,不久他的军事生涯就终结了。华盛顿发来一封封电报,催促他趁南军依然步履踉跄之际,给他们以痛击。而同样数量的复电发回到华盛顿,电文尽是解释延误的理由:敌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他应该训练新兵;他对敌军的情况极为吃惊,因此必须等到为他的士兵提供了新的军装和鞋子才能进军!

林肯在10月1至4日视察了部队，亲自催促麦克莱伦采取行动。总统返回华盛顿后，让哈勒克给麦克莱伦发出指令：若是别的将领，就会考虑这一强制性命令了：“渡过波托马克河并攻击敌军。趁道路良好之际，你部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麦克莱伦仍然按兵不动。10月10日至12日，斯图尔特的骑兵再次绕着整个联邦部队兜了一圈。他们挥师侵入宾夕法尼亚，北上直到钱伯斯堡，避开了被派去追踪他们的联邦骑兵，并且带回1200匹马和数十名俘虏，而仅仅伤亡了两个骑兵。过了几天，麦克莱伦辩解说，他的进军必须继续拖延，直到把不堪再用的马匹都换掉为止，林肯愤然发出讥讽的复电：“请原谅，试问自从安蒂特姆战役把一切都弄得疲惫不堪以来，你军的军马究竟干了些什么？”²⁶

麦克莱伦对这份刺激性的电报的忿怒反应，在致其妻的信中有所披露：“国家的利益需要我屈从来自那些人的一切，而我知悉他们的社会地位、学识和道德上都远逊于我！从未有过比‘大猩猩’更适用于某人的确切称号了。”²⁷当麦克莱伦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军队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了。但是，横渡波托马克河竟费时6天（而李军在安蒂特姆战役后，仅一夜之间便渡过该河），接着又费时7天向南移动了50英里，才抵达弗吉尼亚的沃伦顿附近。李将他那支人数较少的部队分为两部分，把朗斯特里特军摆在敌军和里士满之间，而杰克逊则留在麦克莱伦侧翼的河谷中。

行军神速的南军再一次从沉闷的北部军队手里夺走了主动权。林肯忍耐不住了。11月7日，他解除麦克莱伦担任的波托马克军的统帅职务，任命勉强从命的伯恩赛德接替他。士兵们感情激动地送别麦克莱伦，而有些军官再次窃议向华盛顿进军，但终成泡影。林肯向私人秘书解释这一决定时说：“我严厉命令他前进，……他[依然]以缺东少西的微小借口而拖延行动。我开始担心他在搞骗术——他无意损伤敌军。我要查看他在通往里士满的路上怎样

拦击敌军。我决定把这一命令作为考验。如果他让敌军逃脱，我就将他撤职。他果然这样做了，于是我就解除了他的职务。”²⁸

另外一名纵敌逃遁的将领也在10月底被撤职。跟麦克莱伦一样，唐·卡洛斯·比尔是民主党人，此人毫不隐讳其反对释奴的观点。但与麦克莱伦不同，他不为他的士兵们所拥戴，他们知道他们在佩里维尔战役中未受到很好的调遣。当那些筋疲力尽、数量处于劣势的邦联军从肯塔基撤退到查塔努加的时候，林肯极力敦促比尔追击溃逃的敌军，并为了联邦而保证田纳西东部的安全。然而，尽管比尔的俄亥俄军有半数以上并未在佩里维尔作战，但这位将军却认为，在重新发动进攻之前，需要重新装备和整编。这种论调听起来和麦克莱伦一模一样。被激怒的总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敌军那样进军，像他们那样生活，像他们那样战斗，除非我们的军队和将领承认甘拜下风。”因为比尔不愿像林肯所期望的那样进军和战斗，总统遂任命威廉·S. 罗斯克兰斯接替他的职务。随着指挥权的变动，军队也更名为坎伯兰军；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它的邦联军敌手也把密西西比军改称为田纳西军。

1862年的欧洲与美国内战

1862年夏秋两季，不时出现外交活动的激浪，其节奏是受军事形势的变化所支配的。李在弗吉尼亚取得的胜利，似乎增强了欧洲的信念，认为邦联军永远不会被征服。当“七天战役”的消息传到法国时，拿破仑三世指示外交大臣：“询问英国政府现在是否是承认南部的时候。”7月18日，英国议会就承认邦联的动议展开辩论。尽管该动议因时机未成熟而被撤销，而那场辩论却使外交大臣罗素勋爵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南部的。”财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于7月26日写道：“我们确实希望这场流血的、毫无意义的

冲突应该停止。”后来，格拉德斯通在纽卡斯尔的一次演说中说道：“杰斐逊·戴维斯和南部其他领袖已建立了陆军；看来他们正建立海军；而且他们已建立的还不止这两者，他们已建立了国家。”这番话由于出自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士之口，这就被看作是英国即将承认邦联的信号。美国驻伦敦公使馆沉浸在忧郁气氛中。“这种趋势此间时时刻刻[在]上升，变得比‘特兰特’号事件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对我们更加不利，”美国驻英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兼秘书亨利·亚当斯写道。

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和李侵犯马里兰的消息，使承认南部的趋势更快地发展起来。罗素对首相帕尔默斯顿提议，英法两国联合从中斡旋。他在9月17日写道，如果北部拒绝，“我们自己应该承认南部诸州是一个独立国家。”帕尔默斯顿则比较审慎。他想等待这时正在马里兰进行的战斗的结局。“如果联邦军遭到惨败，[北部]可能出现更加理智的精神状态，[并且]会立即接受斡旋，我们就应该趁热打铁。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得胜，我们可以等候片刻，注视事态的发展。”

安蒂特姆会战的结局，使帕尔默斯顿更加审慎。虽然数周以来一直存在斡旋的想法，但这时帕尔默斯顿却反对迅即采取行动。“整个事态困难重重，”他在10月间写道，“只有敌对的两军之间再发生一些决定性事件，……形势才会明朗化。……我们只能继续旁观，直到战争发生决定性的转折。”当拿破仑第三于10月底提议法、英、俄联合提出一项停战6个月和暂停封锁的建议时，倾向联邦的俄国拒绝了。11月份，英内阁讨论一项法英联合提议，但只有格拉德斯通和罗素表示赞成，所以未采取行动。

由于安蒂特姆会战和《解放宣言》的意义已被人们充分理解，反奴隶制度的英国显然不可能承认亲蓄奴制的邦联，而后者的胜利前景看来不再令人乐观。英国发生了戏剧性的亲北部的舆论倾

向。1月23日,亨利·亚当斯从伦敦写信给在波托马克军的弟弟说:“《解放宣言》在这里为我们发挥了很大作用,比我们以前的全部胜利和一切外交手段所起的作用更大。它正在引起对我们有利的强大反响。……我们倍受鼓舞,兴高采烈。只要你们在国内不遭失败!我们将要使国外对叛逆分子寄托的希望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然而,在1862至1863年冬春两季,联邦军确实遭到许多失败。邦联的信心增长了,而北部的士气相应地再次跌落下来。

附 注

第 一 章

1. Ulysses Prentiss Hedrick,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Albany, 1933), p. 67; Clarence H. Danhof, *Change in Agriculture: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820-1870* (Cambridge, Mass., 1969), p. 181.

2. Stuart Bruchey,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607-1861* (New York, 1965), p. 166.

3. Eugene S. Ferguson, "Technology as Knowledge," in Edwin T. Layton (ed.), *Technology and Change in America* (New York, 1973), p. 23.

4. Nathan Rosenberg (ed.), *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es* (Edinburgh, 1969), pp. 203-4

5. Arthur A. Ekirch,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America, 1815-1860* (New York, 1944), p. 52.

6. *Ibid.*, pp. 102, 119;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p. 39.

7. Irvin G. Wyllie, *The Self-Made Man in America: The Myth of Rags to Riches* (New Brunswick, N. J., 1954), pp. 63, 42-43.

8. The data on business executives are from Frances W. Gregory and Irene Neu,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lite in the 1870's: Their Social Origins," in William Miller (ed.), *Men in Business* (Cambridge, 1952), pp. 193-204. Data on inventors was calculated from the list in Roger Burlingame, *March of the Iron Men: A Social History of Union Through Invention* (New York, 1938), pp. 468-76. Data on religious affiliation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was calculated from Edwin S. Gaustad, *Historical Atlas of Religion in America* (New York, 1962), pp. 52, 140.

9. Lee Soltow, *Men and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New Haven, 1975), pp. 148-49, 152, C. Wright Mills, "The American Business Elite. A Collective Portrait," in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45), pp. 20-44, Pitirim Sorokin, "American Millionaires and Multi-Millionaires," *Journal of Social Forces*, (1925), 634 (this article includes data on scientists also); *American Men of Science* (New York, 1910).

10. 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Sarmiento's Trav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47*, trans. Michael A. Rockland (Princeton, 1970), p. 198.

11. J. C. Furnas, *The Americans: A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1969), p. 505.

12. Ekirch, *Idea of Progress*, p. 197.

13. Michael B. Katz, *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Mass., 1968), p. 43; Horace Mann, "Annual Report of 1848,"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Horace Mann*, 5 vols. (Boston, 1891), IV, 245-51.

14. Ekirch, *Idea of Progress*, p. 173; Benjamin J. Blied, *Catholics and the Civil War* (Milwaukee, 1945), p. 30; Oscar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A Study in Acculturation*, rev. ed. (Cambridge, Mass., 1959), pp. 132, 139; *Freeman's Journal*, June 7, 1856.

15. 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Stanford, 1957), p. 13.

16. This table is derived from the tables in Herbert Ershkowitz and William G. Shade, "Consensus or Conflict? Political Behavior in State Legislatures During the Jacksonian Er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8 (December 1971), 591-621, and in J. Mills Thornton, *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 1800-1860* (Baton Rouge, 1978), pp. 463-71.

17. (New York, 1851), p. 6.

第二章

1. J. Mills Thornton, *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 1800-1860* (Baton Rouge, 1978), p. 255.

2. Quoted in Robert R. Russel, *Economic Aspects of Southern Sectionalism, 1840-1861* (Urbana, Ill., 1924), p. 48.

3. Harold D. Woodman, *King Cotton and His Retainers: Financing and Marketing the Cotton Crop of the South, 1800-1925* (Lexington, Ky., 1968), p. 135.

4. Lee Soltow, *Men and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New Haven, 1975), pp. 65, 101;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1974), p. 248.

5. Roger L.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1977), pp. 3-4.

6.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J.P. Mayer, trans. George L. Lawrence (Garden City, N.Y., 1969), pp. 345-46; Frederick Law Olmsted, *The Cotton Kingdom: A Selection*, ed. David Freeman Hawke (Indianapolis, 1971), pp. 184-85; Frederick Law Olmsted, *The Slave States Before the Civil War*, ed. Harvey Wish (New York, 1959), p. 253.

7. Ulrich B. Phillips,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1918), p. 396.

8. Eugene D. Genove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New York, 1965), p. 30; George Cary Eggleston, *Recollections of a Varied Life* (New York, 1910), pp. 46-49.

9. William Howard Russell, *My Diary North and South* (Boston, 1861), p. 179; David Bertelson, *The Lazy South* (New York, 1967), p. 190; "The Prospects and Policy of the South, as They Appear to the Eyes of a Planter," *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 26 (October 1854), 432, 448.

10. Olmsted, *Cotton Kingdom*, pp. 106, 192.

11. Olmsted, *Slave States Before the Civil War*, p. 251; *The Works of John C. Calhoun*, ed. Richard K. Crallé, 6 vols. (New York, 1854-57), IV, 505-06.

12. Pierre van den Berghe, *Race and Rac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1967)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New York, 1971), chap. 2, applies this concept to antebellum race relations in a penetrating analysis.

13. Yancey and Wise quoted in Fredrickson, *Black Image*, pp. 61, 62.

14. Paul D. Escott, *Slavery Remembered: A Recor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lave Narratives* (Chapel Hill, N. C. 1979), p. 25.

15. John W. Blassingame. *The Slave Community* (New York, 1972), pp. 89-92; Herbert Gutman and Richard Sutch, "The Slave Family: Protected Agent of Capitalist Masters or Victim of the Slave Trade?" in Paul A. David *et al.*, *Reckoning With Slavery* (New York, 1976), pp. 127-29; Herbert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New York, 1976), pp. 146-47; Escott, *Slavery Remembered*, pp. 46-48.

16. Mason and Gregg quoted in Bertelson, *Lazy South*, pp. 159, 195.

17. Olmsted, *Cotton Kingdom*, pp. 28, 153-54.

第三章

1. Quoted in 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Ithaca, 1975), p. 352.

2. Jefferson to John Holmes, April 22, 1820, in H.A. Washington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9 vols. (New York, 1853-1854), VII, 159.

3. October 15, 1856.

4. Data on the birthplace of abolitionist leaders are from the author's research. For studies of New York and Ohio counties, see Whitney R. Cross, *The Burned-over District: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nthusiastic Religion in Western New York, 1800-1850* (Ithaca, 1950); Alan M. Kraut, "The Forgotten Reformers: A Profile of Third Party Abolitionists in Antebellum New York," in Lewis

Perry and Michael Fellman (eds.), *Antislavery Reconsider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bolitionists* (Baton Rouge, 1979), pp. 119-45; and John L. Hammond, "Revival Religion and Antislavery Politic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April 1974), 175-86.

5. The data for abolitionists in Table 5 are based on the author's research. Data for entrepreneurs and the data for the estimated ratio to the religious affiliations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are based on the sources cited in chapter 1, note 8.

6. Lewis C. Gray,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 2 vols. (Washington, D.C., 1933), I, 463;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New York, 1970), p. 46.

7. Foner, *Free Soil*, p. 16,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J., 1953-1955), IV, 24, II, 364, IV, 169.

8.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III, 478; Foner, *Free Soil*, pp. 42, 47.

9. Foner, *Free Soil*, pp. 41, 51.

10. *New York Evening Post*, November 8, 1847, April 14, 1857.

11. Quoted in David Donald, *Charles Sumner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60), p. 349.

12. Calhoun in *Congressional Globe*, 25th Cong., 2nd sess., (1838) Appendix, 61-62; Hammond quoted in William W. Freehling, *Prelude to Civil War: The Nullification Controversy in South Carolina, 1816-1836* (New York, 1966), p. 299.

13. Russel B. Nye, *Fettered Freedom: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Slavery Controversy, 1830-1860* (East Lansing, Mich., 1949), pp. 175, 178, 182-93.

14. Clement Eaton, *The Freedom-of-Thought Struggle in the Old South* (New York, 1964), p. 350; Avery Craven,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2nd ed. (Chicago, 1957), p. 300.

15. Craven,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301-2.

16. Allan Nevins, *Ordeal of the Union*, 2 vols. (New

York, 1947), I, 515; Eric McKittrick (ed.), *Slavery Defended: The View of the Old South* (Englewood Cliffs, N.J., 1963), pp. 58-59, 66-67.

17. McKittrick, *Slavery Defended* pp. 109-10.

18. William S. Jenkins, *Pro-Slavery Thought in the Old South* (Chapel Hill, N.C., 1935), p. 289.

19. Rollin C. Osterweis, *Romantic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Old South* (New Haven, 1949), 101;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30 (June 1860), 401-09.

20. Robert Manson Myers (ed.), *The Children of Pride* (New York, 1972), 489-94.

21. *Ibid.*, pp. 211-12.

第 四 章

1. Charles Sellers, "Election of 1844,"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4 vols. (New York, 1971), I, 760.

2. Frederick Merk, *Slavery and the Annexation of Texas* (New York, 1972), p. 20.

3. Sellers, "Election of 1844," p. 821.

4. William J. Cooper, *The South and the Politics of Slavery, 1828-1856* (Baton Rouge, 1978), p. 206.

5. Sellers, "Election of 1844," pp. 762, 855-56.

6. James D. Richardson (comp.),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789-1897*, 20 vols. (Washington, D.C., 1897-1913), V, 2292.

7. Louis Filler, *The Crusade Against Slavery 1830-1860* (New York, 1960), p. 186; *The Works of James Russell Lowell*, Standard Library ed., 11 vols. (Boston, 1890), VIII, 46-47; H. V. Ames (ed), *State Documents on Federal Relations* (Philadelphia, 1906), pp. 241-42.

8. Chaplain W. Morrison,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Sectionalism: The Wilmot Proviso Controversy* (Chapel Hill, N. C., 1967), pp. 11-12.

9. *Congressional Globe*, 29th Cong., 1st sess., (1846) 1217.

10. Eric Foner, "The Wilmot Proviso Revisited,"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 (September 1969), 270, 277 and 277n.

11. Michael F. Holt,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New York, 1978), p. 51.

12. Cooper, *The South and the Politics of Slavery*, pp. 235, 239, Holt,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p.54.

13. *Congressional Globe*, 29th Cong., 2nd sess., (1847) Appendix, 281; William L. Barney, *The Road to Secess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Old South* (New York, 1972), pp. 105-6.

14. *Congressional Globe*, 29th Cong., 2nd sess., (1847) 454-55; Morrison,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Sectionalism*, p.35.

15. Kinley J. Brauer, *Cotton Versus Conscience: Massachusetts Whig Politics and Southwestern Expansion, 1843-1848* (Lexington, Ky., 1967), p. 240.

16. Cooper, *The South and the Politics of Slavery*, p. 265.

17. *Ibid.*, p. 271.

18. Barney, *The Road to Secession*, pp. 106-7, 110.

19. J. Franklin Jameson (ed.), *Correspondence of John C. Calhoun*, in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1899* (Washington, D. C., 1900), II, 780; Holman Hamilton, *Prologue to Conflict: The Crisis and Compromise of 1850* (New York, 1964), p. 74.

20. *Congressional Globe*, 31st Cong., 1st sess., (1850) 451-55. Calhoun outlined his proposal for a concurrent majority in his posthumously published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

21. *Congressional Globe*, 31st Cong., 1st sess., (1850) 269-76.

22. *Ibid.*, pp. 260-69; Allan Nevins, *Ordeal of the Union*, 2 vols. (New York, 1947), I, 301.

23. David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New York, 1976), pp. 90, 113.

24. Cooper, *The South and the Politics of Slavery*, p.

301.

25. Roy and Jeannette Nichols, "Election of 1852,"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4 vols. (New York, 1960). II, 954.

26. Cooper, *The South and the Politics of Slavery*, 330.

27. *Ibid.*, p. 343.

第 五 章

1. Michael F. Holt,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New York, 1978), p. 77.

2. Davis and the *Mercury* quoted in Robert S. Starobin, *Industrial Slavery in the Old South* (New York, 1970), pp. 219—20; *Southern Quarterly* quoted in William R. Brock, *Parties and Political Conscience: American Dilemmas 1840—1850* (Millwood, N.Y., 1979), p. 319.

3. Davis and Brown quoted in Robert E. May, *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 1854—1861* (Baton Rouge, 1973), pp. 11, 9; many Southern voices quoted in John McCardell, *The Idea of a Southern Nation: Southern Nationalists and Southern Nationalism, 1830—1860* (New York, 1979), pp. 248, 258—59; *De Bow's Review* quoted in John Hope Franklin, *The Militant South* (Cambridge, Mass., 1956), p. 99.

4. William R. Manning (ed.),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American Affairs, 1831—1860*, 12 vols. (Washington, D. C., 1932—1939). XI, 175—78, 193—94.

5. Allan Nevins, *Ordeal of the Union*, 2 vols. (New York, 1947), II, 362.

6. John R. Wells to John Quitman, April 26, 1856, in May,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 p. 137.

7. William Walker, *The War in Nicaragua* (New York, 1860), pp. 278—80.

8. Emerson quoted in James Ford Rhod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 7 vols. (New York, 1893—1906), I, 207—8; Giddings quoted in

Frederick J. Blue, *The Free Soilers: Third Party Politics 1848—54* (Urbana, Ill., 1973) , p. 204.

9. Philip Foner(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4 vols.(New York, 1950-1955), II, 207.

10. Attorney quoted in Nevins, *Ordeal of the Union*, II, 151-52; Everett and Lawrence quoted in Jane H. and William H. Pease (eds.), *The Fugitive Slave Law and Anthony Burns* (Philadelphia, 1975), pp. 51 43.

11. *Congressional Globe*, 29th Cong., 2nd sess.,(1846) Appendix, 317.

12. Holt,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p. 162.

13. *Ibid.*,pp. 157-58.

14.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New York, 1970) , p. 231; Ray Allen Billington, *The Protestant Crusade 1800-1860;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Nativism* (New York, 1938) , p.425.

15. Foner, *Free Soil*, p. 234; Richard H. Sewell, *Ballots for Freedom, Antislave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7-1860* (New York, 1976) , p. 268.

16. Lincoln to Joshua Speed, August 24, 1855, in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II, 323.

第 六 章

1. Allan Nevins, *Ordeal of the Union*, 2 vols. (New York, 1947), II, 92-93.

2. David M.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New York, 1976), p. 160.

3. Nevins, *Ordeal*, II, 112.

4. James Ford Rhod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 7 vols. (New York, 1893-1906), I , 452-53.

5. James A. Rawley, *Race and Politics: "Bleeding Kansa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Philadelphia,1969); p. 36.

6.Seward quoted in *Congressional Globe*.33rd cong.,1st sess. (1854)Appendix,769;Atchison quoted in Rawley, *Race*

and Politics, p. 81

7. Rawley, *Race and Politics*, p. 88.

8. *Ibid.*, p. 89.

9. Robert L. Meriwether (ed.), "Preston S. Brooks on the Caning of Charles Sumner,"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52 (January 1951), 3.

10. Nevins, *Ordeal*, 11, 446-47; John Hope Franklin, *The Militant South 1800-1861* (Cambridge, Mass., 1956), pp. 54-55.

11. Stephen B. Oates, *To Purge This Land With Blood: A Biography of John Brown* (New York, 1970), 128-29, 133.

12. Roy F. Nichols and Philip S. Klein, "Election of 1856,"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4 vols. (New York, 1971), II, 1031; Michael F. Holt,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New York, 1978), pp. 196-97.

13. Nevins, *Ordeal*, II, 498.

14. Holt,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p. 187; Rawley, *Race and politics*, p. 162; Roy F. Nichols, *The Disrup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1948), p. 44.

第七章

1. Don E. Fehrenbacher, *The Dred Scott Case: Its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 (New York, 1978), p. 313.

2. *Ibid.*, p. 347

3. *Ibid.*, pp. 418-19

4. *Ibid.*, pp., 3, 234, 311. See also Don E. Fehrenbacher, "Roger B. Taney and the Sectional Crisis,"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43 (November 1977), 555-66.

5. Charles Warren, *The Supreme Court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rev. ed., 2 vols. (Boston, 1926), II, 302-9;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II, 467.

6. *New York Independent* quoted in Fehrenbacher, *Dred*

Scott Case, p. 429; *Chicago Tribune*, March 12, 1857.

7. *New York Tribune*, March 7, 1857.

8. Fehrenbacher, *Dred Scott Case*, p. 432, *Chicago Tribune*, March 19, 1857.

9. Don E. Fehrenbacher, *The South and Three Sectional Crises* (Baton Rouge, 1980), 54.

10. Fehrenbacher, *Dred Scott Case*, p. 456.

11.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II, 461.

12. *Ibid.*, III, 9—10.

13. *Ibid.*, III, 145—46.

14. *Ibid.*, II, 501, III, 16, 92—93, 315.

15. David M.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New York, 1976), p. 399.

16. *Ibid.*, p. 398; Ronald F. Takaki, *A Pro-Slavery Crusade: The Agitation to Reope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New York, 1971), p. 79.

17. Potter, *Impending Crisis*, p. 399, Allan Nevins, *The Emergence of Lincoln*, 2 vols. (New York, 1950), I, 406.

18. Takaki, *A Pro-Slavery Crusade*, p. 220.

19. Harvey Wish, ed., *Ante-Bellum: Writings of George Fitzhugh and Hinton Rowan Helper on Slavery* (New York, 1960). pp. 58, 82, 9, 85; Nevins, *Emergence of Lincoln*, I, 200n.

20. Vernon L. Parrington, *The Romantic Revolution in America, 1800—1861*. Harvest Books ed. (New York, 1954), p. 77; Arthur C. Cole,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1850—1865* (New York, 1934), p. viii.

21.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and Speeches of the Hon. James H. Hammond of South Carolina* (New York, 1866), pp. 317—19.

22. Wish, *Ante-Bellum*. pp. 201, 179.

23. Potter, *Impending Crisis*. p. 387.

24. Avery O. Craven, *The Growth of Southern Nationalism 1848—1861* (Baton Rouge, 1953), p. 251.

25. Potter, *Impending Crisis*, p. 389.

第 八 章

1. Stephen B. Oates, *To Purge This Land With Blood: A Biography of John Brown* (New York, 1970), pp. 237, 283.
2. *Ibid.*, p. 335
3.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John Brown, 1800-1859: A Biography Fifty Years After* (Boston, 1910), pp. 498-99, 554.
4. For Northern reaction to Brown's raid and its aftermath, see Oates, *To Purge This Land With Blood*, pp. 308-56, and Allan Nevins, *The Emergence of Lincoln*, 2 vols. (New York, 1950), II, 98-101.
5. For Southern reaction, see Nevins, *Emergence of Lincoln*, II, 102-12; Oates, *To Purge This Land With Blood*, pp. 320-24; David M.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New York, 1976), pp. 380-84.
6. Oates, *To Purge This Land With Blood*, p. 310; C. Vann Woodward, "John Brown's Private War," in Woodward, *The Burden of Southern History* (Baton Rouge, 1960), p. 46.
7. *Speech of William L. Yancey of Alabama, Delivered in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Convention*, p. 4; William B. Hesseltine (ed.), *Three Against Lincoln: Murat Halstead Reports the Caucuses of 1860* (Baton Rouge, 1960), p. 54.
8. Robert W. Johannsen, "Douglas at Charleston," in Norman A. Graebner (ed.), *Politics and the Crisis of 1860* (Urbana, Ill., 1961), p. 90.
9. Potter, *Impending Crisis*, p. 428.
10. William L. Barney, *The Road to Secess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Old South* (New York, 1972), p. 149.
11. Emerson D. Fite,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1860* (New York, 1911), p. 165; Dwight L. Dumond, *The Secession Movement, 1860-1861* (New York, 1931), p. 106.
12. *New York Herald*, August 1, 1860.
13.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J., 1953-1955), IV, 132-33.

14. Barney, *Road to Secession*, p. 156.
15. Reinhard H. Luthin, *The First Lincoln Campaign* (Cambridge, Mass., 1944), pp. 183, 208.
16. James M. McPherson, *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Abolitionists and the Negro i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Princeton, 1964), chap. 1.
17. Robert W. Johannsen, *Stephen A. Douglas* (New York, 1973), pp. 797-98, 803.
18. *New Orleans Daily Crescent*, November 13, 1860, and *Richmond Semi-Weekly Examiner*, November 9, 1860, in Dwight L. Dumond (ed.), *Southern Editorials on Secession* (New York, 1931), pp. 237, 223.
19. McPherson, *Struggle for Equality*, p. 27; Charles Francis Adams, *Diary*, November 7, 1860, quoted in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New York, 1970), p. 223.

第 九 章

1. Dwight L. Dumond, *The Secession Movement, 1860-1861* (New York, 1931), p. 122.
2. *Charleston Mercury*, November 8, 1860, Soulé quoted in Willie M. Caskey, *Secession and Restoration of Louisiana* (University, La, 1938), pp. 21-22, Judah Benjamin to Samuel L. M. Barlow, December 9, 1860, S. L. M. Barlow Papers,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3. Charles G. Sellers, "The Travail of Slavery," in Charles G. Sellers (ed.), *The Southerner as American* (Chapel Hill, 1960), pp. 69-70.
4. E. Merton Coulter,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Baton Rouge, 1950), pp. 14-15, *Atlanta Daily Intelligencer*, January 28, 1861, quoted in Donald E. Reynolds, *Editors Make War: Southern Newspapers in the Secession Crisis* (Nashville, 1970), p. 174.
5. *Congressional Globe*, 36th Cong., 2nd sess., (1860) 12.
6. Jesse T. Carpenter, *The South as a Conscious Minority, 1789-1861* (New York, 1930), p. 196.

7.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December 1, 1860, *New York Tribune*, May 21, 1862.

8. Dunbar Rowland (ed.), *Jefferson Davis, Constitutionalist: His Letters, Papers and Speeches*, 10 vols. (Jackson, Miss., 1923), VI, 357; *De Bow's Review*, 33 (1862), 44; *Augusta Daily Constitutionalist*, March 30, 1861.

9. George E. Baker (ed.), *The Works of William H. Seward*, 5 vols. (Boston, 1853-1884), IV, 302;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J., 1953-1955), II, 461.

10. *New Orleans Delta*, November 3, 1860.

11. Mary Boykin Chesnut, *A Diary from Dixie*, ed. Isabel D. Martin and Myrta Lockett Avery (New York, 1905), p. 1; James L. Roark, *Masters Without Slaves: Southern Planters i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77), p. 6.

12. Avery Craven, *Civil War in the Making, 1815-1860* (Baton Rouge, 1959), p. 102; *Richmond Whig and Public Advertiser*, March 19, 1860, in Dwight L. Dumond (ed.), *Southern Editorials on Secession* (Washington, D. C., 1931), p. 60; Michael P. Johnson, *Toward a Patriarchal Republic: The Secession of Georgia* (Baton Rouge, 1977), p. 47.

13. Reynolds, *Editors Make War*, p. 150.

14. James D. Richardson, (comp.)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789-1897*, 20 vols. (Washington, D. C., 1897-1913), V, 628, 630, 632-34, 637.

15. *Ibid.*, pp. 635-36; Kenneth M. Stampp, *And the War Came: The North and the Secession Crisis, 1860-61* (Baton Rouge, 1950), p. 56.

16. Stampp, *And the War Came*, p. 44.

17. Richardson,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V, 626-27, 630, 638, 642.

18. *Boston Daily Advertiser*, December 7, 1860, and *Des Moines Iowa State Register*, December 12, 1860, in Howard C. Perkins (ed.), *Northern Editorials on Secession*, (New York, 1942) pp. 147, 157.

19. *Douglass' Monthly*, January 1861.
20. Stamp, *And the War Came*, p.169.
21.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IV, 150,154,172.
22. *Ibid.*, p.160.
23. For discussions of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Crittenden Compromise, see Stamp, *And the War Came*, chaps. 8-9, and David M. Potter, *Lincoln and His Party in the Secession Crisis* (New Haven, 1942), chap. 8.
24. Edward McPhers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Great Rebellion*, 2nd ed. (Washington, 1865), p.37; Davis quoted in Samuel C. Buttersworth to Samuel L. M. Barlow, December 3, 1860, Benjamin to Barlow, December 9, 1860, Barlow Papers.
25. Allan Nevins, *The Emergence of Lincoln*, 2 vols. (New York, 1950), II.431.
26.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IV, 249-71, reproduces the first and final drafts of the address, with annotations of all revisions and corrections.
27. James C. Randill, *Lincoln the President*, 4 vols (New York, 1945-1955) I, 308-9
28. Samuel L. M. Barlow to Judah P. Benjamin, December 29, 1861, Barlow Papers
29. Richard N. Current, *Lincoln and the First Shot* (Philadelphia, 1963), p.119, Bruce Catton, *The Coming Fury* (Garden City, N.Y., 1961), p. 278.
30. Stamp, *And the War Came*, pp.267-68; Current, *Lincoln and the First Shot*, p.118.
31.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IV, 316-18.
32. *Ibid.*, p. 323.
33. Current, *Lincoln and the First Shot*, pp. 138-39.

第 十 章

1. Roy P. Basler(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IV, 331-32.
2. Henry Steele Commager (ed.), *The Blue and the Gray*,

rev. ed. (Indianapolis, 1973), I, 47; Bruce Catton, *The Coming Fury* (Garden City, N.Y., 1961), p. 325.

3. *Chicago Tribune*, May 2, 1861; Henry B. Stanton to Elizabeth Cady Stanton, April?, 1861, E. C. Stanto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4. *War of the Rebellion: A Compilation of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Armies* (Washington, D.C., 1880-1901), Ser. 3, Vol. 1, pp. 71, 79. Hereinafter cited as *O. R. (Official Records)*.

5. *Ibid.*, pp. 70, 72, 76, 81, 83.

6. 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Fort Sumter to Perryville* (New York, 1958), p. 51.

7. *Ibid.*, p. 53;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The Improvised War, 1861-1862* (New York, 1959), p. 78.

8. *O.R.*, Ser. 3, Vol. 1, p. 83.

9. Thomas L. Snead, *The Fight for Missouri from the Election of Lincoln to the Death of Lyon* (New York, 1886), pp. 199-200.

10. Jay Monaghan, *Civil War on the Western Border 1854-1865* (New York, 1955), p. 185.

第十一章

1.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The Improvised War, 1861-1862* (New York, 1959), pp. 87, 95-96, 151;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Johnny Reb: The Common Soldier of the Confederacy* (Indianapolis, 1943), p. 310.

2. B. H. Liddell Hart, *Sherman: Soldier, Realist, American* (New York, 1929), pp. 74, 72.

3. Bruce Catton, *Grant Moves South* (Boston, 1960), p. 93.

4. Dunbar Rowland (ed.), *Jefferson Davis, Constitutionalist: His Letters, Papers and Speeches*, 10 vols. (Jackson, Miss., 1923), IX, 543;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Regular and Volunteer Officers," *Atlantic Monthly*, 14 (September 1864), 349.

5.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Billy Yank: The Common Soldier of the Union* (Indianapolis, 1952), p. 26; Douglas Southall Freeman, *Lee's Lieutenants: A Study in Command*, 3 vols. (New York, 1942-1944), I, 13.

6. Halleck to W. T. Sherman, April 29, 1864, in *O. R.*, Ser. 1, Vol. 34, pt. 3, pp. 332-33.

7. See especially Frank L. Owsley, *King Cotton Diplomacy* (Chicago, 1931).

第十二章

1.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Johnny Reb: The Common Soldier of the Confederacy* (Indianapolis, 1943), pp. 128-29.

2. Hugh C. Bailey, "Disloyalty in Early Confederate Alabama,"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3 (November 1957), 525.

3. Albert B. Moore, *Conscrip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Confederacy* (New York, 1924), pp. 256., 71.

4. Quoted in Richard N. Current, "God and the Strongest Battalions," in David Donald (ed.), *Why the North Won the Civil War* (Baton Rouge, 1960), p. 5.

5. Dunbar Rowland (ed.), *Jefferson Davis, Constitutionalist: His Letters, Papers and Speeches*, 10 vols. (Jackson, Miss., 1923), V, 84.

6. *London Times*, July 18, 1861, August 29, 1862.

7. John Slidell to Samuel L. M. Barlow, July 20, 1861, Judan Benjamin to Barlow, January 8, 1861, S. L. M. Barlow Papers,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8.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Billy Yank: The Common Soldier of the Union* (Indianapolis, 1952), p. 283; Douglas Southall Freeman, *Lee's Lieutenants: A Study in Command*, 3 vols. (New York, 1942-1944), III, 146n.

9.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V, 505; *O. R.*, Ser. 1, Vol. 12, pt. 3, p. 890.

10. Quoted in Donald, *Why the North Won the Civil War*, p. ix.

11. Franklin Marshall Pierce, *The Battle of Gettysburg* (New York, 1914), pp. 37-38.
12. Thomas L. Livermore, *Numbers and Losses i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 (Boston, 1901).
13. Quoted in J. F. C. Fuller, *Grant and Lee: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Generalship* (London, 1933), p. 41.
14. Bruce Catton, *Glory Road* (Garden City, N. Y., 1952), p. 170.
15. Catton's introduction to Virgil Carrington Jones, *Gray Ghosts and Rebel Raiders* (New York, 1956), pp. vii-viii, and Jones's own assertion in *ibid.*, 12.
16. Albert Castel, *The Guerrilla War, 1861-1865* (Gettysburg, 1974).
17. Bruce Catton, *The Coming Fury* (Garden City, N. Y., 1961), p. 413.
18. Jones, *Gray Ghosts and Rebel Raiders*, p. 279.
19. William T. Sherman, *Memoirs of General W. T. Sherman*, 2 vols., 2nd ed. (New York, 1886), I, 365-66.
20. H. C. B. Rogers, *The Confederates and Federals at War* (London, 1973), p. 51.
21. Wiley, *Billy Yank*, p. 63.
22. See especially Robert V. Bruce, *Lincoln and the Tools of War* (Indianapolis, 1956), and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The Improvised War 1861-1862* (New York, 1959), pp. 361-69.
23. *The Civil War Diary of General Josiah Gorgas*, ed. Frank E. Vandiver (University, Ala., 1947), 90-91.
24. Douglas Southall Freeman, *R. E. Lee: A Biography*, 4 vols. (New York, 1934-1935), III, 247.
25. Russell F. Weigley, *Quartermaster-General of the Union Army: A Biography of Montgomery C. Meigs* (New York, 1959), p. 205.
26. Eugene M. Lerner, "The Monetary and Fiscal Problems of the Confederate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 (December 1954), 520.
27. Bray Hammond, *Sovereignty and an Empty Purse:*

Banks and Politics in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1970), p.23.

28. Hugh McCulloch, *Men and Measures of Half a Century* (New York, 1888), p. 201, *Congressional Globe*, 37th Cong., 2nd sess., (1862) 549.

29. Francis Fessenden,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William Pitt Fessenden*, 2 vols. (Boston, 1907), I, 194; Chase quoted in Robert P. Sharkey, *Money, Class, and Party: An Economic Study of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Baltimore, 1959), p. 41.

第十三章

1. *O. R.*, Ser. 1, Vol. 51, pt. 1, pp. 369—70.

2. T. Harry Williams, *Lincoln and His Generals* (New York, 1952), p. 21.

3. Bruce Catton, *Glory Road* (Garden City, N. Y., 1952), p. 57.

4. Joseph E. Johnston,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irst Bull Run," *Battles and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 4 vols. (New York, 1887), I, 252.

5. Kenneth P. Williams, *Lincoln Finds a General: A Military Study of the Civil War*, 5 vols. (New York, 1949—1959), I, 113.

6. George B. McClellan, *McClellan's Own Story* (New York, 1886), pp. 85, 91, 172; Bruce Catton, *Terrible Swift Sword* (Garden City, N.Y., 1963), pp. 80, 84—85.

7. Tyler Dennett (ed.),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in the Diaries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New York, 1939), p. 33.

8. *McClellan's Own Story*, p. 87; Catton, *Terrible Swift Sword*, p. 84; 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Fort Sumter to Perryville* (New York, 1958), p. 141.

9. Foote, *Fort Sumter to Perryville*, pp. 141—42; *McClellan's Own Story*, p. 176; Dennett,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p. 34.

10. Montgomery Blair to Francis P. Blair, Sr., October 1, 1861, Blair-Lee Pap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McClellan to Samuel L. M. Barlow, November 8, 1861,

S. L. M. Barlow Papers,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11. Frank L. Owsley, *King Cotton Diplomacy: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Chicago, 1931), pp. 16—23.

12. Robert H. Jones, *Disrupted Decades: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Years* (New York, 1973), p. 363.

13. Ephraim D. Adams, *Grea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2 vols. (New York, 1925), I, 263.

14.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The Improvised War, 1861—1862* (New York, 1959), p. 388.

第十四章

1.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V, 95; T. Harry Williams, *Lincoln and His Generals* (New York, 1952), pp. 55—56.

2. Ulysses S. Grant, *Personal Memoirs*, 2 vols. (New York, 1885—1886), I, 311.

3. Ephraim D. Adams, *Grea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2 vols. (New York, 1925), I, 272—73.

4. Bruce Catton, *Grant Moves South* (Boston, 1960), p. 218; 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Fort Sumter to Perryville* (New York, 1958), pp. 329, 331.

5. Catton, *Grant Moves South*, p. 247.

6. Kenneth P. Williams, *Lincoln Finds a General: A Military Study of the Civil War*, 5 vols. (New York, 1949—1959), III, 389; 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Red River to Appomattox* (New York, 1974), p. 398.

7. Bruce Catton, *Terrible Swift Sword* (Garden City, N. Y., 1963), p. 236.

8. *Ibid*, p. 261.

9. Catton, *Grant Moves South*, p. 371.

第十五章

1.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V, 184-85; Johnston to Robert E. Lee, April 22, 1862, *O. R.*, Ser. 1, Vol. II, pt. 3, pp 455-56

2. Edward T. Downer, *Stonewall Jackson & Shenandoah Valley Campaign, 1862* (Charlottesville, 1959), p. 27.

3. George B. McClellan, *McClellan's Own Story* (New York, 1886), p. 398, T. Harry Williams, *Lincoln and His Generals* (New York, 1952), p. 106.

4. 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Fort Sumter to Perryville* (New York, 1958), p. 465, Douglas Southall Freeman, *R.E. Lee: A Biography*, 4 vols. (New York, 1934-1935), II, 92.

5. *O. R.*, Ser. 1, Vol. 14, p. 266.

6. *O. R.*, Ser. 1, Vol. 11, pt. 1, p. 61.

7. Daniel H. Hill, "McClellan's Change of Base and Malvern Hill," in *Battles and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 4 vols. (New York, 1887), II, 394.

8. Foote, *Fort Sumter to Perryville*, p. 509.

9. Bruce Catton, *Mr. Lincoln's Army* (Garden City, N. Y., 1951), p. 149.

10. *Ibid.*, p. 166.

11.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Johnny Reb* (Indianapolis, 1943), pp. 35, 75;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Billy Yank* (Indianapolis, 1952), p. 79.

12. Wiley, *Johnny Reb*, pp. 308-9; Wiley, *Billy Yank*, p. 348.

13. Foote, *Fort Sumter to Perryville*, pp. 518-19.

14. Samuel L. M. Barlow to Henry D. Bacon, July 15, 1862, S.L.M. Barlow Papers,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292

15.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296-97.

16. *O. R.*, Ser. 1, Vol. 12, pt. 3, pp. 473-74.

17. Douglas Southall Freeman, *R.E. Lee, a Biography*, 4 vols. (New York, 1934-1935), II, 264.

18. *O.R.*, Ser. 1, Vol. 17, pt. 2, p. 150.

19. George B. McClellan, *McClellan's Own Story* (New

York, 1886), pp. 487—89.

20. McClellan to Samuel L. M. Barlow, July 23, 1862, Barlow Papers.

21. Stephen E. Ambrose, *Halleck: Lincoln's Chief of Staff* (Baton Rouge, 1962), *passim*.

22. Porter to Manton Marble, August 10, 1862, in T. Harry Williams, *Lincoln and His Generals* (New York, 1952), p. 148.

23. *McClellan's Own Story*, pp. 514-15; Tyler Dennett (ed.),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in the Diaries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New York, 1939), pp. 45, 47; Gideon Welles, *The Diary of Gideon Welles*, ed. Howard K. Beale, 3 vols. (New York, 1960), I, 93-106.

24. Dennett,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p. 47; Welles, *Diary*, I, 113.

第十六章

1.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The Improvised War 1861-1862* (New York, 1959), pp. 204, 205.

2. John G. Nicolay and John Hay, *Abraham Lincoln: A History*, 10 vols. (New York, 1890), IX, 119-20.

3.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J., 1953-1955), IV, 347, 353-54, 364, 414, 419, V, 241-42.

4. Edward McPherson (ed.),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Great Rebellion*, 2nd ed. (Washington, D.C., 1865), p. 150.

5. *Chicago Daily Journal*, April 17, 1861, in Howard C. Perkins (ed.), *Northern Editorials on Secession*, 2 vols. (New York, 1942), II, 808-9;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I, 332.

6.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IV, 438; Tyler Dennett (ed.),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in the Diaries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New York, 1939), p. 19.

7.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53, VII, 23.

8. Belle B. Sideman and Lillian Friedman (eds.), *Europe Looks at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60), pp. 117-18.

9.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IV, 263; *Congressional Globe*, 37th Cong., 1st sess., (1861) 222—23.

10. *Saturday Review*, September 14, 1861, quoted in Ephraim D. Adams, *Grea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2 vols. (New York, 1925), I, 181; *Economist* (London), September 1861, quoted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Richard Enmale (New York, 1937), p. 12.

11.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II, 255, III, 92.

12. William Lloyd Garrison to Oliver Johnson, April 19, 1861, W. L. Garrison Papers, Boston Public Library; *Douglass' Monthly*, May 1861.

13. Edward L. Pierce, *Memoir and Letters of Charles Sumner*, 4 vols. (Boston, 1877-1893), IV, 49.

14. *Montgomery Advertiser*, November 6, 1861.

15. *Douglass' Monthly*, July 1861.

16.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48-49.

17. *Principia*, May 4, 1861.

18. Margaret Shortreed, "The Anti-Slavery Radicals, 1840-1868," *Past and Present*, no. 16 (November 1959), 77.

19. McPherson, *Political History*, pp. 196-98.

20. *Liberator*, December 6, 1861, July 25, 1862.

21.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222-23.

22. *Boston Advertiser*, August 20, 1862;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317-19;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War Becomes Revolution* (New York, 1960), pp. 148-49.

23. *Douglass' Monthly*, September 1861; Gideon Welles, *The Diary of Gideon Welles*, ed. Howard K. Beale, 3 vols. (New York, 1960), I, 70-71; Francis B. Carpenter, *Six Months at the White House With Abraham Lincoln* (New York, 1866), p. 22.

24. Frank L. Klement, "Economic Aspects of Middle Western Copperheadism," *Historian*, 14 (Autumn 1951), 39-40; Wood Gray, *The Hidden Civil War; The Story of the Copperheads* (New York, 1964; first printed 1942), p. 125.

25. Samuel S. Cox, "Puritanism in Politics," in Sa-

muel S. Cox, *Eight Years in Congress* (New York, 1865), pp. 283, 290; Cuthbert E. Allen, "The Slavery Question in Catholic Newspapers, 1850-1865," U. S. Catholic Historical Society,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tudies*, 26 (1936), 145, 160.

26. Cox, "Puritanism in Politics," p. 283.

27. Joel H. Silbey, *A Respectable Minority: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Civil War Era, 1860-1868* (New York, 1977), p. 101; Frank L. Klement, *The Limits of Dissent: Clement L. Vallandigham and the Civil War* (Lexington, Ky., 1970), p. 79.

28. *Congressional Globe*, 37th Cong., 2nd sess., (1862) 1923, Samuel L. M. Barlow to Henry D. Bacon, January 23, 1862, Barlow Papers,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Benjamin J. Blied, *Catholics and the Civil War* (Milwaukee, 1945), pp. 44-45.

29. V. Jacque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The Midwest and the Negro During the Civil War* (Chicago, 1967), p. 6; Forrest G. Wood, *Black Scare: The Racist Response to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1968), p. 35; Frank L. Klement, *The Copperheads in the Middle West* (Chicago, 1960), p. 14.

30.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pp. 1, 18.

31.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Billy Yank* (Indianapolis, 1952), p. 40.

32. *Ibid.*, pp. 42, 109.

33. *Ibid.*, p. 44.

34. *Ibid.*, p. 114.

35. *Ibid.*, p. 112.

36.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370-75.

37. Purvis in *New York Tribune*, September 20, 1862; David Donald (ed.), *Inside Lincoln's Cabinet: The Civil War Diaries of Salmon P. Chase* (New York, 1954) p. 112.

38. *Boston Post*, quoted in *Boston Commonwealth*. October 18, 1862.

39.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p. 45.

40.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March 19, 1864.
41.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388-89.
42. *Ibid.*, V, 419-25.

第十七章

1. Bruce Catton, *Terrible Swift Sword* (Garden City, N. Y., 1963), p. 449; T. Harry Williams, *Lincoln and His Generals* (New York, 1952), p. 166.
2. *O. R.*, Ser. 1, Vol. 19, p. 218.
3. Frederick Tilbert, *Antietam* (National Park Service, Washington, D. C., 1961), pp. 36, 39.
4. *O. R.*, Ser. 1, Vol. 19, p. 377.
5. Jay Luvaas, *The Military Legacy of the Civil War: The European Inheritance* (Chicago, 1959), pp. 18-19.
6. George B. McClellan, *McClellan's Own Story* (New York, 1886), p. 612.
7. *O. R.*, Ser. 1, Vol. 16, pt. 2, p. 421.
8. Gideon Welles, *The Diary of Gideon Welles*, ed. Howard K. Beale, 3 vols. (New York, 1960), I, 142-45; John G. Nicolay and John Hay, *Abraham Lincoln: A History*, 10 vols. (New York, 1890), VI, 158-63.
9. Henry G. Pearson, *The Life of John A. Andrew*, 2 vols. (Boston, 1904), II, 51; Samuel May, Jr., to Richard Webb, September 23, 1862, Samuel May, Jr., Papers, Boston Public Library.
10.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V, 436-37.
11. *Ibid.*, VI, 263, 266-67.
12. James G. Randall, *Constitutional Problems Under Lincoln*, rev. ed. (Urbana, Ill., 1951), chaps. 6-8, 19-20; quotations from pp. 154, 155, 520.
13. *New York World*, October 18, 1862; V. Jacque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The Midwest and the Negro During the Civil War* (Chicago, 1967), p. 55.
14.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p. 64.

15. William B. Hesseltine, *Lincoln and the War Governors* (New York, 1948), p. 265.
16. *Congressional Globe*, 37th Cong., 3rd sess., (1862) 15,92.
17.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537.
18. Sumner to Samuel Gridley Howe, December 23, 1862, Sumner-Howe Correspondenc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 *Spectator* (London), October 11, 1862.
20. Augustus Auberne to Samuel L. M. Barlow, January 17, 1863, S. L. M. Barlow Papers,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21.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War Becomes Revolution* (New York, 1960), p. 239; *O. R.*, Ser. 1, Vol. 24, pt. 3, p. 157.
22. McClellan to William H. Aspinwall, September 26, 1862, in *Battles and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 Extra-Illustrated ed.,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Vol. VIII; Porter to Manton Marble, September 30, 1862, in Nevins, *War Becomes Revolution*, pp. 238-39.
23.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442-43, 508-9; Nicolay and Hay, *Abraham Lincoln*, VI, 186-88.
24. *O.R.*, Ser. 1, Vol. 19, pt. 2, pp. 395-96.
25. McClellan to Ellen McClellan, September 20, 1862, McClell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26. *O. R.*, Ser. 1, Vol. 19, pt. 1, p. 72;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 474.
27. McClellan to Ellen McClellan, undated, McClellan Papers.
28. Tyler Dennett (ed),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in the Diaries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New York, 1939), pp. 218-19.